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2011

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自我反思的立场

Lijuan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tran_etd

Part of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Commons](#), an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陈丽娟 (2011)。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自我反思的立场 (博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tran_etd.1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
——自我反思的立场

陈丽娟

哲学博士

岭南大学

二零一一年

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
——自我反思的立场

陈丽娟

此论文为翻译哲学博士学位课程之部分要求

岭南大学

二零一一年

论文撮要

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 ——自我反思的立场

陈丽娟

哲学博士

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已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介入翻译研究，并成为“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中的两大流派。但是，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在缺乏自我反思立场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分别体现了对种族维度和性别维度的漠视，从而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尽管已有极少数学者，从结合性别和种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了有关翻译现象，她们并没有考虑将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性地纳入翻译研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体现自我反思。有鉴于此，本研究一方面以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尝试体系性地将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纳入翻译研究，另一方面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尝试如何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并审视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其他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所具体分析过的翻译现象。

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提出一系列翻译研究问题之后，本研究继而选择其中的两个问题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即考察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在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政治，以及西方女译者在处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本方面的翻译政治。在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的启发下，以及在保持自我反思立场的同时，本研究首先审视了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 Books 以及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 Press，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选材特点。接着，本研究考察了美国白人女译者，在处理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所著《扶桑》中体现道家思想和佛教内涵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方面，所采用的翻译方式。本研究表明，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殖民，西方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及其背后文化理据之间的权力差异，以及相关主体所具有的白人女性身份，以颇为复杂的形式，体现于涉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翻译选材和翻译方式。此外，通过上述讨论，本研究也展示了如何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并凸显自我反思的翻译研究话语的内部冲突和暧昧之处。

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本论文为原创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发表或未发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适当注明出处。

（陈丽娟）

二零一一年一月

目录

表格与图示.....	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一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在研究立场上体现的倾向.....	2
二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在研究主题上体现的倾向.....	7
第二节 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	8
第三节 研究立场.....	11
一 何为自我反思.....	11
二 强调翻译研究需自我反思的语境.....	12
三 如何在“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中做到自我反思.....	14
第四节 论文构架.....	15
第二章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	17
第一节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种族维度的隐形.....	17
一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19
二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	21
三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	24
四 小结.....	25
第二节 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性别维度的隐形.....	26
一 主流后殖民翻译理论.....	27
二 主流后殖民翻译史.....	28
三 主流后殖民翻译批评.....	29
四 小结.....	30
第三章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	33

第一节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33
一 学界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概念的分歧.....	33
二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34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所受到的批评.....	41
第二节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42
一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42
二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史.....	44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批评.....	46
第三节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47
一 现有的少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及其不足.....	48
二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需要注意的问题.....	52
第四章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 面的翻译选材政治.....	54
第一节 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	55
一 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的历史源起和发展现状.....	55
二 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与种族问题.....	57
第二节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美国的 Aunt Lute Books 在出版中国女性 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	58
一 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	58
二 Aunt Lute 翻译出版的女性文本.....	59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选材分析: Aunt Lute 与严歌苓.....	60
四 小结.....	82
第三节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英国的 Virago Press 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 方面的翻译选材.....	87
一 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	87
二 Virago 翻译出版的女性文本.....	88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选材分析: Virago 与马燕.....	89
四 小结.....	10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02
第五章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	107

第一节 严歌苓的历史小说《扶桑》.....	107
一 《扶桑》中的多重话语.....	108
二 《扶桑》的总体英译情况.....	110
第二节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111
一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抵制....	111
二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观点.....	113
三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道家思想和佛教内涵.....	116
四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主义.....	120
五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悖论.....	121
第三节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	122
一 美国白人女译者 Cathy Silber.....	122
二 Silber 与 Hyperion East 主编之间的合作.....	130
三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	13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73
一 译者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在翻译中的体现.....	175
二 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	180
三 小结.....	181
第六章 结论.....	186
第一节 研究发现.....	186
一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186	
二 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188
三 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 本方面的特点.....	194
第二节 研究局限及后续研究的可能性.....	195
参考文献	197

表格与图示

表格

表 1: 在涉及所选五类主题方面, 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78
表 2: 在涉及所选五类主题方面, Aunt Lute 对不同主题体现的不同程度重视.....	80
表 3: 在出版严歌苓作品方面, 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倾向.....	82
表 4: Virago 翻译出版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	96
表 5: Virago 翻译出版的白人女性文本.....	96
表 6: 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 Aunt Lute 和 Virago 所体现的异同.....	103
表 7: 翻译“扶桑的母亲意象”.....	139
表 8: 翻译“扶桑的宽恕”.....	145
表 9: 翻译“扶桑的以受为攻”.....	158
表 10: 翻译“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	169
表 11: 翻译“扶桑的女菩萨形象”.....	172
表 12: 翻译《扶桑》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174

图示

图 1: <i>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i> 的封面.....	79
图 2: 电影《天浴》(DVD) 的封面.....	81
图 3: 《马燕日记》的出版.....	93
图 4: 《马燕日记》的 2004 年版本 (Virago)	100
图 5: 《马燕日记》的 2005 年版本 (Virago)	100

致谢

在此，谨向所有在论文写作期间帮助过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感谢导师孙艺风教授和陈德鸿教授。他们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并都对我的学业和生活给予了莫大关怀，使我从中受益并深受鼓励。正是在两位导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我最终完成了论文写作。

感谢论文评审委员会的张南峰教授、童元方教授、龙惠珠博士。他们都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也对我给予了莫大鼓励。此外，也要感谢在我论文写作的不同阶段、在其他场合给我提过意见的老师。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穆雷教授，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也要感谢李波博士，以及李文静和彭勇穗同学。他们在各方面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铭记在心。

感谢系秘书陈彩云女士和赵玉婵小姐，感谢她们为我提供的帮助。同时，也要感谢所有其他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朋友，感谢他们为我提供宝贵的一手材料以及必要信息。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与关怀，特别要感谢我的先生杨英杰，感谢他在我论文写作期间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第一章 绪论

本章主要介绍以下内容，包括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范围、研究目标、研究立场，和论文构架。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翻译研究体现了强烈的跨学科特点。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已纷纷介入翻译研究，并已产生不少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中，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两大流派，构成 Brownlie (2007: 135) 所谓的“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committed approach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的主干。需要承认的是，把“committed approaches”翻译成“效忠取向”，²或许不是特别理想，因为其中的“效忠”意味着“忠诚”，这会使人认为“效忠”的翻译研究者没有可能反思所服务的议程和所进行的研究项目。不过，考虑到存在“效忠”和“愚忠”（盲目和无原则的忠诚）之分，“效忠”者还是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反思。³

但是，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两个倾向。第一是研究立场上的倾向，体现了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容易体现的倾向，即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我反思的立场。第二是研究主题上的倾向，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体现了对种族维度和性别维度的漠视，因为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关注性别层面的权力关系，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只关注种族文化层面的权力关系。

尽管已有极少数学者，从结合性别和种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了翻译，但他们一方面没有考虑体系性地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纳入翻译研究，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我反思的立场。

¹ Brownlie (2008: 335) 区分了两种类型的跨学科，包括借用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工具性跨学科”(instrumental interdisciplinarity)，以及探索学科之间共性的“纲要性跨学科”(synoptic interdisciplinarity)。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前者。

² 邵毅 (2007) 把“committed approaches”翻译成“指向性路向”。在我看来，这个译文的意思不够明确。

³ 我在本论文中提及效忠和效忠取向时，均加上双引号，借此表示我对这个译文不是十分满意。

一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在研究立场上体现的倾向

正如我在上文指出，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体现了“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在研究立场上容易体现的倾向，即自我反思的缺乏。本部分将关注“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的界定，以及类似研究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上述倾向。

(一) “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的界定

“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相对于描述取向的翻译研究，由 Brownlie (2003; 2007) 在 Hermans (1999) 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展开探讨。Hermans 指出，正如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等认为中立而不带价值判断的观点是不存在的，并认为人文学科参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一样，借助性别、后殖民、文化物质主义理论的翻译研究，也从一个“效忠的、对抗的、批评的”(committed, oppositional and critical) 视角看待翻译，凸显翻译的社会政治背景及影响，从而构成翻译研究中“更为效忠的取向”(1999: 146; 155; 157)。Brownlie 摘取了其中的“效忠取向”，并进行了扩充和论述。

Brownlie 指出，“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复兴的“有关翻译的规定取向”(prescriptive approaches regarding translation)，特点是强调“政治效忠”(political commitment) 的重要性，并区分了两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第一类涉及“特定的”(specific) 政治“效忠”，第二类涉及“宽泛的”(general) 政治“效忠”即强调“政治参与”(political engagement) 的重要性，并认为后者代表了某种新的研究领域(2007: 136-137)。可见，Brownlie 之所以把“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与描述取向的翻译研究相对，是因为她认为“效忠取向”包含了“规定”成分。

Brownlie 认为，在第一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中，研究者的直接研究动机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议程，并提倡某种特定的翻译方式：比如，女性主义学者 Lotibinière-Harwood 认为只应该翻译“对女性主义者友好的”文本，⁴并认为

⁴ Brownlie (2007) 参考了 Lotibinière-Harwood 的 *The Body Bilingual: 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

应该使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翻译这些文本，后殖民学者 Niranjana 提倡凸显“异质”(heterogeneity)的翻译方式，⁵而参考文化物质主义理论的 Venuti 则提倡“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⁶很明显，Brownlie 所界定的第一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⁷就是 Hermans 所谓的翻译研究中“更为效忠的取向”，属于 Baker(1996)所谓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范式，⁸同时也属于 Koskinen(2004)所谓的批评翻译学。⁹

Brownlie 继而指出，相比之下，第二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没有支持某个特定政治议程，也没有提倡某种特定翻译方式，但相关研究者如 Baker 和 Tymoczko 本人，均相信“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实践，¹⁰这使得她们规定（至少是强烈支持）特定翻译观，规定（至少是提倡）特定翻译研究项目：比如，Tymoczko 和 Baker 都质疑将译者视为中立中间人的隐喻，而强调译者的社会政治立场，并都强调并致力于把翻译当作干涉和参与来研究。¹¹

不难看出，Brownlie 把相关研究者是否支持特定政治议程，以及是否提倡特定翻译方式，当作区分上述两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的关键。但在我看来，上述划分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类似划分排除了很多“效忠”于某个特定政治议程，却没有建议特定翻译方式的研究。以有关历史上女译者的研究为例。相关研究重点考察历史上的女译者如何借助翻译抵制父权限制和为社会做贡献等，旨在促使女性浮出历史地表。尽管没有提倡特定翻译方式，类似研究明显“效忠”于女性主义议程。

⁵ Brownlie(2007)参考了 Niranjana 的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⁶ Brownlie (2007) 参考了 Venuti 的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Hermans (1999) 和 Brownlie (2003; 2007) 都没有把 Venuti 的有关论著纳入后殖民翻译研究范畴；其他学者如 Robinson (1997)、Pettersen (1999)、Gentzler (2003) 等则将其纳入后殖民翻译研究范畴。

⁷ Brownlie (2003) 更为详细地探讨了第一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

⁸ Baker 指出，鉴于文化研究具有政治化任何研究对象的特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范式均有一个政治议程，这个议程可涉及性别、种族、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出版策略、源文本的文化特色 (1996: 9; 13)。在我看来，Baker 把性别和种族等问题与出版策略和源文本的文化特色放在同一个层面，似有不妥之处。

⁹ Koskinen (2004: 153-154) 指出，“批评翻译学”(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认为，研究者的任务不仅包括描述，也包括尝试改善现状或解决问题，如提高译者地位、建立更平等的社会等。

¹⁰ 比如，Baker 的个人主页体现了她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 Tymoczko 则多次参加过美国的政治运动 (Brownlie 2007: 137)。

¹¹ Brownlie(2007)参考了 Tymoczko 的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tivism, Soci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eopolitical Shifts”、“Ideology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Translator: In What Sense is a Translator ‘In Between’?”，以及 Baker 的 “Narratives in and of Translation”、*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Translation and Activism: Emerging Patterns of Narrative Community”。

第二，类似划分将没有“效忠”于某特定政治议程却只是强调翻译政治性，并把翻译当作干涉和参与来审视的研究，纳入“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范畴，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概念和类别的区分性。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有关翻译政治性的观点（包括译者的政治立场、翻译行为的政治性、译文的政治用途等）已被普遍认可，而把单单强调和实践这种普遍观点的研究纳入“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范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者的有效性。

第三，Brownlie 认为，Tymoczko (1999a) 有关翻译如何帮助抵制英国殖民统治的研究，属于第二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没有“效忠”于特定政治议程，也没有提倡特定翻译方式），这是有争议的。因为 Tymoczko 的这个研究往往被纳入后殖民翻译研究范畴，¹²为此可被认为“效忠”于某个特定政治议程。

此外，有学者可能不同意有关描述取向和“效忠取向”的划分，认为任何翻译研究都可以被理解为“效忠”于某个观点、理论等。但在我看来，类似划分还是有其可取之处，重要的是如何更合理地界定“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

考虑到 Brownlie 在界定“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方面存在上述问题，以及考虑到 Hermans 对“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的理解过于狭窄（等同于 Brownlie 所谓的第一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我拟对此重新界定。

在我看来，“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是在各种程度上和以各种方式认同某个特定政治议程的翻译研究。其中的“效忠”，表示研究者通过有关翻译研究，增强有关政治议程的“显形”（visibility），从而达到服务特定政治议程的目的，这跟有没有提倡特定翻译方式（规定主义）没有必然关系。为此，在均认同某个特定政治议程的情况下，“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可以包括公然支持特定翻译方式的翻译研究（高程度的“效忠”），秘密/间接支持特定翻译方式的翻译研究，不支持任何特定翻译方式的翻译研究（低程度的“效忠”），等等。为此，“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概念应该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 Brownlie 所建议的两个类别。此外，“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或直接或迂回），体现对某个特定政治议程的“效忠”，包括研究强势者如何借助翻译统治或帮助弱势者，或是弱势者如何借助翻译抵制或迎合强势者，或是通过建构新的翻译理论颠覆霸权翻译理论，等等。

¹² 比如 Bouagada (2005)、Hermans (2009)、Wang (2009) 等都持类似观点。

(二) “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在研究立场上体现的倾向

正如文化研究中有关“抵制”(resistance)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被认为体现研究者的“政治幻想”(political fantasies),而非所研究对象一样(Saukko 2003: 5),“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也不断受到批评。

Baker (1996: 17-18) 和 Hermans (1999: 156) 都曾提出有关质疑和批评(但他们针对的,是 Brownlie 所谓的第一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Baker 就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以下批评:首先,因为缺乏自身方法论,该范式(会)促长不够专业、不够严谨的研究;其次,因为所涉及的政治议程,该范式也有可能导致翻译研究中规定主义传统的复兴,这是考虑到有关学者提倡某些特定翻译方式。尽管 Baker 批评的是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范式,考虑到她所谓的这个范式与“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她的上述批评事实上也针对“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

Hermans 则针对“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提出如下质疑:首先,有关研究提倡特定翻译方式并规定翻译实践,从而没能履行翻译理论的批评任务,因为该任务在于理论化各翻译方式及有关概念话语的历史“偶然性”(contingency),以及理论化自身的“偶然性”;其次,有关研究没有质疑自身预设,确信自己的政治立场“正确并有价值”(correct and worthy)。¹⁴

可见,“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被认为具有以下两个倾向或不足:第一,因为提倡特定翻译方式,在促使(导致)规定主义传统复兴的同时缺乏批评视野;第二,“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更可能会因为自我反思的缺乏,受到所“效忠”议程的奴役而显得不够严谨。

上述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以第一个批评为例。Tymoczko (2000a: 39) 曾表示,尽管 Venuti 的政治议程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在研究中采用了“规范”(normative)取向(比如提倡异化翻译),而考虑到当今翻译学从规范往描述方向发展的事实,这种规范取向意味着翻译学的倒退。

再以第二个批评为例。Flotow (1997b: 77) 曾强调,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受到女性主义阵营外部势力的抵制(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对学术界影响不大的文化

¹⁴ 在跟 Brownlie 的私下交流中, Hermans 提及了第二个批评 (Brownlie 2003: 45)。

中), 被认为缺乏学术性。¹⁵Robinson (1997: 105-106) 在评论后殖民翻译理论时指出, Cheyfitz 有关翻译构成纯粹的殖民统治工具的观点,¹⁶受到他本人“本土主义”(nativism)的影响, 并强调他没有力图避免类似影响。

相对于第一个批评, 我更为关注的是涉及自我反思的第二个批评。确实, “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 更容易因为对自身所信奉的理论及有关政治议程缺乏质疑, 因为主体立场的绝对化, 而导致对权力关系的简单化和片面化描述。类似问题就存在于某些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

比如, 某些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 满足于用二元对立的方式证明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假设, 忽略其中的冲突或混杂成分。具体而言, 某些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只是为片面证明男译者, 或是 Henitiuk (1999: 474) 所谓的“男性化”(immasculated)女译者, 如何翻译不好女性文本, 而没有反过来考虑男译者如何试图更好地翻译女性文本, 或可以胜任翻译女性文本的任务。正如 Hermans (2009: 100-101) 指出, 有些关注男译者如何翻译女性文本的批评显得不够公正, 因为批评者片面强调男译者对女性文本做出的删改如何损害原文, 却往往忽略探讨男译者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原文的事实。同样, 在一个旨在证明译者因为父权意识翻译“不好”女性文本的案例中, 为保持论证一致, 某些研究者还可能忽略译者体现强烈女性主义意识的地方(即反例)。事实上, 对于类似批评, 学者往往怀疑这是研究者戴上“有色眼镜”进行观察的结果。另一方面, 某些学者还倾向将涉及女性文本的删改完全归因于父权意识形态, 而没有考虑从女性主义框架外寻找可能原因。

与此类似, 不少后殖民翻译研究也只是为片面证明西方译者, 或是西化的第三世界译者, 如何“殖民”第三世界文本。一方面, 相关学者往往忽略考察译者如何试图尊重第三世界文本, 却往往事先假设译者或“西化”译者因为政治不正确(即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操纵原文, 并有意无意地过滤了很多更为复杂的可能性, 比如, 政治正确的译者在把第三世界文本译成西方语言时, 在效果上有可能不如政治不正确的译者。在后殖民批评深入人心的语境下, 在很多主体对种族等问题保持自省的情况下, 有些政治正确的译者, 有时正是因为自己的政治正确, 在翻译过程中修正他/她认为政治不正确的第三世界文本, 如认

¹⁵ Susam-Sarajeva (2005: 175) 也表示, 涉及性别的翻译研究往往被认为主观和缺乏学术性。

¹⁶ Robinson (1997) 参考了 Cheyfitz 的 *The Poetics of Imperialism: Translation and Colonization from the Tempest to Tarzan*。

为原文卖弄东方主义，却没有意识到原文作者或许是在“仿拟”（parody）某些霸权话语以达到抵制目的，从而犯了后殖民翻译学者所“憎恨”的操控弱势原文之“罪”；相比之下，某些内化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译者，面对同样的文本，可能乐得忠实传递，倒显得迎合了后殖民翻译学者所“推崇”的对弱势原文的尊重。那么，从后殖民翻译研究视角看（这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认为，理想译者尊重而不是操控弱势原文），哪个是理想译者？是那个因为反殖民主义却为此操纵第三世界文本的译者？还是那个因为内化殖民主义却忠实传递第三世界文本的译者？这显然不是“是”或“不是”所能概括的。另一方面，正如 Brownlie（2003: 48）在谈论 Niranjana 的研究时指出，自我反思的缺乏，会导致某些后殖民翻译学者无法接受后殖民框架外的其他可能阐释。

为此，“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应该特别注意上述问题。¹⁷确实，包括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在内的“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若不力图进行自我反思，没有做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质疑有关预设，如实揭示各种冲突和混杂情况，并复杂化翻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说服力。

二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在研究主题上体现的倾向

作为“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中的两大流派，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和以各种方式，“效忠”于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政治议程。但是，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我反思的立场，正如上文所示，也体现了研究主题上的狭窄，从而导致了某些重要研究问题的忽略。具体而言，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关注性别层面的权力关系，针对的是父权，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关注种族文化层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针对的是实际和隐喻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有关内容将在第二章具体探讨）。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一方面揭露女性如何遭受男性及父权文化压迫，另一方面强调女性对类似压迫的抵制。此外，因为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绝对依赖，以及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忽略，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

¹⁷ Chang（2009: 321）也强调该取向的拥护者需要注意其缺陷。

构成一个西方话语。在种族、阶级等方面具有优势的西方女性，往往仅仅重视性别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LeGates 2001: 2），同样道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西方话语，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性别之外的其他维度。

至于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性，从而体现了对性别维度的忽视。考虑到中性与男性之间的历史合谋，以及很多情况下的等同效应，中性意味着对女性的抹除。为此，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事实上体现了对女性的忽视。在当今语境下，这种忽视有政治不正确之嫌。比如，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要么忽视有关女译者，要么对她们“去性别化”（即没有突出这些女性的性别之于其翻译行为的意义），从而没有女性化/性别化种族文化层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主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分别忽视了种族维度和性别维度，这并非意味着没有任何学者意识到结合两者的重要性或者在结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了探讨，毕竟“主流”并非等于“所有”。

但是，有关学者往往只停留在意识层面（即认识到关注性别层面之种族差异的重要性，却没有更进一步），另一些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学者）尽管确实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了翻译，但她们的言论或分析，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有单薄之嫌，同时也体现了自我反思立场的缺乏。最重要的是，后者并没有探讨上述两派翻译研究在研究主题方面所体现的局限，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尝试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性地纳入翻译研究。

考虑到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存在的上述倾向，以及考虑到现有的少量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一方面以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尝试体系性地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纳入翻译研究，另一方面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尝试如何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并审视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其他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学者所深入分析过的翻译现象。

第二节 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都已发展到

一定程度。在本研究中，我首先考察了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文献，分析现有文献分别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种族维度和性别维度的漠视，从而导致了某些研究结论的不足，以及对某些重要研究问题的忽略。我同时也提及了极少数从结合性别和种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翻译的学者，强调她们没有考虑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性地纳入翻译研究。

为体系性地建构一个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框架，我接着简述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该理论主要关注西方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张力（如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如何建构第三世界女性，或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如何挑战西方女性主义，等等），同时也关注殖民主义父权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关系（如殖民主义父权如何借助第三世界女性建构殖民话语，等等）。我同时也梳理了学界对上述理论的批评。

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出一系列研究问题的方式，我试图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性地纳入翻译研究，即探索可能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史，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从而凸显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研究的意义，比如关注一些分别被主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所忽略的重要层面或现象。此外，我还分析了现有的少量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体现的不足，尤其是自我反思立场的缺乏，并探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所应注意的问题。

接着，在我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的一系列研究问题中，我选择了其中两个作为个案研究对象（这是因为这两个研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未被其他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所认真审视过），考察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如何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即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选材分析），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如何翻译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本（即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方式分析），并试图在此过程中实践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具体而言，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 Books 和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 Press，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选材特点，成为本研究的第一个个案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上述两个出版社，是因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两家继续营业，并翻译出版过书本长度的非学术类的中国女性文本的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该个案重点关注这两个出版社在涉及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政治，考察它们的选择行为本身如何“在效果上”（in effect）迎合或抵制

了有关主流话语，同时比较这两个同样具有“白人女性身份”却具有不同机构性质的出版社，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异同。

美国白人女译者 Cathy Silber 在翻译严歌苓的《扶桑》时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成为本研究的第二个个案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扶桑》的英译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该文本包括了某种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争锋相对的、基于本土文化传统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即我所谓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者 Silber 刚好是个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白人女性，并且同时也具有高度“有色”思想，体现了强烈的尊重他者和差异的立场。该个案主要考察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和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如何体现于她对《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处理。

以上简单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范围。接下来简述本研究的研究目标。

通过本研究，包括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的翻译研究问题，以及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的翻译个案分析，我试图实现以下三点。

第一，凸显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理论为例。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理论，意味着用一些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观点（而不是西方女性主义观点）看待翻译行为、女性主义译者等问题，为此可以在有可能得出一些新鲜结论的同时，抵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方面的霸权。

第二，尝试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考虑到“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包括现有的少数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我反思立场的缺乏，本研究试图在研究中贯彻自我反思的立场，以期了解该立场可在何种程度上，使得“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减轻某些学界认为比较明显的欠缺。

第三，了解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大体特点及可能原因。这是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学界深入分析过的问题。较之于上述两个目标，这最后一个目标是最为具体现实的。有关研究结果可以告诉我们，在高举旗帜抵制西方女性（主义）霸权的当代西方，这个“有色”意识会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于中国女性文本的翻译出版。

第三节 研究立场

本研究主要采取自我反思的研究立场。考虑到自我反思事实上是任何学术研究的要求，我如此强调要在本研究中进行自我反思有重复之嫌。

我之所以明确提出要贯彻自我反思的研究立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考虑。第一，这是考虑到我在本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采取的取向即“效忠取向”，特别容易忽略自我反思，而受到所“效忠”的理论和政治议程的“奴役”。第二，这是考虑到当代翻译学界对翻译研究建构性和翻译研究者主体性的强调，以及对翻译研究者需进行自我反思的强调。第三，这是考虑到具有自我反思意识和如何在实际研究中贯彻自我反思立场是两回事。事实上，在实践中贯彻自我反思立场并非易事，正如 Hermans（2002）指出，他也不知道翻译研究者如何在实际研究中做到自我反思。

本部分将简述何为自我反思、翻译研究需要自我反思的背景，以及如何在“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中进行自我反思。

一 何为自我反思

自我反思对于所有研究者而言都是重要的。如何在研究中做到自我反思，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对象。

在 Alvesson 和 Skoldberg（2009: 269-270）看来，自我反思的研究要求研究者注意避免经验主义、自恋，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或语言简化”（social and linguistic reductionism），能做到背离某个参考框架并看到这个框架的局限。

可见，自我反思不仅仅是对任何研究建构性的承认，对自身“处境”（situatedness）、局限等的承认（这是最基本的），还意味着研究者需要质疑自己的假设、兴趣等问题，比如对某些理论、观点、议程等的“效忠”。研究者的类似质疑一方面使得“矛盾”（contradictions）或“悖论”（paradoxes）得以出现（Steier 1991: 7），另一方面也使得研究者更能接受对事实的其他可能阐释和解读（Saukko 2003: 62）。

为此，从根本上说，自我反思的研究立场，意味着研究者力图避免被自己所认同或假设的理论、观点等“奴役”，并能考虑从其他视角解读同一现象的可

能性，从而有利于减轻或避免自身偏见。

二 强调翻译研究需自我反思的语境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已开始质疑知识的客观性，以及学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透明性，至 20 世纪下半期，有观点认为学术无法做到客观中立而带有政治性和价值判断，而学者也并非公正中立，这最终导致了人文学科范式的转变，学者的身份/主体性与其研究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重要关注对象（Cabezón & Davaney 2004: 3-4）。

这个大语境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翻译界。目前为止，已有部分翻译学者强调了翻译研究者的主体性，以及翻译研究的建构性问题。¹⁸鉴于 Venuti 和 Hermans 所表达的有关观点较其他学者而言更为详细，接下来看看他们有关该议题的探讨。

Venuti（1998: 27-28）强调研究的不单纯性，认为甚至连研究计划的设计和执行都会涉及价值观，强调翻译研究者与译者的相似性，认为翻译研究者所总结的规范与译者所总结的规范没有本质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质疑了推崇科学性的翻译研究。¹⁹另一方面，Venuti（29）指出强调翻译研究的客观中立而否认其价值观的危害性，认为这使得翻译学学科无法进行自我批评，并使得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理论话语相脱离。

在质疑早期描述翻译研究的基础上，Hermans（1998a; 1998b; 1999; 2009）也强调了类似观点。总体而言，Hermans 的立场最明显体现于以下两方面。第一，Hermans 质疑翻译研究中“客体层面”（object-level）和“元层面”（meta-level）的划分。具体而言，Hermans 认为翻译研究者都有立场，从而质疑翻译研究中的客体层面（译文以及译者、教师等有关翻译的言论）和元层面（研究者本人的论述）的划分，并指出中立的翻译行为的不可能决定了中立的翻译研究的不可能，而事实上有关中立或客观性的言论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性质。²⁰第二，

¹⁸ 正如 Brownlie（2003: 40）所言，翻译研究中的任何描述都离不开某个理论框架，总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阐释和价值观，并为此追溯了提出过有关观点的学者，包括 Venuti、Hermans、Chesterman、Arrojo、Crisafulli。

¹⁹ 针对 Toury（1995）的观点，即描述翻译学者在选题和陈述研究结果时，应避免价值判断以及提倡合适的翻译行为，Venuti（1998: 28）认为这个观点本身也体现了 Toury 本人的议程，即试图将翻译学发展成一门学科，并期望自己的理论“战胜”其他缺少科学性的理论。

²⁰ 上述观点体现于 Hermans（1998a: 67; 1999: 36, 148; 2009: 103）。

Hermans 在翻译研究和翻译行为之间做类比。在 Hermans 看来，翻译研究本身构成某种翻译行为，并体现研究者自身的设想、理论方式等，操控翻译行为的因素也同样会影响有关翻译的学术研究本身，比如观察者（如这里的翻译个案研究者）在观察过程中认为哪个因素最相关，有可能是某种假设和猜想行为，为此观察者总是通过“使得材料相关”（render data relevant）建构所研究个案。

21

除上述学者外，Pym、Tymoczko 也暗示或提出类似看法。²²Pym (1998: 27) 指出，（翻译）研究者的主体性或是（翻译）研究社区的主体间性，具有译者和译文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Tymoczko (2002: 22) 甚至指出，考虑到 20 世纪学界有关“表征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等类似问题的强调，翻译学者不应力求“客观”（objective），因为这意味着犯了某种“严重的思维上的时代错误”。

上述观点均表明，有关翻译学者通过质疑客体层面和元层面、实证与非实证、专家与外行等之间的严格区分，强调翻译研究的建构性。²³这意味着翻译研究者不再被赋予一种超然定位，而被认为是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事实和话语有着脱不开干系的社会和历史实体。

然而，对翻译研究建构性和翻译研究者主体性的强调，并非等同于鼓励不严谨的研究论证，正如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并非等同于鼓励胡译乱译一样。与此相反，类似强调是为了使得翻译研究者对自身的主体性和立场更加敏感，并进行更为自省和严谨的研究。

正是基于对翻译研究建构性和研究者主体性的承认，有关学者强调翻译研究具有自我反思的必要性。比如，Hermans (1998a: 70) 强调翻译研究应该向其他已具有更强自我反思精神的学科学习，承认翻译研究本身的“规范性”（normativity）等问题，并认为这应该构成翻译学学科的某种“精神”（ethos）。尽管 Hermans (2002: 20-21) 表示，他不知道翻译研究者如何在实际研究中做到自我反思，但他就如何在翻译话语内部建立反思和自我批评空间提出了以下建

²¹ 上述观点体现于 Hermans (1998a: 58, 67; 1998b: 140; 1999: 148)。

²² 其他学者还包括 Baker (1996; 2006)、Cheung (2002) 等。

²³ 学者如 Cheung (2002) 还强调了客体化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所谓翻译研究的客体化，指代把翻译研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像分析译文、译者等一样对其进行分析。

议, 包括了解现代阐释学、“叙事性”(narrativity)、Luhmann 所谓的“二阶观察”(second-order observation)。Tymoczko (2002: 22) 也指出, 翻译研究者应注意自身的主体立场及其对自身研究的影响, 并质疑自身预设。²⁴

考虑到在所有取向的翻译研究中, “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往往被认为具有最明显的建构性, 最有可能受到所“效忠”理论(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的影响, 该取向的翻译研究更有自我反思的必要。

三 如何在“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中做到自我反思

尽管 Hermans 推崇自我反思的翻译研究, 但他质疑自我反思和“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结合的可能性。这似乎是因为自我反思和“效忠”表面上看来很难共存, 因为自我反思意味着对议程、假设等的背离和抵制, 而“效忠”意味着受制于议程、假设等。具体而言, Hermans (1999: 157) 指出, “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会因为“专一的效忠”(exclusive commitment), 而很难做到“自我相对化”(self-relativization) 并批评自身预设, 为此在研究中或许会忽视其他可能的原因, 而只注意其中一个明显政治不正确的方面。

与 Hermans 相反, Brownlie 强调“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需要并可以做到自我反思(2007: 146-149)。根据 Derrida 有关做决定的观点,²⁵即真正的决定意味着做决定者并非受到某个规则的“奴役”, 同时也对复杂情况敏感, 而公正的决定意味着在(重)建一个规范之前质疑既定规范, Brownlie 暗示自我反思的“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 需要作出“效忠的本土的决定”(committed local decisions)。为此, 正如我在上文指出, “效忠”并非“愚忠”, 并非一定意味着受“奴役”, 而“效忠”者也可以做到自我反思。

有鉴于此, 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个案时, 我尝试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在参考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考察相关翻译现象之前, 我事先考虑学界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批评, 借此力图避免被某些预设所“奴役”。

第二, 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 我也试图保持反思意识, 复杂化西方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权力关系, 注意白人女性主体所体现的分裂性, 特别强调她们的“有色”思想, 承认她们

²⁴ Gouanvic (2007) 和 Yves (2007) 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²⁵ Brownlie (2007) 参考了 Derrida 的“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

的出版或翻译行为的积极之处，尽可能揭示有关行为所涉及的冲突成分，并考虑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之外的视角分析有关行为背后的可能原因，等等。

第三，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在进行论述和阐释之时，我也试图避免在不质疑的情况下套用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尽管考虑到我的中国人身份和第三世界女性身份，这有一定难度）。

为此，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不再致力于建构一个统一而无任何内部冲突的话语（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试图把整个研究过程，包括其中的不确定性和暧昧之处（比如所谓的反例、对同一现象作出的不同解释等）敞开，从而让读者有判断的平台。

上述反思事实上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但考虑到“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考虑到自我反思立场在实践中的难以执行和贯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凸显和强调这一立场。我希望我在本研究所贯彻的自我反思立场，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容易体现的“不足”，包括戴着有色眼镜看现象、简单化权力关系的描述，等等。

第四节 论文架构

本研究共有六章。本章主要提供一个大体介绍。

接下来的第二章，考察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分别体现了对种族维度和性别维度的忽视。具体而言，本章重点关注主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三个领域分别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上述特点。本章结尾也提及了极少数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翻译的学者，强调她们没有考虑体系性地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纳入翻译研究。本章旨在凸显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体系性地切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具体切入提供参考。

第三章首先简述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并梳理学界有关该理论的批评。在参考第二章所得出结论的基础上，本章尝试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提出一系列翻译研究问题，为此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所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史、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在本章最后一部分，在分析

现有的少量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体现不足的基础上，我强调研究者需要进行自我反思。

第四章是本研究的第一个个案分析。在保持自我反思的立场上，我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包括美国的 Aunt Lute Books 和英国的 Virago Press，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翻译选材政治，关注其选择行为本身如何“在效果上”抵制或迎合了有关主流话语。本章首先考察 Aunt Lute。考虑到作家严歌苓是 Aunt Lute 翻译出版的唯一中国女作者，本章重点关注这个出版社如何从严歌苓的众多小说中挑选出某些文本结集翻译出版（*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接着，本章考察 Virago Press。考虑到非作家出身并只写过一文本（《马燕日记》）的马燕，是 Virago 翻译出版的唯一中国女作者，在从这个文本本身的角度分析 Virago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之前，为提供一个大体语境，本章先总体分析了 Virago 在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方面的选材特点。我在本章结论中指出，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上述两个同样具有白人女性身份的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因其性质的不同以及“有色”成分的高低，既体现了相同点也体现了不同点。

第五章是本研究的第二个个案分析。在保持自我反思的立场上，我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白人女译者 Cathy Silber 如何翻译《扶桑》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本章首先介绍了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包括所产生的背景，所包括的观点，所依托的文化理据，与中国女性主义的关系，以及所体现的悖论。接着，本章介绍了译者 Silber，包括她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实践，以及她的白人女性身份，并探讨了它与编辑之间的合作。最后，本章从五个方面考察了《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包括扶桑的母亲意象，扶桑的宽恕，扶桑的以受为攻，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以及扶桑的女菩萨形象，关注 Silber 的“有色”思想和她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如何体现其中。

第六章是本研究的结尾章，涉及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研究局限，以及后续研究的可能性等问题。

第二章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

后殖民翻译研究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至今，作为“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中的两大流派，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翻译研究都已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本章旨在确定当前的主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分别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种族维度和性别维度的忽略，²⁶从而导致了某些研究结论的不足，以及对某些重要研究问题的忽略。

第一节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种族维度的隐形

当前的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更确切的说，应该是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这个说法有两层意思。首先，尽管所用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很多研究者在论述中往往省略西方这个限定语。²⁷其次，很多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学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这体现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领域的霸权地位。

尽管西方女性主义派别林立，包括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等，但均以给女性赋权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根据是否强调女性差异，西方女性主义可分成两大类，包括强调两性相似性的西方女性主义，和强调女性差异所代表价值的西方女性主义；前者的代表流派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后者的代表流派是文化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重点关注女性作为个人的权利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把男性视为标准，认为女性解放的标志在于通过改革达到两性平等，即两性在各方面享有平等权利。与此不同的是，针对父权文化对男性特点的推崇和对女性特点的贬抑，文化女性主义给后者赋予价值，并认为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使得女性价值观和文化取代男性价值观和文化成为社会标准。²⁸

²⁶ 除性别、种族维度外，还有其他维度包括阶层、性取向、宗教信仰等，但任何研究不得不有所侧重。

²⁷ 这涉及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本身的自我中心定位，即抹煞自身的地方性和特殊性，而自认为具有世界性和普适性，从而把西方女性主义等同于女性主义本身。有关这一点将在第二章论述。

²⁸ 有关文化女性主义，可参考 Evans (1995: 18-19)、Donovan (2000: 47-78; 183-198)、LeGates (2001: 6)。

事实上，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用，目前为止，还没有深入到需要区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文化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的程度。但可以确定的是，当前的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的最基本观点，也就是最明显体现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但同时也体现于其他西方女性主义流派的观点。

此外，还需要区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性别翻译研究。我们可参考 Flotow (1999; 2007) 就英美语境内的性别翻译研究所区分的两个范式。第一个范式比较传统，将性别视为稳定类别，并将女性看成一个弱势整体；第二个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解构思想，强调同一性别群体内部的差异，质疑性别作为分析类别的有效性。为此，第一个范式的性别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谓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第二个范式的性别翻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关注翻译的表演性、涉及同性恋问题的翻译等。

可见，在当前的性别翻译研究领域，占主流地位的还是 Flotow 所谓的第一个范式；这个范式，用 Sánchez (2007: 172) 的话说，关注作为话语表征对象的女性，或是作为话语生产者/干涉者的女性。

以上是对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概念所做的简短说明。接下来将关注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内容本身。

继 Simons (1983) 探讨法国女性主义经典 *Le deuxième sexe* 的英译之后，Godard (1984; 1989)、Hannay (1985) 等也相继探讨了有关话题。但在 Garayta (1998: 37) 看来，可被看作翻译研究中的“分水岭”(watershed)，凸显借助“性别”审视翻译之意义的文章，是 Chamberlain 的“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1988)。总体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介入，用 Garayta (同上) 的话说，标志着翻译学“纯真”时代的结束。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因为大部分学者更为关注的并非翻译本身，而是其他问题如性别研究、女性文学研究等。此外，除 Díaz-Diocaretz 的 *Translating Poetic Discourse: Questions on Feminist Strategies in Adrienne Rich* (1985) 外，鲜有其他专门探讨女性主义与翻译问题的专著问世。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日趋成熟，以专著、论文集、博硕士论文、期刊论文等的出版发表为标志。这表明，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的结合意义已得到较

大程度认可。

总体而言，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参考西方女性主义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以修正主义的立场出现，从翻译的角度批评和抵制对女性的边缘化，一方面揭露女性（概念女性和实体女性）如何遭受男性及父权压迫的事实，另一方面强调女性对父权的扰乱和抵制。此外，在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性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学者关注的唯一权力关系轴，他们忽略了其他维度，尤其是种族维度。²⁹

接下来将简单梳理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的三大领域，包括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重点关注这三个研究领域在何种程度上忽视了种族维度，从而在体现某些局限的同时，也忽视了某些重要的考察对象。需要强调的是，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之间并非存在绝对区别，而存在重叠之处。比如，翻译理论的建构有时会用到翻译史料，有时也为翻译史提供视角和框架；翻译批评可包括翻译理论批评和译文批评；翻译史也可包括翻译理论史和翻译批评史，等等。我在本研究中使用这三个类别是为了方便梳理有关文献。

一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从源头上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源于有关语言父权性质的女性主义批评，³⁰以及在翻译“以阴性书写”（written in the feminine）的文本时所遇到的挑战（Anderson 2000: 435）；从内容上而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方面批评体现父权观点的翻译理论（比如贬低女性和翻译的概念或隐喻），另一方面从女性主义视角建构新的翻译理论（比如提出新的翻译观、忠实观、译者观、翻译策略等）。简而言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在解构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揭示翻译隐喻的性化层面，质疑其中的父权观点（Johnson 1985; Chamberlain 1988）。³¹有关研究主要针对（但不局限于）体现二元对立的两类翻译隐喻。第一类隐喻歧视女性和翻译或置两者于不利处境（比

²⁹ 在谈论女性时，除种族维度外，还有阶级、性取向等维度，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种族维度。

³⁰ 语言的父权性质指代语言中歧视女性的语法规则和贬低女性的词汇等问题，这势必影响女性的自我表达（Anderson 2000: 435）。

³¹ 在 Godard (2000: 505) 看来，Johnson 是最早揭示“忠实”这个“性化”（sexualized）概念所隐含意义的女性主义者之一，指出忠实隐喻背后是“俄狄浦斯”（Oedipal）契约。

如认为两者具有劣等性和被动性，在各自等级体系中处于弱势），这类隐喻往往把翻译行为、译文、译者比作女性，而把创作行为、原文、作者比作男性。第二类是对第一类的逆转，这类隐喻往往把译者比作男性而把原文比作女性。比如，第二类中的某些隐喻用“父权意象”（patriarchal imagery）描述译者任务，从而边缘化了女译者（Goozé 1995: 295; Godard 2000: 505）。³²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试图重新界定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和议题，建构新的翻译神话，探讨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观和实践，等等。

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意义和“阴性”（feminine）的无限性、不确定性、流动性的强调，以及总体上对女性主体性的强调，促使有关学者就翻译问题提出有别于传统的看法。比如，Godard（1989）和 Lotibinière-Harwood（1991）将翻译行为重新界定为创造表演而非模仿复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行为的重新界定，为宣扬译者主体性和提升译者的权力和地位奠定了基础。除了翻译行为和主体性之外，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还就原文译文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Shread（2007）用基于“相遇”（encounter）的“母体范式”（matrixial paradigm）看待原文译文关系，并建构翻译的差异伦理。

此外，针对把翻译理解为缺失的传统巴别塔翻译神话，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试图建构更为积极的翻译神话，比如，Littau（2000）建议用一个女性主义版本的潘多拉翻译神话，取代强调翻译困难的巴别塔翻译神话。³³

最后，某些学者还探讨了女性主义译者。比如，Garayta（1998: 58-59）根据女性主义译者所体现的不同女性主义程度，根据她们对如何处理美学与政治的冲突、是否应该以女性主义的名义审查原文等问题的回答，把她们划分成不同等级。³⁴具有“高度”女性主义的译者，往往被等同于整个女性主义译者类别；她们在翻译中进行 Godard（1989: 50）所谓的“妇占”（womanhandle），或 Lotobinière-Harwood（1991: 112）所谓的“以阴性的名义重写”（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

³² 比如，Derrida 认为，翻译是译者与母亲原文订立的旨在生育孩子的婚姻契约（Goozé 1995: 295）。

³³ 根据法国女性主义学者 Irigaray 有关女性身体和语言等体现“多重性”（multiplicity）的理论，根据潘朵拉神话本身具有多个版本的事实，Littau（2000）强调翻译同女性一样具有连续多重的本质，从而传达了积极的翻译观。

³⁴ Levine 之类的女性主义译者，属于一个极端[低端]，她认为普遍意义上的翻译政治比性别政治重要；Lotobinière-Harwood 之类的女性主义译者，属于另一个极端[高端]，她认为女译者因为翻译某些男性文本而受到“伤害”（Garayta 1998: 58）。

以上是对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简述。考虑到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可避免具有争议性。有关批评涉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双重标准和不连贯等问题。³⁵但在我看来，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体现了以下倾向。

首先，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女性主义，忽视各种非西方女性主义形式，从而排除了根据后者进行理论建构所可能得出的不同结论（有关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展开）。比如，强调翻译同女性一样具有多重本质的潘多拉翻译神话，以及有关原文译文关系的母体范式等，都离不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关女性/阴性的文化阐释。

其次，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关女性主义译者的界定也不无问题。有关学者在界定女性主义译者时，没有把其中的女性主义概念问题化，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根据有关女性主义的“主流”看法即抵制父权维护女性利益，而忽略了当来自不同种族文化社区的女性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如何对女性主义译者进行界定的复杂问题。比如，她们没有考虑以下情况：如果一个译者在翻译中维护一个种族文化社区的女性利益，而损害另一个种族文化社区的女性利益，那么他/她是否是女性主义译者。可见，考虑到当代语境中性别与种族之间的巨大张力，对女性主义译者的界定也不应局限在性别这个层面。

最后，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简单化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忽视所涉及主体性在性别层面之外的冲突和复杂性。比如，有关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性别与种族的复杂交错，单单用父权所象征的压迫性界定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忽略女性在涉及种族时的主体分裂问题，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有关观点的有效性。无论是体现于“妇占”的译者主体性，还是体现于“以阴性的名义重写”的译者主体性，其中的主体性均在于对男性/父权的抵制。此外，这些女性主义译者也体现了理想的西方女性形象，即咄咄逼人并坚决捍卫自己权利的女勇士。

二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

翻译史为翻译理论建构提供素材。同样道理，女性主义翻译史对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有重要作用。正如 Chamberlain (1988: 471) 指出，只有当女译者开始探讨自己的翻译，并对历史上女译者的翻译行为做足够考察后，才有可能

³⁵ 参考 Flotow (1997b: 81-83)。

在此基础上建构新模式。³⁶当前存在不少研究历史上女译者的文献，这不仅是因为背后的女性主义意图，也跟译者在整个翻译话语中的显形有关。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致力于挖掘西方历史上的女译者（某些通过各种途径如前言论述翻译问题的女译者，则同时具有女翻译理论家的身份），这个处于双重弱势的群体，关注她们如何借助翻译摆脱父权限制和促进社会进步（Hannay 1985; Krontiris 1992; Healy 2004 等），使其浮出历史地表，并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历史上的女译者之所以被认为处于双重弱势，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翻译在历史上被认为次等。比如，有观点认为，翻译是派生的，为此不会像原创那样威胁男性统治及男性自尊（Lamb 1985: 116）。其次，女性在历史上被认为次等，女性的翻译行为，较之男性的翻译行为，更不受重视。³⁷为此，女译者也往往受到翻译史的排斥。³⁸需要指出的是，女译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史的排斥，同时也受到早期女性主义批评的排斥。Simon（1996: 40）和 Agorni（2005: 819）都表达了类似看法。自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席卷文学研究之后，对西方历史上女作家的挖掘和评论早已屡见不鲜，但西方历史上的女译者最初却没有受到同样待遇，因为传统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也认同翻译具有派生性，不能向原创一样给女性赋权，因此令她们感兴趣的往往不是译文和译者而是原文和作者，甚至当她们研究经过翻译的文本时，她们也往往不会关注翻译问题。

Hannay 主编的论文集（1985）描述了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若干个翻译宗教文献的女译者。她们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有的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视角，并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有的则借翻译之名为自己学习其他外语进行辩护。该研究表明，虽然这些女性从事边缘性活动如翻译，但她们通过传达上帝话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Hannay 1985: 14）。Krontiris（1992）则考察了若干个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翻译通俗文学的女译者，关注这些女性如何反抗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女性的文学活动深受父权文化限制，比如女性不能发表作品，除非所涉及主题关乎宗教和家庭事务；对此，某些英国女性以各种方式比如翻译抵抗类似父权限制，因为翻译较之原创更容易被父权接受，女译者可在作者“保护”下翻译不涉及宗教和家庭事务的文本，而免

³⁶ Godard（2000: 506）也强调了 Chamberlain 的这个观点。

³⁷ 比如，在 18 世纪的英国，古典语作品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领域，大部分女性因为没机会学习古典语，只能从事现代语作品翻译，但受到批评家关注的往往是前者（Agorni 2002: 46-47）。

³⁸ 比如，Godard（2000: 508）指出，在 Robinson 的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收录 9 个西方女译者/翻译理论家之前，她们一直受到翻译史的排斥。

受谴责。还有学者如 Agorni (2002) 探讨了 1739 年和 1797 年之间的英国女性如何借助“翻译”(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即两种语言的转换, 和隐喻意义上的翻译如游记) 建构意大利形象,³⁹ 实现自己的目的。

有关历史上的女性如何通过从事翻译或论述翻译, 以各种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主体性和抵制父权, 还可参考 Robinson (1995)、Goozé (1995)、Wolf (2005) 等。⁴⁰

总体而言,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 女性主义翻译史存在不足之处。比如, 女性主义翻译史在很大程度上只关注翻译他人作品的女译者, 而忽略女自译者。事实上, 考虑到自译本身可以具有女性主义意义, 因为它跨越了原文与译文之间人为划分的“父权”界限 (Garayta 1998: 3), 对历史上女自译者的考察可以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另外, 女性主义翻译史还没有足够重视翻译在女性写作中发挥的历史作用 (Godard 2000: 506)。

除此之外, 在我看来, 正如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样,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种族维度的忽视。

具体而言, 女性主义翻译史把女译者放置的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是涉及性别和性别歧视的父权文化, 考察的是女译者与男性和父权的对抗, 却往往没有把女译者置于性别之外的其他历史背景, 包括西方的帝国主义史、反殖民史等。事实上, 把对女译者的历史考察置于超越性别而涉及种族文化层面的语境, 比如审视女译者的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的冲突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其翻译行为, 将会使得对女译者的形象勾勒更为丰满真实, 而不会只建构千篇一律的抵制父权的女勇士形象。

为此, 女性主义翻译史学者不应满足于对女译者歌功颂德, 强调她们的反父权意识和历史功绩, 不应满足于凸显她们的“进步”面, 在研究中忌讳或排除那些在历史上与殖民主义合谋, 因而显得不那么“进步”的女译者。考虑到历史上的女译者往往被赋予双重弱势地位, 有关研究者或许认为对这些译者“反

³⁹ 在 Agorni (2002: 4) 看来, 翻译与游记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重写, 在于两者所建构的“外来”(the foreign) 形象, 均取决于目的语文化中观察者和源语文化中被观察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Chan (2006: 69) 也承认, 有关翻译小说与游记之间的类比有一定道理, 因为译文也代表着陌生的文化。

⁴⁰ Robinson 探讨了 16、17 世纪的英国女译者兼翻译理论家, 关注她们如何将各种阻止其进入公共领域的“从属修辞”(rhetorics of submission) 转换成暗中赋权的渠道; Goozé 探讨了 18、19 世纪的德国女译者兼翻译理论家, 关注她们如何颠覆当时的性别化翻译隐喻。

动”面的研究会有某种政治不正确之嫌，也或许认为历史女译者这个身份类别还没有强势到可以遭受“攻击”的程度。但是，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这种单一的性别视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一些重要史实的忽略。

三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被翻译的女作者，旨在了解这个女性群体在翻译中有没有受到良好待遇。当然，不是所有的女性主义翻译批评都以女作者为研究对象，有些也涉及男作者，但关注的层面也跟着变化，往往论及原文所体现的父权话语，以及译文对该父权话语的处置情况。

总体而言，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从所采取的态度看，大部分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是否定性的，有关文章往往关注译文如何因为删除和误译，改变了原文的女性/女性主义基调、视角、风格等，或是关注译文如何复制甚至强化原文的父权话语等。第二，从所涉及的题材看，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涉及任何题材的女作者作品，既包括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文本。第三，从所采用的方式看，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既包括对整个作品的全局分析，也包括对其中某个方面的集中考察，包括女性性欲、女性主义文字游戏等；既有对单个译文进行批评，也有对同一作品的多个译文（不同译者或历史时期）进行对比分析。

Simons（1983）对法国女性主义经典 *Le deuxième sexe* 英译本的批评（认为该译文体现了男译者的性别歧视），开了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先河。在某种程度上说，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主要涉及译文背后的父权话语，或译文对原文的性/性别议题的敏感或尊重程度（Lotbinière-Harwood 1991; Chance 1998）。⁴¹ 比如，Chance 考察了 15 世纪女作家 Christine de Pizan 作品的英译情况，重点探讨译文如何压制女作者的权威，男性化原文，以及体现厌女情绪等。

第二类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主要涉及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差异对翻译实验性女性主义文本的影响（Simon 1996; Flotow 1997a 等）。比如，Flotow 考察了美国女性主义者 Mary Daly 的 *Gyn/Ecology* 中文字游戏的德译问题，及其所反映

⁴¹ 有关文献还包括 Mezei（1986）、Henitiuk（1999）、Moi（2002）、Tolliver（2002）、Gisbert & Santaemilia（2003）等。

出的英美女性主义和德国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这类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尽管涉及了女性内部差异，但基本上是西方女性内部的差异。

在我看来，同上文提及的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一样，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种族维度的忽视。

第一类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从上文可知，主要涉及译文背后的父权话语，或对原文的性/性别议题的敏感或尊重程度，有关学者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在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父权意识形态如何导致对女性文本的重写，或是性别意识的缺乏如何导致对女性文本所涉及性别议题的“破坏”，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从性别之外的种族文化视角分析译文。比如，即使有时注意到女译者对所翻译的女性文本进行改写，研究者也仅仅从性别和父权文化的角度考虑，指出类似女译者是内化了父权意识形态的“男性化”（immasculated）译者（Henitiuk 1999），而没有考虑从种族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女性翻译女性的问题。

第二类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尽管涉及女性内部差异，却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西方内部。为此，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性别之外问题的关注，这类批评还是忽视了种族这个更为重要的层面。此外，较之于第一类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第二类只是占少数。

四 小结

总体而言，当前的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一方面致力于揭露女性如何遭受父权文化压迫的事实，另一方面致力于强调女性对父权的抵制，性别方面的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中的唯一关注点。此外，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因为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绝对依赖，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个西方话语。

在种族、阶级等方面具有优势的西方女性，往往因为过于重视性别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LeGates 2001: 2），同样道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西方话语，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性别之外的其他维度。

从上文可知，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均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种族维度。简而言之，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忽视建构翻译理论的非西方女性主义版本时，往往简单化女性主义译者

概念、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等问题；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在将女译者置于父权文化而非其他历史语境，并建构千篇一律的女勇士（译者）形象的同时，忽略探讨女译者的性别身份和种族身份在某个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冲突；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性别当作唯一参照对象，忽视从性别层面的种族张力角度评析译文。⁴²

第二节 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性别维度的隐形

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可包括三层意思，即殖民开始后、殖民结束后、关注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理论视角和方法。⁴³考虑到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尤其明显体现于殖民开始后，并持续存在于殖民结束后，第三个层面其实涵盖了前两者。Hatim 和 Munday（2004: 107）指出，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越来越多地跟权力关系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涉及但不局限于前殖民地。

后殖民翻译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方向，包括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后殖民文学与翻译的关系，以及后殖民文学的翻译。第一个方向，即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着重从不平等权力关系角度看待翻译，在后殖民翻译研究中占绝对主流。另外两个方向，包括后殖民文学与翻译的关系和后殖民文学的翻译，很明显还处于起步阶段。⁴⁴

后殖民视角下的翻译，作为后殖民翻译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向，构成了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而种族/民族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是其中一个核心关注点。⁴⁵但这种权力关系往往被传统西方翻译理论所忽略，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

⁴² 尽管有些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确实超越了性别视角，而涉及了西方女性内部的文化差异，但这改变不了主流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总体趋势。

⁴³ 上述观点参考自 Robinson（1997: 13-14）。但有翻译学者认为或暗示，后殖民翻译研究应该涉及实际意义的殖民史实，为此反对把所有审视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翻译研究纳入后殖民翻译研究范畴。比如，Tymoczko（2000a: 32-33）表达了类似观点，而 Trivedi 在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座（“Constructing the Orient: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from India in the 19th Century”，2005/08/18）上也表达了类似看法。

⁴⁴ 后殖民文学与翻译的关系，作为第二个研究方向，涉及后殖民文学创作与翻译行为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后殖民文学所包含的翻译成分或所体现的翻译性等（Tymoczko 1999b, 2000b; Bandia 2003 等）。后殖民文学的翻译，作为第三个研究方向，探讨在翻译中如何处理后殖民文学的语言混杂性、多样性等问题（Snell-Hornby 2001, 2003; Sumillera 2008 等）。

⁴⁵ 种族是一种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是历史产物（Ashcroft et al 2007: 186）。在后殖民语境下，种族和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意义，均隐含文化层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但前者具有更大程度

内部翻译体验的传统西方翻译理论，没有深刻意识到语言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⁴⁶Simon (2000: 13; 17) 为此指出，后殖民翻译研究一方面表示翻译研究的全球性，即超越欧美边界而涉及亚非拉等地区，另一方面表示翻译学者需要注意权力关系和“他性关系”，为此意味着将翻译置于全球权力关系网络。在此语境下，译者的文化身份也成为一个重要考察对象。⁴⁷

总体而言，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体现为中性，从而体现了对性别维度的忽视。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性别指代女性主义语境中的性别。考虑到中性与男性之间的历史合谋，以及很多情况下的等同效应，中性意味着对女性的抹除，而对性别维度的忽视为此意味着对女性的忽视。考虑到当前的性别政治，这种忽视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政治不正确”。接下来将从三个方面看待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如何体现了对性别维度的忽略。

一 主流后殖民翻译理论

主流后殖民翻译理论涉及对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翻译观和策略的探索。尽管有关翻译观和策略，有时也因所涉及的源语和目的语权力关系的不同而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均有着抵制霸权的共同目的。

在原语为强势语而目的语为弱势语的情况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考虑到后殖民研究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修正中心，比如中心建构的种种话语及所代表的真理，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也力图修正传统西方翻译理论。该理论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翻译观，包括原文译文之间的二元对立等级关系，翻译是单向运动和复制等，而强调翻译是在抹除原文的基础上重新创造和双向互惠的跨文化运动等观点，使得翻译实践为本民族谋利的同时，也抵

的象征意义。比如，殖民者会将所统治的白种民族建构成一个东方或亚洲种族。正如 Tymoczko (1999a: 18; 20) 指出，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爱尔兰人往往被建构成“东方或亚洲种族”(Oriental or Asiatic race)，还被类比为“非洲的原始部落”，并遭受了“种族歧视”。

⁴⁶ 可参考 Niranjana (1992)。

⁴⁷ 比如，Gupta (1998: 182; 184-185) 以翻译印度文本的西方译者为例，探讨了译者的文化身份赋予翻译的政治性质。在 Gupta 看来，翻译印度文本的西方译者，尽管本着良好意图，让源文本在西方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译者的西方人身份使得他/她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篡夺者，强化了西方霸权，但这种反应是本着良好出发点的西方译者无法避免的。Gupta 强调的是，在原语和目的语有着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语境下，译者的文化身份本身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某个翻译行为的性质，比如两个拿出一模一样译文却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译者，会使得他们的翻译行为具有不同性质。

制了源语文化霸权（Vieira 1999; Gentzler 2003）。

在原语为弱势语而目的语为强势语的情况下，针对强势语翻译弱势语的主流模式，⁴⁸某些学者提出了另外一套翻译观和策略。考虑到后殖民研究的一个目标是尽可能从非西方他者的自身角度证实非西方他者，不少学者比如 Venuti 等建议异化翻译。Gupta（1998）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为详尽的抵制策略，探讨如何借助翻译抵制三种语言层面的不平等，包括政治不平等（涉及语言地位），表层不平等（涉及词汇、语法、句法等），和深层不平等（涉及语言的内部运作），并相应提出了在翻译层面进行的政治抵制、⁴⁹表层抵制、深层抵制。

有些学者尽管没有探讨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翻译观和策略，而只是提出与非西方文化密切相关的翻译观，考虑到类似行为对西方翻译理论霸权的修正意味，类似翻译观本身也具有抵制性，为此也构成某种后殖民翻译理论。

除探索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翻译观和策略之外，有关翻译的殖民主义隐喻也受到了后殖民审视。⁵⁰

在我看来，致力于探索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翻译观和策略的主流后殖民翻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性别/女性问题的忽视。具体而言，无论是主张挪用霸权原文的食人主义翻译观，主张尊重弱势原文所代表文化他性的异化翻译观，还是所揭露的涉及翻译的殖民主义隐喻，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针对有关翻译的殖民话语，而没有挖掘或足够重视有关翻译的性别化殖民话语。比如，有关学者没有考虑有关翻译的殖民话语，如何挪用了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层面的抵制。另一方面，后殖民翻译理论所探索的翻译策略也仅仅针对殖民霸权，而没有凸显其中的性别政治。

二 主流后殖民翻译史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后殖民翻译史重点关注翻译如何在历史上充当抵制霸权统治的角色。有关翻译作为某种话语实践可以强化统治或促进解放的观点，

⁴⁸ 前者往往在各个层面操纵后者，比如使目的语文本符合目的语规范、建构刻板印象等。

⁴⁹ Gupta 以印度为例探讨了政治抵制。考虑到西方语言在权力上大于印度语言，西方所出版的译文比印度所出版的译文，会对语言权力关系产生更大影响，Gupta（1998: 179-180）认为，在西方翻译出版印度文本时，需要注意借助选材把西方有关印度的印象复杂化，从而抵制有关印度的刻板印象，比如可以考虑同时翻译两种以上的印度文本，包括强调西方与印度非常规差异的文本，以及强调西方与印度相似性的文本。

⁵⁰ 可参考 Robinson（1997: 55-60）。

已得到普遍认可。

已有不少学者研究翻译如何被用于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包括抵制殖民统治和各种形式的霸权。⁵¹从所考察的文献看，翻译被当作抵制工具的方式是多样的，也因原语和目的语权力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在原语为强势语而目的语为弱势语的情况下，有些译者通过不翻译霸权文化文本以示抵制，或在翻译过程中用本土文化归化所翻译的霸权文化文本；在原语为弱势语而目的语为强势语的情况下，有些译者试图在翻译过程中提升本民族形象，抵制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等。

以 Tymoczko 的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为例。在这部专著中，作者探讨了早期爱尔兰文学作品的英译，如何帮助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需要指出的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权力关系，种族歧视不仅仅在白种和有色人种之间发生，而东方主义也不仅仅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发生。同样道理，爱尔兰也曾被英国殖民话语建构成东方或亚洲种族（Tymoczko 1999a: 20）。为抵制英国对爱尔兰的刻板建构以及文化侵略，爱尔兰开始英译早期爱尔兰文学，发起翻译运动，使得翻译成为抵制英国殖民统治并进行民族建构的场所。

在重点关注翻译如何被用以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后殖民翻译史中，性别/女性也是在很大程度上隐形的。比如，有关学者所研究的参与翻译抵制的很多是男译者，即使有时涉及女译者，因为研究者对种族/民族文化权力关系的巨大关注，所涉及女译者的种族/民族身份也往往被放大至完全遮蔽其性别身份的地步，研究者很少就其性别身份做文章，为此女性还是隐形的。考虑到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在很大程度上关注西方女译者，而忽略非西方女译者，以及考虑到主流后殖民翻译史对译者性别的不够重视，非西方女译者不可避免地落入双重隐形的境地。此外，有关学者所考察的翻译抵制对象也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殖民霸权，而忽略殖民霸权与父权结合的可能性。

三 主流后殖民翻译批评

正如后殖民学者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一样，后殖民翻译研究者也非常强调翻

⁵¹ 可参考 Trivedi (1997)、Tymoczko (1999a)、Ramakrishna (2000) 等。

译的殖民统治功能。

不少学者提及翻译如何被用以建立和维持不平等权力关系，比如辅助殖民统治和强化霸权话语（Niranjana 1992; Jacquemond 1992; Sengupta 1995; Bassnett & Trivedi 1999; Bouagada 2005 等）。Niranjana（1992）强调指出，在殖民时期，翻译同其他行为一起建构并维持不平等权力关系，比如，殖民时期的英国译者 William Jones 通过译者前言等元文本方式建构了印度及印度人。Bassnett 和 Trivedi（1999: 6）则表示，19 世纪流行某种印度语和阿拉伯语文本的英译传统，英译者往往删改原文并附上大量的人类学脚注，并在这些脚注中贬低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翻译被用以殖民统治的事实，涉及 Robinson（1997: 50）所谓的“翻译的帝国使用”或“帝国的翻译本质”。

较之于一些学者对元文本、翻译策略等的关注，另外一些则探讨霸权语言文化和被统治语言文化在翻译数量方面的反差，如何在事实上维护了不平等权力关系。英语与其他语言的不平等关系对翻译的影响尤其突出。正如 Venuti（1998: 88-89）指出，身为世界霸权语的英语，是世界上最多充当译出语，却最少充当译入语的语言，而英美文化对翻译的忽略将导致文化自恋和不平等价值观的继续。

但是，主流后殖民翻译批评，同上文提及的主流后殖民翻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史一样，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体现出对性别/女性的足够重视。比如，有关学者所批评的在翻译中体现殖民主义立场的译者，很多时候是男译者，而即使涉及女译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就其性别身份做文章。这就导致了对殖民主义女译者这个特殊群体的忽略，从而忽视了对这个群体的翻译行为进行批评可能得出的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此外，有关学者对翻译数量反差的后殖民批评，也往往没有考虑把女性文本作为一个分析类别。

四 小结

有些学者已指出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不足之处。比如，Robinson（1997: 109）质疑了被用以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异化翻译，Wang（2009: 204）则指出，后殖民翻译研究把很多涉及隐喻翻译的文献纳入研究范畴，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严格意义的翻译研究本身。

但是，我看到并关注的是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所体现的中性，从而所体现出的对女性/性别的忽视。简言之，后殖民翻译研究没有性别化/女性化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在当代语境下，考虑到女性才是被压制和静默的他者，性别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化，因为需要争取机会凸显自身“存在”和发出“声音”的是女性而非男性。）比如，很多后殖民翻译学者就男译者（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观点和实践义愤填膺，却很少从同样的批评视角看待女译者。这或许是因为这些政治正确的学者认为，在女性主义翻译学者眼中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双重压迫，并因冲破父权和造福社会的翻译行为受到“尊敬”的女译者，目前为止还不适合被安上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头衔。

本章对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梳理，旨在凸显两者在何种程度上没有把性别和种族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导致了某些观点或研究视野的局限。

事实上，因为种种原因，翻译研究对某些理论的意识 and 借用，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比其他领域慢一拍：文学批评对女性主义的借鉴，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进行得有声有色，但翻译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正式引进女性主义，并直到 90 年代中期才日趋成熟；主流女性主义批评和主流后殖民批评，早已于 80 年代受到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质疑，被认为分别忽视种族维度和性别维度，但当前的翻译学界还没有足够重视主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同样存在的问题（正如我在本章试图表明）。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翻译学者意识到性别与种族的交错问题，特别是女性在种族文化层面的差异问题，也并非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翻译学者尝试从结合性别和种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翻译。

但是，学者如 Maier（1998）和 Flotow（1997b; 2007）虽然认可把女性用作一个（分析）类别所可能带来的不足之处，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却没有凸显女性在种族文化层面的差异与在其他层面（包括阶层、性取向、宗教信仰等）的差异有何不同，从而终究没有突出女性在种族文化层面的差异之于翻译的意义。比如，Flotow（2007: 92）指出，在一个对女性有着“普遍主义”（universalist）看法的语境下，有关翻译女性文本的重要性、危险性，以及承认“女性之间巨大差异”所给人的挑战已得到充分探讨。Flotow 区区一个“女性之间巨大差异”，

不可避免地淡化了女性在种族文化层面之差异的特殊性和政治性。这在我看来是不妥的。

另外的学者如 Godard (2000) 和 Bertacco (2003), 虽然强调性别层面的种族文化差异, 以及把后殖民视角纳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重要性, 但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更进一步研究。

还有学者如 Massardier-Kenney (1994) 和 Kadish (1994), 虽然探讨了涉及种族和性别的女性文本的翻译问题, 但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有关种族或性别的意识形态, 以及对这些意识形态的意识, 分别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没影响文本中种族或性别要素的翻译,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超越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的研究视野。

另一方面, 尽管已有极少数学者如 Spivak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1993) 和 Amireh (“Framing Nawal EL Saadawi: Arab Feminism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2000), 已从结合性别和种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了翻译, 但她们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就事论事, 没有考虑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性地引入翻译研究。事实上, Spivak 在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中所提出的观点已被广为提及和引用, 并启发了很多翻译研究者。Simon (1996)、Godard (2000)、⁵²Flotow (1997b; 2007) 等尽管都重视并不同程度地论述了 Spivak 的翻译政治, 强调她把女性主义、后殖民, 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分析, 但她们同样没有更进一步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性地引入翻译研究。需要指出的是, Flotow 往往认为 Spivak 的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是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谴责, 这在我看来是不确切的, 因为 Spivak 在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涉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翻译政治, 源于她本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立场, 并非针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现状。也就是说, Spivak 在写上述论文时, 事实上并没有加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这个对话圈的出发点。

有鉴于此, 在接下来的第三章, 我将简单介绍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框架, 从而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所忽视的问题。

⁵² 比如, Simon (1996: 144) 指出, Spivak 有关翻译的探讨因为结合了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框架而显得独特。Godard (2000: 510) 也表示, Spivak 有关翻译的探讨, 把 20 世纪 90 年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导向后殖民话语。

第三章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

本章试图探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中三大领域的结合。⁵³具体而言，本章主要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简述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学界有关该理论的质疑和批评；第二，以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探讨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第三，在分析现有的少量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以更为理性和自省的方式，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研究。

第一节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以批评为主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主流后殖民理论缺乏性别维度的批评，但在更大程度上源于对主流女性主义理论缺乏种族维度的批评。总体而言，后殖民女性主义旨在把女性主义议题纳入后殖民理论的同时，种族化主流女性主义理论（Lewis & Mills 2003: 3）。为此，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既是解构也是建构，在对进步话语（如白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和非进步话语（如帝国主义和性别歧视）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同时，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Mohanty 1991b: 51; Ghosh 2001: 170）。

一 学界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概念的分歧

对于后殖民女性主义中后殖民的理解，学界并非总是一致。后殖民有时被认为涉及文化冲突和种族的历史性（Suleri 1992: 759-760），有时被认为涉及第三世界（Bahri 2004: 211），⁵⁴有时被认为涉及第三世界政治定位和抵制普遍主义的后现代思想（Beasley 2005: 74），有时被认为涉及结束被殖民史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某种修正主义立场（Mehta 2000: 395），⁵⁵等等。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将

⁵³ 正如当代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一样，除文学和文化学外，后殖民女性主义也已被纳入各个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等。

⁵⁴ 第三世界的定义既跟地理位置相关，也跟社会经济语境等相关，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群体，也包括第一世界内的类似群体（Mohanty 1991a: 2; Johnson-Odim 1991: 314）。

⁵⁵ 这就是 Padmini Mongia 所谓的“方法论修正主义”（methodological revisionism），即修正西方在知识建构方面的霸权（Mehta 2000: 395）。

后殖民女性主义中的后殖民与第三世界相联系。

另一方面，对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是属于女性主义范畴还是后殖民范畴，学界也有着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后殖民女性主义属于女性主义范畴。也有学者认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形式，同时也属于后殖民研究的一部分。⁵⁶甚至还有学者如 Rajan 和 Park (2000: 53) 认为，后殖民女性主义不单单是后殖民研究的一个分支，也不单单是某个女性主义流派，而是对两者的干涉。

尽管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概念有着上述争议，学界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所包括的核心观点还是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

二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在探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之前，我先简述有关学者对某些身份划分、宏观概念、普遍理论框架等的态度。

尽管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承认女性、黑人等类别划分所体现的问题，但她们没有排斥代表边缘群体提出观点的可能性，这就涉及对某些身份类别的策略性使用，因此后殖民女性主义介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 (Beasley 2005: 80-81)。此外，尽管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要注意差异并抵制普遍主义，但并不排斥甚至强调宏观分析，比如 Spivak 强调微观分析忽视了帝国主义，而 Chow 也表示需要从宏观层面理解各种差异 (Felski 2000: 125)。为此，体现解构立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在承认二元对立、普遍主义等问题的同时，继续出于政治目的使用体现类似问题的概念，包括西方女性、第三世界女性等，并继续进行体现类似问题的宏观分析。

总体而言，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主要关注西方女性主义所代表的霸权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殖民主义父权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关系。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则大都有着第三世界背景并生活在西方，包括 Gayatri Spivak、Chandra Mohanty、Trinh Min-ha、Rey Chow、Uma Narayan 等。

(一) 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⁵⁶ 比如 Reed (2008: 95) 就持这一观点。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一方面关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处理,另一方面也通过提倡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而抵制西方女性主义霸权。Mohanty (1991b: 52) 指出, 尽管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并非铁板一块, 但因为都把西方当作“主要所指”(primary referent) 而体现了类似效应。

1 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与第三世界女性

在涉及第三世界女性时,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在客体化第三世界女性的同时, 对其进行很有问题地再现, 另一方面则从主体层面排斥了第三世界女性, 并在此过程中体现了自我中心倾向。

具体而言,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就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处置, 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批评。

第一, 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姐妹情, 忽视女性内部的深刻差异, 特别是西方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差异, 为此同化了所有女性包括第三世界女性, 这体现为西方女性主义试图为全世界女性代言。Virginia Woolf 的名言“作为女人, 我没有国家。作为女人, 我不想有国家。作为女人, 我的国家是全世界”, 曾被广泛引用。在此基础上, 西方女性主义提出了跨国界、种族、阶层等边界的姐妹情设想, 假设女性因具有类似处境和体验而具有共同的视角和目标, 为此可结成政治联盟。

上述观点因为抹煞女性内部差异和体现性别本质主义, 受到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⁵⁷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 在谈及女性时, 单单强调性别是不够的, 正如 Chow (1991b: 82-83) 指出, 第三世界女性认为, 她们作为女性的体验不可能局限于“女性”这个类别所蕴含的“性化层面”(sexualized aspect)。而对姐妹情的强调, 也忽视了父权之外的其他压迫势力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 为此抹煞了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⁵⁸

与西方女性主义推崇姐妹情相反, 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指出, 女性主义研究非常有必要强调女性内部差异, 也就是 Rajan 和 Park (2000: 66) 所谓的在全

⁵⁷ 尽管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犯本质主义错误, 这并非表明, 后殖民女性主义本身可以彻底摆脱本质主义。事实上, 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如 Spivak (1988a: 13) 曾提及出于政治目的的策略性本质主义。但是, Spivak 在建议策略性本质主义的同时, 强调要有抵制本质主义的立场 (1990: 11)。她还在“*In a Word: Interview*” (1993: 5) 中指出, 对本质主义的批评, 意味着“承认不得不使用的某样东西的危险性”。

⁵⁸ 有关批评还可参考 Ong (1988)、Johnson-Odium (1991)、Ang (2001) 等。

球语境下对女性进行“本土阅读”(local readings)。事实上,强调差异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信条,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只强调性别维度的差异,而不够重视其他维度特别是种族维度的差异。与此相反,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重点强调女性内部的种族差异,认为种族应该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其中一个重点。

第二,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抹煞第三世界女性内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殖民”话语。“殖民”(colonization)既可指代政治经济等级体系,也可指代有关第三世界的文化话语的建构,均隐含“结构统治”(structural domination),以及对有关主体“多样性”的压制(Mohanty 1991b: 52)。这涉及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再现问题,包括文学再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文本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再现),⁵⁹和学术/理论再现(西方女性主义学术文本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再现)。

具体而言,尽管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忽视种族维度强调姐妹情,推广从自身利益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但并不认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没有差异。事实上,有关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在第一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建构“等级化”(hierarchized)关系,是后殖民女性主义抨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看来,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尽管承认西方女性与非西方女性曾有共同过去,却认为两者不在同一个层次,并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隐性的等级关系,体现为文明与落后、拯救与被拯救、主体与客体、理论生产者与原材料提供者等模式。比如,第三世界女性“在政治上不成熟”(politically immature),需要学习西方女性主义(Amos & Parmar 1984: 7);第三世界女性因为身处第三世界,体现了无知、贫穷、未受教育、传统等特点,成为特定社会经济体制的受害者,而西方女性却能够自主决定,控制自己的“性”(sexualities)和身体,并体现了受过教育、现代等特点,从而使得第三世界女性和西方女性之间体现了客体与主体的差异(Mohanty 1991b: 56-57; 71)。

上述这种等级关系,明显体现于对参与同一实践的西方女性和非西方女性的不同再现。Nnaemeka (1997: 166-167)比较分析了西方对美国 and 非洲一夫多妻现象的不同再现,强调同样生活于一夫多妻家庭的美国女性以及非洲女性所

⁵⁹ 在批评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的文学再现方面,Spivak的“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1985)是一个典范。

受的不同“待遇”。刊登于法国女性月刊 *Marie Claire* 的一篇文章（1997），谈及美国犹他州的一个一夫多妻家庭，文章作者没有为其中的美国妻子代言，比如让她们表达对一夫多妻的看法，并尊重这些他们认为与其他现代美国女性无异的同侍一夫的女性；但是，西方对非洲一夫多妻等类似现象的谈论，就没有体现对非洲女性的类似尊重，这些非洲女性没有获得她们的美国“姐妹”所被赋予的发言权和主体性，而往往被建构为非洲压迫传统的受害者。

事实上，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普遍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某些第三世界文化实践（寡妇自焚、缠足、戴面纱等）的谴责，源于该话语有关女性人权的强调，却没有注意到类似文化实践是在某种程度上实践自己的文化权利，从自身文化（而非西方文化）角度看，甚至可以具有某种程度的女性主义意义。以面纱为例。Yeğenoğlu（2003: 558; 565）指出，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视角看，穆斯林女性除去面纱意味着能动性和解放，但面纱可被用以抵制殖民统治，比如，阿尔及利亚女性曾拒绝迎合殖民者而坚持戴面纱，为此，坚持戴面纱就成为这些女性彰显自身能动性的标志，这也是为什么说，女性能动性最终来源于自身文化。

为此，Narayan（1997: 58）指出，某些批判西方父权的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不能完全摆脱西方文化中的“问题层面”（problematic aspects），在论及第三世界女性时复制了“殖民主义立场”（colonialist stance）。西方女性主义不可能免受西方文化任何影响的事实，使得很多西方女性主义文论被认为有东方主义之嫌，体现所谓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⁶⁰

为避免复制所谓的“殖民主义立场”，西方女性主义者开始试图用标榜中立的多元文化主义视角，充分认可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贬低第三世界女性差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第三世界女性及其所代表差异在西方的崛起。但是，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批判性地看待了类似现象，认为这并没有改变固有的权力关系。

61

第三，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体现自我中心倾向。这也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

⁶⁰ 女性主义东方主义表示某种修辞策略，用以抵销西方女性主义主张所代表的威胁，使得这些主张更能被信奉西方优越性的读者或听众接受，比如，某些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指出性别压迫等现象是某种东方要素，从而使得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具有了从西方文化中消灭东方要素的性质（Zoana 1993: 594）。

⁶¹ 比如，Ang（2001: 180）表示，将差异纳入现成的[西方]女性主义社区而没有挑战后者作为社区的合理性，只是同化的其中一种形式。

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而言，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把西方当作“主要所指”，把西方女性的体验和需要当作标准，把自身利益和方法论强加于第三世界女性，假设从其角度提出的观点适用于全世界女性。⁶²

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自我中心，也就是 Ang (2001: 182) 所谓的“白人自我命名的抹除”(white self-exnomination)。在 Ang (同上) 看来，这是西方/白人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无意识层面，因为这个话语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某些最基本观点和信条均源于西方/白人文化：比如，(在涉及性侵犯和性骚扰时，针对流行的男权看法即“女性说不的时候表示是”)，西方女性主义基本信条即“女性说不的时候表示不”(When a woman says no, she means no)，反映出该话语所推崇的理想女性包含“坚决”(determined)、“对抗”(confrontational) 等特点；然而，这些特点事实上都与个人主义、“直接”(directness) 等西方文化价值观相关，而类似西方文化价值观却是其他女性无法拥有或不感兴趣的，但她们(比如亚洲女性)可以借助与此不同的并更为委婉的方式对抗男权。

此外，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某些信条，还可能反过来压迫而非解放其他女性。比如，在美籍非裔女性主义者 hooks 看来，女性在性方面的大胆开放，只有从白人女性的角度看才具有女性主义赋权意义，但这不适用于黑人女性，因为黑人女性被普遍认为放荡，而更为关注如何改变这一形象 (Ang 2001: 183)。

另一方面，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自我中心倾向，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于如下事实：西方女性主义往往被等同于女性主义。比如，很多仅仅论及西方女性主义的专著或文集，往往被命名为女性主义。

2 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

针对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把女性主义“据为己有”的倾向，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指出，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前，第三世界就已存在性别平等思潮。后殖民女性主义不仅抵制西方女性主义把女性主义据为己有的倾向，同时也抵制西方女性主义在性别政治方面的霸权。

考虑到对霸权话语的颠覆意味着用 Brooks 所谓的“边缘认识论”(marginal epistemologies) 取代之，⁶³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强调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价值和

⁶² 参考 Mohanty (1991b: 52)、Chow (1991b: 93)、Lewis & Mills (2003: 4)、Hutchings (2007: 176)。

⁶³ 我从 Aitchison 的 *Gender and Leisur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2003: 35) 中引用了 Brooks 的这

有效性，强调父权在不同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呼吁尊重第三世界女性自身的解放途径，借以抵制西方女性主义特有的妇女解放模式。

在此语境下，很多第三世界女性从本土文化中探索质疑西方女性主义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形式，并在女性主义前加上各种修饰语如国族、宗教文化传统等以示区别，比如所谓的非洲/黑人女性主义、中国儒家女性主义、埃及女性主义、⁶⁴阿拉伯伊斯兰教女性主义等。对女性主义国族性和文化传统的强调，不可避免地挑战了西方女性主义霸权。

以非洲女性主义为例。在非洲女性看来，西方女性主义体现了极度的个人主义、对父权的激进反抗，和对男性的憎恨等（Mikell 1995: 406），有关学者为此论证了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的非洲女性主义。基于非洲文化的非洲女性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⁶⁵第一，非洲女性主义认为，对女性而言男性不是他者，两性是互补关系，这源于非洲文化从总体而不是从二元对立角度看问题的方式，以及该文化中的两性合作传统。这就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男女两性的对抗。第二，非洲女性主义强调给女性赋权的同时，也强调给男性和所有人赋权，强调权力的分享，这源于非洲文化重视所有人之间联系的世界观，以及非洲文化中的“平面权力母体”（horizontal power matrix）。与此相反，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对权力的侵占。第三，非洲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女性主义不仅反抗性别压迫，同时也反抗种族、阶级、文化等层面的压迫，因此比西方女性主义更为全面。总体而言，植根于非洲文化并推崇“母职”（mothering）和利他主义的非洲女性主义，被认为体现了妥协、合作、互惠等特点，从而有别于体现解构和对抗等特征的西方女性主义。

再以中国儒家女性主义为例。中国儒家女性主义也被认为在不同层面质疑了西方女性主义。比如，Lee（2000）分析了体现于中国文人李贽（明朝）有关作品的中国儒家女性主义，探讨他的有关观点如何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 John Stuart Hall 的某些观点。一方面，李贽强调内外领域的可渗透性和“分度”（graduated）差异，为此和 Hall 所强调的公私领域的不可渗透性和“对立”（oppositional）差异不同；另一方面，李贽认为改善女性处境的其中一个方式

个术语。

⁶⁴ 在论及埃及女性主义时，Badran 质疑西方女性主义把“力量”（power）与公开的激进主义相挂钩的假设，区分了“显形”（visible）和“隐形”（invisible）女性主义，强调隐形抵制方式的力量（Mehta 2000: 395-396）。

⁶⁵ 参考 Steady（1987: 4; 8）、James（1989: 23-24; 209-211）、Nnaemeka（2005: 32-34）。

在于获得“修身”(self-cultivation)机会,但 Hall 认为,女性解放的出路在于通过法律等变革将女性纳入公共领域,等等。

其他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如伊斯兰教女性主义,也在不同层面质疑了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普适性。比如,伊斯兰教女性主义一方面重新阐释伊斯兰教文本,强调其中捍卫女性权利、主张两性平等的要素,一方面质疑西方女性主义的某些核心信条如性解放,认为该信条根据男性利益定义女性自由,另一方面则强调穆斯林女性的宗教权力如戴面纱(Saliba 2000: 1090; Lewis & Mills 2003: 4; Fehr 2004: 54-54),为此挑战了西方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赖以建立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西方女性主义普遍将戴面纱解读为女性受压迫象征的立场。

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下,西方女性主义者也越来越多认可和重视女性内部的差异,但这并非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实质性改变。正如 Alexander 和 Mohanty (1997: xviii)指出,尽管学界已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倡“世界女性主义”(international feminism),但这种标榜多元主义并展示其包容性的世界女性主义,往往基于“中心/边缘模式”,而占据边缘的还是第三世界女性。事实上,尽管不是特别确定西方女性主义者是否把自己看成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众多“声音”(voice)之一,Schutte (2000: 59)认为,考虑到西方思想自认为不具有文化特性,西方女性主义仍旧希望自己有关女性解放的观点适用于所有女性。

(二) 殖民主义父权和第三世界女性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也批评殖民主义父权,但前者占更大比重。对殖民主义父权的批评,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试图“性别化”主流后殖民理论的其中一个方式。

考虑到仅仅关注种族政治,意味着对帝国时期第三世界女性所受“双重殖民”(double colonisation)的忽略,后殖民女性主义关注各种父权(包括殖民主义父权)如何导致第三世界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层面的“他性”(otherness)(Ghandi 1998: 83; Mehta 2000: 395)。为此,后殖民女性主义也考察殖民主义父权如何表征第三世界女性。

有关殖民主义父权如何建构性别化的殖民话语,是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分析

的其中一个方面。比如，通过强调被殖民地女性如何成为本民族野蛮传统文化的受害者，该话语把自身的殖民行为合理化为“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这就涉及 Spivak (1988b: 296) 所谓的“白人男性把棕色女性从棕色男性手中拯救出来”(White men are saving brown women from brown men)。

某些西方女性也以不同方式参与了上述话语的建构，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殖民者/压迫者身份（这就涉及类似女性的主体分裂问题）。正如 Bahri (2004: 200-201) 指出，在殖民时期，来自殖民帝国的女性也通过实践某种“母性帝国主义”(maternal imperialism) 与殖民主义合谋。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所受到的批评

正如主流女性主义和主流后殖民理论受到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一样，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本身也受到了内部和外部的质疑和批评。

具体而言，学界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了本质主义和“同质化”(homogenise)倾向。在某些批评者看来，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犯本质主义错误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本身，也本质化和同质化了很多概念，包括第三世界女性、西方价值观、西方女性、西方女性主义等。比如，在 Ghandi (1998: 88) 看来，⁶⁶（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如 Trinh、Mohanty、Spivak 的局限，在于她们本质化了现实第三世界女性的“难以认识性”(epistemological opacity)，此外，她们在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同质化建构时，也同质化了所有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意图。Narayan (1998: 96-97) 则提及了文化本质主义问题，比如，某些学者（包括后殖民女性主义者）认为平等、人权等是西方价值观。

第二，体现了排斥西方女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并因其激进的修正主义立场，影响了女性主义对话。比如，Ghandi (1998: 88) 认为，Trinh、Mohanty、Spivak 体现了某种“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reversed ethnocentrism)，而类似问题也同样体现于 Said 有关东方主义的批评。Suleri (1992: 765) 则指出，⁶⁷（后殖民女性主义者）hooks 所体现的激进修正主义加深了女性主义内部的分裂，而这种修

⁶⁶ Ghandi 参考了 Trinh 的 *Woman, Native, Other*、Mohanty 的“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和 Spivak 的“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

⁶⁷ Suleri 参考了 hooks 的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正主义事实上依赖于第三世界女性这个类别所被赋予的“政治不可触性”(political untouchability), 并在此过程中影响这个类别在当代女性主义对话中的意义。

第三, 体现了很多身份政治较难避免的“自以为正义”(self-righteousness)。这往往导致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忽略质疑自己的立场和预设。比如, Rajan 和 Park (2000: 55) 指出, 后殖民女性主义中的某些层面, 正如很多身份政治一样, 体现了“自我放纵的、爱争辩的、自以为正义的”(self-indulgent, polemic, and self-righteous) 特点。

第四, 体现了对第三世界女性受迫害状况的漠视。这是因为, 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往往阻止西方女性主义干涉第三世界女性所受压迫, 甚至还为第三世界女性所受压迫辩护。比如, Nussabaum 和 Okin 指出, 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无权指责非西方传统的批评者, 以相对主义为借口, 避免直接谴责非西方女性所受迫害, 为此体现了对女性受迫害处境的漠视 (Jaggar 2005: 186)。

尽管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现了上述不足, 但其理论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比如, 在 Rajan 和 Park (2004: 55) 看来, 后殖民女性主义对西方理论的批评所产生的影响, 或许大于任何单纯的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

第二节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这一节将集中探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可在何种程度上启发翻译研究, 包括其中的翻译理论、翻译史, 和翻译批评, 从而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被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所忽略的问题。这些研究问题将构成所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框架。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我在下文使用了诸如西方女性、第三世界女性、西方女译者、第三世界女译者等体现本质主义问题的宏观概念, 这涉及 Spivak 所谓的策略性本质主义, 只为宏观探讨之便, 并非意味着我相信这些概念具有本质意义。

一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理论

从第一节可知, 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其中一个核心内容, 就是推崇提炼

自非西方文化传统的非西方女性主义,包括非洲女性主义、中国儒家女性主义、埃及女性主义等,借此挑战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在性别政治方面的霸权。这些非西方女性主义,就两性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观点。

为此,用这些非西方女性主义观点看待翻译行为所得出的结论,有可能不同于用西方女性主义观点看待翻译行为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不同于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有关观点。在此启发下,我们可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如果从强调男性不是他者而强调两性互补,强调“平面权力母体”和利他主义,以及强调同时抵制父权和殖民霸权等的非洲女性主义视角看待翻译行为,将会得出什么结论?如果从强调内外领域的可渗透性而非不可渗透性,同时强调体现为同心圆形式的“分度”差异的中国儒家女性主义视角看待翻译行为,将会得出什么结论?如果从强调隐形而非显形抵制方式的埃及女性主义视角看待翻译行为,将会得出什么结论?等等。可以预料的是,这些探讨所得出的结论,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谓的“妇占”、“以阴性的名义重写”等观点。

此外,非西方女性主义的存在,也将多样化所谓的女性主义译者。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从非西方女性主义视角界定的女性主义译者,将如何不同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译者?比如,考虑到非洲女性主义对母职和利他主义的强调,翻译理论的非洲女性主义版本,有可能建构出类似于慈爱地母的女性主义译者形象,从而不同于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青睐的类似于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译者形象。

除推崇非西方女性主义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强调女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关系。这将不可避免地把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关女性主义译者的界定问题化。从第二章可知,在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有关女性主义译者的界定仅仅涉及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以各种方式抵制父权并维护女性利益的译者。尽管有些学者如 Garayta (1998) 试图拓宽女性主义译者的定义,建议区分类似于低度、高度等之分的女性主义译者,她也还是仅仅关注了性别。可见,类似界定明显忽略了女性之间的利益冲突,为此不无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如何在女性内部存在权力关系的情况下界定女性主义译者?

此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也从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方面探讨女性的自我

和主体性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因为弱势文化他者的要求，强势文化主体感到自我的分裂，而只有那些信奉“殖民主义逻辑”的强势文化主体，才会感到自我的整体性（Schutte 2000: 60）。在当今语境下，具有强势文化主体身份的西方女性，往往会有类似的主体分裂问题，因为第三世界女性的批评使她们意识到，自己在充当被压迫者时（父权）也与压迫者合谋（殖民霸权）。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考虑如下问题：在女性之间存在权力差异的情况下，如何界定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对类似问题的探讨，将在某种程度上复杂化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也能克服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涉及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方面的单一性，因为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仅仅用父权所象征的压迫性界定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即以抵制父权为名干涉原文本所体现的主体性。

从上一节可知，除探讨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也试图通过关注殖民主义父权等问题，“性别化”主流后殖民理论。有鉴于此，我们可提出以下问题：考虑到殖民主义父权的存在，有关翻译的殖民话语如何贬低或“挪用”（appropriate）了殖民地女性？如何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视角探索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后殖民女性主义译者如何定位自己的翻译任务，在抵制殖民主义霸权的同时也抵制殖民主义父权？等等。上述探讨也将不可避免地“性别化”主流后殖民翻译理论。

为此，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理论，在沟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同时，也将在某种程度上拓宽理论视野。

二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史

为挑战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普适性，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非常强调父权机制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作用形式，以及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对父权的不同抵制方式。把这一观点纳入翻译史研究，将使得我们关注以下问题：历史上的西方女译者和第三世界女译者，如何采用不同的翻译方式抵制各自文化中的父权？这意味着研究者将考察和比较历史女译者的翻译抵制背后体现出的种族文化语境和差异。

西方女性与殖民主义统治之间既合谋又抵制的关系，也是后殖民女性主义

理论的一个关注点。有鉴于此，我们可提出以下研究问题：西方女性与殖民主义统治之间既合谋又抵制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于历史上西方女译者的翻译行为？或者，西方女译者的翻译行为，在何种程度上辅助和扰乱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统治？翻译学者可参考 Chaudhuri 和 Strobel 合编的 *Western Women and Imperialism: Complicity and Resistance* (1992)。

此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还指出，历史上的西方女性主义个体，在抵制父权限制和建立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自我的过程中，有可能迎合殖民话语。比如，Spivak 在“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中表示，*Jane Eyre* 的作者 Brontë，在建构女性主义主体 *Jane Eyre* 的同时，他者化了第三世界女性即疯女人 Bertha。在 Bahri (2004: 205) 看来，Spivak 的这篇文章表明，即使“女性主义工程”(feminist project) 也无法保证能表征或尊重第三世界女性的视角，而女性主义个体在建立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自我的过程中，还可能与以“他者化”(othering) 为特点的殖民话语合谋。有鉴于此，以下问题可以成为翻译史学者的一个研究对象：历史上的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如何在借助翻译摆脱父权压迫建立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自我的过程中，同时在客观上辅助了殖民统治？比如，在某个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时期，在限制该国女性创作和翻译的父权语境下(从第二章可知，这种情况在西方历史上比较普遍，这也是为什么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尤其强调历史女译者的“进步性”和“抵制性”)，某个女译者翻译了某个殖民地语言的文本，并在翻译过程中迎合了殖民话语，建构了殖民者身份。对于这个西方女译者来说，一方面，考虑到她抵制了本国父权有关创作和翻译的限制，这种翻译行为意味着她借助翻译建构了自身的女性主义主体性；另一方面，考虑到她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殖民主义建构，这种翻译行为同时意味着她在某种程度上辅助了殖民统治。

除强调西方女性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外，后殖民女性主义也强调第三世界女性的抵制，即抵制西方女性主义所体现的话语殖民和霸权。为此，我们还可尝试研究以下问题：历史上的第三世界女译者是否/如何借助翻译，抵制体现于某些西方女性主义经典的女性主义东方主义？这些第三世界女译者是否/如何借助翻译，抵制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在妇女解放方面的绝对发言权，比如通过译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本而不是译入西方女性主义文本？等等。

最后，我们还可以考虑，历史上西方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对彼此之间作品

的翻译，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彼此关系之历史变迁的影响，或是因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三次浪潮而体现出阶段性特征？历史上的殖民地女译者如何借助翻译参与本国的反殖民主义项目，如何借助翻译抵制殖民主义父权话语？等等。

总体而言，对上述问题的考虑，将会使得有关历史女译者的研究超越单一的父权文化背景，而将研究对象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包括西方的帝国主义史、有关的反殖民史等。这将使得对女译者的形象勾勒更为丰满和真实，而不会只建构千篇一律的抵制父权的女勇士形象（这正是主流女性主义翻译史给人的印象）。同时，这些问题也将促使隐形于主流后殖民翻译史中的第三世界女译者浮出历史地表，因为有关研究者要么完全忽略这类群体，要么因为对种族/民族文化权力关系的巨大关注，无限放大她们的种族/民族身份而忽视性别身份。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批评

从上一节可知，后殖民女性主义尤其强调西方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而这种不平等权力关系，最明显体现于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殖民，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排斥。

在这样一个语境下，我们可以关注以下问题。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殖民，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没影响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在西方的翻译方式？⁶⁸比如，有关译者有没有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或抵制类似话语殖民，建构或抵制“刻板的”（stereotypical）第三世界女性形象？再比如，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社会学文献定位（这也源于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因为前者往往把自己视为理论生产者，而把后者定位为“原材料”提供者），⁶⁹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类似文本的翻译，导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此更为重视其中的信息价值而非美学价值，或是没影响类似文本的翻译，为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同样非常重视其中的美学价值？西方女性主义在性别政治方面的

⁶⁸ 类似问题已有人提出。第三世界女性，就有关主体以第一世界女性主义之名“歪曲”（misrepresent）其文本，提出了问题：在让第三世界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译者扮演了什么角色？她应该怎么翻译？她为谁翻译？她的翻译强化了对这些女性的剥削，还是促进了世界女性主义目标的实现（Flotow 1997b: 3）。

⁶⁹ 正如 Amireh 和 Majaj（2000: 7）指出，在西方，第三世界女性文学文本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社会学文献，为西方读者提供有关第三世界女性受压迫的信息。

霸权，以及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在性别政治方面的无权和隐形处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没影响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本在西方的翻译？与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认同的译者，会在何种程度上抵制或尊重所译文本中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特别是以非常激进的方式颠覆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信条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⁷⁰等等。

在对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译介方面，除了西方个体（即译者）外，类似机构如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也起了一定作用。为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不同性质的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非营利或营利，独立或附属），在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方面（涉及选材），在何种程度上迎合或抵制了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⁷¹

可见，将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批评，意味着对父权话语的迎合或抵制与否，不再是涉及女性文本的翻译批评很多时候依赖的唯一重要标准，也意味着对殖民主义话语的迎合或抵制，不再是涉及第三世界文本的翻译批评很多时候依赖的唯一重要标准，从而使得批评者将注意力转向一些被忽视却同样重要的关注点。

第三节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我在第二章结尾指出，已有极少数学者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了翻译现象，也就是说，她们的研究涉及了我在上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的某些问题。但是，这些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批评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探讨它们在研究主题上体现的倾向，也没有考虑将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体系性地引入翻译研究。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些学者的最大问题，是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我反思的立场。

本节将重点关注有关学者如何体现出自我反思立场的缺乏，并在此基础上提及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所应注意的问题。

⁷⁰ Bertacco (2003: 241) 也提出了类似问题：在面对一个非洲女性主义作家的文本时，当这个作家的女性主义观点不同于自己所认同的女性主义观点时，西方女性将会怎么翻译？

⁷¹ 尽管没有针对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Amireh 和 Majaj (2000: 4) 也提出了涉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翻译选材问题：哪些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被选择翻译？是那些迎合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看法（如受害者）的文本？还是那些把第三世界女性塑造为能动者的文本？

一 现有的少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及其不足

考虑到翻译的文化实践性质，以及任何文化实践的政治功能，少数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如 Spivak、Kahf 等也提及了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英译问题，但她们的关注重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翻译研究本身。

(一) 现有的少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在“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93)一文中，Spivak 探讨了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英译问题，探讨如何借助翻译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同时也提出了她理想中的译者。考虑到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英译是批量生产并带有翻译腔，从而降低了这些文本在英语国家的竞争力和地位，Spivak 强调需要注意西方女译者以女性主义之名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背后的政治，比如前者在翻译时往往不注意文本修辞而构成某种新殖民主义行为，并违背了最初的好意。

对此，Spivak 指出，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西方女译者，应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在翻译时向原文“投降”(surrender)，包括原文的修辞、风格等要素。Spivak 还认为，理想的西方女译者应该知道区分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优劣，知道哪些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是抵制的，而哪些是迎合的，了解在英语文化中具有抵制意义的成分，在源语文化中或许是反动的。

此外，从 Spivak 的翻译实践中可知，她理想中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英译者（如她本人），还需以各种方式如元文本（译者前言、后记等）凸显自己作为调解者的立场。以她英译印度女作家 Mahasweta Devi 的 *Imaginary Maps* (1995) 为例。Spivak 在译文中附上作者访谈、译者前言、后记等元文本，谈及她的翻译策略（她把原文中原本存在的英文，在英译文中用斜体标出，凸显印度的被殖民史），⁷²谈及她对西方读者误读第三世界文本的担心（考虑到西方对第三世界文学的阅读与教学存在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她往往会发表与所译文本相关的评论文以修正类似倾向），⁷³等等。

除 Spivak 之外，学者如 Amireh 等也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了翻译。但较之于 Spivak 的“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没有

⁷² 参考 Spivak (1995: xxxi)。

⁷³ 参考 Spivak (1995: 197)。

引起翻译学者的足够注意。

不同于 Spivak, Amireh (2000) 提供了案例分析, 探讨埃及女作家 Nawal EL Saadawi 所著文本的英译情况,⁷⁴ 凸显西方(女性主义)有关阿拉伯女性的话语如何在不同方面改写了原文。

第一, 有关标题的改写。原本意思为 “the naked face of Arab woman” 的书名, 在翻译中被改成 *The Hidden Face of Eve*。原书名强调脸的完全暴露, 以此表明该文本旨在揭示阿拉伯女性生活实况并改变之, 但译文书名却强调脸被面纱遮盖。Amireh (226) 指出, 这个改变与西方有关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的主流话语相关, 而译文把原书名中的 “Arab woman” 改成 “Eve”, 也强化了原文本的神秘色彩。

第二, 有关正文内容的改写。一方面, 译文省略了若干完整章, 包括谴责资本主义而建议实行社会主义的两章 (“Woman’s Work at Home” 和 “Arab Woman and Socialism”), 并省略了若干段落, 这些段落强调阿拉伯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领先于欧美女性, 强调阿拉伯女性已取得的进步以及民族解放战争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另一方面, 译文添加了若干章, 包括 “The Grandfather with Bad Manners” 和 “Circumcision of Girls”,⁷⁵ 并将该文本的第一部分命名为 “The Mutilated Half”。

第三, 有关形式的改写。译文把原本置于后面涉及性的内容调整到第一部分, 而把原本置于第一部分涉及阿拉伯女性史的内容调整到最后一部分。涉及阿拉伯和穆斯林女性史的内容, 旨在凸显这些女性在过去更为强大, 旨在凸显伊斯兰教并非导致她们如今受压迫的状况, 暗示真正的伊斯兰教能给女性赋权。在 Amireh (226) 看来, 这种形式调整更好地满足了西方读者对受压迫他者的偏好。

通过上述分析, Amireh 试图证明, 西方(女性主义)有关阿拉伯女性和文化的主流话语(强调阿拉伯女性的神秘和受害者身份, 以及伊斯兰教的压迫性等)如何导致了对原文本的重写。

与 Amireh 类似, Kahf (2000) 也提供了案例分析, 考察 Huda Sha’rawi 回忆录的英译情况(由美国 The Feminist Press 出版), 重点分析西方(女性主义)

⁷⁴ 这个文本的英译名是 *The Hidden Face of Eve*。Amireh 提及了两个英文版, 分别由英国的 Zed Press (1980) 和美国的 Beacon Press (1982) 出版。

⁷⁵ 西方普遍认为, 涉及女性的 “circumcision” 是某种第三世界野蛮实践。

有关阿拉伯女性的话语如何重写了该文本。在 Kahf (149) 看来,该话语包括以下刻板印象:首先,阿拉伯女性受到性别压迫;其次,阿拉伯女性逃离自身的“压迫”(oppressive)文化;⁷⁶最后,阿拉伯女性充当男权工具。⁷⁷Kahf 指出,Sha'rawi 的回忆录在被译成英文 *Harem Years* (1986) 的过程中遭受改动,而这些改动明显受制于上述话语。

第一,译文削弱了原文描述的与阿拉伯男性之间的友好关系,比如译文削弱原文带着敬爱之情描述的男性形象,因为这不符目的语读者对阿拉伯女性遭受性别压迫的期待。第二,译文夸大了原文中的欧洲“成分”,忠实传达了原文所描述的受压迫阿拉伯女性,却省略了原文所描述的一个法国女性的不幸故事,维护了有关阿拉伯女性和欧洲女性之间等级差异的假设,这是因为目的语读者期望阿拉伯女性逃离自身文化并被欧洲文化所拯救。第三,译文削弱了原文所凸显的女作家的阶级优势,因为这不符目的语读者对阿拉伯女性劣势处境的期待。第四,译文把原文从一个关于公众人物的故事,改变成一个关于私人生活和“后宫”(harem)的故事,因为译文只重点翻译了原文描述女作家少女时代等的前面几章,而把原文关于女作家参与民族主义等公众运动的核心章节简化为后记。

可见,Kahf 也试图证明西方有关阿拉伯女性的主流话语如何导致了原文的改写。

(二) 现有的少量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上述较有代表意义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关注了以下话题,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如何导致了对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重写,以及译者应该如何尊重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所代表的差异。但是,这些有限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不无问题。

先以 Spivak 的“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为例。在这篇文章中,Spivak 明确建议了具体翻译方式,比如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译者应该向原文“投降”,

⁷⁶ Barbara Nimri Aziz 指出,如果美国读者发觉某些阿拉伯女性不符合受害者模式,就将其理解为逃离自身文化的“逃离者”(escapee)(Kahf 2000: 150)。

⁷⁷ 美国女性主义话语暗示,在脱离阿拉伯文化和男性之前,阿拉伯女性不可能成为女性主义者(Marnia Lazreg),为此,如果阿拉伯女性手中掌握些权力或没有脱离阿拉伯文化和男性,从而不符合受害者或逃离者模式,她们会被认为与男权合谋(Kahf 2000: 151)。

知道区分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优劣等等，这就重复了学界就“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所提出的第一个批评，即建议具体翻译方式的规定主义。此外，Spivak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自我反思立场的缺乏。比如，她仅仅注意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英译存在批量生产和翻译腔问题，却没有考虑非英语西方国家女性文本的英译，是否也存在同样问题。最后，Spivak也似乎排除了以下可能性，即已有西方女译者用她所建议的方式翻译了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尽管Spivak多次强调要抵制本质主义而关注内部冲突，但就她有关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英译的探讨而言，她并没有足够质疑西方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对立。

再以Amireh和Kahf的个案分析为例。在分析两个埃及女性文本的英译方面，两者体现了以下几个倾向。

第一，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简单化了有关话语（即西方（女性主义）有关阿拉伯女性的话语）的作用方式，片面强调其负面的压制力，而没有凸显话语所作用不到的场合或时刻，比如，没有足够重视和分析可能存在的反例。考虑到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强烈意识形态，上述倾向有可能引起读者质疑，怀疑她们戴着“有色”眼镜做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无意识忽略。无意识忽略表示研究者因为“信奉”某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她们眼里“看不到”事实上抵触了这些观点的例子。

第二，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两者也没有足够重视对所涉及出版社/编辑和译者的背景、立场、身份等问题的分析，并倾向把他们看成是某些话语的纯粹受害者，而没有重点分析这些主体与这些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主体在翻译或编辑过程中体现的分裂性等。尽管Kahf提及译者对主流话语的可能质疑和抵制，但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点展开分析。

第三，在分析涉及翻译的删改现象时，除了考虑西方（女性主义）有关阿拉伯女性的话语之外，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其他可能性。此外，两者也没有强调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如何影响阐释分析，从而体现了很强的“自以为正义”（self-righteousness）。

这表明，Mireh和Kahf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反思自己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包括反思有关话语的实际作用方式和作用力，反思有关主体与有关话语的复杂关系，反思自己与所用理论的认同如何影响自己的研究，等等。为此，Mireh

和 Kahf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借助文本分析的方式，证明西方有关阿拉伯女性的主流话语，如何导致了译文对阿拉伯女性文本的重写，而没有复杂化各个层面的权力关系。

事实上，考虑到上述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的学者，具有更大程度的文学文化批评背景而非翻译学背景，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以翻译研究为出发点，从而不够重视译者、编辑等主体的行为和立场以及严谨的文本分析。

二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需要注意的问题

鉴于上述分析，我认为，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研究时，需要事先审视学界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这样才有可能在理论运用过程中，尽可能“减轻”某些明显或不必要的欠缺。

从上文可知，学界对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有关观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体现了本质主义和“同质化”（homogenise）倾向。在某些批评者看来，批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犯本质主义错误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本身，也本质化和同质化了很多概念。第二，体现了排斥西方女性的种族中心主义，并因为激进的修正主义立场影响了女性主义对话。第三，体现了很多身份政治较难避免的“自以为正义”（self-righteousness）。这往往导致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忽略质疑自己的立场和所涉及的预设。

那么，上述批评，对试图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翻译的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关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具有抵制本质主义的立场，认可群体内部的多样性，避免针对西方女性主体的激进修正主义，质疑后殖民女性主义预设，避免对性别、种族、权力和翻译之间关系的简单描述，等等。

为此，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学者，需要事先质疑以下这些比较诱人的假设（这只是很多假设中的其中几个）：在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时，西方女译者往往不够尊重原文并进行“话语殖民”，比如根据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重写原文，根据自己所信奉的女性主义理论重写原文？在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时，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选择迎合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文本，选择迎合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信条的文本？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以及西方有关

第三世界的主流话语，对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在西方的译介情况，有着完全的控制力？在涉及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在西方的译介时，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所提供的视角最为合适？等等。

在我看来，考虑到后殖民批评已在西方产生了一定影响，以及很多西方女性主体在涉及种族等问题时体现了自省意识，前三个假设的答案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是单纯的“是”或“否”，而是界于“是”和“否”之间或是更为复杂的情况。类似考虑是很明显也是很基本的，但很多“效忠”的研究者却往往忘记这一点。

对于最后一个假设，即后殖民女性主义所提供的视角最适合分析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在西方的译介，我们也需要质疑，充分承认这个视角本身的局限，分析它所不能解释的层面，考虑从其他视角看问题的可能性甚至优势。

具有自我反思意识和如何在实际研究中贯彻自我反思立场是两回事。事实上，在实践中贯彻自我反思立场并非易事，正如 Hermans (2002) 指出，他也不知道翻译研究者如何在实际研究中做到自我反思。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在充分认识“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所受质疑，以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所受批评的情况下，我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翻译个案分析，以期在此过程中实践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第四章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在 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政治 ——以美国的 Aunt Lute Books 和英国的 Virago Press 为例

我在第三章简述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并以提出一系列研究问题的方式，探讨如何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纳入翻译研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主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对某些重要研究问题的忽略。我所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问题，涉及如何从第三世界（有色）女性主义视角理论化翻译，⁷⁸西方和第三世界女译者如何采用不同翻译方式抵制各自文化中以不同方式运作的父权，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选择翻译出版哪些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西方女译者如何翻译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等等。

在这一系列研究问题中，本章选择关注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在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并把研究对象具体化为“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以美国的 Aunt Lute Books 和英国的 Virago Press 为例”。

关于这个研究对象，我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界定翻译选材，为何选择关注翻译选材？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的翻译选材政治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选择考察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为什么选择 Aunt Lute Books 和 Virago Press？

第一，翻译选材指的是有关文本的译文由出版社首次出版，而不是出版社对已出版译文的重印，这意味着出版社承担更大的责任和风险，为此，关注翻译选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出版社（有意或无意体现的）立场。第二，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的翻译选材，意味着考察这些出版社对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翻译出版（选材行为本身），在何种程度上迎合或抵制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以及西方有关第三世界的主流话语。第三，之所以选择考察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而非其他西方国家的女性主义出版社，是考虑到这两个国家的女性主义出版社在整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界最具代表性，数量上也相对而言最多。第四，之所以选择 Aunt Lute 和 Virago，是

⁷⁸ 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中，“有色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往往互换使用。

因为我只知道这两家女性主义出版社继续营业，并翻译出版过书本长度的、非学术类的中国女性文本。⁷⁹

下面，我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这两个出版社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情况，并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质疑后殖民女性主义预设，以避免重复其中的本质主义和同质化倾向等问题。

第一节 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

出版社选择出版哪个作者的哪部作品背后涉及政治，比如，某些出版社通过出版特定文本而服务于某种特定意识形态，这早已人所共知。在各种类型的出版社中，女性主义出版社的意识形态是最明显的。

女性主义出版社，顾名思义，就是为服务女性和女性主义政治而建立和运行的出版社。总体而言，女性主义出版社不仅出版女性文学文本，也出版跟女性主义相关的学术作品，并体现了美学和政治的结合。

一 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的历史源起和发展现状

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产生于英美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20 世纪 60、70 年代）。意识到作为某种文化实践的出版行为的政治性和重要性，某些女性主义者不满当时主流出版社对女性文本的排斥，着手建立女性主义出版社，以确保为女性提供“发声”渠道，而女性主义出版行为也为此在事实上构成英美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Murray（2004: 1）看来，女性主义出版社的出现及其对主流文化的“渗透”（infiltration），构成 20 世纪末出版界最具有意义的现象。

在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界，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影响力上来讲，美国的女性主义出版社都是最为瞩目的，其第一个女性主义出版社（Shameless Hussy Press）成立于 1969 年。在论及美国的女性主义出版社时，Short（1994: 2）指出，这些出版社一直处于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出版被主流出版社边缘化的女性文本，包括女同性恋和工人阶级女性的文本，以及有色女性的文本。根据有关

⁷⁹ 据我了解，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的很多是非女性主义出版社，包括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等。

资料，可确定目前为止仍在营业的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约有 21 家。⁸⁰尽管美国现存的女性主义出版社只有这么一些，但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很多女性主义出版社，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持续至今。

至于英国的女性主义出版社，无论从曾经存在过的数目还是从现存的数目来看，都少于美国。⁸¹根据伦敦的 the Women's Research and Resource Center 于 1993 年的统计，英国有 21 家女性主义出版社 (Eagleton 1996: 105)。截至今日，继续营业的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仅约 7 家左右。⁸²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有着不同的营运结构，比如 Virago 是所谓的“公司”(corporate) 女性主义出版社，往往采用等级化模式并重视利润，而 Onlywomen Press 则是所谓的“激进”(radical) 女性主义出版社，往往采用非等级化的集体主义模式，并且不是特别重视利润 (Murray 2004: 127; 132)。

时至今日，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成立的很多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不断“失守”停业或成为跨国集团的分社。这是因为随着女性研究在大学的的确立，以及女性主义文本读者群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非女性主义出版社如主流出版社和学术出版社等，也开始重视出版跟女性主义相关的作品，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挤兑了女性主义出版社。⁸³需要指出的是，主流出版社出版跟女性主义相关的文本，并非表明类似出版社试图服务女性主义政治或是体现了政治正确，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出版社看到了其中的市场潜力。

⁸⁰ 有关信息主要参考网站 www.litwomen.org/WIP/publist.html，以及 Short 的博士论文“Publishing Feminism in the Feminist Press Movement, 1969-1994” (1994)。在统计继续营业的女性主义出版社时，我主要考虑出版社是否致力于服务女性和女性主义（这就排除了那些仅仅由女性经营，但没有类似出发点的出版社）。目前为止，继续营业的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包括以下 21 家：Acacia Books、Artemis Press、Ash Tree Publishing、Aunt Lute Books、Bella Books、Calyx Books、Chicory Blue Press、DLSIJ Press、Firebrand Books、GirlChild Press、Intaglio Publications、Jane's Stories Press Foundation、Kelsey St. Press、Kore Press、New Victoria Publishers、Paris Press、Seal Press、Spinsters Ink、The Feminist Press、Wish Publishing、WovenWord Press。

⁸¹ 除数量上的差异外，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和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还有另外一个区别，即前者与学术界的互动程度低于后者 (Murray 2004: 49)。

⁸² 这 7 家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包括 Honno Welsh Women's Press、Onlywomen Press、Raw Nerve Books、The Women's Press、Vane Women Press、Virago Press、Wild Women Press。

⁸³ Kim (2004: 6) 和 Murray (2004: 213) 都提及了这个问题。针对来自非女性主义出版社的竞争，某些女性主义者强调了女性主义出版社的价值。比如，June Arnold 认为，选择女性主义出版社的好处是所出版文本有更长的销售时间，作者的观点风格得到尊重等 (Webb 1995: 18)。Ruth Gundle 则表示，女性主义出版社在提供涉及各主题的文本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女性主义出版社的存在以及所出版的文本，也启发其他非女性主义出版社出版同样文本 (Gold 1996: 117)。

二 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与种族问题

正如英美女性主义运动由白人中产女性发起和主导一样，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也在很大程度上由类似群体控制。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英美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种族层面的分裂，比如有色女性指责白人女性体现了所谓的“殖民”态度或立场。

在女性主义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女性主义出版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上述审视，审视对象包括出版清单是否包括有色女性文本，出版社管理层是否包括有色女性，所选择出版的有色女性文本是否迎合“殖民”话语等。

在 Webb (1995: 2) 看来，女性主义出版社并非脱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而存在，在这些出版社试图抵制基于性别、阶级、种族、性取向、语言等的压迫时，同样的压迫（除性别外）还是明显存在于女性主义出版行为中。Murray (2004: 88) 则指出，既然女性主义出版社的成立基于如下假设，即由白人男性控制的出版界所出版的内容体现了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同样道理，由白人女性占据决策权的女性主义出版社，也将不能很好地为有色女性服务，比如，它们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哪些问题对于黑人女性而言是真正重要的，从而无法成功地吸引黑人女性读者。

为此，由白人女性控制和经营的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往往更可能边缘化有色女性。可见，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和有色女性之间存在很大张力。

尽管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与种族问题之间的探讨已非新鲜话题，有关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从翻译角度切入。Amireh 和 Majai (2000: 2) 也表示，当前学界没有足够重视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在西方被翻译、编辑、出版、销售的情况。

不仅学界不重视，很多西方出版社包括女性主义出版社本身对一般意义上的翻译问题也不够重视，更不用说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翻译了。Bassnett (1992: 68) 提及了类似情况。她在 1986 年有个硕士研究生，研究翻译出版女性文本的策略，并在英国出版社中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各出版社争相出版女性文本，只有一个出版社编辑声称考虑过翻译问题，而英国的两个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 和 The Women's Press) 则反映冷淡。这个学生为此表示，尽管性别和语言是大家都极为关注的话题，但一旦涉及翻译，情况就变了，并认为这可能跟翻译的低等地位相关，也可能跟许多英国编辑的单语背景相关。

女性主义学界以及出版社本身不够重视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翻译问题，这表明我们更有必要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与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之间的动态关系。

接下来，我将审视 Aunt Lute 和 Virago 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的情况，重点关注其中的翻译选材政治。

第二节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美国的 Aunt Lute Books 在出版

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

在美国继续营业的女性主义出版社中，只有纽约的 The Feminist Press 和三藩市的 Aunt Lute 翻译出版过中国女性文本，⁸⁴但只有 Aunt Lute 翻译出版过书本长度的、非学术类的中国女性文本。⁸⁵其他继续营业的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则连重印中国女性文本译文的兴趣都没有，更不用说翻译出版了。

一 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

Aunt Lute 是三藩市的一家非营利的、独立的小型女性主义出版社。该出版社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书本销售，以及来自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和 the California Arts Council 等的补助金（Young 1997: 27-28）。

以下是这个出版社的简史：Aunt Lute 的前身是成立于 1972 年的女同性恋出版“集体”（collective），即 Iowa City Women's Press；在 1982 年，Iowa City Women's Press 的成员 Joan Pinkvoss 和 Barb Wieser 组建了 Aunt Lute，充当前者的出版分支；在 1986 年，Aunt Lute 与另一家成立于 1978 年的美国女性主义出

⁸⁴ The Feminist Press 重印了非学术类的中国女性文本译文，包括 1990 年的 *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收集的中国女性文本译文，重印自台湾和美国出版的译文集）、1995 年的 *China for Women: Travel and Culture*（收集了丁玲和张洁的文本译文，重印自美国出版的译文集）、1998 年的 *Mulberry and Peach*（聂华苓的代表作，重印自美国 Beacon Press 的英文版）、2003 年的 *Women on War: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Women's Writing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收集了秋瑾的文本译文，重印自美国出版的译文集）、2007 年的 *The Power of Weakness: Four Stori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收集了丁玲的文本译文，重印自美国出版的译文集）。The Feminist Press 只翻译出版过蔡文姬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的节选（收录于 *Women on War*），以及 21 篇中国女学者的论文（收录于 2004 年的 *Holding Up the Half Sky: Chinese Women Past Present Future*）。但这两者都不符合我在本章的考察项目，因为我关注的是书本长度的、非学术类的中国女性文本。

⁸⁵ 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Women in Translation 本应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考察对象，可惜已不再营业。我之所以选择考察继续营业的女性主义出版社，是因为类似出版社研究起来更方便。

版社 Spinsters Ink 合并；在 1990 年，Aunt Lute 和 Spinsters Ink 脱离彼此而独立（Short 1994: 37-38）。

Aunt Lute 自称是一家“多元文化女性出版社”（multicultural women’s press），致力于出版一直以来被主流和小型出版社边缘化的女性文本，旨在传播涉及女性复杂体验以及个人社会变革可能性的文本，并声称愿意出版从没有出版过的女作者，从而让她们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所出版的文本来看，Aunt Lute 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首先，Aunt Lute 出版了不少所谓的“杂类文本”（mixed-genre work），即一个集子同时收录不同文类的文本。Aunt Lute 的最高主管 Joan Pinkvoss 指出，出版“杂类文本”是为了照顾那些因为从事激进主义运动或其他其原因而没时间写长篇的女性（Young 1997: 38）。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Aunt Lute 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左”倾，在出版过程中试图破除白人、中产、异性恋、知名、“健康”女性的“霸权”地位，尽可能关注在各方面被边缘化的女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Aunt Lute 所出版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色女性，包括非裔、印第安裔、拉美裔、亚裔等，约占所出版作者的 75%。第二，在 Aunt Lute 所出版的这些有色女作者中，大部分是那些当时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女性。第三，Aunt Lute 出版了不少女同性恋、非中产阶级女性的文本。第四，Aunt Lute 也试图“关心”那些不“健康”的女性，比如肥胖症患者、癌症患者、艾滋病患者等。这最明显体现于 Aunt Lute 所出版的三个文集，包括 *Shadow on a Tightrope: Writings by Women on Fat Oppression*（1995）、*Positive/Negative: Women of Color and HIV/AIDS*（2002）、*The Cancer Journals*（2006）。

二 Aunt Lute 翻译出版的女性文本

Aunt Lute 既出版原创的英语文本，也翻译出版非英语文本，包括墨西哥女作家 Sara Levi Calderón 的小说 *The Two Mujeres*，由美籍波多黎各裔 Diana L. Vélez 翻译和编辑的 *Reclaiming Medusa: Short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Puerto Rican Women*，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集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1999），以及西班牙女作家 Rosa Montero 的小说 *Beautiful and Dark*（2010）。

考虑到严歌苓是该出版社所翻译出版的唯一中国女作者，⁸⁶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 Aunt Lute 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意味着考察该出版社在出版严歌苓作品方面的翻译选材。

接下来，我将分析 Aunt Lute 在翻译出版严歌苓文本方面所体现的选材倾向，重点关注这个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的选择行为本身，在何种程度上迎合或抵制了在目的语文化中占主流地位的话语，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以及西方有中国的主流话语。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选材分析：Aunt Lute 与严歌苓

出版社的翻译选材从本质上而言相当复杂，因为现实中的决策过程往往涉及出版社/编辑、译者、经纪人、作者等方。为此，正如我们不能认为译文最终面貌（出版后的译文）应该完全由译者一个人负责一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出版社有关翻译选材的决定也从头到尾应该由出版社单方面负责。

但是，无论背后涉及多么复杂的关系，无论是出版社主动邀稿，还是由译者、经纪人、作者等人向出版社推荐，在涉及翻译选材方面，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最大的权力和最终的决定权，这取决于出版社和被出版方之间的权力关系。

在第一种情况下，在出版社主动邀稿的情况下，出版社在翻译选材方面往往有着更为直接的控制权，体现为建议甚至“要求”翻译出版某些特定文本。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在译者/经纪人/作者等主动向出版社推荐的情况下，出版社在翻译选材方面的控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间接的，却依然具有决定意义。考虑到所有被“交付”（submit）给出版社遴选的文本，已是某种选择的结果，因为作者选择哪个出版社基于他们对有关出版社的印象（Bourdieu 2008: 124），以及考虑到被推荐翻译出版的文本最终需要得到出版社的认可才能最终出版，出版社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翻译选材。此外，即使在第二种情况下，出版社也会建议翻译某些特定文本。

总而言之，只有被出版社选中或认可的文本才得以翻译出版，这表明出版社在翻译选材方面的“权力”。可见，即使缺乏精确的内部消息（比如文本出

⁸⁶ Aunt Lute 还重印了澳籍华裔女作家丁小琪的 *Maidenhome* (小说译文集，最先由澳大利亚的 Hyland House Publishing 出版)。但这不符合我的考察标准，正如我在上文指出，我关注的是翻译出版而非重印。

版之前的所有内幕），考察一个出版社所翻译出版的文本，还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窥探这个出版社（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迫）体现的）倾向、立场、意识形态。

Bourdieu（2008: 127）曾指出，研究出版社有一定难度，因为出版社往往不愿意接受外界的询问和透露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我曾试图联系 Aunt Lute 和 Virago 的编辑，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应。

因此，我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现存的文本证据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我将根据 Aunt Lute 从严歌苓文本库中选择翻译出版哪些文本的事实/结果本身，考察 Aunt Lute 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有意或无意采取的立场，探讨选择行为本身是否“在效果上”（in effect）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以及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

（一）严歌苓

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于 1958 年生于上海。她曾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和铁道兵文化部创作组，并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作家班。⁸⁷严歌苓在 1989 年赴美留学并定居，在 1996 年获 Columbia College Chicago 的写作硕士学位。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创作的严歌苓，在移居美国前后都是一个多产作家：移居美国前主要围绕部队生活进行创作；⁸⁸移居美国后主要以中国近代历史题材如文革和移民题材为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中文创作。⁸⁹至今，多产的严歌苓已囊括海内外各奖项，⁹⁰并被誉为“北美地区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之一”（陈瑞林 2003a: 12）。

在严歌苓的众多作品中，已有六篇中短篇小说包括《少女小渔》、《无非男女》、《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少尉之死》、《天浴》、《白蛇》，和一部长篇小说《扶桑》被英译出版。这六篇中短篇小说由本节所要探讨的 Aunt Lute 翻译出版，名为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1999）。

⁸⁷ 参考陈燕妮（1997: 239）。严歌苓指出，她的最大读者群是台湾读者和美国的华人读者（同上: 244）。

⁸⁸ 移居美国前的主要作品是三部长篇小说，包括《绿血》（1986）、《一个女兵的悄悄话》（1987）、《雌性的草地》（1989）。

⁸⁹ 移居美国后，唯一一部英文原创作品是 *The Banquet Bug/The Uninvited*（同一部作品，但以不同书名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出版）。

⁹⁰ 这些奖项包括“上海文学奖”（大陆）、“《十月》文学奖”（大陆）、“洪醒夫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台湾）、“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台湾）、“《亚洲周刊》年度中文十大小说奖”（香港）、“Best Experimental Fiction Prize from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lastic Press Association”（美国）等。

考虑到 Aunt Lute 翻译出版的是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为分析其选材，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严歌苓此前出版的 45 则中短篇小说，收集于《少女小渔》、《海那边》、《倒淌河》、《风筝歌》、《白蛇》这五部文集。这些文集构成了 Aunt Lute 的翻译选材文库。

考虑到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涉及西方/白人女性和第三世界/有色女性之间的关系，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分析 Aunt Lute 在出版严歌苓作品方面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之前，我想先简单提及这个出版社的“白人女性身份”。

(二) Aunt Lute Books 的白人女性身份

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实体，女性主义出版社由不同背景的人员组成，而这些人员也具有不同的等级地位。考虑到白人女性（主义）和有色女性（主义）之间存在权力差异，比如前者代表普遍/标准而后者代表特殊/差异，⁹¹一个女性主义出版社是具有“白人女性身份”还是“有色女性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两个要素。

第一，有关女性主义出版社的最高控制权属于白人女性。也就是说，在女性主义出版社等级体系内占据最高地位的是白人女性。正如虽然事实上译者、经纪人、作者等都可能参与了翻译选材，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取决于出版社一样，虽然事实上出版社内部可能也有不同人员参与翻译选材方面的决策讨论，但最终决定权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主管。第二，有关女性主义出版社对自己的定位是服务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不分种族、阶层等属性。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早已指出，白人女性主义的一个特点正是试图为所有女性代言，这种超越种族、阶层等属性的姐妹情，恰恰暴露了白人女性主义的霸权。

与此相反，在一个具有“有色女性身份”的女性主义出版社中，最高控制权属于有色女性，而出版社对自己的定位也是服务有色女性。美国的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就是一个有色女性主义出版社，由美籍非裔女性 Barbara Smith 于 1980 年创建（现已停业）；加拿大的 Sister Vision: Black Women

⁹¹ 白人女性（主义）和有色女性（主义）之间的普遍和特殊关系，总体上属于 Chow（1995: 27-28）所谓的存在于西方和第三世界之间的“认识论等级制”（epistemological hierarchy），即前者代表“普遍理论”，而后者代表“特定文化”。比如，Chow 比较了“第一世界”电影研究和非“第一世界”电影研究所用的语言，指出前者倾向于运用“通称”（generic）术语，包括“性别”、“符号学”、“主体性”等，而后者则往往必须标明所涉及的族裔或民族，比如“黑人电影”、“中国电影”等。

and Women of Color Press 也是一个具有“有色女性身份”的女性主义出版社。Stasiulis (1993: 52) 指出, 由有色女性建立和经营的出版社在颠覆种族歧视方面做了重要贡献。

Aunt Lute 是一个具有白人女性身份的女性主义出版社。首先, Aunt Lute 的最高控制权属于美国白人女同性恋 Pinkvoss, 她是这个出版社的创立者、资深编辑、主管。⁹²此外, Pinkvoss 也是 Manuscripts Development and Acquisitions Committee 的主要负责人。⁹³其次, Aunt Lute 也声称服务普遍意义上的女性, 从而体现了白人女性(主义)的“独特”立场。有鉴于此, 尽管 Evans (1995: 300-301) 强调, 自 1990 年来, Aunt Lute 已从只有三个白人女性和一个有色女性职员的出版社, 发展成有更多有着不同族裔、阶层、性取向的女性职员的出版社, 强调该出版社的平等与多元文化视野, 这没能改变 Aunt Lute 作为一个出版社整体所具有的“白人女性身份”。

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 Aunt Lute 具有包含高度“有色”思想/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广义的“有色”思想表示对任何霸权话语和实践的挑战, 以及对“他者”(包括话语和实践)的尊重和认可; 狭义的“有色”思想表示对“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ist)话语和实践的挑战, 以及对“有色他者”(包括话语和实践)的尊重和认可。

在后殖民批评日益深入人心的时代, 白人主体具有“有色”思想的情况已越来越普遍。此处“白色”(whiteness)和“有色”之间的共存, 体现了当今语境下“白人身份”之内涵的演变。正如 Wiegman (1999: 119-120) 强调指出, 在当今语境下, 应该把白人身份的“主流建构”(hegemonic formation), 理解成发生于“脱离白人至上实践和话语的修辞和或政治语域”, 从而导致了白人主体的分裂, 分裂于“与白人至上实践的脱离、对白人权力的持续重构和从中得益的否认”。

现在我们看看, 有着“白人女性身份”的 Aunt Lute 如何体现了高度“有色”思想。这最明显体现于 Aunt Lute 在出版方面体现的“左倾”, 即尽力破除白人、中产、异性恋、知名、“健康”女性的“霸权”地位, 尽可能关注在各方面被边

⁹² Aunt Lute 的主要工作人员是两个“共同主管”(co-director), 包括资深编辑 Pinkvoss 和 Fabienne McPhail, 和由三个部门主任构成的管理团; 但 McPhail 已于 1994 年秋离职, 而 Aunt Lute 也因财政问题而决定以后再聘 (Young 1997: 213)。

⁹³ 参考 Evans (1995: 302)。

缘化的女性，比如，所出版的大部分作者是第三世界/有色女性、名不见经传的女性，还包括女同性恋者、非中产阶级女性、患有各种疾病的女性，等等。另外，Aunt Lute 还帮助工人阶级女性写稿和改稿，也给年轻的有色女性提供实习机会，使她们学到有关出版的知识，等等（Young 1997: 33）。

事实上，Aunt Lute 所体现的“有色”思想，跟最高主管 Pinkvoss 有很大关系。Pinkvoss 是犹太人，同时也是女同性恋者。这两个边缘文化身份或许使得她尤其关注他者，而试图挑战各种霸权。比如，在谈及为什么决定出版美籍墨西哥裔女作家 Gloria Anzaldúa 的作品时，Pinkvoss 指出：

我在早期妇女解放运动中学到的教训之一，是这个运动因为体现为白人中产女性解放运动而失败。在我看来，这从来没有改变过。原因在于我们从来没有给其他族裔群体腾出空间，让她们成为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或是因为我们阻止任何其他规定这个运动。[……]观察一下女性主义出版界，你会发现，很多出版社都由白人中产女性拥有和经营，因为只有这些人会有从事类似行为的通道。当然也有不同情况……，那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但白人中产女性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控制权。很明显，如果我们有那控制权的话，我们有责任出版[有色女性文本]。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在我心中，我经常对他者的声音感兴趣并感到激动”（引自Young 1997: 34）。

不难看出，Pinkvoss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为白人中产女性所拥有的特权，并试图用这个特权去服务那些被边缘化的女性，尤其是有色女性。

以上简述了Aunt Lute作为一个整体，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包括高度“有色”思想的白人女性身份，从而体现了分裂。这种分裂事实上涉及白人的无意识习惯（比如对某些霸权话语和实践的无意识认同）和“有色”思想（比如对某些霸权话语和实践的有意识挑战）之间的张力。有关“白色”所表征的无意识习惯，可参考Sullivan（2006）的*Revealing Whiteness: The Unconscious Habits of Racial Privilege*。

在此背景下，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 Aunt Lute 在出版严歌苓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意味着考察该出版社所具有的“白色”和“有色”之间的张力或是抵制和迎合有关霸权话语之间的张力，如何体现其中。这里的霸权话语就是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以及西方有中国的主流话语。

（三）Aunt Lute Books 的翻译选材特点

Pinkvoss 指出，在她所出版的 30 本书中，只有 3 本书原本就是书本长度，

而 Aunt Lute 参与了另外 27 本的建构 (Young 1997: 38)。⁹⁴严歌苓的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也是该出版社参与建构的结果。

译者 Lawrence Walker 私下里提供了部分建构信息。⁹⁵*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的出版并非因为 Aunt Lute 主动邀稿，而是因为 Walker 的推荐。Walker 指出，这个译文集的出版与涉及女同性恋的中篇小说《白蛇》有关。严歌苓的朋友虹影和赵毅衡建议出版一个涉及同性恋的中文集和相应译文集，严歌苓为此用中文创作了《白蛇》，而 Walker 也着手英译这则小说。考虑到严歌苓的朋友丁小琪已在 Aunt Lute 出版过作品，以及印象中记得这是一个出版女同性恋文本的出版社（尽管事实上不是），Walker 开始联系 Aunt Lute，提及赵毅衡所建议出版的同性恋文集和严歌苓的《白蛇》。Aunt Lute 表示想再多看些严歌苓的作品。因为还没译完《白蛇》，Walker 就把《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和《方月饼》的英译本当成“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发给 Aunt Lute。Aunt Lute 收到之后，告诉 Walker 还想再多看些严歌苓的作品。当 Walker 把《天浴》（英译本）发给 Aunt Lute 之后，Aunt Lute 告诉 Walker，出版社决定出版一部严歌苓作品专辑，并指出大部分作品应该关注女性或是采用女性视角。Aunt Lute 接着跟 Walker 商量从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中再选出另外几则，从而最终导致了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的出版。

可见，除了 Aunt Lute 之外，译者 Walker（或许还有严歌苓本人）也在实际上参与了翻译选材。但我已在上文强调指出，尽管我们承认出版社的翻译选材从本质上而言相当复杂，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在涉及翻译选材方面，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最大的权力和最终的决定权。

为此，我们可以认为，Aunt Lute 需要对涉及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的翻译选材承担最根本责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 Aunt Lute 从严歌苓的 45 则小说中分别“认可”（approve）和拒绝了哪些文本，考察这个出版社的选择行为本身是否“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话语的迎合或抵制。我假设在 Aunt Lute 和 Walker 的交流过程中，Aunt Lute 已了解这 45 则小说的内容（看过某些小说的译稿，看过另一些的梗概），从而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最终选择。

⁹⁴ 比如，Pinkvoss 曾听过美籍墨西哥裔女作家 Anzaldúa 的诗歌朗诵，并告诉 Anzaldúa 应该出版自己的作品，但同时也表示，Aunt Lute 无法出版一部诗集，并鼓励她写些小短文；Pinkvoss 的鼓励与建议最终导致了 *Borderlands* 的诞生 (Young 1997: 40)。

⁹⁵ 在下文探讨 Aunt Lute 的翻译选材特点时，除非特别注明，有关信息均由 Walker 提供。

在考察 Aunt Lute 的选材特点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供该出版社参考的选材文库，即严歌苓的 45 则小说，收录于文集《少女小渔》、《海那边》、《倒淌河》、《风筝歌》、《白蛇》。这些小说根据所涉及的背景可分为两类，包括大陆背景（22 则）和移民背景（23 则）。

根据所凸显的主题，大陆背景的小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凸显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包括《天浴》、《白蝶标本》、《白蛇》。第二类凸显西藏问题，包括《蹉跎姻缘》和《卖红苹果的盲女子》。第三类凸显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困、再婚、老人生活、住房等，包括《审丑》、《少尉之死》、《除夕，甲鱼》、《筋斗》、《家常记》、《洞房》。第四类凸显真情/亲情/爱情，包括《老囚》、《黑宝哥》、《馋丫头小婵》、《士兵与狗》、《我不是精灵》、《无非男女》、《倒淌河》。有几篇无法纳入上述归类，包括《正午谁扣门》、《领袖扮演者》、《大歌星》、《小珊阿姨》。

需要承认的是，任何分类都意味着对复杂性的抹除。上述分类也不免重叠之处。比如，凸显文革伤害女性的《白蛇》也涉及了女性之间的爱情，凸显西藏问题的《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也涉及了西藏女人和汉族老兵之间的感情，凸显贫困问题的《除夕，甲鱼》也发生在文革期间（但文革背景跟小说的情节发展几乎没有关系），凸显真情的《馋丫头小婵》也涉及了贫困问题。

根据所凸显的主题，移民背景的小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凸显移民生活的不易，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失眠人的艳遇》、《无出路咖啡馆》、《大陆妹》、《茉莉的最后一日》、《少女小渔》、《海那边》、《屋有阁楼》）。第二类凸显跨种族文化（情感）的相斥与相吸（《方月饼》、《橙血》、《女房东》、《栗色头发》、《簪花女与卖酒郎》、《初夏的卡通》、《处女阿曼达》、《风筝歌》、《学校中的故事》、《抢劫犯查理和我》、《“没出路”咖啡馆》）。第三类凸显功利的同种族跨国婚姻的悲哀（《红罗裙》、《约会》、《冤家》）。有几则无法纳入上述归类（《乖乖贝比》、《拉斯维加斯的谜语》）。

同样道理，上述分类也不免有重叠之处。比如，凸显跨种族文化（情感）的相斥和相吸的《栗色头发》也涉及移民生活的不易，而凸显移民生活不易的《少女小渔》也涉及跨种族文化（情感）的相斥与相吸。

在上述 45 则小说中，Aunt Lute 最终选择翻译出版《白蛇》、《天浴》、《少尉之死》、《卖红苹果的盲女子》、《无非男女》、《少女小渔》。

在我看来, Aunt Lute 体现了以下几个翻译选材特点。第一, 就所涉及背景而言, Aunt Lute 青睐涉及大陆背景的小说。第二, 就所凸显的主题而言, Aunt Lute 青睐多样化主题。第三, 就主题的重要性而言, Aunt Lute 对不同主题体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

1 就所涉及背景而言, Aunt Lute 青睐涉及大陆背景的小说

在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所收集的六篇小说中, 五篇涉及大陆背景(《白蛇》、《天浴》、《少尉之死》、《卖红苹果的盲女子》、《无非男女》), 一篇涉及移民背景(《少女小渔》)。这明显不是因为可供 Aunt Lute 参考的文库在很大程度上只涉及大陆背景, 因为涉及大陆背景的小说和涉及移民背景的小说分别占 22 和 23 则。可见, Aunt Lute 明显偏爱大陆背景。

就单单从 Aunt Lute 对大陆背景的偏爱看, 而不考虑所涉及主题,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所强调的观点, 即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往往把第三世界女性定位为提供本土“真实”(authentic)信息的“本土情报员”(native informant)。这里的“本土情报员”涵盖而不局限于 Narayan (1997: 142) 所谓的“真实的知情者”(Authentic Insider)。在 Narayan 看来, “真实的知情者”是西方赋予第三世界主体的一个角色, 有着批评第三世界文化、制度等的任务。

此外, 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指出, 被赋予“本土情报员”角色的第三世界女性所著文本, 也在更大程度上被认为具有信息而非美学价值, 为此, 对待有关文本的“取向”(approach)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的“信息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被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选择出版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 更多的是写实主义小说而非诗歌或先锋小说, 因为前者具有社会学文献的功能。事实上, 对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上述定位,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有关第三世界文学的主流态度。正如 Goldblatt (2000: 327) 指出, 在很多情况下, 20 世纪西方读者在中国文学中看到更多的是信息而非美学价值, 比如中国文学吸引的往往是想“了解中国”(learn about China)的西方读者。针对 *New York Times* 对贾平凹的《浮躁》英译文所做的评价——“以启发人和感动人的方式, 描述有着将近 10 亿农民的中国农村”, Goldblatt (2000: 327-328) 指出, 这个评论把“启发人”(instructive)置于“感动人”(moving)之前, 表明评论者

阅读这部小说的最初动机或许是“非文学的”(nonliterary)。

同样道理, 仅仅从Aunt Lute选择五则大陆小说和一则移民小说这个行为本身判断, Aunt Lute有意无意地把严歌苓定位为一个提供真实信息的第三世界女“本土情报员”。这是因为, 大陆小说往往被认为能提供更多的本土“真实”信息, 从而具有更大的本土“真实性”, 移民小说因为涉及文化接触, 往往被认为无法提供足够的本土“真实”信息, 从而缺乏足够的本土“真实性”。不仅第三世界女作者的文本所涉及背景, 被认为对“真实性”产生影响, 第三世界女作者的身份也被认为对“真实性”产生影响。比如, 流散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女作者, 愈来愈被认为缺乏足够的“真实性”(Ramanathan & Schlau 1995: 5)。⁹⁶Chow(1991a: 28-29)也指出, 大陆女性被认为比台湾和香港女性更为“真实”, 因为后者已被西化。

有关Aunt Lute把严歌苓定位为“本土情报员”的假设, 还体现于一个幕后细节。Walker最先发给Aunt Lute以供参考的是《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大陆背景, 凸显西藏问题)和《方月饼》(移民背景, 凸显跨种族文化差异和冲突)。但是, Aunt Lute根本没有考虑后者。

综上所述, 仅仅从Aunt Lute选择了五则大陆小说和一则移民小说这个事实本身而言, 仅仅从Aunt Lute对大陆背景的偏爱而言, 我们可以认为, Aunt Lute的选择行为本身, “在效果上”, 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尽管该出版社可能没有类似的出发点或目的(这就涉及无意的或被动(迫)的迎合)。但是, 我们也需要承认, Aunt Lute并没有全部选择大陆小说, 毕竟还是选择了一篇移民小说, 为此, Aunt Lute并没有完全受到有关主流话语的“奴役”。

需要指出的是, Aunt Lute之所以选择五则大陆小说和一则移民小说, 可能在事实上涉及非常复杂的原因, 包括编辑的个人兴趣、对读者需求的考虑等(这往往无从得知)。我对Aunt Lute“在效果上”迎合有关主流话语的判断, 仅仅参考选择行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现实过程。上述说明适用于我在下文所做的有关Aunt Lute的所有判断。

⁹⁶ 这种有关本土作者的“真实性”高于流散作者的看法, 也有一定道理。正如严歌苓本人指出, “我现在有了国外文化的经历, 反过头来, 就更想去表达跟自己文化对比的结果。我觉得现在写的本土故事, 并不非常本土。它的一些视角, 是受西方影响的”(引自程绮瑾 2006)。

2 就主题而言，Aunt Lute 青睐多样化主题

Aunt Lute 所翻译出版的六篇小说，涉及五类主题，包括凸显文革伤害女性的《白蛇》和《天浴》，凸显西藏问题的《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凸显社会问题的《少尉之死》，凸显真情/亲情/爱情的《无非男女》，凸显移民生活之不易的《少女小渔》。

考虑到所选择的五类主题分别都包括两则或两则以上的小说，我先分别考察 Aunt Lute 在涉及每类主题时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然后再从整体层面进行分析。

(1) 在涉及第一类主题的小说时，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在强调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的三则小说中，Aunt Lute 选择了《白蛇》和《天浴》，排除了《白蝶标本》。在这类主题的小说中，中国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以受害者形象出现。

在《白蛇》中，一个著名的异性恋女舞蹈家在文革期间被关押和羞辱，在此过程中堕落、绝望的她爱上一个女扮男装来看望她的女同性恋者，在得知真相发疯并清醒后，两人开始她们的同性爱情，但最终均在世俗偏见下走入异性恋婚姻。⁹⁷《白蛇》尽管以文革迫害为主题，其中的女同性恋线索也同样重要。正如林婉蓉（2006: 37）指出，《白蛇》从政治角度、社会传统角度、人性角度关注了中国女同性恋（于文革期间）的不幸处境。⁹⁸麻蕊（2009: 195）则表示，《白蛇》凸显了“文革政治对女性自然属性的残酷剥夺和异化”。

较之于《白蛇》，《天浴》中女性所受的迫害更是不堪。在文革期间，女知青文秀到乡下学牧马，为了返城不惜出卖肉体打通门路，成为一个失去羞耻感的免费妓女，甚至在堕胎的时候还被强奸，最后在返城无望的情况下结束了生

⁹⁷ 《白蛇》的标题源于中国民间有关白蛇的传说。白蛇传有多个版本，其中一个把青蛇对白蛇的感情“诠释”为同性恋感情，这也是《白蛇》所参考的。严歌苓谈及了写《白蛇》的动机：“之前我看了《蜘蛛女之吻》的电影，非常喜欢，又找了它的小说，又找了它的剧本。我之前对同性恋一点了解都没有，看了这部作品，我开始相信非常尊严，深沉的情感，可以在同性之间发生。这是我写《白蛇》的其中一个动机。但是我们国内至今对这个事实讳莫如深。我特别不理解：同性恋有什么错？又不是他们道德有问题。你知道，希特勒是反对同性恋的。在这个问题上，难道我们要和反动落后的人站在一起吗？”（引自柏邦尼 2008）。

⁹⁸ 通过引用萧乾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言论——“最近（1995年4月21日，晚）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得知：我国已同意于九月间在北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时，准许国外女性同性恋者及爱滋患者入境。这标志着我国对这一特殊现象已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表现出开放中的我国，力图克服固有的成见，作与现代社会并驾齐驱的努力”，林婉蓉（2006: 38）指出，这表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陆官方，完全漠视女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

命。《天浴》英译版还获“Best Experimental Fiction Prize from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lastic Press Association”(1998)。Walker 私下里表示,严歌苓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篇小说获得的是“Best Experimental Fiction”,而非其他奖项,因为她认为这篇小说的叙事方式非常传统。或许评审者认为《天浴》的主题具有很大的“实验性”,因为其中女性所受迫害之残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天浴》有着很大的政治性。严歌苓本人也明确指出:“我不是存心要避开政治,像我的《天浴》等作品,都是很尖锐的。我写的时候也并没有期待[中国政府]也看,但现在中国也发表了,在出版的时候,他们政审也没有把它拿下来,也就算是蒙混过关了”(引自胡亚非 1997)。《天浴》已于 1998 年拍成电影,是中国大陆禁片,却在台湾、美国、法国等地方得到好评,所获奖项包括台湾金马奖(1998)、美国 Fort Lauderdal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的“Jury Award”(1998)、美国 National Board of Review 的“International Freedom Award”(1999)、法国 Paris Film Festival 的“Special Jury Prize”(1999)等。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天浴》是促使 Aunt Lute 决定翻译出版严歌苓作品集的首要原因。在读到这篇小说之后,出版社编辑如此激动以至于为此特意召开了一个会议。

在《白蝶标本》中,一个著名女演员在文革期间不堪迫害羞辱,但自杀未遂成植物人,并成为医院里供男性“欣赏”的裸体标本,之后被人拔掉输液管而结束生命。

可见,在上述三则小说中,以女主角是否死亡来判断,最悲惨的应该是《天浴》和《白蝶标本》。从第三章可知,西方女性主义者总是喜欢探讨第三世界女性的受害状况。正如 Jaggar (2005: 185) 指出,许多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第三世界女性的处境堪称恐怖,并揭露包办婚姻、寡妇自焚、“基于性别的选择性流产”(sex-selective abortion)等存在于第三世界的类似实践,而她们如此探讨第三世界女性的受害情况也已达三十多年。

但是,后殖民女性主义者最痛恨的,恰恰就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女性受害形象的强调和建构(因为她们往往把第三世界女性的受害事实归因于“野蛮落后”的第三世界文化),认为这迎合了西方带有殖民主义动机的“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并非常抵制西方出版凸显第三世界女性受害形象的文本。此外,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也怀疑西方女性主义者偏爱谴责本土父权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动机,认为她们只是想证实有关第三世界的普遍看法。

为此, 仅仅就以下事实而言, 一方面, 凸显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天浴》, 是 Aunt Lute 决定要翻译出版严歌苓文集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 Aunt Lute 并没有选择所有凸显文革语境下女性受害者形象的小说(比如排除了《白蝶标本》), 也没有选择收录女性受害程度最高的小说(比如选择了《白蛇》而非《白蝶标本》), 我们可以认为, 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 “在效果上”, 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同时还有抵制, 尽管他们或许没有类似的出发点或目的(涉及无意的、被动(迫)的迎合或抵制), 从而体现了 Aunt Lute 作为一个“白人女性主体”所具有的分裂性。

(2) 在涉及第二类主题的小说时, 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在凸显西藏问题的两篇小说中, Aunt Lute 认可了《卖红苹果的盲女子》,⁹⁹ 排除了《蹉跎姻缘》。两篇小说所叙述的故事都发生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在《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中, 一个西藏盲女人和一个驻藏兵站的汉族老兵互生好感, 但西藏人对汉人的仇视导致了汉族老兵的悲惨结局, 同时也使得这个西藏女人被小说中的汉族文艺兵所憎恨。这个也某种程度涉及爱情的小说, 旨在凸显中国驻藏解放军与藏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 尤其是藏民对汉族人的疏离和仇恨。¹⁰⁰

《蹉跎姻缘》讲述一个汉族女性如何成为中国大陆官方政府改善汉藏关系的牺牲品。跟随大陆文艺兵团在西藏演出的江渝, 是西藏男人眼中的美女, 因为救了一个藏族男婴而受到藏民们的喜欢, 并在不了解西藏文化的情况下, 稀里糊涂接受了藏族男婴父亲的求婚。当江渝向党组织和当副师长的父亲求助时, 他们却下令她以国家利益为重与藏人完婚。

尽管都凸显西藏问题, 《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和《蹉跎姻缘》有不同的侧重点。《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侧重汉藏冲突, 尤其是藏民对汉族人的疏离和仇恨, 《蹉跎姻缘》强调大陆官方努力处理好汉藏关系, 满足藏人要求而不惜牺牲“自

⁹⁹ 《卖红苹果的盲女子》有两个英译本, 一个由 Walker 翻译, 收录于 Aunt Lute 出版的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1999), 另一个由 Herbert J. Batt 翻译, 收录于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出版的 *Tales of Tibet: 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and Wind Horses* (2001)。

¹⁰⁰ 比如, 在《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中, 藏族人不许汉族人“参观”他们的沐浴节(小说中的汉族老兵是西藏平叛时的兵, 曾因偷看沐浴节时藏人男女共浴, 而被藏民围堵并遭到兵站处罚, 后来又因为看他的西藏“女友”洗澡, 再次遭到藏民围攻和兵站处罚), 不喜欢藏族女人和汉人谈恋爱。此外, 藏人在汉人眼里还显得“凶神恶煞”(这可理解为不满于汉人的“统治”), 等等。

己人”，实施所谓的“和亲”政策。

凸显汉藏冲突尤其是藏人仇视汉人的文本，往往被认为质疑中国“占领”西藏的合理性。正如 Lai (2007: 26-27) 在分析旅英华裔女作家欣然的 *Sky Burial* 时暗示，藏人对汉人的抵制以及汉藏之间的严重冲突，事实上凸显了中国对西藏的征服不得藏人民心。

Shakya (2001: xxii) 则明确表示，《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在某种程度上怀疑中国占领西藏的合理性，比如，小说提到驻藏兵站对当地温泉的占领，不许藏人使用，指出“兵站把温泉变成男女澡堂之前，泉是他们[西藏人]的。那时他们泡洗得宽裕，也不洗别人的剩水”。¹⁰¹

在探讨 Aunt Lute 选择《卖红苹果的盲女子》而排除《蹉跎姻缘》，这个行为本身说明的问题之前，需要先看一下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话语。

Mackerras (1999: 4) 指出，有关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主导国，比如 18 世纪由法国主导，19 世纪由英国主导，而 20 世纪由美国主导。Mackerras (178) 还表示，很多时期有关中国的主流印象，与当时主要的西方当局或政府利益相一致。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藏问题一直凸显于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话语。¹⁰²在 1997 年，美国发布了三部好莱坞“反华”电影，并深入“西方”人心，包括 *Kundun*、*Seven Years in Tibet*、*Red Corner*，¹⁰³前两部涉及西藏问题。在 Sautman (1999: 181-182) 看来，这两部影片建构了中国政府的“罪恶” (villainous) 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美国人对西藏的兴趣，主流看法是支持藏独。¹⁰⁴

Aunt Lute 选择《卖红苹果的盲女子》而排除《蹉跎姻缘》，仅仅就这个事实而言，我们可以认为，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美国/西方有关中国（西藏问题）的主流话语的迎合，尽管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出发点

¹⁰¹ 驻藏兵站强占了藏人用以庆祝沐浴节的温泉，并把其变为自己的澡堂，藏人只好用汉人洗澡后的脏水庆祝沐浴节。

¹⁰² 自 1989 年以来，Mackerras (1999: 166) 指出，西方对中国处理西藏的方式，一直有着非常负面的看法或印象，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的压迫导致了 100 多万藏人的死亡；中国破坏西藏文化，可能导致“文化灭绝” (cultural genocide)；汉人在西藏的涌入，导致藏人成为本国的少数民族；中国压制西藏宗教，并在此过程中践踏人权。

¹⁰³ Wasserstrom (2000: 23) 指出，1997 年下半年叶中国政府的私有化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 (demonization)，但 1997 年发行的揭露中国丑陋面的三部好莱坞电影，包括 *Seven Years in Tibet*、*Kundun*、*Red Corner*，促使美国有关中国的负面看法在 1997 年末又开始流行。

¹⁰⁴ 有关藏独的观点已深入美国主流文化。比如，在 *Friends* 第 10 季的 12 集中（播放于 2003 年至 2004 年），Phoebe Buffay 曾说：“She will shower when Tibet is free”（其中的“she”是 Phoebe 认识的一个西藏女人）。

或目的（这就涉及无意的或被动（迫）的迎合）。需要指出的是，对《卖红苹果的盲女子》英译文的考察，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证据。《卖红苹果的盲女子》的英译文大体忠实，但某些改动也体现了目的语文化中的主流话语。比如，译文把“兵站与藏民一直处得不省力，别处**汉人镇压藏人暴动**，这个僻静地方也跟着乱乱治治”（严歌苓 1995: 74）改成：

In other locales, *the Han Chinese oppression had given the Tibetans cause to revolt*, and this isolated place had felt the repercussions. (Yan 1999: 116)¹⁰⁵

原文强调“藏人暴动”（乱）是因，而“汉人镇压”（治）是果，但译文反过来强调“汉人镇压”是因，而“藏人暴动”是果。为此，译文体现了对汉人的“不满”，以及对藏人的“同情”。

再比如，译文把“平常时间藏民背些牛羊肉**胁迫兵站买**；兵站若蒸了太酸或太咸的馒头，也舍给藏民吃”（严歌苓 1995: 74）改成：

Even in peaceful times, the Tibetans, who were the way station's only source of fresh meat, would bring beef and mutton that had started to turn and *proffer it to the way station as a gift*. If the way station had prepared any steamed bread with too much or too little sourdough, it would give this to the Tibetans in return. (Yan 1999: 116)

在原文中，藏民给人的印象是不友好的，因为他们“胁迫”兵站买肉，兵站却不计较而主动“示好”，送给他们酸咸馒头；但在译文中，藏民给人的印象却是友好的，因为他们把开始变质的肉“送”给兵站，而兵站也为此送给他们酸咸馒头，作为“回礼”。可见，译文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藏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则“减弱”了汉族兵站“主动示好”的立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可以认为，Aunt Lute 选择的《卖红苹果的盲女子》符合或强化了美国/西方有关中国（西藏问题）的主流看法，但该小说并没有把其中的女性描述为纯粹受害者。相反，Aunt Lute 所排除的《蹉跎姻缘》，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像《卖红苹果的盲女子》那样，强化美国/西方有关中国（西藏问题）的主流看法，我们却可以认为它符合或强化了西方女性主义有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看法。就这个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假设，Aunt Lute 对西方有关中

¹⁰⁵ 除非特别说明，本论文例子中的黑体、斜体均为笔者所加。

国的主流话语的认同，超过它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认同（这或许是因为 Aunt Lute 假设前者或许能吸引更多读者）。当然，我们需要分析完所有的选材层面后才能断定。

(3) 在涉及第三类主题的小说时，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严苓小说的第三类主题涉及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包括老人的生活问题、贫困问题、城市住房问题、法制不完善问题等。凸显类似主题的小说包括《少尉之死》、《审丑》、《除夕，甲鱼》、《筋斗》、《家常篇》、《洞房》。¹⁰⁶Aunt Lute 选择了《少尉之死》，排除了另外五篇。

《少尉之死》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来自特困山区的年轻少尉刘粮库，为避免他的农村女友因为他贫穷而离开他，阴差阳错入室盗窃，终至过失杀人而被判死刑。

就社会阴暗性而言，《少尉之死》是六则同主题小说中程度最高的。《少尉之死》提及某些农村的极度贫困（没能从当时进行的农村改革中获益），提及军队司务长克扣公粮（揭露军队里的腐败），提及中国法庭某些政策的欺骗性（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诱使嫌疑犯认罪），¹⁰⁷提及审判的不公正（受到杀人偿命理念的影响），提及对死刑犯的残忍（拒绝他们的合理要求）。正如奚志英（2006: 38-39）指出，在《少尉之死》中，对刘粮库的审问带有欺骗，而杀人偿命出现在 80 年代末的中国法庭，意味着原始时期的报复性理念以及对个体生命的践踏，这说明中国法制不健全。赵爱华（2007: 48）也认为，《少尉之死》体现了法庭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主角刘粮库试图通过坦白从宽来获得轻判，却加速死亡。

不像上文所提及的以女性为主角的《白蛇》和《天浴》，《少尉之死》是一个关于男人的不幸故事。如果说 Aunt Lute 选择《白蛇》和《天浴》，或许在更大程度上跟其“女性身份”相关，那么 Aunt Lute 选择《少尉之死》而排除另外

¹⁰⁶ 在《审丑》中，一个捡垃圾的老嫖夫将孙子抚育成人，却遭后者唾弃，凸显底层老人的生活困境。《除夕，甲鱼》讲述一对旅居穷乡僻壤的夫妇在除夕偷偷煮甲鱼的故事，凸显社会的贫困和物资缺乏。在《筋斗》中，一个以翻筋斗为生的五十岁演员，因为所从事行当的没落以致生活窘迫，凸显下层阶级的生活困境。《家常篇》讲述一个老年丧偶女人再婚的故事，凸显老年人的婚恋问题。《洞房》凸显大城市紧张的住房问题。

¹⁰⁷ 比如，《少尉之死》有如下内容：“‘你……你们’，少尉听着自己嗡嗡的声音：‘你们不是说，只要我全都坦白，说实话，你们保证不判我死刑吗？’……我相信了你们，把实话都讲了，你们没费事就查清了事实。我信了你们！我信了你们啊！……”（严歌苓 1995: 101）。

五则同主题小说，或许在更大程度上跟其“白人身份”相关。

在分析这个选择行为本身所象征的意义之前，我们先看看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话语。我在上文指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西藏问题一直是该话语的一个重要成分；但除此之外，中国的贪污腐败、不健全的法律体系等阴暗的社会问题，也是美国/西方用以建构中国话语的重要参数。

我也在上文指出，在三部 1997 年的好莱坞“反华”电影中，两部涉及西藏。剩下的第三部即 *Red Corner*，在某些方面与 Aunt Lute 所选择的《少尉之死》相似。*Red Corner* 是中国大陆禁片，主角是美国人 Jack Moore，他在到北京出差的过程中，被中国高官子弟陷害入狱，但最终在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在 Mackerras (1999: 147) 看来，*Red Corner* 凸显了冷酷无情的中国警察人员，和“邪恶”(vicious) 的中国法律体系，前者无视司法和生命，后者借助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引诱被告认罪。美国的 MGM 公司选择在江泽民访美期间发行 *Red Corner*，因为在此期间有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激烈抗议；该影片的官方网站还提供了“人权”链接，在详述国际人权侵犯个案的同时，还提供了 Amnesty International、Human Rights Watch、Human Rights in China 的网址 (Goldberg 2007: 65)。

为此，在涉及第三类主题的小说时，我们可以认为，仅仅就 Aunt Lute 选择阴暗性最高的《少尉之死》而排除另外五则这个事实而言，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尽管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出发点或目的（涉及无意的或被动（迫）的迎合）。

(4) 在涉及第四类主题的小说时，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严歌苓小说凸显的第四类主题涉及真情/爱情/亲情，包括《无非男女》、《老囚》、《黑宝哥》、《馋丫头小婵》、《士兵与狗》、《我不是精灵》、《倒淌河》。¹⁰⁸ Aunt Lute 选择了《无非男女》，排除了另外六篇。

《无非男女》讲述伦理对爱情的限制。雨川与未婚夫的弟弟（一个患有绝症，并随时可能终止生命的青年）真诚相爱，但伦理的约束使得他们最终没有

¹⁰⁸ 《老囚》讲述一个 50 年代被押入大牢并关押 30 年的政治犯，对他女儿的无限真情。《黑宝哥》涉及孩子之间懵懂而青涩的感情。《馋丫头小婵》讲述一个为了吃什么都愿意的女孩与她穷老保姆之间的真情。《士兵与狗》围绕一群巡演文艺兵与一只藏獒之间的感情展开。《我不是精灵》涉及一个女孩子与一个中年男人之间的忘年恋。《倒淌河》涉及一个汉族男人和一个藏族女人之间的爱情。

越界，并使得他们的爱保留在精神层面。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爱情故事。

考虑到上述六则小说均凸显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Aunt Lute 选择《无非男女》，或许是因为这篇小说已于 1996 年被台湾导演朱延平拍成电影《情色》（但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也没获什么大奖）。另外，《无非男女》没有把其中的女性塑造为受害者，也基本没有涉及有关中国的敏感题材。

仅仅从 Aunt Lute 选择《无非男女》而排除另外六篇这个事实而言，我们可以认为，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并没有“在效果上”构成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

(5) 在涉及第五类主题的小说时，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严歌苓小说凸显的第五类主题涉及移民生活的不易，包括物质和精神生活。这些小说包括《少女小渔》、《失眠人的艳遇》、《无出路咖啡馆》、《大陆妹》、《海那边》、《茉莉的最后一日》、《屋有阁楼》。Aunt Lute 选择了《少女小渔》，排除了另外六篇。

尽管都凸显移民生活的不易，《少女小渔》有以下两个不同之处。首先，《少女小渔》是唯一被拍成电影的小说。《少女小渔》于 1995 年由台湾导演张艾嘉拍成电影（李安参与了制片和编剧），在第 40 届亚太影展上获多个奖项（1995），也在比利时根特影展上获“国际影评协会奖”（1996）。其次，《少女小渔》是唯一凸显中国女性的善良美德及其征服力的小说。在散文《弱者的宣言》中，严歌苓（1999b: 171）指出，她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她不满善良在当代女性群体中的泯灭。

具体而言，《少女小渔》涉及绿卡婚姻。在澳大利亚的江伟和女朋友小渔过着穷酸生活，为尽快搞定身份，江伟建议小渔和一个潦倒无耻的意大利老头假结婚，而小渔也就与这个老头过起了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尽管凸显旅外华人的无奈现实，《少女小渔》也提及小渔如何以她接近无私的温情善良，感动了齷齪的意大利老头，并使他找回了尊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小渔最终以她的善良感化了意大利老头，这表明她并非以一个女性受害者的形象出现，而体现了一种不寻常的“强势”。Shen（2001: 120）在分析电影《少女小渔》时指出，该影片凸显了小渔的“柔韧力量”（soft and supple strength），正如影片中

的意大利老人对小渔的评价：“she’s a fighter, just not in a style we recognize”。另一方面，《少女小渔》也基本没有涉及有关中国的敏感题材。

为此，在涉及第五类主题的小说时，就 Aunt Lute 选择《少女小渔》这个事实而言，我们可以认为，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并没有“在效果上”构成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相反，考虑到严歌苓试图在《少女小渔》中强调女性所象征的差异及其征服力，从而与贬低女性差异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相对立，我们还可以认为，Aunt Lute 对这篇小说的选择，“在效果上”，构成了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抵制。

至此，我已简单探讨了 Aunt Lute 在涉及五类主题的小说时，分别体现出的翻译选材特点。为对上述特点做一个总体了解，以下表格供参考：

Aunt Lute 选择考虑的五类主题	每类主题包括的小说	Aunt Lute 选择翻译出版的小说	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in effect），是否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语的迎合或抵制
凸显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大陆背景）	《白蛇》、《天浴》、《白蝶标本》	《白蛇》、《天浴》	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同时还有抵制
凸显西藏问题（大陆背景）	《卖红苹果的盲女子》、《蹉跎姻缘》	《卖红苹果的盲女子》	构成了对美国/西方有关中国（西藏问题）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凸显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大陆背景）	《少尉之死》、《审丑》、《除夕，甲鱼》、《筋斗》、《家常篇》、《洞房》	《少尉之死》	构成了对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凸显真情/爱情/亲情（大陆背景）	《无非男女》、《老囚》、《黑宝哥》、《馋丫头小婵》、《士兵与狗》、《我不是精灵》、《倒淌河》	《无非男女》	没有构成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
凸显移民生活的不易（移民背景）	《少女小渔》、《失眠人的艳遇》、《无出路咖啡馆》、《大陆妹》、《海那边》、《茉莉的最后一日》、《屋有阁楼》	《少女小渔》	没有构成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

表 1: 在涉及所选五类主题方面, 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从上表可知, 在从每类主题所包括的小说中进行选择时, 就选择行为本身而言, Aunt Lute 体现了与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 以及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而言, Aunt Lute 体现了以下倾向。第一, 在涉及中国女性形象方面, 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 “在效果上”, 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同时还有抵制。这是因为 Aunt Lute 没有选择全部体现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小说, 同时也选择了体现普通中国女性形象的小说, 如《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中的盲女子, 《无非男女》中的雨川, 以及《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事实上, 在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所收集的六则故事中, 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只有《白蛇》和《天浴》。

第二, 在涉及中国的形象方面(西藏问题和社会问题), 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 “在效果上”, 构成了对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这是因为 Aunt Lute 选择了质疑中国占领西藏的合理性的小说, 并选择了与好莱坞“反华”电影 *Red Corner* 有较大相似之处的小说, 而排除了没有体现类似特征的其他几则小说。

有鉴于此, 我们可以假设, 具有包括“有色”思想/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的 Aunt Lute, 在更大程度上意识到的是自己作为“白人女性”的特权, 而不是作为“白人”的特权, 尽管意识到需要抵制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 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也需要抵制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 而事实上对前者的成功抵制, 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以对后者的成功抵制为基础。

3 就主题的重要性而言, Aunt Lute 对不同主题体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

Aunt Lute 所选择翻译的小说涉及五类不同主题, 但 Aunt Lute 对不同主题体现了不同程度重视, 这可根据译文集标题的安排、封面的设计、各小说的排序等元文本信息得以确定。

考虑到 Aunt Lute 明确指出这六则小说中最重要的是《白蛇》, 从而把《白

蛇》安排成该译文集的标题小说和译文集的第一篇小说，以及考虑到 Aunt Lute 也非常“欣赏”《天浴》（因为《天浴》是这个出版社决定翻译出版严歌苓文集的直接原因），从而把《天浴》的信息也置于封面，并把它安排成译文集的第二篇小说，我们可以认为，在编排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方面，Aunt Lute 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小说的重要性来排序。

根据有关元文本信息，我们可以认为，Aunt Lute “显得”体现了以下态度：最重要的是凸显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的小说（涉及女同性恋的《白蛇》，和涉及异性恋女性的《天浴》），次之是凸显社会问题的小说（《少尉之死》），再次之是凸显西藏问题的小说（《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再次之是凸显真情/爱情/亲情的小说（《无非男女》），最不重要是凸显移民生活之不易的小说（《少女小渔》）。

图 1: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的封面¹⁰⁹

关于 Aunt Lute 如何赋予不同主题以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可参考下表：

Aunt Lute 所选主题	Aunt Lute 对不同主题体现的不同程度重视	判断依据
凸显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涉及女同性恋（大陆	《白蛇》	①《白蛇》是译文集 <i>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i> 的标题小说；

¹⁰⁹ 在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的实际封面上，还贴着一个铜色塑料贴，上面写着 “Includes ‘Celestial Bath’ the basis of Joan Chen’s award-winning film *Xiu Xiu The Sent Down Girl*”。其中的“Celestial Bath”是“天浴”的英译。

背景)		②译文集封底简单提及了《白蛇》; ③是译文集的第一篇小说
凸显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 涉及异性恋女性 (大陆背景)	《天浴》	①电影《天浴》的其中一个画面是译文集封面; ②译文集的封面和封底都指出,《天浴》是陈冲导演的获奖电影的脚本; ③译文集封底简单提及了《天浴》; ④是译文集的第二篇小说
凸显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 (大陆背景)	《少尉之死》	①译文集封底简单提及了《少尉之死》; ①是译文集的第三篇小说
凸显西藏问题 (大陆背景)	《卖红苹果的盲女子》	是译文集的第四篇小说
凸显真情/爱情/亲情 (大陆背景)	《无非男女》	是译文集的第五篇小说
凸显移民生活的不易 (移民背景)	《少女小渔》	是译文集的最后篇小说

表 2: 在涉及所选五类主题方面, Aunt Lute 对不同主题体现的不同程度重视

从上表可知, 尽管《白蛇》和《天浴》都凸显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 尽管《天浴》比《白蛇》“震撼”得多, 同时也是促使 Aunt Lute 决定翻译出版严歌苓文集的直接原因, 但 Aunt Lute 最终选择把涉及女同性恋的《白蛇》置于译文集最重要的位置, 这应该与出版社最高主管 Pinkvoss 的女同性恋身份相关。

Aunt Lute “显得”认为最重要的四篇小说 (《白蛇》、《天浴》、《少尉之死》、《卖红苹果的盲女子》), 均可以被纳入美国/西方的中国人权话语, 这是因为人权话语内在于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 (《白蛇》和《天浴》可被用以强化该话语), 以及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 (《少尉之死》和《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可被用以强化该话语)。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认为, 这些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美国/西方有关中国人权的主流看法。

比如,《天浴》的同名电影 (英译名是 “Xiu Xiu: The Sent Down Girl”) 是大陆禁片, 在西方发行的 DVD 版本如下图所示, 上面还标有 “BANNED IN CHINA” 字眼:

图 2：电影《天浴》（DVD）的封面

电影《天浴》获得了一些奖项。西方有关该影片的很多评论，都强调中国官方对该影片（拍摄）的抵制，以及影片所涉及文革的罪恶（Keough 1999; Blackwelder 1999; Sragow 1999 等）。美国的“政治电影协会”（Political Film Society）则认为《天浴》号召政府要尊重孩子、家庭、农民的权利，并已把《天浴》提名为“最佳人权电影奖”。¹¹⁰

另外，我们也可以认为，与美国反华“电影”*Red Corner* 有相似之处的《少尉之死》，¹¹¹也涉及人权问题。考虑到 Mackerras（1999: 180）曾指出，自 1989 年以来，西方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往往涉及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凸显汉藏冲突的《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也涉及人权问题。

综上所述，考虑到 Aunt Lute 把《白蛇》、《天浴》、《少尉之死》、《卖红苹果的盲女子》编排在《无非男女》和《少女小渔》之前（从而体现了对前者更为重视的态度），我们可以认为，Aunt Lute 的这个（次序）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尽管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出发点或目的（涉及无意的或被动（迫）的迎合）。

¹¹⁰ 参考自 <http://www.geocities.com/polfilms/xiuxiu.html>。

¹¹¹ Mackerras（1999: 148）指出，*Red Corner* 体现了中国当权者对个体人权的漠视，而 Goldberg（2007: 64-65）则认为，中国对人权的侵犯是 *Red Corner* 的背景。

四 小结

上文分别从三个方面考察了 Aunt Lute 在翻译出版严歌苓作品方面体现出的选材特点，包括所选小说所涉及的背景，所选小说所涉及的主题，以及赋予所选小说所涉及主题的不同程度重要性。下表是我在上文整理得出的结果：

所考察的三个方面	所得出的结论
所涉及的背景	Aunt Lute 青睐大陆背景，而不是移民背景
所凸显的主题	①Aunt Lute 青睐多样化主题，包括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西藏问题、社会问题、真情/爱情/亲情、移民生活的不易； ②在涉及前三类主题的小说方面，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和抵制（迎合同时抵制了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迎合了美国/西方有中国的主流话语）； ③在涉及后两类主题的小说方面，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没有构成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
对不同主题体现的不同程度重视	①Aunt Lute 最重视文革对女性的迫害（译文集的第一、二篇），其次是社会问题（第三篇），再次是西藏问题（第四篇），再次是爱情（第五篇），最后是移民生活的不易（第六篇）； ②Aunt Lute 的（次序）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表 3：在出版严歌苓作品方面，Aunt Lute 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为此，在涉及严歌苓作品的翻译选材方面，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包括背景的选择、主题的选择和同主题小说的选择、主题重要性的选择）表明以下三点。

第一，总体而言，Aunt Lute 作为“白人女性主体”所具有的“有色”思想/成分，起了一定作用。我已在上文指出，当今的白人（女性）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裂的，体现为有关主体也具有“有色”思想。正如很多白人女性一样，Aunt Lute 也具有包括“有色”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就涉及严歌苓作品的翻译选材而言，Aunt Lute 的“有色”思想，主要体现在它没有在译文集中建构一个纯粹凸显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话语。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收集的六则小说中，只有

《白蛇》和《天浴》涉及中国女性的受害者形象。另外，Aunt Lute 也在选择中排除了某些完全迎合受害者模式的小说。另一方面是因为 Aunt Lute 选择的一些小说（《卖红苹果的盲女子》、《无非男女》、《少女小渔》），在违背受害者模式的同时，“多样化”（diversify）了中国女性形象。无论是《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中的盲女子，《无非男女》中的雨川，还是《少女小渔》中的小渔，都既不是有关主流话语中的受害者，也不是西方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并且彼此不同。《少女小渔》中的小渔，甚至还成为非西方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摆脱他者化第三世界女性的其中一个途径，是通过凸显第三世界女性的多样性颠覆刻板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抵制。

第二，总体而言，尽管 Aunt Lute 具有包括高度“有色”思想/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在涉及严歌苓作品的翻译选材方面，其中的“白色”（即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认同）还是取得了绝对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白人身份”的实体所无法控制的，因为其中的“白色”往往在无意识层面起作用。

我在上文指出，Aunt Lute 具有高度“有色”思想，比如，它在出版方面试图破除白人、中产、同性恋、知名、“健康”女性的“霸权”地位，尽可能关注在各方面被边缘化的女性。另外，Aunt Lute 还帮助工人阶级女性写稿和改稿，也给年轻的有色女性提供实习机会，等等。然而，在涉及严歌苓作品的翻译选材方面，Aunt Lute 所具有的“白色”，还是在绝对意义上“击败”了它的“有色”思想。

具体而言，“白色”的绝对优势体现于以下几点。其一，凸显文革对女性的伤害或毁灭的《天浴》，是促使 Aunt Lute 决定出版严歌苓译文集的直接原因，而同主题小说《白蛇》则是所出版译文集的标题小说，此外，Aunt Lute 还把这两篇小说置于整个译文集的最重要位置。就上述事实而言，我们可以认为，这意味着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凸显第三世界女性的受害者形象），在 Aunt Lute 这个实体身上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其二，在涉及中国的形象方面（西藏问题和社会问题），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这是因为 Aunt Lute 选择了凸显汉藏冲突，从而质疑中国人占领西藏之合理性的小说，并选择了与好莱坞“反华”电影 *Red Corner* 有较大相似之处的小说，而排除了没有体现类似特征的其

他几篇同主题小说。其三，Aunt Lute 所选择翻译出版的六分之五小说都涉及大陆背景，就这个事实而言，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更大程度地迎合而非抵制了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因为该话语的其中一个观点，就是把第三世界女性定位为提供本土“真实”信息的“本土情报员”。其四，Aunt Lute 选择翻译出版的六分之四小说，都可以被认为涉及人权问题，就这个事实而言，Aunt Lute 的选择行为本身，更大程度地迎合而非抵制了美国/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因为人权问题是该话语的核心成分。

我已在上文指出，Aunt Lute 的最高主管 Pinkvoss 曾强调对自己身为白人女性所具有特权的认识（比如白人女性控制和经营大部分女性主义出版社），强调要通过出版有色女性文本破除白人女性霸权。（但是，Pinkvoss 没有谈及编辑选材过程。有些白人女性编辑倒是对自己的选材进行了反省。比如，Malina 和 Maslin-Prothero 在“Coming Clean: On Being Feminist Editors”（1998: 146-155）中，探讨了她们作为白人女同性恋编辑 *Surviving the Academy: Feminist Perspectives* 的体验，强调她们对自己的选材标准的质疑，比如她们担心自己的种族中心、同性恋观点，会导致她们排斥挑战类似观点的论文，强调自己作为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并呼吁应该更多地关注女性主义编辑过程。）

很明显，Pinkvoss 的立场表明，Aunt Lute 试图通过出版有色女性文本，使得自己与白人（女性）特权相“分离”，从而与白人霸权实践和话语相“分离”。但是，就严歌苓作品的翻译选材而言，Aunt Lute 所期望的这种“分离”是有限的。

类似局限同样存在于加拿大女性主义出版社 Women's Press。该出版社亦具有包括高度“有色”思想/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曾在 80 年代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比如，Women's Press 在编辑出版 *Imaging Women* 时，以使用体现种族歧视的语言、结构、风格为由，拒绝了三则均由白人女性创作，均涉及第三世界文化生活的短篇小说（Stasiulis 1993: 38-39），并在投稿指南中表示拒绝出版“把白人中产女性视角视为标准，而把有色女性视角视为独特或奇异的稿件”，但是，该出版社的某些观点或实际行为恰恰违背了上述原则（Kim 2004: 184-185）。

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白人主体”能够辨认某些明显政治不正确的观点或实践（比如种族歧视），有时却很难抵制已进入无意识层面从而很难客观看待

和批评的话语信条（这就涉及“白色”的无意识习惯）。为此，我们可以假设，一方面，Aunt Lute 知道要翻译出版有色女性文本，因为它知道排挤有色女性是政治不正确的，另一方面，Aunt Lute 的某些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而这或许是因为有关话语信条已进入其无意识层面，比如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

第三，Aunt Lute 的“白色”压倒其“有色”的事实，尽管可能跟有关主流话语客观上的难以去除相关，也或许跟 Aunt Lute 对严歌苓译文集的定位相关，这就涉及 Aunt Lute 的经济状况。

从上文可知，Aunt Lute 是一个非营利的小型女性主义出版社，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书本销售和资助，并曾一度有财政问题。但是，非营利只是意味着不以营利为首要目标，并非意味着完全不重视促销和市场。事实上，考虑到女性主义出版社的财政状况直接影响其“政治效力”（political effectiveness）（Young 1997: 58），任何女性主义出版社应该都会关注营利。Aunt Lute 也重视促销和市场，最高主管 Pinkvoss 会在某些新书出版后，四处致电给书店和图书馆（Young 1997: 42）。

最为重要的是，Pinkvoss 曾提及如何在保持财政稳定的同时，出版具有政治意义的文本，策略就是通过出版一个有畅销潜力（但不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文本，“资助”（subsidize）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但不具畅销潜力）的文本的出版：比如，Aunt Lute 翻译出版墨西哥长篇小说（*The Two Mujeres*），就是使用了上述策略；Pinkvoss 认为这是一本好书，“但它没有表达出我所关心的……[但]我们的一些读者将会非常喜欢”，之所以选择翻译出版这本书，是因为它涉及历史，也因为“它[的出版]将帮助销售 Edna Escamill 的作品”，后者更能体现 Aunt Lute 的政治使命（Young 1997: 43-44）。（在谈及 *The Two Mujeres* 时，Pinkvoss 说“但它没有表达出**我**所关心的”，而不是“但它没有表达出**我们**所关心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 Pinkvoss 对选材有着很大的控制权。）

从 Pinkvoss 的上述言论中，我们可以明确，Aunt Lute 至少出版两类文本，一类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但不具有畅销潜力的文本，另一类是具有畅销潜力但不具备重要政治意义的文本。

考虑到《天浴》是促使 Aunt Lute 决定翻译出版严歌苓文集的直接原因（在做这个决定时，《天浴》还没拍成电影），我们可以假设，Aunt Lute 或许一开始就试图把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建构为畅销文本，用以“资助”其他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文本的出版。有关中国女性如何受中国社会文化压迫的悲惨故事，在西方总是特别畅销。比如，《The Woman Warrior》(Kingston) 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是描述作者姑姑悲惨遭遇的“*No Name Woman*”，在 David Leiwei Li 看来，这个章节也可能是许多大学生阅读的，唯一一个美籍华裔文学文本节选（Zhu 2007: 70）。更说明问题的是，Aunt Lute 不仅用电影《天浴》中的一个画面，当作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的封面，还在封面和封底都强调该译文集包括电影《天浴》的脚本（在出版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时，《天浴》已拍成电影）。考虑到电影《天浴》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这种设计也体现了 Aunt Lute 建构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的商业动机。

Aunt Lute 出于经济原因（财政不稳定，缺乏资金）对严歌苓作品进行了商业定位，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定位解释 Aunt Lute 在建构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时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就选择行为本身而言，Aunt Lute 对有关西方/白人主流话语的迎合超过了抵制。也就是说，Aunt Lute 带着营利目的，在翻译选材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迎合而非抵制有关主流话语，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这个实体所具有的“白色”最终压倒其“有色”。

为此，Aunt Lute 的“白色”压倒其“有色”的事实，或许跟 Aunt Lute 对严歌苓译文集的商业定位相关，因为商业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西方/白人主流话语的认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抵制自身作为“白人女性”所代表特权，而翻译出版有色女作者严歌苓作品的 Aunt Lute，因为在无意识层面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商业动机，在翻译选材方面体现了分裂立场，在抵制有关权力机制的同时，在更大程度上重复了同样的权力机制。

Aunt Lute 曾于 1994 年重印了澳籍华裔女作家丁小琪，事先由澳大利亚 Hyland House Publishing 翻译出版的小说集 *Maidenhome* (1993)。¹¹²事实上，美国非营利小型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在翻译出版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方面体现出的选材特点，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澳大利亚小型商业出版社

¹¹² 该文集不是由 Aunt Lute 翻译出版，所以没有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Hyland House Publishing, 在翻译出版 *Maidenhome* 方面体现出的选材特点。就这个现象而言,在翻译选材方面,考虑到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在西方的商业潜力,一个小型的非营利女性主义出版社和一个小型的商业出版社,有时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前者不一定更“革命”,后者也不一定更“反动”,尤其是当小型的非营利女性主义出版社也需要从销售中获取“资金”时。

第三节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 Virago Press 在出版

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

在英国继续营业的不到 10 家的女性主义出版社中,只有 Virago 翻译出版过书本长度的非学术类的中国女性文本。这一节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分析 Virago 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一 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

Virago 在主页上自称是优秀的并取得商业成功的“女性文学国际出版社”,世界上最大的“女性分社”,以及英国出版界最为成功的“分社”之一,致力于出版涉及女孩和女人生活的文本。

以下是 Virago 的简史:¹¹³在 1973 和 1975 年间, Virago 是一个有着独立所有权,但在资金方面却依赖宣传公司 Carmen Callil Ltd.的编辑分社;在 1976 年, Virago 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费出版社;在 1982 年, Virago 成为 CVBC (the Chatto, Virago, Bodley Head and Cape Group) 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在 1987 年, Virago 脱离当时属于 Ramdon House USA 的 CVBC 独立,但 Ramdon House UK 仍占有该出版社的 10%股份,并继续负责销售;自 1996 年至今, Virago 成为英国 Little, Brown 公司的一个分社,¹¹⁴由“出版商”(publisher) Lennie Goodings 主管。

Virago 的女性主义性质,最明显体现于这个出版社的名字和“标识”(logo)。Virago 把指代“悍妇”的“virago”当作出版社名字,体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

¹¹³ 参考自该出版社主页。

¹¹⁴ 在 1989 年至 2006 年间, Little, Brown 附属于 Time Warner Book Group; 自 2006 年后, Little, Brown 附属于 Hachette Book Group USA。

西方女性主义语境，当时很多女性主义出版物把主流社会有关女性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如“泼妇”(shrew)等当成出版物的名字，借此颠覆类似刻板印象；而 Virago 的标识是一个被咬了一口的红苹果，

矛头直指夏娃诱惑这个主流父权“迷思”(myth)(Murray 2004: 57)。

但是，Virago 不仅仅是一个女性主义出版社。确切的说，Virago 是一个附属的商业女性主义出版社，为此不同于我在第二节探讨的 Aunt Lute (独立的小型的非营利女性主义出版社)。正如 Virago 的创办者 Callil 曾指出，她创办这个出版社出于两个原因，包括商业和意识形态，并认为女性主义出版社不应把政治正确摆在首要位置 (Simons 1998: 185-186)。

Murray (2004: 32) 探讨了 Virago 的双重定位。不同于很多成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妇女解放运动语境下的女性主义出版社，Virago 对自己有着双重定位，一方面把自己看成一家商业出版社，另一方面把自己看成英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致力于出版受当时女性主义启发的文本并从中盈利，试图协调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尽管这种双重定位曾一度使得 Virago 处境尴尬，在受到女性主义质疑的同时，也受到伦敦主流出版界的排斥，¹¹⁵事实证明 Virago 是成功的。

需要指出的是，Virago 把目标读者定位为主流读者，认为主流是一个“中立场”(neutral ground)，并认为女性主义政治完全可以“挪用”主流市场 (Murray 2004: 55)。

二 Virago 翻译出版的女性文本

在 Virago 出版的所有女作者中，白人女作者占 90%左右 (其中，英美国家的占 78%左右)，有色女作者占 10%左右。

Virago 翻译出版的白人女作者作品，包括 Gaby Hauptmann (德国) 的 *In Search of an Impotent Man* 和 *Grabbing the Family Jewels*, Sabine Kuegler (德国)

¹¹⁵ 伦敦的主流出版界认为，任何政治导向的出版社都是没有商业潜力的 (Murray 2004: 32)。

的 *Jungle Child*, Sabine Dardenne (比利时) 的 *I Choose to Live*, Åsne Seierstad (挪威) 的 *A Hundred and One Days*、*With Their Backs to the World: Portraits of Serbia*、*The Angel of Grozny: Life Inside Chechnya*。

Virago 翻译出版的有色女作者作品, 包括马燕 (中国) 的 *Diary of Ma Yan* (2004; 2005), 和 Byambasuren Davaa (蒙古) 的 *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 (2007; 2008)。¹¹⁶

考虑到 Virago 只出版过一个中国女作者马燕,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 Virago 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翻译选材, 意味着考察 Virago 在出版马燕作品方面的翻译选材。

三 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选材分析: Virago 与马燕

我在第二节强调指出, 出版社的翻译选材从本质上而言相当复杂, 但无论背后涉及多么复杂的关系, 在涉及翻译选材方面, 出版社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最大权力和最终决定权, 为此, 即使缺乏精确内部消息, 考察一个出版社所翻译出版的文本, 还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窥探这个出版社 (有意或无意采取的) 倾向、立场、意识形态。

考察一个出版社在涉及某个作者时所体现的翻译选材政治, 可以意味着以下两个可能性: 第一, 考察出版社从作者的作品库中选择哪些进行翻译, 这适合那些出版过多个文本的作者; 第二, 考察出版社对作者所在群体的翻译选材情况, 之后再考察出版社对作者本人的翻译选材情况, 这适合那些只出版过一个文本的作者。在第二种情况下, 考察出版社对有关作者所在群体的翻译选材情况, 目的在于提供必要的语境, 以免研究过程显得单薄而不够有说服力。在本研究中, 对严歌苓的考察属于第一种情况 (因为她已出版过若干部小说集), 对马燕的考察属于第二种情况 (因为她只出版过《马燕日记》)。

接下来, 我将根据事实存在的文本证据, 分析 Virago 选择翻译出版《马燕日记》这个行为本身, 如何“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

¹¹⁶ 尽管 *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 列着两位作者, 包括蒙古导演 Byambasuren Davaa 及其德国助理 Lisa Reisch, 考虑到这个文本改编于 Davaa 的同名影片 (涉及蒙古的游牧生活), 考虑到这个文本原本用德语书写 (为此 Davaa 需要德国助理在语言层面的帮助), 以及考虑到有关这个文本的介绍仅仅提及 Davaa, 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 *The Cave of Yellow Dog* 等同于 Davaa 的作品。

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以及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但在此之前，我会先考察 Virago 对马燕所在群体（第三世界女性）的翻译选材情况，以便为分析 Virago 选择翻译出版《马燕日记》提供必要语境。

（一）有关马燕

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知道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的是电影《天浴》，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知道中国回族女孩马燕的是《马燕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的名声或许还更大些。

马燕来自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特困农村家庭，有两个弟弟，一家五口人。十多年前，马燕父母无法同时供养三个孩子读书，于是让当时还在读小学的她辍学在家。极度热爱读书的马燕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辍学前后），并在日记中表达了求学的艰辛、对读书的渴望、对极度贫困的无奈等等。她的文盲母亲也觉得愧对马燕，却无能为力。

在 2001 年 5 月的一天，法国日报 *Libération* 的驻京记者 Pierre Haski,¹¹⁷ 和助手何岩萍等人，来到马燕家所在的宁夏同心县预旺乡章家树村，马燕妈妈把马燕的日记手稿设法交给了他们。之后，马燕得到了他们的资助并继续上学。

经 Haski 编辑的日记手稿于 2002 年在法国出版，名为《马燕日记》。《马燕日记》在法国的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举成为法国的畅销书，也促使了 *Enfants du Ningxia* 于 2002 年在法国的成立。¹¹⁸ 《马燕日记》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引起了世界“轰动”，同时也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这都使得一些与马燕一样不幸的孩子得到了及时帮助。另一方面，《马燕日记》在法国的出版，使得马燕被法国一个青少年杂志评为“2002 年度少年”，也使得马燕成为法国家喻户晓的名字。在接受赞助完成在中国的学业之后，马燕于 2008 年前往法国巴黎的 The University of Sorbonne 攻读法语，部分费用由 *Enfants du Ningxia* 赞助。¹¹⁹

考虑到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涉及西方/白人女性和第三世界/有色女性之间的关系，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分析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这一行为

¹¹⁷ 从 1981 年至 2006 年，Haski 是 *Libération* 的记者；在 2000 年和 2005 年间，Haski 驻在中国，并在日报主页上写博客，名为 *Mon Journal de Chine* (My Journal from China)，但受到中国官方屏蔽。此外，Haski 还因为《马燕日记》接受过美国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的采访。

¹¹⁸ 该组织的网页是 <http://www.enfantsduningxia.org/>。

¹¹⁹ 这是 Haski 提供的信息。

之前，我想先简单提及这个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的“白人女性身份”。

(二) Virago Press 的白人女性身份

从第二节可知，一个女性主义出版社是否具有白人女性身份，取决于两个因素，包括出版社内部的最高控制权属于白人女性，以及出版社对自己的定位是服务普遍意义上的女性；与此相反，有色女性主义出版社的最高控制权属于有色女性，对自己的定位也仅仅是服务有色女性。

Virago 是一个具有白人女性身份的女性主义出版社。首先，Virago 内部的最高控制权属于白人女性。比如，于 1973 年创立 Virago 的 Carmen Callil 是白人女性，而于 Virago 成立几年后加入 Virago，并自 1996 年以来担任 Virago 出版商的 Lennie Goodings 也是白人女性。其次，Virago 致力于出版涉及女孩和女人生活的文本，借此服务女性。这种服务于所有女性的立场，恰恰暴露了试图为所有女性代言的霸权，而这在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看来，正是西方/白人女性主义的特点。

我在探讨 Aunt Lute 时曾指出，这个出版社具有包括高度“有色”思想/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比如它试图通过出版非白人/异性恋女性文本，破除白人异性恋女性的霸权地位，而其最高主管 Pinkvoss 也表示，要用自己作为白人女性所具有的特权服务有色女性。那么，Virago 的情况如何？

Virago 也是一个有着“有色”思想的“白人女性主体”。比如，Virago 也出版有色女作者。而 Virago 的最高主管 Goodings 也曾指出，种族政治是女性主义的必备成分（1993: 67），这说明她对白人女性特权也是有所意识的。在当今语境下，大部分白人女性，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对性别层面的种族政治有所意识，正如大部分白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对种族政治有所意识一样，这也是为什么 Wiegman（1999）强调当代的白人身份在与白人至上话语和实践的分离中建立。

但是，根据我所能收集到的信息，Virago 的 Goodings 对自己作为白人女性所拥有特权的反省，远不及 Aunt Lute 的 Pinkvoss。这种差异也或许已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于这两个出版社对待白人女性文本和读者的态度：Aunt Lute 在很大程度上出版有色女作者（占 75%左右），并在很大程度上以边缘读者为目标读者；Virago 在很大程度上出版白人女作者（占 90%左右），并在很大程度上以主流

读者为目标读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假设，尽管 Aunt Lute 和 Virago 作为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均具有包括“有色”思想/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但 Aunt Lute 的“有色”程度高于 Virago 的“有色”程度。Scanlon 和 Swindells 指出，Virago 的出版“清单”（list）类似于 Routledge、Blackwell 等主流出版社涉及女性/性别研究的出版清单（1996: 136）。这意味着 Virago 不会有太高的“有色”成分，因为“有色”跟“主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冲突的。事实上，Virago 的商业性质也预示了这一点。

接下来，我将根据事实存在的文本证据，分析 Virago 选择翻译出版《马燕日记》本身如何“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以及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

（三）Virago Press 的翻译选材特点

这一部分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第一，有关《马燕日记》的信息；第二，考察 Virago 对马燕所在群体（第三世界女性）的翻译选材情况，旨在了解 Virago 的选择行为本身，是否“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第三，考察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本身，是否“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

1 有关《马燕日记》

考虑到《马燕日记》的特殊性，我先简单提及《马燕日记》的法文、中文、英文版本的出版情况及所涉及的内容。¹²⁰

在拿到《马燕日记》的手稿并回到北京后，Haski 在 *Libération* 上发表了一篇有关马燕日记的报道，并引起了法国巴黎出版社 Éditions Ramsay 的注意。该出版社致电给当时还在北京的 Haski，表示愿意出版马燕的日记全稿。之后，Haski 和助手何岩萍开始着手把日记手稿翻译成法文：何岩萍提供了法译文的第一稿，接着和 Haski 在此基础上修饰译文。在他们将日记的法译稿交给巴黎的出版社之后，该出版社在反馈中提出了 100 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将帮助“外人”

¹²⁰ Haski 提供了有关《马燕日记》法语版的出版过程，该书的巴黎代理商，以及中文版等的信息。

(outsider) 理解马燕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于是, Haski 等人重新回到马燕所在村, 并让她回答出版社所提的涉及饮水、健康、学校生活等问题, 而所收集的信息也最终以注释、解释性短文等元文本形式, 出现在出版后的法语版中。在 2002 年, Éditions Ramsay 出版了《马燕日记》的法文版(这是马燕所出版的第一本书, 也是唯一一本书), 并引起轰动。看到该书的潜在商机后, Ramsay 决定让总部基于巴黎的书籍代理商 Susanna Lea Associates, 负责该书的国外版本情况。该代理商在主页上指出, 已有 19 个出版社出版了《马燕日记》。

《马燕日记》有多个英文版。Lisa Appignanesi 把《马燕日记》法文版译成英文, 在 2004 年 7 月由 Virago 出版。接着, Virago 在 2005 年 8 月出了第二版。美国的非女性主义商业出版社 HarperCollins, 向 Virago 购买了英文版权, 也出了两版(分别是 2005 年 6 月和 2009 年 7 月)。¹²²《马燕日记》主要有两个中文版, 包括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和台北平安文化有限公司(2004)出版的版本。¹²³

综上所述,《马燕日记》的法文、中文、英文版呈如下关系:

图 3:《马燕日记》的出版

从内容上看, Virago 翻译出版时所依据的《马燕日记》法文版, 类似于某

¹²² 版本信息参考自 www.amazon.co.uk。

¹²³ Haski 指出,《马燕日记》的中文版也由 Susanna Lea Associates 经手。该法国代理商联系了一个台湾代理商, 由后者联系大陆和台湾出版社, 出版《马燕日记》的中文版。

个以提供信息为主的纪实文本或是民族志文本。这是因为《马燕日记》法文版除日记本体外还包括了各种元文本信息：第一，提供了目录，指出这本书所包括的各方面内容；第二，提供了马燕写给妈妈的一封亲笔信——“我想读书”；第三，提供了“前言”，提及 Haski 与马燕及其家人之间的认识过程等内容；第四，提供了马燕和马燕家人等的照片等，穿插在日记正文间；第五，提供了 100 多个注释，解释日记正文中某些费解的术语、现象等；第六，提供了 20 多篇帮助读者理解日记正文的解释性短文，涉及中国的重男亲女、农村的贫困等问题，穿插在日记正文间；第七，提供了“后记”（由多篇短文构成），内容涉及有关马燕的报导在法国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以及马燕写给 Haski 等人的感谢信等；第八，提供了附录，涉及章家树村的缺水状况，回族穆斯林状况，以及教育问题等。为此，在《马燕日记》的法文版中，各种元文本信息构成的字数还超过日记正文。

总体而言，《马燕日记》凸显了当代中国某些边远山区的赤贫（很多吃不上饭）和教育问题（很多上不起学）。

2 在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方面，Virago 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考虑到马燕是 Virago 翻译出版的唯一中国女作者，考虑到马燕只出版过《马燕日记》，以及考虑到仅仅分析 Virago 对《马燕日记》的翻译出版会有单薄之嫌，在这一部分，我将简单探讨 Virago 在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以便为分析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提供必要语境。

Virago 翻译出版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除《马燕日记》外，还包括《小黄狗的窝》（蒙古作者 Byambasuren Davaa）。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文本是否是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取决于作者的身份而非所使用语言。

出生于 1971 年的 Davaa 是一个蒙古导演，现居德国，童年时期经历过游牧生活。在 1999 年，Davaa 来到德国的 Munich Academy of Television and Film，学习记录片和传媒，所拍摄的电影主要包括《哭泣的骆驼》（*The Story of the Weeping Camel*）（2003）和《小黄狗的窝》（*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2005），均涉及原始游牧生活。《哭泣的骆驼》获德国 Bavarian Film Awards 的“Best Documentary”，并在 77 届 Academy Awards 上获“Best Documentary”提名；《小

黄狗的窝》也获 German Film Awards 的 “Best Children’s Picture”。此外，《小黄狗的窝》的放映权已卖给 20 多个国家 (Elley 2005)。Balakaeva (2007: 125) 指出,《哭泣的骆驼》和《小黄狗的窝》之所以深受西方欢迎,是因为青睐“乡村风味”(rusticity)的(西方)后现代,也喜欢(中亚)游牧人的原始生活方式。

Davaa 只出版了电影《小黄狗的窝》的德语文本,¹²⁴由 Sally-Ann Spencer 译成英文,在 2007 年由 Virago 出版,2008 年再版。《小黄狗的窝》基于一个蒙古寓言,涉及狗的轮回转世,讲述一个过着原始游牧生活的蒙古家庭与一只流浪狗之间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¹²⁵有关影评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影片展示了与现代脱节的古老原始的游牧生活,暗示现代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威胁;其次,影片体现佛教色彩,比如相信轮回转世并强调相互依存;最后,影片体现了人类学成分。¹²⁶

至此,我们已了解 Virago 选择翻译出版的两个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包括《马燕日记》和《小黄狗的窝》。

考虑到 Virago 也翻译出版了若干白人女作者的文本,包括 Hauptmann (德国)的《寻找一个阳痿男》(*In Search of an Impotent Man*)和《抢占家庭珠宝》(*Grabbing the Family Jewels*),¹²⁷Kuegler (德国)的《丛林孩子》(*Jungle Child*),¹²⁸Dardenne (比利时)的《我选择生存》(*I Choose to Live*),¹²⁹Seierstad (挪威)的《一百零一天》(*A Hundred and One Days*)、《背对世界:塞尔维亚写照》(*With Their Backs to the World: Portraits of Serbia*)、《格罗兹尼的天使:车臣内部的生活》(*The Angel of Grozny: Life Inside Chechnya*),¹³⁰比较 Virago 在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以及白人女性文本方面的选材差异,能帮助我们确定 Virago 在出

¹²⁴ 《小黄狗的窝》的德语版,由 Piper Verlag GmbH (2005) 出版。

¹²⁵ 这个蒙古家庭的六岁女儿 Nansaa,偶然在洞穴中发现一只流浪狗 Zochor,想收养它,却遭到父亲拒绝。Nansaa 不顾父亲反对,坚决留住小狗。之后,小狗因为救了 Nansaa 弟弟的命,获得了父亲认可。最后,全家和这条狗游牧去另一个地方。

¹²⁶ 参考 Bitel (2006)、Crust (2006)、Schager (2006)、Cornelius (2007)。

¹²⁷ 在《寻找一个阳痿男》中,一个漂亮能干的女人因为厌倦了好色男人,试图寻找阳痿男做理想情人;《抢占家庭珠宝》讲述一个富人的四个女儿彼此争夺财产的故事。

¹²⁸ 《丛林孩子》是作者 Kuegler 的回忆录。Kuegler 有 10 年时间(从 7 岁到 17 岁)在 West Paupu 的丛林里度过,与当地的 Fayu 部落一起生活,该回忆录讲述的就是她对原始部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体验。

¹²⁹ 《我选择生存》是作者 Dardenne 的回忆录。12 岁的 Dardenne 被一个比利时连环杀手(也是恋童癖者)绑架并遭受性侵犯,被关押 80 天之后获救。该回忆录叙述了这次经历以及被拯救后的生活,并呼吁社会加强对恋童癖者的管制。

¹³⁰ Seierstad 的上述作品均是纪实文本。《一百零一天》涉及美国入侵之前、之时、之后的伊拉克情况;《背对世界:塞尔维亚写照》涉及塞尔维亚居民在 Milosevic 统治下的生活;《格罗兹尼的天使:车臣内部的生活》涉及车臣冲突及其对百姓的影响。

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

为比较 Virago 在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和白人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选材差异，我提供以下两个表格，以供参考。

Virago 翻译出版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

Virago 翻译出版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	共同点	不同点
中国马燕的《马燕日记》	①都有一定知名度； ②都可以算是某种纪实文本：马燕日记》涉及一个农村女孩的真实生活，并包括各种真实的元文本信息；《小黄狗的窝》取材于一个真实游牧家庭的日常生活；	①女作者“受害”于落后的经济文化； ②文本中有很多凸显中国阴暗社会问题的信息，包括贫困问题、教育问题、重男轻女问题等。
蒙古 Davaa 的《小黄狗的窝》	③都涉及远离城市现代化的生活：《马燕日记》涉及贫困的边远农村生活；《小黄狗的窝》涉及原始游牧生活； ④凸显作者的族裔身份和族裔文化。	佛教色彩，神秘主义

表 4：Virago 翻译出版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

Virago 翻译出版的白人女性文本：

Virago 翻译出版的白人女性文本	共同点	不同点
德国 Hauptmann 的《寻找一个阳痿男》和《抢占家庭珠宝》		中上层阶级女性的生活
德国 Kuegler 的《丛林孩子》	①都有一定知名度； ②都可以算是某种纪实文本：《丛林孩子》和《我选择生存》都是回忆录；Seierstad 的三个文本均是纪实报告。	比较原始部落文化和欧洲文化
比利时 Dardenne 的《我选择生存》		女作者受害于比利时某个变态杀手
挪威 Seierstad 的《一百零一天》、《背对世界：塞尔维亚写照》、《格罗兹尼的天使：车臣内部的生活》		战地情况

表 5：Virago 翻译出版的白人女性文本

比较上述两个表格，参考这个有限的语料库，就 Virago 选择《马燕日记》和《小黄狗的窝》这个行为本身而言，我们可以认为，Virago 倾向选择凸显女作者族裔身份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而这种族裔身份在很多时候等同于体现为贫困、落后、（贬义意义上的）原始等的第三世界差异。¹³¹

Virago 表现出的这个倾向涉及 Chow (2002: 107) 所谓的“强制模仿” (coercive mimeticism)，即身处主流西方文化边缘的个体，被期望“像和复制” (resemble and replicate) 赋予他们的“陈腐预想” (banal preconceptions)，比如所谓的“亚洲性” (Asianness)、“非洲性” (Africanness)、“阿拉伯性” (Arabness) 等等，也就是说，一个有着某种族裔身份的个体，被期望体现这个族裔身份往往具有的特点。

这也是为什么 Virago 所选择翻译出版的这两个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均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有关第三世界女作者的族裔身份，比如，《马燕日记》凸显了某种“中国性” (Chineseness)，这里体现为落后的中国边远农村，而《小黄狗的窝》则凸显了某种“蒙古性” (Mongolianness)，这里体现为蒙古的原始游牧生活。这就意味着 Virago 不会特别热衷于选择那些不凸显作者族裔身份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

相反，Virago 并没有对白人女作者进行类似定位。也就是说，为了得到 Virago 的翻译出版，白人女作者不需要提供凸显她们族裔身份的文本。比如，德国 Hauptmann 的《抢占家庭珠宝》，讲述的是四个女儿争夺家庭财产的故事，比利时 Dardenne 的《我选择生存》，讲述的是一个普通女孩被某个恋童癖患者/杀手所绑架和折磨的故事，类似主题均有不受族裔文化限制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假设，如果上述两个故事的作者，换成是中国女性或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Virago 估计就不会选择翻译出版了。

¹³¹ 虽然学界已普遍认同，一味把第三世界女性建构为贫穷、可悲、无知等刻板形象是政治不正确的，通俗文化还是“坚守”类似形象。比如，美国开播于 2004 年并获 Emmy Awards、Golden Globe Awards 等的当代电视剧 *Desperate Housewives*，塑造了一个可悲的中国女孩形象（为此受到中国观众的极度反感）。在该剧中，当移民局要遣送非法居留美国的小梅回中国时，小梅面露惊惧之色，竟然说，一旦回中国，她就要被叔叔卖掉当“奴隶”。再比如，美国喜剧电影 *Baby Mama* (2008) 里的白人女性在找代孕妈妈时，说不希望她孩子的妈妈是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女性。类似例子不计其数。

3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这一行为，与有关主流话语的关系

从上文可知，Virago 倾向翻译出版凸显作者族裔身份的第三世界女性文本。这为我考察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本身是否“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提供了必要语境。

首先，我们看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或抵制。该主流话语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第三世界女性受害者形象的迷恋。

需要指出的是，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并非不允许西方女性主义者谈论或再现第三世界女性的受害体验，因为揭示女性受害体验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但她们讨厌西方女性主义者倾向把第三世界女性的受害体验，与第三世界经济文化等大范畴相关联，¹³²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殖民主义”话语。

我们可以认为，《马燕日记》中的马燕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受害者（尽管这部日记的出版，使得她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这个身份）。需要强调指出的是，Virago 也同时翻译出版了比利时女作者 Dardenne 描述自身受害体验的《我选择生存》。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并非表明，Virago 通过翻译出版同时凸显中国女性和比利时女性受害体验的文本，而抵制了将第三世界女性定位为受害者形象的主流话语，并非表明 Virago 体现了主体分裂。这是因为，马燕和 Dardenne 分别经历的受害体验有着不同性质：前者的迫害者是中国农村的落后经济文化（贫困、重男轻女思想等），¹³³后者的迫害者是某个变态杀手/恋童癖患者。

为此，考虑到其中的受害性质，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这一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尽管这或许不是 Virago 的出发点或目的（涉及无意的或被动（迫）的迎合）。

接下来，我们考察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考虑到《马燕日记》所涉及的敏感内容，不难看出，Virago 这个英国商业女性主义出版社，还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西方“男性”领域的当代意识形态政

¹³² 比如，Mohanty (1991b: 57) 指出，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把第三世界女性，建构成一个受害于特定社会经济体系的无权群体。Narayan (1997: 50) 也表示，第三世界女性所面临的问题，往往被设想成与第三世界“宗教/传统/文化”相关。

¹³³ Virago 重印的译本 *In the Name of Honor*，也讲述一个巴基斯坦农村女性如何受到相关文化传统的迫害，即所谓的“honor revenge”。

治，比如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张力。在共产主义中国的发展势头对资本主义西方构成威胁的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马燕日记》所涉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这个话语的基调就是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或所谓的“反华”）。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都试图揭示中国社会的阴暗面，英国也不例外。比如，Cao（2007b: 277）指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拍摄了一系列旨在揭露中国的“调查记录片”（investigative documentary），包括 *Laogai: Inside China's Gulags*（1993）、*The Dying Rooms*（1996）等。Cao（2007a: 115）还提及了英国有关中国的主流印象的作用力，比如，一个英国电影摄制者拍了两部有关中国的记录片，一部是体现中国负面形象的 *Last Governor*（1997），另一部是体现中国正面形象的 *Dragon's Ascent*（2004），结果是前者在英国 Channel 4 频道的黄金时段播出，而后者被从英国频道中撤除。

我们看看西方有关《马燕日记》的媒体报道。美国 *Publishers Weekly* 认为此书“will open youngster's eyes”（意思是居然还有像马燕这么可怜的中国女孩）；加拿大的 *Edmonton Entertainment Weekly* 指出此书是“a striking window into daily life in rural China”（意思是中国农村都像马燕所在农村那么穷），¹³⁴等等。

除媒体报道之外，很多西方读者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美国读者为例。有的美国读者暗示，《马燕日记》和中国奢华的奥运会开幕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有的指出，《马燕日记》将使得美国读者珍惜他们享受教育等机会的权利；还有领养了中国女孩的美国读者表示，她不敢想象她女儿如果没有被她领养，是否会有着跟马燕类似的命运；甚至有美国读者指出，这部日记应该成为课堂教材，是所有美国孩子特别是美国女孩的必读书，他们将会感激自己生活在美国。¹³⁵

考虑到上述评论，我们可以认为，《马燕日记》确实强化了西方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而 Virago 也因为选择翻译出版这个文本，“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此外，Virago 的另外一个行为，也使得它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这涉及《马燕日记》的封面设计。

Virago 出版了《马燕日记》的两个英文版（2004 年 7 月和 2005 年 8 月），

¹³⁴ 参考自 http://www.amazon.com/gp/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0060764961/ref=dp_proddesc_0?ie=UTF8&n=283155&s=books。

¹³⁵ 参考自 http://www.amazon.com/Diary-Ma-Ya-n-Struggles-Schoolgirl/product-reviews/0060764961/ref=dp_top_cm_cr_acr_txt?ie=UTF8&showViewpoints=1，以及 http://www.harpercollins.com/books/9780060764968/The_Diary_of_Ma_Yan/index.aspx。

有着不同的封面设计。2004 年版本的封面是淡绿色，上面是马燕的肖像：

图 4：《马燕日记》的 2004 年版本（Virago）

但出版于 2005 年的封面是大红色，上面是一个空碗和一双筷子：

图 5：《马燕日记》的 2005 年版本（Virago）

为什么 Virago 更换了封面？这涉及美国非女性主义商业出版社 HarperCollins。HarperCollins 经 Virago 授权，于 2005 年 6 月出了《马燕日记》的英文版，但它采用了不同的封面设计，即上文所示的红色封面。或许是因为这个红色封面的版本更为畅销（美国亚马逊网以及《马燕日记》的法国代理商

Susanna Lea Associates, 均采用了红色封面版本), Virago 在 2005 年 8 月再版时, 也采用了 HarperCollins 的红色封面设计, 并在其主页上撤掉了 2004 年的绿皮版本。

如果说 Virago 的 2004 年版本还能表明这个出版社关注性别政治, 那么, Virago 的 2005 年版本只能表示这个出版社只关注中西政治了, 因为红色封面版本在很大程度上只传递了以下信息: 21 世纪的红色中国还没能解决温饱问题, 为此有关中国的崛起言论不攻自破。

就从 Virago 弃“绿”(2004 年的淡绿版本)从“红”(2005 年的红色版本), 这个行为本身而言, Virago 再一次“显得”迎合了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 尽管它或许没有类似出发点或目的。

四 小结

从上文可知, 在涉及中国女性文本方面,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日记》这一选择行为本身, “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

一方面, 《马燕日记》的女主角是中国落后经济文化的受害者, 从而使得该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 而 Virago 也因为选择翻译出版这个文本, 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了这一主流话语。

另一方面, 《马燕日记》所提供的内容包括贫困、教育问题等, 也确实强化了西方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 而 Virago 也因为选择翻译出版这个文本, 有意或无意地迎合了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外, Virago 在其主页上仅提供了一个更为凸显中国负面形象的版本(2005 年的红色版本), 而撤掉原本没有如此凸显中国负面形象的版本(2004 年的淡绿版本), 这个事实本身也更加使得 Virago “显得”迎合了上述话语。

可见, 尽管也具有包括低度“有色”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 就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而言, Virago 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体现出白人主体往往被期望具有的分裂性, 即对有关主流话语的抵制, 而体现了某种“整体性”。

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 强势文化主体因为弱势文化他者的要求感到自我分裂, 而只有那些信奉“殖民主义逻辑”的强势文化主体, 才会感到自我的整体性 (Schutte 2000: 60)。但是, 这个观点不一定适合 Virago 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

文本方面，“显得”体现的统一立场，即在很大程度上迎合而不抵制有关主流话语。这个立场或许是 Virago 无意识采取的，这意味着 Virago 无意中选择了迎合有关话语的文本，而这或许是因为，正如我在上文指出，有关话语的基本信条已进入其无意识层面。

另外，上述这个立场也或许是 Virago 被迫采取的，这意味着 Virago 在某些压力下不得不选择迎合有关话语的文本。也就是说，Virago 的立场整体性，或许并非因为有关主体（编辑）信奉“殖民主义”逻辑，而更可能跟 Virago 对自身的商业定位相关，也跟 Virago 的附属身份相关（自 1996 年以来附属于大商业出版集团）。正如 Murray(2004: 64)指出，尽管 Virago 拥有“编辑自主”(editorial autonomy)，但在涉及要不要出版某个文本时，还是有可能受到所属公司董事会的限制，比如，公司董事可能否决 Virago 愿意出版某个文本的决定。上述这两种情况都导致了商业因素对 Virago 的绝对控制，继而导致了对 Virago 所具有“有色”思想的绝对压制，从而也使得 Virago 维持了“白人女性身份”的整体性。

最后，我还是要强调指出，Virago 选择翻译出版《马燕日记》，或许在事实上涉及相当复杂的原因。我有关 Virago “在效果上”迎合有关话语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根据的是《马燕日记》的内容，以及 Virago 对两个版本（淡绿版本和红色版本）的不同态度，而不是背后的现实过程。

第四节 本章小结

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的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某种再现。考虑到再现的建构性和政治性，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的翻译出版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了建构性和政治性。英美女性主义出版社选择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从而赋予她们走向世界的机会，固然令人欣慰，但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哪些文本被选择翻译，这里就涉及翻译选材的政治问题。

本章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了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和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这两个出版社同样具有包括“有色”思想/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却在其他方面体现差异。两者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也存在异同。

以下表格可供参考：

本章所考察的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	两个出版社的共同点	两个出版社在翻译选材方面的共同点	两个出版社的不同点	两个出版社在翻译选材方面的不同点
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 翻译出版严歌苓作品	①都具有包括“有色”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 ②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商业动机：Aunt Lute 偶尔也选择出版具有畅销潜力的文本；Virago 一贯选择具有畅销潜力的文本； ③都只翻译出版少量第三世界女性文本。	①（某些）选择行为本身在不同程度上，“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 ②选择行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迫）地参与了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	①非营利的独立的小型女性主义出版社； ②具有高度“有色”成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分裂主体性； ③在很大程度上出版有色女性文本； ④以边缘群体为目标读者。	Aunt Lute 作为“白人女性主体”所具有的“有色”思想/成分，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它的某些选择行为，“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抵制：一方面，没有试图通过翻译选材，建构一个纯粹凸显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话语；另一方面，所选择的小说呈现了多样化的中国女性形象。
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 翻译出版马燕作品			①附属的商业女性主义出版社； ②具有低度“有色”成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整体性； ③在很大程度上出版白人女性文本； ④以主流群体为目标读者。	Virago 作为“白人女性主体”所具有的“有色”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挥其作用，因为它的选择行为，“在效果上”，构成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选择的文本凸显中国女性是中国农村落后经济文化的受害者。

表 6：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Aunt Lute 和 Virago 所体现的异同

从上述表格可知，在涉及中国女性文本方面，Aunt Lute 和 Virago 的翻译选材体现了以下三点。

第一，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出版社对中国女性文本的翻译选材。作为一个非营利的独立的女性主义出版社，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具有高度“有色”成分的 Aunt Lute，“在效果上”，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构成了一定程度抵制（类似抵制可以是有意或无意的，主动或被动（迫）的）。比如，Aunt Lute 没有试图通过选择特定文本，从整体上建构一个纯粹凸显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话语，从而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主体分裂。

与此相反，作为一个隶属于大商业集团的商业女性主义出版社，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Virago 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没有构成对上述话语的抵制，为此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主体完整性。另一方面，Virago 在翻译出版第三世界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倾向，也支持和强化了这种主体完整性。

第二，总体而言，就选择行为本身而言，这两个包括“有色”成分的白人女性主义出版社，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显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者所具有“白色”的限制。也就是说，在“白色”和“有色”的较量中，“白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占了上风。从上文可知，这两个女性主义出版社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认同程度，在绝对意义上超过抵制程度。同样，这里的认同和抵制也可以是有意或无意的，主动或被动（迫）的。

考虑到 Virago 具有几乎“纯白”的“白人女性身份”（也就是说，“有色”成分如此之少，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 Virago 在很大程度上“显得”迎合了有关话语。但是，连具有“高度”有色思想的 Aunt Lute，也“显得”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上述话语，却是让人费解。正如我在上文指出，这也从侧面凸显西方霸权话语客观上的难以去除。

接下来，我们看看 Aunt Lute 和 Virago 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以及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认同程度，如何在绝对意义上超过抵制程度。

先以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为例。我承认 Aunt Lute 对该话语体现了一定程度抵制。但是，考虑到强调文革对女性极度迫害的《天浴》，是促使 Aunt Lute 决定出版严歌苓译文集的直接原因，考虑到同主题小说《白蛇》

是所出版译文集的标题小说，以及考虑到这两则小说还被置于译文集的最重要位置，我们可以认为，这意味着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凸显第三世界女性的受害者形象），在 Aunt Lute 这个实体身上占有最重要位置。至于 Virago，我也已在上文指出，它没有体现出对该话语的抵制。

再以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为例。如果说，Aunt Lute 还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体现了既迎合又抵制的立场，对于西方有中国的主流话语，Aunt Lute 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体现了迎合。Virago 更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对这一主流话语，均“显得”体现了迎合态度。比如，两者都翻译出版了可被用以辅助“反华”的文本：Aunt Lute 所选择的六分之四小说，都可以被认为涉及人权问题，其中涉及西藏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两篇小说，还与发行于 1997 年的好莱坞“反华”影片有类似之处；Virago 所选择的凸显中国贫穷落后的《马燕日记》，更是迎合了西方力图“揭中国之短”的意识形态。通过选择翻译特定的中国女性文本，这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迫）地）参与了西方“男性”领域的当代意识形态政治，即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

此外，我们还可以认为，在涉及中国女性文本的翻译选材方面，就相关选择行为本身而言，这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所体现出的对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迎合，超过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的迎合。这表明，在这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所具有的两个属性即“西方”和“女性主义”之间，前者压倒了后者。Mackerras (1999: 183) 曾指出，Said 的观点，即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首先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然后再是个人，至今还是有着一一定道理。同样，具有“白人女性身份”Aunt Lute 和 Virago，在某种程度上也先是“白人”，然后再是“女性”。

第三，“商业动机”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的“白色”，因为“商业动机”意味着把对接受语境的考虑放在第一位，从而翻译出版迎合西方主流话语和读者的文本。考虑到 Virago 把自己定位为商业女性主义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比较重视商业利润，后来又附属于大商业出版集团，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 Virago 选择翻译出版了，在很大程度上迎合西方主流话语的《马燕日记》。

但是，Aunt Lute 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与 Virago 相反，Aunt Lute 把自己定

位为一家非营利女性主义出版社，并以边缘群体为目标读者。但我已在上文指出，非营利女性主义出版社并非意味着这个出版社不重视商业利润，只是没有把商业利润当作首要目标。旨在出版具有重要政治意义文本的非营利女性主义出版社，往往有着不稳定的财政状况，而 Aunt Lute 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出版一个有畅销潜力（但不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文本，“资助”（subsidize）另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但不具太多畅销潜力）的文本的出版。

遗憾的是，有证据表明，Aunt Lute 似乎把严歌苓的 *White Snake and Other Stories* 定位为具有畅销潜力但不具重要政治意义的文本，希望这个文集能够为出版社营利。而 Aunt Lute 对严歌苓文集的商业定位，或许也促使该出版社在翻译选材方面体现出了迎合西方主流话语的倾向或姿态，从而在稀释该出版社“有色”成分的同时，强化了出版社的“白色”。

最后，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有关出版社迎合或抵制有关主流话语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基于选择行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现实过程。为此，我所谓的迎合或抵制，指的是有关选择行为所体现的某种“效果”，而不是选择主体（出版社）的真实立场以及选择行为的真实原因（这往往无从得知）。但是，尽管这两个出版社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迎合，我们需要承认这些出版行为的积极意义，毕竟不是所有第三世界女作者都有被翻译出版从而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第五章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扶桑》中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

在简述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时（第三章第一节），我曾指出后殖民女性主义一方面批评西方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殖民，另一方面推崇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在接着探讨如何通过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纳入翻译研究，从而有助于弥补被主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所忽略的研究问题时（第三章第二节），我曾强调以下研究问题：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如何翻译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本？这就是本章的重点关注对象。

出于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质疑和抵制，美籍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也试图在其作品中建构某种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有鉴于严歌苓所提出的女性主义观点不是特别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根本颠覆性，并与很多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者的看法不同（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观点），我把它称为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考虑到《扶桑》是严歌苓所有作品中最明显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文本，以及考虑到《扶桑》的美国白人女译者 Cathy Silber 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本章旨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考察译者在何种程度上容忍或抵制了严歌苓式女性主义，重点关注译者的白人女性身份（她的“有色”思想及其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认同之间的张力）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于翻译过程。

第一节 严歌苓的历史小说《扶桑》

《扶桑》取材于美国的早期华人移民史，背景是 19 世纪下半叶的唐人街，主角是华裔妓女扶桑。王德威（1996: vi-vii）认为《扶桑》是严歌苓所有得奖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并简介如下：

《扶桑》写的是由神女变女神的故事。主角扶桑是上个世纪中国乡间女子，辗转被拐卖到美国从事皮肉生涯。尽管身世悲苦，扶桑却能逆来顺受。送往迎来的日子里不知摧残了多少唐山女子，唯有扶桑婷婷玉立。扶桑的魅力诱惑了一个美国少年，并由此展开数十年的爱怨纠缠。而同时，她从小被许配的丈夫也以神秘的面目出现……。

作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文本,《扶桑》包含了东方主义、种族主义、西方主义、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等不同话语。这种复杂性取决于严歌苓的中国人身份(本土视角)和美国移民身份(西方视角)之间的张力。这是因为移民者往往被认为具有分裂的人格或自我(Ma 1998: 41-42),或是 Ang (2001: 194)所谓的“杂合间性”(hybrid in-betweenness),¹³⁶从而往往与在现居国文化中占主流的话语之间有着非常暧昧的关系。

一 《扶桑》中的多重话语

在谈及《扶桑》的多重话语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严歌苓本人对中美关系的认识。身处西方的中国作家往往对不平等权力关系敏感,居美多年的严歌苓也不例外。她多次提及中美不平等权力关系,以及美国人的屈尊俯就态度和拯救情结。

在 1989 年去美国留学之前,严歌苓曾受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邀请赴美访问,并期望见一些大作家,但到美国后发现事与愿违,为此在散文《一天的断想》中指出:“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和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1999b: 5-6)。严歌苓之后的长期居美生活,更使她深刻体会了种族差异及其带来的不平等关系。她曾在另一篇散文《FBI 监视下的婚姻》中指出,美国 FBI 对她的监视和调查使她意识到在美国做外国人只具有“次等人的人权”(1999b: 87)。¹³⁷

此外,严歌苓也曾在访谈中表示,她在美国的生活使她感受到不同包装的种族歧视,比如美国人的屈尊俯就和自我优越感,他们认为美国接纳那些来到美国的人就像上帝接纳“装在箩筐里的孩子”。¹³⁸

¹³⁶ Ang (2001: 194) 以自己的移民经历为例,指出“杂合间性”具有以下含义:既非真正西方人也非真正亚洲人;置身于西方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脱节;不在亚洲生活却总是对其怀有依恋。

¹³⁷ 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严歌苓,曾因和一个美国外交官(现任先生)恋爱结婚受到过 FBI 的调查和监视,使她感到自己只有“次等人的人权”。这是她在《FBI 监视下的婚姻》中论及次等人权的原话:“我是在美国懂得了‘人权’这字眼,而懂得之后,又必须对这个神圣的权力一再割让。亦或许,他们的人权是有种族条件的,对一个我这样的外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一层虚设的礼貌就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过来。[……]我已意识到在这里做外国人是次等人种;次等人的人权,自然质量分量都不足”(1999b: 86-87)。

¹³⁸ 严歌苓的原话如下:“我 1989 年底去的美国,很多时候其实还能感受到扶桑那个时代移民的种种滋味,移民的种种生活、情感问题也都还存在,种族歧视,对立依旧存在,只是已经转换成新的花样了,不容易辨认。比如美国人对我很友好,但这种友好很明显地让我觉得他们是优越的,是高姿态的。我碰到过一个美国学者,当他听说我是从中国过来的,马上对周围的人说,看啊多么神奇,一个装在箩筐里的孩子被冲到了我们的岸边,这是用的那个《圣经》里的故事。我当时就想,你们美国人把每一个到你们美国来的人

同上述这种变相的种族歧视关系密切的是美国（西方）的拯救情结，这也是严歌苓所强调的。她多次指出美国（西方）喜欢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构某种拯救者与被拯救者关系，并对此表示出极大反感，因为在她看来拯救意味着“弱化”被拯救者。¹³⁹

需要强调的是，严歌苓也把性别视角纳入上述反思，强调美国白人女性对中国女性的歧视。¹⁴⁰从这个角度看，严歌苓也具有后殖民女性主义意识。

严歌苓对自己身为当代中国移民体验的反思，促使她回望美国的早期华人移民史。当代美国尚且像她所经历的那样充满变相歧视，19 世纪的美国更是惨不忍睹。这也是她写《扶桑》的主要背景和动机。严歌苓曾在采访中指出，她写《扶桑》的目的在于“希望中国人看到自己在一个阶段、在人类当中被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希望中国人能够记住这样一段历史，像犹太人一样，能够自强”（引自雅非 2003）。

在明确严歌苓的主要创作动机后，现在来看看《扶桑》中的多重话语。《扶桑》对盛行于 19 世纪的美国东方主义话语进行了仿拟（从而抵制），比如凸显唐人街华裔妓女的异国情调如缠脚等。¹⁴¹严歌苓的反东方主义立场已被评论者承认。¹⁴²此外，《扶桑》也仿拟了种族主义话语，强化白人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包括美国女传教士对华裔妓女的歧视）。

除借助仿拟抵制上述“殖民”话语外，《扶桑》也建构了本身具有抵制意义的话语，包括西方主义和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正如东方主义刻板化东方人一样，所谓的西方主义也刻板化西方人，比如严歌苓在《扶桑》中多次讽刺美国人的拯救情结。¹⁴³同时，严歌苓也在《扶桑》中建构了旨在抵制主流西方女性

都当成箩筐里的孩子吗？主一样地接纳了他们吗？真是太荒谬了”（引自俞小时 2002）。

¹³⁹ 比如，严歌苓曾指出，在写《扶桑》时，她“对西方在文化上的沙文主义做了认真的思考，他们会本能地认为其他宗教、其他民族都是劣于他们的，他们离上帝最近，想当然地把自己看成是其他民族的拯救者。像今天的美国政府，他们好像不去拯救谁就不开心似的，他们的幸福感、成就感好像就是建立在有谁需要他们去拯救上。拯救其实就是把对方放在比自己弱的位置上”（引自俞小时 2002）。

¹⁴⁰ 可参考她的《栗色头发》等小说。

¹⁴¹ 比如，《扶桑》中有如下内容：“那女子以花汁染红指甲，以绛罗为肌肤；将血浸的西瓜子一粒粒填进嘴唇，用残缺的足尖走出疼痛和婀娜的步子”（1996b: 18）。

¹⁴² 比如，Feng（2000: 64）指出，严歌苓在《扶桑》中表明各种“异国情调化”（exoticize）亚洲女性的话语出自美国的官方记载，这证明她事实上致力于反东方主义；Kinkley（2002: 136）也认为《扶桑》传达了某种反东方主义信息。

¹⁴³ 比如，《扶桑》中有如下内容：“他仍想像自己是神话中的骑侠，有个遥远国度的美丽女奴需要他去营救。他得以剑斩断囿她于其中的罪恶”（1996b: 56）。严歌苓曾在访谈中指出，“过去好莱坞的电影里都妖

主义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这将在下文展开）。

上述这些话语在《扶桑》中的同时存在，使得这个文本体现了 Emberley(1993: 151) 所谓的“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因为严歌苓对东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仿拟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压迫者视角，而有关西方主义和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建构则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被压迫者视角。¹⁴⁴但是，考虑到其中所仿拟的压迫者视角事实上被用以颠覆“殖民”话语，在《扶桑》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严歌苓的民族自尊和抵制意识，为此中国民族主义是所有上述话语被仿拟或建构的主要动机。

二 《扶桑》的总体英译情况

《扶桑》的英译文于 2001 年由美国商业出版社 Hyperion East 出版，这是 Walt Disney Company 旗下 Hyperion 出版社的一家分社。该英译文于同年入围“洛杉矶时报 2001 年十大畅销书”之列，据说在美国还算畅销。¹⁴⁵这或许是因为《扶桑》所具有的“双重视野”，在体现异国情调的同时也体现政治正确，正如被认为同样体现异国情调和政治正确的 *The Woman Warrior*。¹⁴⁶

总体而言，《扶桑》的英译文体现了较大删改，并导致了风格上的变化。严歌苓在接受《文学报》采访时指出，“汉语的《扶桑》比较硬，现在英文版的比较软，而且删掉了 50 页，很多议论的东西都被去掉”，并表示去掉这些在她看来很重要的议论使得译文失去了原本的“大的气势，偏于阴柔”（引自俞小时 2002）。

就主题而言，《扶桑》英译文所删改的内容涉及我在上文提及的各类话语。当然，有些删改并非涉及某个特定话语。至于所有这些涉及不同话语的删改背后是否分别体现出某种特定规律，这不是本章篇幅所能涵盖的。

魔化东方人，正如今天我们有不少作品把西方人当猴来展现”（引自庄园 2006: 102）；事实上，她本人的某些小说包括《扶桑》也体现了“把西方人当猴来展现”的要素。

¹⁴⁴ 比如，在涉及中国男性形象方面，严歌苓一方面把男主角大勇塑造成西方人眼中的唐人街恶棍（类似于流行于西方的恶棍原型 *Fu Manchu*），另一方面把他塑造成抵制种族歧视的民族英雄。再比如，在民族文化方面，严歌苓一方面批评存在于唐人街的多种野蛮文化实践，另一方面则强调另一些实践的积极意义。

¹⁴⁵ 严歌苓在采访中指出，《扶桑》的英文版“在美国卖得很好”（王颖 2001: 201）。

¹⁴⁶ Ma (1998: 12) 指出，美国读者喜欢阅读体现异国情调和政治正确的文本，为此喜欢所谓的“人种志女性主义”（ethnographic feminism），比如被加于花木兰、观音菩萨等人物的女性主义，这种“人种志女性主义”也体现于 Kingston 的 *The Woman Warrior*。但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人种志女性主义”并没有背离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框架。

考虑到本研究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我主要关注《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问题。在此之前，我想先简单探讨我所谓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第二节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所谓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指代严歌苓有关何为真正女性主义和强势女性的观点，是她为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和实践而建构。西方女性主义根据是否强调两性差异分为两大阵营，包括强调两性相似性并以男性标准衡量女性解放程度的西方女性主义（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和强调两性差异并推崇女性文化和价值观的西方女性主义（以文化女性主义为代表）。在绝对意义上占主流地位的是前者。

在所有流派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受到最大认可，并且很多时候被等同于（西方）女性主义本身（Beasley 1999: 51）。一般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其中占据主流之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严歌苓也不例外。¹⁴⁷

本节将从五个方面探讨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包括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观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道家思想和佛教内涵，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主义，以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悖论。

一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抵制

严歌苓多次在散文、讲座、采访中强调了她有关西方女性主义（确切的说 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彼此关联的方面。为确保最大程度地传达她的观点，我尽可能引用原话。

第一，严歌苓不同意西方女性主义把女性定位为第二性。有关女性第二性的观点最先由法国女性主义者 Beauvoir（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并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严歌苓看来，这个第二性理论很误导人，因为该理论认为女性由于接受体的生理构造和防御位置而被认为是第二性。比如，

¹⁴⁷ 需要指出的是，严歌苓是作家不是学者，她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而有些也仅仅是她非常个人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看待学者的标准，看待严歌苓有关西方女性主义的认识。

她在 2006 年的复旦大学演讲中指出，波伏娃“讲‘第二性’，所谓男人是第一性，女人是第二性的这种说法，我是不愿意接受的。女人不能因为她首先是防御的位置，从性上面来讲，不能因为生理原因，她是一个被动的位罝就说女人是第二性”（严歌苓等 2006: 6）。此外，严歌苓在某次访谈中再次强调她有关女性为第二性的质疑，甚至否认了女性的被动性：

女性的阴柔、接纳、以守为攻不能说明她们被动，太极运动的退让、收敛全部是进攻的一部分，每一个向后的步伐和手势都潜藏着向前。因此不能说退就是被动，所以就是客体，就是第二性。我们中国人懂得太极中的辩证法，就明白阴阳的互存互动关系，就不会提出第二性之说。（引自楼乘震 2006）¹⁴⁸

第二，严歌苓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在把自己与男性对立起来的同时，强调两性相似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严歌苓在访谈中指出，“女性主义在西方，是非常偏执的一个概念。女性主义首先是男性的对立面[.....]。女性主义太咄咄逼人了，总是在要求和斗争，‘我们要和男人一样’。太傻了。女人和男人永远不一样，一样了反而可怕”（引自柏邦尼 2008）。西方女性主义把自己与男性对立起来，意味着把女性和男性放在同一个层面，并认为女性主义需要建立在对抗男人的基础上。相反，严歌苓认为真正的女性主义意味着把女性放在比男性高的一个层面，认为男性是女性包容施舍而非抵制对抗的对象。此外，针对西方女性主义通过强调两性具有同样理性能力，而认为女性要在各方面与男性平等的观点，严歌苓则强调两性差异和女性特点的价值。

第三，严歌苓质疑西方女性主义应对男性的策略，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公开抵制运动和政治化在引起男性警觉的同时没涉及本质。她以美国 60、70 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包括其中的“烧胸罩”（bra-burning）为例，强调了她的看法。

¹⁵⁰在严歌苓看来，很多西方女性主义者以男性思维为中心，因为她们：

只注意到女性被凌辱被损害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女性在被凌辱被损害过程中所可能获得的享受，将使得凌辱和损害不再是凌辱和损害]，于是号召女性烧掉乳罩剪掉头发借以除掉那些女性的外在物征，似乎这就是女权主义了，其实这是个傻想法，因为在实质上女性并未改变被动体的位置，

¹⁴⁸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波伏娃的《第二性》确实分析了两性在生理方面的主动与被动差异，但这一专著往往被认为旨在说明女性的第二性或其他地位，在更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而非生理因素。为此，对于严歌苓在很大程度上从生理角度理解第二性理论，不免有争议之处。无论如何，她的抵制立场是明确的。

¹⁵⁰ 在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某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包括胸罩在内的物件象征父权限制，为此建议“烧胸罩”以示抵制。

只有反过来思考反过来行动，以守为攻，才变被动为主动。¹⁵¹（引自李硕儒 2001: 78-79）

严歌苓之后再次强调指出，美国 60 年代的女权运动表明，有些女性“不懂得真正女性主义是这样的女性，是非常有力量的，是极其坚韧的。不是像她们把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越是作为政治主张有时越不堪一击”（引自王红旗 2007）。可见，严歌苓所欣赏的女性主义一方面讲究策略，不是大张旗鼓而是暗中颠覆，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受而不垮的女性。

事实上，严歌苓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反感和抵制并非特例，而是一种在第三世界女性中较为普遍的情况（可参考第三章第一节）。比如，Mikell（1995: 406）指出，非洲女性非常不喜欢西方学者和激进主义者试图将她们拉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因为后者在她们看来体现了“极度的个人主义、与父权的激进对抗、对男性的敌意”。

考虑到西方在女性主义方面的霸权已使得女性主义这个术语“臭名昭著”，美籍非裔女作家 Alice Walker 甚至还主张用维护全人类利益的“女人主义”（womanism）取代女性主义。尽管严歌苓也偶尔暗示对女人主义这个术语的认同（柏邦尼 2008），但她还是认可了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本身：“我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2005: 48）。

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反思和抵制，严歌苓在其作品中建构了她自认为“狡猾”从而也更“高明”的女性主义，而这种女性主义最明显体现于《扶桑》，正如她在批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男性中心思维后指出，“我就是想通过扶桑的形象，写出我对[西方]女权主义的这种思考”（引自李硕儒 2001: 79）。

二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观点

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及了她有关两性差异的看法：“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

¹⁵¹ 严歌苓还在散文《十年一觉美国梦》中指出：“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去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2005: 48）。

情，慈悲，了解，安息。”针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有关两性相似性的强调，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强调张爱玲所强调的上述差异，并推崇她所谓的女性本性。

总体而言，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强调和赞美体现为雌性的女性本性，认为真正的女性主义意味着给女性本性赋权，而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是那些包容男性/男权实践，在其中得以存活并最终在精神层面“征服”后者女性。具体而言，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主要体现于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对雌性的推崇。严歌苓在散文《雌性之地》中指出，“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雌性包涵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雌性更含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1999b: 182），并在另一篇散文《性与文学》中把雌性等同于母性，同时强调内在于雌性的牺牲精神（1999b: 158）。除自我牺牲外，严歌苓所推崇的雌性还包括善良、慈爱、宽恕、承受、隐忍、坚韧、自然原始等她认为是女性本性的品质。雌性最集中体现于母亲，而严歌苓对雌性的推崇意味着对母亲身份的推崇。

事实上，严歌苓对雌性的提倡是针对当代文明贬低女性本性的事实。以善良为例。严歌苓在散文《弱者的宣言》中指出，善良越来越多地被等同于愚蠢、软弱、“人类前期文明遗留下的缺陷”，取而代之的是绝不吃亏让步和牺牲自己（1999b: 171-172）。在她看来，文明的发展事实上意味着退步，为此提倡雌性回归。

第二，强调并赋权给雌性中心理/精神层面的宽恕和怜悯等品质，并在此过程中逆转了常规意义上的强（压迫者）和弱（被压迫者）关系。具体而言，严歌苓尤其强调她认为内在于雌性的宽恕和怜悯，并指出类似品质使得女性比压迫她们的男性更为优越强大。¹⁵⁴类似品质就是李文杰（2007: 15）所谓的“女性的精神性”，体现为对人类灵魂的拯救，尤其是对“男性心灵的洗涤和宽恕、被男性心理所依赖的强大力量”。严歌苓为此从理论层面逆转了传统意义上的强弱关系，因为正如乔以钢和刘堃（2007: 93）指出：“在宗教和伦理学的意义上，宽恕的主体相对于宽恕的对象是一种强势的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的强势。”

第三，强调雌性中生理/物质层面的承受性，在两性关系中推崇女性以受/守为攻和以柔克刚的哲学。这里可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首先，严歌苓推

¹⁵⁴ 比如，严歌苓在《弱者的宣言》中指出，《少女小渔》中的小渔“对处处想占她上风、占她便宜的人怀有的那份怜悯使她比他们优越、强大”（1999b: 175）。

崇女性的接受和承受，主张以受为攻，即“在接受中消融，在接受中享受”（引自李硕儒 2001: 79）。其次，严歌苓推崇女性的阴柔防守，主张以守为攻。她用太极运动对此作出解释：“太极运动的退让、收敛全部是进攻的一部分，每一个向后的步伐和手势都潜藏着向前”（引自楼乘震 2006）。可见，在严歌苓看来，常规意义上被认为被动的受和守在本质上都是某种进攻方式。

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有关女性第二性的看法基于女性的受/守及其所导致的客体身份，严歌苓试图通过强调受/守的进攻本质而赋予受/守者以主体性，从而抵制有关女性为第二性的说法。此种意义上的以受/守为攻在很大程度上可被理解为以柔克刚。为此，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者借助她们的受/守得以在男性世界中存活，成为严歌苓所欣赏的真正“女强人”。

第四，强调并赋权给雌性中的自然原始即拒绝理性和意识，通过否认和解构各种把女性定义为受害者的概念达到给女性赋权的目的。比如，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者没有把当代文明所普遍认同的女性迫害行为包括性剥削、性侵犯等，当成是对女性的迫害，由此使得自己在经受类似体验时能超越受害者身份。

可见，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从本质上而言，“不是参与男性世界的争斗，而是从男性二元对立的处境中解脱出来，恰恰是将自身的雌性因素完全的发挥”（缪丽芳 2006: 91）。

为此，张扬雌性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者，即严歌苓眼中的理想女性，往往“很浑然，也很单纯，面对一切，承受一切，始终尊严，宽恕，悲天悯人”，并“始终在爱，在给，而从不‘要’，不索取。她们有血有肉，有肤色，有温度，越浑圆越好。她们只是在生活，从不分析”（引自柏邦尼 2008），“看上去迟钝但内心藏着一种英明，她们不和男人、不和这个世界一般见识，在混沌的境界中有大智慧”（引自 Mianhuatang 2006: 264）。显然，严歌苓笔下的这些女性主义者形象，跟当代主流文化中女战士般的西方女性主义者形象背道而驰。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反直觉的，尤其是对女性受难的歌颂和合理化。另外，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也似乎违反了有关性别政治的常识性看法，但所谓的常识只不过是某种霸权作用的结果，正如真理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当权者所建构的话语。

Dirlik（1997: 98）曾指出：“以拒绝被世界的现代和理性主义同质化为名，颂扬现代前过去，会导致某种因为考虑资本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压迫，而忽略

过往压迫的地方主义或‘第三世界主义’。”从 Dirlik 的视角看，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似乎也是某种“忽略过往压迫”的第三世界主义。当然，严歌苓本人或许认同其中的第三世界主义，但不会接受其中的“忽略过往压迫”，因为她的女性主义已解构了常规意义上的压迫概念。

三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道家思想和佛教内涵

不难看出，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旨在探索源于非西方文化（确切的说，中国文化）的女性抵制方式。正如 Yeğenoğlu (2003: 558) 强调，女性能动性（从而什么行为具有女性主义意义）最终来源于有关女性的自身文化，严歌苓也试图证明这一点。相对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对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的依赖，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则体现了道家思想和佛教内涵。考虑到道家、儒家，和佛教一起，构成中国文化的根基，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也为此体现了某种“中国性”或“东方性”，¹⁵⁵而这也是严歌苓式女性主义针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抵制意义之所在。

（一）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不同于作为某种宗教的道教，尽管两者均称“Taoism”。该流派主要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普遍被认为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格。道家思想博大精深，但也有着核心观点。以下是我认为跟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相关的观点。

第一，道家推崇雌性原则，并推崇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等辩证。道家对雌性的强调和推崇已获得较大认可，¹⁵⁶这尤其体现于老子的《道德经》。个别学者还把道家对雌性的强调与中国历史上的母系社会相联。¹⁵⁷具体而言，道家推崇常规意义上被认为处于弱势并与雌性相连的概念，包括无、守、退、柔、虚、静、辱、贱、愚等，强调上述概念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这也是老子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即什么都顺其自然（或顺从）却在此过程中什么都实现。这意

¹⁵⁵ 陈思和 (2006a: 28)、李淑 (2008: 41) 等都表达了类似看法。

¹⁵⁶ 当然，也存在异议。比如，在 Laughlin 和 Wong (1999: 162-163) 看来，认为道在本质上为雌性的看法忽视了道家的核心观点即阴阳平衡和两极互补。

¹⁵⁷ 比如，Chen (1969: 401) 指出，体现于《道德经》的道家思想很可能受到母系社会的启发。

味着行为主体需要“具有涵容性和承受力，能够忍辱负重”，而其中的承受力跟力量成正比（李炳海 1992: 6）。

道家对雌性原则的推崇，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第一个观点，即推崇温柔、善良、承受、隐忍、牺牲等严歌苓所认为的雌性特点/女性本性。

另一方面，道家有关柔弱与刚强等之间的辩证，¹⁵⁹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第三个观点，即主张在两性关系上以受/守为攻。正如老子推崇往往被赋予弱势地位的雌性特征以强势力量一样，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主义者也正是充分利用其柔弱和顺从的雌性特征，而体现了强大生命力。张琼（2004: 67）为此指出：“深沉的、阴柔的、甚至被严歌苓戏说为狡猾的‘女性主义’在她的作品中俯首皆是。也确实使她作品中的许多女性在作为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的同时却具有了悖性的强势力量。”

第二，道家推崇主体客体之间界限的取消。这尤其体现于庄子的“物化”思想。“物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忘掉他人、忘掉外物、忘掉自己得以实现，忘掉他人表示“超然于人我之分”，为此能做到“别人对自己敬之不喜、侮之不怒”，忘掉外物表示听任客观事物自然发展而不加干涉，忘掉自己表示超越自己的感觉和理性，为此“物化”意味着主体对自我的舍弃（李炳海 1992: 115-117）。

第三，道家推崇公平看待和对待所有人和物，而不加任何是非、善恶、高低、贵贱等判断。这尤其体现于庄子的“齐物”思想，他认为从宏观长远的角度看，任何看法和判断都是片面暂时的，因而是徒劳的。为此，代表着某种宏观观照方式的“齐物”意味着“站在道的高度审视世界，就像严正的君主，没有任何偏私；又像被人祭祀的社神，它并无特殊的保护对象”（李炳海 1992: 259）。从这个角度看，“齐物”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任何人为概念类别等的摒弃，从而也是对理性意识的摒弃。

第四，道家追求绝对的心灵和精神自由，即主体不受任何道德、情感、荣

¹⁵⁹ 比如，《道德经》的第七十六章包含以下内容：“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八章也包括类似内容：“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除了在柔弱和刚强之间进行辩证之外，老子也进行了其他层面的辩证。比如，《道德经》的第四十一章有以下内容：“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四十五章则有如下内容：“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辱等要素的束缚。这可通过道家所提倡的“应而不藏”得以实现，即主体在被动顺应外界的同时，并没有让外界在心灵留下任何痕迹，从而保持心灵的冲虚和无意识状态（李炳海 1992: 193）。

上述三个观点（第二、三、四）均凸显了道家对传统和常规、意识和文明的抵制，以及对自然和原始的推崇。Clarke（2000: 184-185）为此指出，道家思想抵制了西方哲学话语中的核心假设，并认为这个思想流派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后现代思想，比如两者都质疑了有关理性和真理的观点、文明生活本身等。道家对文明的抵制涉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第四个观点，即推崇自然原始，通过否认和解构各种将女性定义为受害者的文明概念，达到赋权女性的目的。

（二）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佛教内涵

考虑到帝国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合谋，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把宗教视为文化差异而非文化工具（Spivak 1993: 194），很多抵制霸权的第三世界女性借助本土宗教给女性赋权。严歌苓偏爱佛教，其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¹⁶¹而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佛教思想。尽管佛教同道家一样博大精深，但其中同样有着一些公认的核心观点。以下是我认为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比较相关的观点。

第一，佛教推崇宽恕、怜悯、慈悲。在佛教中，宽恕、怜悯、慈悲等是给主体赋权的概念。以怜悯为例。正如 Klein（1995: 109）所言，在佛教中，对众生的怜悯以及所怜悯的众生是获得觉悟和佛境的根本原因。

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第二个观点，即强调并给雌性中心心理/精神层面的宽恕和怜悯等品质赋权，并在此过程中逆转了常规意义上的强（压迫者）和弱（被压迫者）关系。考虑到一个怀有宽恕、怜悯等心态的人是在向佛靠近，严歌苓笔下那些对男性（压迫者）心怀宽恕怜悯等的女性便具有了强者身份，从而具有了女性主义意义。

第二，佛教宣扬平等。具体而言，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佛性平等、性相平等、怨亲平等（刘贵杰 2006: 342）。这里的怨亲平等意味着大乘佛教所主张的四无量心中的“舍”心，即舍弃一切差异而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任何人包括朋

¹⁶¹ 这是严歌苓的先生 Walker 提供的信息。

友、陌生人、仇敌等。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忍辱”，即为坚守佛法忍受任何苦难侮辱而不怀怨恨之情。¹⁶³

第三，佛教强调苦难。这是佛教四圣谛中的苦谛，即认为人生皆苦，并认为痛苦的原因在于“五取蕴”，是五蕴包括色、受、想、行、识和执着相结合的结果。佛教认为，摆脱苦难的其中一个出路在于灭绝贪（欲望）、嗔（怨恨）、痴（不明人生实相）。

第四，佛教强调“无我”。具体而言，佛教认为“我”指代恒常的、能自我主宰的自在实体，并否认这种实体的存在，这是因为“一切存在现象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舍离各种因缘关系，所有事物也就不存在了”（刘贵杰 2006: 44）。Rahula 指出“自我”概念的危害性：“根据佛陀的教法，自我的观念是一种想象的、虚假的信念，它并没有相应的真实性，而且它会产生有害的想法，诸如‘我’、‘我的’，以及自私、贪婪、憎恨、恶意、自负、骄傲、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其他污点、不洁等问题”（引自阿部正雄 2003: 29）。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的消解。

上述三个观点（第二、三、四）均强调舍弃自我，包括接受他人所施加的任何苦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第三个观点，即强调雌性中生理/物质层面的承受性，在两性关系中推崇女性以受/守为攻和以柔克刚的哲学。从严歌苓的视角看，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男性施与她们的难和苦时，要以佛教的态度对待。为此，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淡然地接受各种各样的苦，并忍受和承受男性对她们的任何欺负和侵犯，颇有唐朝佛教僧侣拾得的风范。¹⁶⁴考虑到在佛教中，接受苦难不是自虐，而是一种觉悟和向佛靠近的体现，上述女性为此也摆脱了弱者身份。

综上所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确实体现了道家思想和佛教内涵。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之所以为女性主义，在于它一方面借助了道家中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借助了佛教中有关宽容怜悯的强调，前者使得女性及有关特质由弱转强从而胜过男性，后者使得女性在精神境界层面超越和优于男性。不难看出，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视角看，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体现出了很大的“他性”。

¹⁶³ “忍辱”是大乘佛教所提出的六度之一。

¹⁶⁴ 拾得与唐代诗僧寒山的对话（所谓的忍耐歌）人尽皆知：“昔日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维基百科）。

四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主义

在这一部分，我将简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主义的关系，以确定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中的代表性或边缘性。

中国女性主义有着中国特色，体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总体而言，男性和民族/国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男性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妇女运动的主导力量，即乔以钢（2007: 9）所谓的“与男共舞”的历史传统。这为此不同于由女性发起和主导的西方女性主义运动。比如，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最初提出要关注中国性别问题同时主张反封建的大多是男性。另一方面，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与民族革命和国家政权息息相关。确切的说，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民族和国家事务，没有自己的独特身份和地位。比如，妇女解放问题之所以得到重视，有时是因为民族革命需要女性摆脱束缚参与其中。这也是为什么李小江指出，“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妇女解放在中国，似乎从来就不是妇女自己的事”（引自丁宁 2007: 5）。

第二，总体而言，中国女性主义是“微笑的女性主义”。这是由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丛刊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定位。所谓“微笑”，表示中国女性主义不像西方女性主义所给人的激进对抗印象：“它探讨女性问题，关怀两性的和谐发展，并最终关注‘人’这一永恒命题”（参考该丛刊封二）。这跟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土壤相关，包括两性合作传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儒道的影响等。

但是，尽管有着上述中国特色，中国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相一致。比如，就中国“女性主义作家”而言，大多数作家包括虹影、陈染等所主张的，事实上均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基本观点。这意味着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中国女性主义，而严歌苓为此也与很多中国“女性主义作家”相异。为此，我们或许不能说“虹影式女性主义”或“陈染式女性主义”，因为她们的的女性主义没有很大特色，但我们却可以说“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因为她的女性主义无论在中国语境还是世界语境都属“另类”。

五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悖论

对某些西方霸权话语的抵制有时不得不以自我东方化为基础，从而有自我东方主义之嫌，这是一个悖论。同样道理，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在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的同时，也在某些层面体现了自我东方化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她对道家和佛教的借用。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是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

Dirlik(1996)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探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上述悖论。基于 Mary Louis Pratt 所谓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即来自不同地方和历史时期的人相互接触并建立不平等、冲突等关系的地带，Dirlik(1996: 112-113)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正是源于那些产生自接触地带的知识分子。(移民美国的严歌苓也正是这么一个知识分子)。考虑到民族主义基于自我本质化和自我东方化，Dirlik(1996: 114)继而指出，“自我本质化[自我东方化]或许有助于抵制西方统治，但同时也因为内化东方主义的历史假设强化西方意识形态霸权”。针对受西方霸权困扰的第三世界(中国)，Chow(1991a: xi; xv)也不提倡回归“纯粹的族裔起点”(pure ethnic origins)，因为这种通过强调非西方(中国)差异和价值而借以抵制西方的方式，还是意味着对西方的“致敬”(homage)。

按照 Dirlik 和 Chow 的上述逻辑，旨在抵制基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借助道家和佛教思想凸显中国/东方差异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最终无法做到成功抵制。

然而，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是否能真正达到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的目的，并不是我所关心的，我也同样不关心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或可行性。但是，我肯定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具有理论层面的抵制意义。考虑到在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下，西方女性主义者越来越注意避免对第三世界女性进行话语殖民，并越来越重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价值，我更关注西方女性主义者能在何种程度上辨认出或承认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中的女性主义，能在何种程度上容忍这种他者的声音或是 Chow(1995: 65)所谓的“对抗西方的他性”(oppositional alterity to the West)。

接下来的一节将考察集中体现于《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情况，

重点关注译者的白人女性身份（她的“有色”思想及其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认同之间的张力）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于翻译过程。

第三节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扶桑》中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

从上文可知，严歌苓明确表示她写《扶桑》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想借助扶桑写出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思考（确切的说应该是抵制），而在她的所有作品中，《扶桑》也最明显体现以雌性为根基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在散文《性与文学》中，严歌苓（1999b: 158）指出扶桑体现了“一种只有古老东方才有的雌性，是‘后土’式的雌性，不可能被任何文明和文化所‘化’的雌性”。最重要的是，严歌苓强调扶桑的女性主义意义，指出扶桑与茶花女尽管都身为妓女，却不相同：扶桑是一个“胜利人物”和一个“强于男人的女性主义者”，比如她有一种“崇尚自由，不愿从一，享受肉体”的现代精神，而茶花女是一个体现懦弱和牺牲的“悲剧人物”（雅非 2003）。

具体而言，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意义主要体现在五个密切联系的方面，包括扶桑的母亲意象，扶桑的宽恕，扶桑的以受为攻，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以及扶桑的女菩萨形象。

在考察《扶桑》的译者 Silber 如何在翻译中处理上述五个方面之前，¹⁶⁵有必要先了解 Silber 的个人背景，以及她与 Hyperion East 主编之间的合作。

一 美国白人女译者 Cathy Silber¹⁶⁶

有着犹太血统和意大利血统的美国白人女译者 Silber，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亚洲语言和文化系，是一个精通中文的女性主义学者和译者。她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若干年：1985 年和 1986 年间，在内蒙古的包头师范学院（原包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担任英语教师；1986 年和 1989 年间，在北京外文出版社担任编辑/翻译；1988 年和 1989 年间，在湖南收集有关女书的资料。

¹⁶⁵ Walker 告诉我，Silber 之所以成为《扶桑》的英译者，是因为严歌苓看过她以往的译作并认可其质量后，主动找她翻译。

¹⁶⁶ 除非特别注明，本章接下来有关译者 Silber 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私下交流。

(一) 译者 Silber 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实践

Silber 曾是一个汉学家/学者，也曾是一个译者；但不久之前已从学术领域退出，并已基本停止翻译实践。

1 Silber 的学术研究

Silber 在 1995 年博士毕业后曾分别在 Iowa State University (1995-1997)、Williams College (1997-2003)、Hamilton College (2003-2007) 担任过助理教授。

作为一个精通中文并对女性写作感兴趣的学者，Silber 撰写了有关中国女书（流传于湖南某些地方并仅由女性撰写和阅读的文本）的学术文章（1992; 1994b; 1995a 等）和博士论文（1995b）。¹⁶⁷Silber 的博士论文 “Nüshu (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事实上涵盖了其所发表的有关文章。从她的博士论文前言（1995b: vi）可知，Silber 的其中一个选题动机，在于意识到当时继续研究中国女书的学者都是男性，而她认为这是女性应该做的事。除女书之外，Silber 也撰写过有关中国女作家的学术文章，如 “Literature: China”（2000）。最后，Silber 也发表过有关中国文化的学术文章，如 “Privacy in *Dream of Red Chamber*”（2002）。

Silber 曾拿过的奖项包括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Fellowship (2000)、Bunting Fellowship (2000)、Radcliffe Research Partnership Award (2000)、Faculty World Fellowship (2000)。

2 Silber 的翻译实践及其有关翻译的看法

Silber 也曾是一个译者。她曾在中国的外文出版社担任编辑/译者（1986-1988），之后继续从事翻译，所英译的男作者包括王蒙、¹⁶⁸钱刚、¹⁶⁹孙

¹⁶⁷ “A 1000-year-old Secret”（1992）刊登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杂志 *Ms.*；“From Daughter to Daughter-in-Law in the Women’s Script of Southern Hunan”（1994b）收集于论文集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由美国的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Women’s Writing from Hunan”（1995a）收集于论文集 *China for Women: Travel and Culture*，由美国的 The Feminist Press 出版。

¹⁶⁸ 王蒙，中国作家。Silber 与 Deirdre Huang 合译了 *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1989），由中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

¹⁶⁹ 钱钢，报告文学作家及记者，现任职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Silber 与 Nicola Ellis 合译了 *The Great China Earthquake*（1989），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见喜、¹⁷⁰冯骥才等，¹⁷¹女作者包括吴藻、¹⁷²鲍之兰/鲍之惠/鲍之芬、¹⁷³丁小琪、¹⁷⁴苏青、¹⁷⁵严歌苓等。除此之外，Silber 也翻译了不少女书文本，但大多数没有发表或出版。Silber 参与翻译的丁小琪小说集 (*Maidenhome*)，还于 1994 获澳大利亚翻译奖 (The Dinny O’Hearn/SBS Priz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在 Silber 所翻译的女作者里，丁小琪、苏青、严歌苓属于同一个类别，均是中国现当代女作家。通过考察 Silber 所翻译的丁小琪和苏青的文本 (严歌苓文本的翻译情况将在下文详细探讨)，我发现她的翻译总体而言较为忠实。

作为一个译者，Silber 对翻译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第一，她觉得应该翻译值得翻译的文本，比如好的、具有文学价值的文本，这些文本能被她所理解，并能让她产生共鸣。比如，当 Silber 还在外文出版社担任翻译时，出版社曾建议她翻译国际青年年获奖短篇小说选，但她认为这些小说比较幼稚，为此建议出版社不要实施这个翻译计划。第二，她试图在翻译中重现阅读体验，试图使英文读者获得与中文读者类似的体验 (但她承认这个原则不无问题)。第三，她认为从理性上讲译文需要“延伸”英语，为其注入新要素，但考虑到文学市场的现状、英语霸权，以及美国人的阅读习惯，译文最重要的还是具备可读性，这就使得那些期望所译作品获得出版的译者进行自我审查。第四，她认为文学译者也应该是作家，有着作家的能力、敏感等。不难看出，Silber 对翻译还是有着一定认识，这或许跟她曾经教过两门翻译课程 (Translation Workshop;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Stories) 相关。

以上是有关 Silber 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实践的简述。

但是，自 2007 年以来，Silber 从学术领域退出，并且也已在很大程度上停

¹⁷⁰ 孙见喜，中国作家。Silber 与 Denis Mair 合译了“Jia Pingwa and His Fiction”，收集于 *The Time is Not Yet Ripe* (1991)，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¹⁷¹ 冯骥才，中国作家。Silber 所英译的作品是“*They Who Have Suffered Greatly*”，收集于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91)，由美国的 Pantheon Books 出版。

¹⁷² 吴藻，中国女词人 (清朝)。Silber 所英译的作品包括“*Song in Sixteen Words*”、“*To the Tune of ‘Tung Hsien Ko’*”、“*On a Picture of Self With Hoe, Cultivating Plum Blossoms in Moonlight*”，收集于 *The Literary Review* (1989)。

¹⁷³ 鲍氏三姐妹，中国女诗人 (清朝)。Silber 所英译的作品，包括鲍之兰的“*Sunset*”、“*Pear Blossoms in the Next Yard*”、“*Spring Sacrifice*”，鲍之惠的“*Sleepless*”、“*Sitting Up at Night*”、“*Thoughts on a Rainy Day*”、“*Going by the Old House*”，鲍之芬的“*Getting Through the Summer*”、“*Out on a Boat, Facing the Moon, Thinking of My Brother and Sister-in-Law in the Capital*”、“*On Hearing a Flute*”，收集于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1999)，由美国的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¹⁷⁴ 丁小琪，澳籍华裔女作家。Silber 所英译的作品包括“*Indica, Indica*”、“*Killing Mom*”、“*Black Cat*”，收集于 *Maidenhome*，先后由澳大利亚的 Hyland House Publishing (1993)，以及美国的 Aunt Lute Books (1994) 出版。

¹⁷⁵ 苏青，中国女作家。Silber 所英译的作品是“*Waves*”，收集于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1936-1976* (2005)，由美国的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止翻译实践，尽管她一如既往地热爱翻译。Silber 转而从事的工作跟“倡导”（advocacy）相关，这个转变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她不再对教中文感兴趣，而开始对美国社会文化感兴趣，但她的专业决定了她不可能找到美国社会文化方面的学术职位。第二，她感到她作为一个教授不是特别具有影响力，感到不再喜欢只与少数人分享她所“生产”的知识。Silber 的这些观点形成于美国前总统布什执政时期，因为她发觉布什政府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破坏，包括阿富汗战争、入侵伊拉克、能源政策等，并认为自己有必要为停止这个破坏做应该做的事情。为此，当还在大学当全职老师时，Silber 就曾在业余期间加入各种“政治”团体，包括 Town of Kirkland Democratic Committee（2004-2005）、MoveOn.org: Democracy in Action（2005-2006）等，并意识到这才是她想要的全职工作。

总体而言，从学术领域和翻译实践活动中退出后的 Silber，最感兴趣的是为“正义”而战，用语言改变人们的思维。她致力于旨在争取“经济公正”（economic justice）以及反对种族歧视等的工作，包括结束伊拉克战争、帮助非洲难民、维持儿童医疗保健基金、改革金钱主导的竞选体系、改革剥削穷人的税收政策等，所服务过的机构包括 New Hampshire Citizens Alliance（2007-2008）、Coalition for Open Democracy（2008-2009）等。

（二）译者 Silber 的白人女性身份

从第四章可知，在后殖民语境下，当今的白人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分裂的，因为白人主体往往认识到自身特权，并意识到需要抵制白人至上话语和实践等。美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 具有包括高度“有色”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体现了较为明显的主体分裂性，而英国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 则具有包括低度“有色”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立场的统一，这都体现于两者的翻译选材行为中。译者 Silber 在这方面更接近 Aunt Lute，因为她也是具有包括高度“有色”思想/成分的白人女性。但是，正如上述两个出版社某些时候无法抵制有关主流话语而最终迎合一样，译者 Silber 也体现了类似处境。

1 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

我在第四章指出，广义的“有色”思想指代对霸权话语和实践的抵制，以及对“他者”（包括话语和实践）的尊重和认可；狭义的“有色”思想指代对白人至上话语和实践的抵制，以及对“有色他者”（包括话语和实践）的支持和认可。总体而言，汉学家/译者 Silber 具有高度的“有色”思想，这体现于她的学术文本和政治实践。

第一，Silber 的“有色”思想体现于她的学术文本。她明确表示了尊重他者的立场。在博士论文中，Silber (1995b: 2-3) 谈及了她有关话语殖民的认识。Silber 表示她认同 Mohanty、Ong 等（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后者指出有关研究者倾向把自己的斗争体验和关注对象强加于“文化他者”，并倾向用自己有关女性主义、压迫、抵制的观点来判断所研究对象的生活和行为。在 Silber 看来，这就是 Mohanty 所谓的“话语殖民”，并认为这最明显体现于西方学者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文本，以及上层阶级学者有关本国底层阶级女性的文本。Silber 继而指出，话语殖民意味着研究者将文化他者描述得比研究者本人更受压迫（将其建构为受害者），或“浪漫化”（romanticize）他们的抵制（将其建构为英雄）。¹⁷⁷Silber 表示，在美国媒体对 1989 中国天安门事件的描述中，对抵制的“浪漫化”以及美国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标准，使得示威者成为“美国式自由斗士”（American-style freedom fighters），为此抹煞了他们的历史文化特性。Silber 还指出，有关湖南女书构成某种女性主义行为的普遍假设，也体现了对抵制的“浪漫化”。Silber (1995b: x-xii) 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为例，证实了类似“话语殖民”的存在。她曾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杂志 *Ms.* 写过有关女书的文章，强调女书只是被当地文化所认可的女性（而非女性主义）行为。但是，编辑“篡改”她的文稿，将她原本的“**Like most men in Shangjianxu, Yi's grandfather didn't object to nüshu—it was just something women and girls did, like embroidery. He did forbid her to write that letter, though**”，改成“**Yi's grandfather didn't object to nüshu. He did forbid her to write that letter, though; for other women nüshu was an act of resistance for which they faced threats of violence and outright battering**”，这一方面使得男性对女书的认可成为个别情况，

¹⁷⁷ “浪漫化”抵制意味着认为“所有形式的抵制体现了权力体系的有效，以及拒绝被统治的人类精神的适应力和创造力”（Lila Abu-Lughod，引自 Silber 1995b: 2）。

另一方面使得女书从实际上的合法行为转变成某种反叛行为。¹⁷⁸当 Silber 对此捏造表示抗议时，编辑表示她们不希望中国女书只是某种绣花般的女性行为。

（这些编辑似乎希望女书是西方女性主义意义上的行为。）有鉴于此，Silber 做博士论文的其中一个目的，正是为了尽可能勾勒女书的历史文化特性（1995b: 8），避免对女书进行 Ms.编辑等实践的话语殖民。

在为丁小琪的译文集 *Maidenhome* 所做的序中，Silber 指出，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之间存在差异。比如，在谈及如何理解 *Maidenhome* 所收集的小说时，Silber 表示：“我们需要将丁的作品置于其自身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认识到中国女性主义运动所关注的某些问题，并不存在于其他国家的女性主义政治议程”（1994a: xii）。这里的“其他国家”很大程度上指代西方国家。

除了在性别问题方面体现对他者的尊重之外，Silber 在其他方面也体现了类似立场。比如，在“*Privac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文中，Silber 明确指出，“为避免单单寻找我本人关于私的理解，强加源自我本人所属文化有关私的概念，这一篇涉及中国文化中私的机制和内容的文章，将通过考察对私的控制如何被威胁、削弱、丧失的例子，来间接考察中国文化有关私的概念”（2002: 55-56）。在引用《红楼梦》英译本中体现“私”的段落时，Silber 还关注译文是否强加了西方有关“私”的假设，并指出译文有时确实有上述“强加”之嫌（2002: 59）。

第二，Silber 的“有色”思想也体现于她的政治实践。从上文可知，Silber 参与各种政治团体，致力于为“正义”而战，如为各种“他者”谋求利益，包括被美国“欺凌”的国家、有色人种、穷人等。

不难看出，Silber 有着强烈的尊重他者的意识。这跟她的汉学家背景相关，因为汉学家研究的就是他者语言和文化。另外，在我看来，这还跟她本人的他者体验相关。比如，她认同犹太人文化身份，而犹太人往往被认为有着文化他者的处境。按照 Silber 本人的看法，他者体验跟她本人从小到大以来的迁移相关，为此很多时候因为是新来者而被边缘化，也跟她 80 年代在中国的居住体验（内蒙古、北京、湖南）相关，因为她是当地少数外国人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外国人。

¹⁷⁸ 这段话中的 Yi 是个中国女书作者，她想写一封女书信跟别的女孩结成“老同”（同年同性别的好朋友）；但因为不久之前有个女孩被她未来“老同”的兄弟强奸了，Yi 的祖父为此禁止她写信找“老同”。

2 译者 Silber 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认同

但是，除了有意识地与白人霸权话语和实践相分离，从而导致身份体现分裂之外，白人有时无法排除某些已进入无意识层面的“白色”习惯。这体现了白人另一种层面的分裂，即在有意识地抵制某些霸权的同时，有时也在无意识层面与其合谋。

译者 Silber 也体现了对有关霸权话语的迎合。通过考察 Silber 的学术论文和翻译实践，可以认为 Silber 是一个等权女性主义者，认同的是强调两性相似性及平等，并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而非强调女性差异，并以文化女性主义为代表的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事实上，Silber 本人也私下指出，她并不欣赏所谓的女性特点，认为把他人需要置于自我需要之前的“自我牺牲”是病态的，并表示她希望减少或根除迫使个体自我牺牲的客观因素，而创造条件使人人都有机会发展“最完整人格”(fullest personhood)。此外，Silber 还认为抚育孩子应由父母双方分担。需要指出的是，也有美国白人女性认同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可惜 Silber 不是其中一员。

接下来，我将探讨 Silber 的学术文本和翻译实践如何表明她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第一，Silber 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认同体现于她的学术文本。我们先看 Silber 如何在博士论文中判断中国女书行为和内容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意义。在 Silber 看来，女书行为不具有反抗中国儒家父权的女性主义意义，而只是一种类似绣花的被父权社会认可的“女性行为”，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历史上的父权没有禁止女性识字和书写，而只是限制内言外传，为此，仅流通于女性内部（代表私人领域）而不为男性所阅读（代表公共领域）的女书，并没有僭越父权边界，而女书作者也没有获得公平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利。其次，考虑到两性之间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如父权体制给予男性更多利益，排斥男性的女书体系，并非等同于排斥女性的标准（男性）书写体系，因此女书体系也没有意味着从男性手中夺取“权力工具”。

另一方面，就女书内容来看，Silber 也不认为女书文本作为一个整体体现了女性主义意义。首先，某些女书文本将女人的不幸更大程度地归罪于命运和他人，而非父权体制，有些则体现了对父权体制的迎合；其次，尽管某些女书文

本体现了对嫁女儿体制的不满和抵制（而非建议变革），但它们往往认为类似体制由“玉帝”规定，因而具有不可改变的神圣性；¹⁷⁹最后，某些女书文本所体现的抵制也被父权认可和制度化。此外，Silber 也不认为那些在女书文本中描述自己的作者有“女性意识”，因为这些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场合和文类等外部因素，而不是体现作者作为女性的真实想法。

Silber 在博士论文中对中国女书不具有女性主义意义的论证表明，她有关中国女书的理解离不开她本人有关女性主义、压迫、抵制的认识。为此，无论是（在 Silber 看来）对女书进行话语殖民的学者所提出的观点（如认为女书构成某种女性主义行为），还是她本人为批评上述话语殖民而提出的观点（如认为女书只是某种女性行为），她们的判断标准都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框架。可见，声称要避免对他者进行话语殖民的 Silber，还是有话语殖民之嫌。这是因为 Silber 根本没有质疑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地方性”，而将其当作“普遍真理”。这也为此凸显了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霸权，因为正如 DiQuinzio（1999: 2）所言，霸权的意义在于某些观点对个体而言是常识或“事情的本象”（the way things are）。

另一方面，Silber 在博士论文中还频频在儒家与父权之间划等号，而没有意识到儒家跟女性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这还是表明她受到鄙视女性传统美德等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Rosenlee（2006: 149）曾指出，将儒家和女性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意味着以女性主义的名义强加某种“种族等级制”（racial hierarchy），即把西方和非西方分别建构成“道德理论”的提供者和有待解决的“道德问题”，而这是某种新殖民假设。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试图修正有关儒家思想的主流看法，试图挖掘其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有些还用所谓的儒家女性主义质疑主流西方女性主义。¹⁸⁰

Silber 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认同，还体现在她为 *Maidenhome* 所做的序（1994a: xii-xiii）。其中，Silber 谈及了对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解。在 Silber 看来，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女性主义，意味着争取女权（比如废除缠脚和包办婚姻）和受教育权等，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考虑到共产党及其父系政权对女性体验和主体性的压制，此时的女性主义意味着冒着政治风险探索女性

¹⁷⁹ 要求改变体制的意识，只有当主体认识到体制并非神圣而是人为时才可能产生（LeGates 2001: 9）。

¹⁸⁰ 可参考 Lee（2000）的“Li Zhi and John Stuart Mill: A Confucian Feminist Critique of Liberal Feminism”、Rosenlee（2006）的 *Confucianism and Wome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等。

体验和主体性。

可见，正如 Silber 用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基本信条，判断中国女书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意义一样，她对中国女性主义的理解也如出一辙。

第二，Silber 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认同体现于她的某些翻译实践。以她英译《马兰花，马兰花》并把它推荐给 *Mother Jones* 为例。丁小琪的《马兰花，马兰花》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农村女孩，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父母卖给他人做媳妇的故事。译成英文后，Silber 把它投给 *Mother Jones*，美国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自由主义杂志（收录于 1990 的其中一期）。在向 *Mother Jones* 的编辑介绍这则小说时，Silber 指出，当她打算翻译《马兰花，马兰花》时，中国一个国家出版社的编辑委员会表示不愿意，并继而指出“他们禁止这个故事，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大家认为中国没有人权”。¹⁸¹Silber 此处有关中国官方的描述，证实了 Chow (1995: 153) 在谈论张艺谋电影时提及的中国官方心态，即认为这些电影犯了中国“家丑不可外扬”的禁忌。可见，Silber 试图通过翻译《马兰花，马兰花》，引起大家有关中国女性人权的注意。为此，Silber 也跟大多数美国（西方）人一样，非常关注中国的女性人权问题，而对女性人权问题的关注正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根基。

综上所述，译者 Silber 体现了这种复杂状况：一方面，她有着高度“有色”思想，以各种方式强调自己抵制话语霸权和话语殖民，并强调自己尊重他者和差异；另一方面，她没有足够认识到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本土性”，而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在无意识层面，以此为参考框架看待其他文化中的性别问题。那么，在她翻译《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过程中，上述复杂状况将如何体现？

在分析上述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 Silber 与 Hyperion East 主编在翻译《扶桑》方面的合作，借此确定谁更需要对《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情况负责。

二 译者 Silber 与 Hyperion East 主编之间的合作

研究者不能认为译者应该对出版后的译文面貌负全部责任，因为编辑（有

¹⁸¹ *Mother Jones* 的编辑在介绍《马兰花，马兰花》英译文时，提供了上述信息。

时还有作者本人）往往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这已成为共识。但是，我们往往无法得知幕后所有故事。若要知道所有幕后细节，最有效的办法是拿到出版前的所有手稿，与出版后的终稿做比较，同时让译者、编辑等对整个翻译过程作出全面解释，但这往往不可能。研究者为此往往假设删改均是译者所为，尽管知道这有时是“冤枉”译者。

我的情况比较尴尬，因为仅仅知道一些而不是全部内幕。为此，一方面，我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而理直气壮地假设译者需要对译文中的所有删改负责；另一方面，我最终还是不能明确所有删改背后的建议者和或决定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剖析事实上的整个翻译过程，而只能根据有限信息对大致倾向做出假设。

Will Schwalbe 是 Hyperion East 的创立者兼主编，¹⁸²也是《扶桑》的英译文编辑。在谈及 Schwalbe 与 Silber 的合作前，我先简短介绍一下 Schwalbe 的情况。因为在耶鲁大学读本科时曾修读过东南亚历史课程，Schwalbe 非常喜欢亚洲文学；另一方面，Schwalbe 支持言论自由和人权，比如他是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to Publish Committee 的一员，也是 Human Rights Watch 的拥护者，对出版被祖国所迫害的亚洲作者有特别大的兴趣，并曾多次去亚洲会见亚洲作者（Stronach 2006）。看来，编辑 Schwalbe 和译者 Silber 都对第三世界人权问题感兴趣。

作为编辑，Schwalbe 遵循以下两个原则：首先，他考虑的首要对象是读者，并认为可以将自己当作标准读者，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读者，自己的阅读感受有一定代表性；其次，他试图保证原文读者所获取的印象和译文读者所获取的印象相一致，如果原文在译者读来是悲伤的，而译文在他读来是可笑的，那么就得考虑删除这段话，同样道理，如果译文在他读来是不知所云的，那也有删除或改变的必要。¹⁸³

可见，编辑 Schwalbe 具有较大的干涉倾向（对于商业出版社编辑而言，这是一种普遍情况），但他不懂原文（中文），这中间就涉及了译者。为确定谁需要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情况负更大责任，我们有必要了解 Silber 和 Schwalbe 在翻译过程中的合作。接下来，我将根据 Silber 写给编辑 Schwalbe 的

¹⁸² Hyperion East 主要翻译出版亚洲文学（至少在其创立者 Schwalbe 于 2008 年离职之前）。

¹⁸³ 这是 Schwalbe 提供的信息。

两封信，Schwalbe 写给严歌苓的一封信，¹⁸⁴以及 Jin 所提供的跟译者 Silber 的采访稿，¹⁸⁵考察上述问题。

根据译者 Silber 在 1999 年 11 月 15 日写给 Schwalbe 的一封信，可明确以下几点。第一，不懂中文的 Schwalbe 要求译文具备“口语化和简单明了”（colloquial and straightforward）的风格，建议 Silber 在她认为有问题的地方标上括号。第二，Silber 为此在她认为体现“说教”（didacticism）、“不必要的阐释”（gratuitous interpretation）、“做作”（affectation）、“重复”的地方标上括号，有关内容涉及在美华人所受的种族歧视、东方主义、爱情、性和性政治、历史记载的不可靠性等，并告诉 Schwalbe 可以放心删除她所标注的内容，指出删除不会对情节有太大影响。Silber 还表示，考虑到 Schwalbe 很可能会删除或大幅度简化她所标上括号的内容，她没怎么好好翻译。第三，Silber 特别指出，她在译文稿中用括号标注了一整块内容（在我看来，是《扶桑》中最为集中并最为全面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内容），并表示她已在译稿中加了可以代替上述内容的句子（这整块内容最终没有在出版后的译文中出现）。第四，Silber 认为《扶桑》中的叙述者“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严歌苓本人），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显得不够饱满，或显得“屈尊俯就”（patronizing）和“装腔作势”（pretentious）。

根据 Silber 在 1999 年 12 月 22 日写给编辑 Schwalbe 的另一封信，可明确以下几点。第一，Schwalbe 在译文稿中标注了他建议（而 Silber 没建议）删除的内容，Silber 表示她能认同。第二，对于 Schwalbe 保留她在译文稿中标上括号建议删除的某些内容，比如描述扶桑受难后的浴血和光辉（这也是《扶桑》中明显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段落；尽管没有被全部删除，出版后的译文省略了其中的核心成分），Silber 表示吃惊。第三，Silber 指出她确信严歌苓将乐意接受他们的删改。

我手头还有一封 Schwalbe 在 2000 年 2 月 22 日写给严歌苓的信。从信中可知，Schwalbe 认为 Silber 所给的删除建议对他的编辑相当有帮助，但他没有采取所有建议。

¹⁸⁴ 这三封信是 Hyperion East 的 Duffy Brendan 寄给我的。

¹⁸⁵ Jin 之所以采访 Silber，是因为她当时的研究涉及不受国家/民族边界限制的文学批评方式，而《扶桑》的英译是其中一个考察对象。Jin 主要分析了《扶桑》中几个段落的英译，用以表明美国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民族主义对族裔文学的“塑造”。

除上述三封信之外，Jin 对 Silber 的采访也提供了有用信息。声称知道编辑 Schwalbe 的品位，Silber 指出她自做主张选择不翻译某些内容（意味着没有标上括号建议删除），比如有关什么是真正女性的段落（这也是《扶桑》中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例子，这段话也最终在出版后的译文中消失），并对编辑说“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一部分，与其浪费时间翻译这么长一段，我干脆就略过了”，因为她认为他肯定不喜欢这个段落所体现的“多愁善感”（sentimentality）、“直言”（explicitness）、“夸大”（overstatedness）。

那么，上述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是否可从中推断，译者 Silber 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内容的翻译情况负责？

根据上述信息，可明确以下几点。第一，在编辑 Schwalbe 授权下，译者 Silber 用括号标注出她建议删除的段落，这无疑给 Schwalbe 提供了导向，指引他的干涉方向。考虑到 Schwalbe 作为编辑的权力，删改决定可能最终由他所做，但 Silber 在此过程中的极力“推荐”，在我看来，对 Schwalbe 的决定会有一定影响。第二，译者 Silber 有时没有认真翻译她认为编辑肯定会删除的段落，有时甚至擅作主张省略她认为编辑肯定不喜欢的段落，这些都进一步凸显了她的干涉立场。第三，译者 Silber 非常不认同或不欣赏《扶桑》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这是因为，她要么标上括号建议删除的例子，要么她觉得编辑肯定不喜欢所以干脆略过不译的例子，均明显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最说明问题的是，她建议用一句话代替在我看来最集中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整块内容。事实上，我的这个判断还有其他证据：Silber 曾私下里明确指出，她完全不认同扶桑这个人物形象，并认为[她建议用一句话代替的]那块内容，是整本小说中最“弱”的内容。第四，译者 Silber 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辨认出体现于扶桑的女性主义成分，这是因为她完全没有提到扶桑这个人物具有女性主义内涵。事实上，Silber 也私下明确表示，她并不认为严歌苓推崇体现于扶桑的女性特点。编辑 Schwalbe 曾指出，他认为扶桑是一个非常可悲并被破坏到极致的人物，对她深表同情，并且不认为扶桑对所有暴力的忍受和接受是某种抵制。¹⁸⁶Silber 有关扶桑的看法，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与 Schwalbe 的看法类似。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假设，对于《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情况，译者 Silber 需要负较大责任。基于这个（有一定证据而非盲目的）假设，

¹⁸⁶ 这是 Schwalbe 在私下交流中提供的信息。

接下来,我将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考察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及其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如何体现于她的翻译实践,考察她的有色思想将如何帮助她摆脱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奴役”,并尊重代表他者和差异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三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

《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主要体现于扶桑。正如我在上文指出,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意义主要有五个方面,包括扶桑的母亲意象,扶桑的宽恕,扶桑的以受为攻,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扶桑的女菩萨形象。这五个方面关系密切,不免有重叠之处,比如宽恕往往内在于母亲身份,同时也是菩萨的行事原则之一,以受为攻体现某种程度的原始性,母亲和女菩萨之间也存在共性,等等。

(一) 翻译“扶桑的母亲意象”

这首先体现于严歌苓把女主角命名为扶桑的事实,因为扶桑被认为是一棵东方神树,¹⁸⁷而树在 Jung (1986: 109) 看来,同井、温泉等一样是母亲原型的其中一个层面。总体而言,扶桑的母亲意象指代扶桑常常体现出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形象。我们可以认为这涉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第一个观点,即推崇包括自我牺牲、慈爱、善良等特质的雌性,因为雌性往往被等同于母性,集中体现于传统意义上的母亲。

《扶桑》的主要线索是华裔妓女扶桑与白人男性克里斯之间的爱恋。严歌苓主要通过扶桑与克里斯之间建构“母子”关系,凸显扶桑的母亲意象:要么强调克里斯在扶桑心目中永远是个孩子,要么强调克里斯在扶桑面前总觉得自己是个孩子。为突出这一点,严歌苓特意让扶桑大克里斯八岁。通读整个文本,可发现扶桑与克里斯之间的“母子”关系贯穿小说始终:发生关系前,扶桑和克里斯之间体现“母子”关系,而正是扶桑强烈的母亲意象,使得克里斯一直处于阳痿状态;发生关系(在唐人街暴动中,克里斯同其他白人一起轮奸了扶桑)并终于可以维持正常性关系之后,扶桑和克里斯还是维持了“母子”

¹⁸⁷ 参考自缪丽芳(2006: 89)。

关系。正如李硕儒（2001: 78）指出，扶桑与克里斯的关系无论是什么场合什么姿态，呈现的都是宽博的母性。

考虑到传统意义上母亲的地位和对于儿子在象征意义上的权力，严歌苓对扶桑与克里斯之间“母子”关系的建构，也具有女性主义意义。正如缪丽芳（2006: 88）指出，在雌雄的三层关系包括男人/女人、父亲/女儿、儿子/母亲中，雌性只有在第三种情况下占强势。

比如，扶桑把与克里斯发生性关系“定位”为给婴儿“哺乳”，为此体现了母亲情怀。以下是《扶桑》中的一段话及其英译：

原文：他咽一口热辣辣的唾沫，看着她。**她突然觉得他像是一个急待哺乳的婴儿。**她把他搂进怀里。他非常顺畅地随她而去；随她仰下去的身体倒伏。（1996b: 188）

译文：He swallowed a mouthful of warm spit, watching her. She drew him into her arms and onto the bed.（2001: 185）

在这个例子中，“他”是当时十五岁左右的克里斯，“她”是二十三岁左右的扶桑，两人久别重逢。克里斯体现了对扶桑的雄性渴望，而扶桑则把满足克里斯的雄性渴望定位为给婴儿“哺乳”。扶桑对性的这种“哺乳”态度和慷慨的“给予”态度，也是其他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者比如《少女小渔》中的小渔所具有的。曾经当过护士的小渔，因为一个喜欢她的快死了的病人想跟她发生关系，就把自己的贞操给了他。为此，扶桑的“哺乳”态度是一个重要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观点，但上述译文恰恰省略了其中的核心信息（斜体部分）。

我们可以假设，上述删除跟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相关。也就是说，这或许是因为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和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在女性性态度方面的冲突：前者推崇基于个人主义并满足个人需要的（利己）性态度，后者推崇基于母亲情怀并满足他人需要的（利他）性态度。

具体而言，在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女性一方面需要能控制自己身体不被男性所利用，避免成为男性性欲的客体化对象，另一方面需要冲破各种束缚和歧视，解放自己的身体而满足自身需求。不难想象，这种对阻止男性利用并客体化女性身体的强调，对译者 Silber 来说几乎是某种常识。然而，扶桑有关性的“哺乳”态度，以及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却与上

述常识发生冲突。为此，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视角看，扶桑的这种“哺乳”态度，不仅是政治不正确的，也是无法理解的，因为类似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于当代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经编辑“授权”在有问题的地方标上括号的译者 Silber，或许因此在译稿中标注了这个信息而建议删除。

除强调扶桑对性的“哺乳”态度外，严歌苓也强调她在对待其他问题时体现出的母亲形象。这里是《扶桑》中的一段话及其翻译：

原文：似乎是一个孩子上了一个年轻顽皮的母亲一记温柔的当。又似乎是一个母亲哄骗一个孩子；把一场重罚延期，缓延到什么时候她也不告诉他，让那或许永远不实行的惩罚永远悬在他的生命上，永远笼罩着他的良心。
(1996b: 253)

译文：删除。

在由白人发起针对华人的唐人街暴动中，克里斯在黑暗中同其他白人一起轮奸了扶桑，并以为扶桑不知道他的恶行。扶桑其实一直知道克里斯是其中一个轮奸者，但一直没有揭穿。最后，克里斯发现真相。在上述段落中，严歌苓用母子关系描述了发生在扶桑和克里斯身上的这种情况。具体而言，严歌苓把扶桑知道克里斯参与轮奸却不告诉他的情况，和母亲哄骗孩子并把惩罚延期进行类比，强调扶桑作为“母亲”对于“孩子”克里斯的权力。但译文省略了这个段落。

我们同样可以假设，这或许跟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相关，因为该话语和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在看待被强（轮）奸女性方面存在冲突。从上述例子可知，在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中，被轮（强）奸的女性并非纯粹的受害者和无权者，因为她从一个母亲的角度看待这个事件，把侵犯自己的人看成犯错孩子，而自己也有着母亲特有的惩处权力。为此，借助“母子”隐喻，严歌苓把受害者和被受害者之间的弱强关系，转变成具有惩处权力者（母亲）与被惩处对象（儿子）之间的强弱关系。但是，在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被轮（强）奸女性是纯粹的受害者和无权者，她们借以给自己赋权的方式是法律惩处手段。

我在上文分析了两个凸显扶桑母亲意象的例子的删改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凸显扶桑母亲意象的例子都在翻译中被删改，也存在不少忠实传递的情况。比如，这是《扶桑》中的另一个段落及其译文：

原文：终于，他的嘴唇贴近了。**像朝乳汁贴近的婴儿的嘴唇。**扶桑想，他永远不会完成那个从男孩到男人的堕落。她伸出双臂，将他拥向自己坦赤的胸口。（1996b: 188）

译文：Finally, his lips nestled on hers. *Like the lips of a baby nestling toward the milk.* Fusang wrapped her arms around him and pulled him to her naked chest. (2001: 185)

在这个例子中，十五岁的克里斯与扶桑久别重逢，并非常想跟她发生关系，但扶桑在他心目中的强烈母亲意象阻止他更进一步。从原文可知，扶桑把试图向她“求爱”的克里斯看成“朝乳汁贴近的婴儿”，从而建构了两者之间的“母子”关系。译者 Silber 忠实传递了其中的核心信息。

上文只是分析了三个例子的翻译情况。在《扶桑》中，体现扶桑母亲意象的不止这三例。为考察总体翻译情况，我先提供《扶桑》中所有代表性例子的原文和译文，并在此基础上做有关分析。

先看所有代表性例子的翻译，以下表格可供参考（其中的例子按照删改程度排序：删除-重写-忠实传达）：

例	原文	译文	说明
1	他咽一口热辣辣的唾沫，看着她。 她突然觉得他像是一个急待哺乳的婴儿。 她把他搂进怀里。他非常顺畅地随她而去；随她仰下去的身体倒伏。（1996b: 188）	He swallowed a mouthful of warm spit, watching her. She drew him into her arms and onto the bed. (2001: 185)	①背景：十五岁左右的克里斯与二十三岁左右的妓女扶桑久别重逢。他对扶桑充满了雄性渴望，而扶桑则把与他发生性关系看成哺乳。 ②译文： 删除 了斜体部分。
2	扶桑说：我怕把你身上划伤。 她自己没有意识到她口气的简单和诚恳。那母性的底蕴露了出来。 他忽然烦恼自己的长大，已长成这样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男子汉。（1996b: 250）	She said, I don't want to scratch you. He was suddenly annoyed that he had grown up, that he was now a man who could do anything. (2001: 247)	①背景：这是扶桑与克里斯久别重逢并打算发生关系前的情景。这时的克里斯十七岁左右。 ②译文： 删除 了斜体部分。
3	似乎是一个孩子上了一个年轻顽皮的母亲一记温柔的当。又似乎是一个		①背景：扶桑一直知道克里斯曾经强奸过她，但一直没告诉他，直到他自己

	母亲哄骗一个孩子 ：把一场重罚延期，缓延到什么时候她也不告诉他，让那或许永远不实行的惩罚永远悬在他的生命上，永远笼罩着他的良心。（1996b: 253）		发现真相。严歌苓用母子关系描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种情况。这时的克里斯十七岁左右。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4	当你这样一下一下为他把茶吹凉时， 他身心出现了一种战栗的感动 。（1996b: 15）	And when you cooled his tea, breath by breath, he trembled with longing . (2001: 17)	①背景：十二岁的克里斯，与二十岁的妓女扶桑首次见面，并因为她母亲般的温柔体贴而感动。 ②译文：将原文带有亲情意味的“感动”， 重写成 带有性意味的“渴望”。
5	他竟躺在你怀里睡着了。天亮你为难地看着他，那么多吻也不能哄他放了你。他睡得很沉， 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 。（1996b: 270）	He had fallen asleep in your arms. In the morning you had a problem—all those kisses and you still couldn't get him to let you go. He slept so soundly, like all young men . (2001: 268)	①背景：这是扶桑跟克里斯呆在一起的最后一次。此时的克里斯已不止十七岁。 ②译文：将原本的“孩子” 重写成 “年轻人”。
6	你斜靠着床栏， 像看着刚学会走路的孩子 ，鼓励地微笑。他一直走到你跟前，与你只隔一尺，如同十二岁的他头回见你。（1996b: 125）	You leaned against the bed rail with an encouraging smile, as if watching a child who had just learned to walk . He came right up to you and stood just a foot away, like the first time he saw you at twelve. (2001: 124)	①背景：克里斯来医院探望治疗肺病的扶桑，那时他十四岁左右。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7	终于，他的嘴唇贴近了。 像朝乳汁贴近的婴儿的嘴唇 。扶桑想，他永远不会完成那个从男孩到男人的堕落。她伸出双臂，将他拥向自己坦赤的胸口。（1996b: 188）	Finally, his lips nestled on hers. Like the lips of a baby nestling toward the milk . Fusang wrapped her arms around him and pulled him to her naked chest. (2001: 185)	①背景：十五岁的克里斯与扶桑久别重逢，并非常想跟她发生关系，但扶桑在他心目中的强烈母亲意象阻止他更进一步。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8	扶桑像个年轻的母亲那样看着眨眼间长成的男子汉的儿子 ，脸腾起血色。（1996b: 244）	Like a young mother who notices her son has become a man overnight , Fusang felt the blood rushing to her face. (2001: 241)	①背景：克里斯与扶桑在分开后偶遇，那时他十七岁左右。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9	他情愿小回去，比十二岁更小， 小到她能揣在她怀中，小得他可以顺理成章	He wished he could go back to his younger self, younger than twelve, young enough	①背景：这是克里斯打算与扶桑发生关系前的想法。这时的克里斯十五岁

	她去吮吸她的乳头。 (1996b: 250-251)	<i>to nestle into her bosom and take the next natural step and suck at her nipples.</i> (2001: 247)	左右。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10	克里斯的泪水急雨似的直落。他不再顾得上体面，索性呜呜地敞开来痛哭。扶桑噙着泪，却不让它们落。她仅仅是为他的哭泣做伴。 一个母亲见一个孩子哭得如此之痛是不可能不动容的。 (1996b: 253)	Tears ran down his face. He didn't care about his dignity any more. He began sobbing openly. Fusang's eyes filled with tears, but she didn't let them fall. She was simply keeping him company in his crying. <i>When a mother sees a child sobbing with such pain, she is bound to be affected.</i> (2001: 250)	①背景：在得知扶桑一直知道他曾强奸过她却一直没揭穿后，克里斯崩溃了。这时的克里斯十七岁左右。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在所有例子中，删改约占 50%，忠实传递约占 50%。			

表 7：翻译“扶桑的母亲意象”

上述表格表明，在十个凸显扶桑母亲意象的例子中，有五例被进行了不同程度删改，而另五例被大体忠实传递。这是否说明，在处理“扶桑的母亲意象”方面，译者 Silber “显得”体现了立场上的分裂，即在迎合所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同时，也进行了抵制？

在我看来，在翻译某个主题方面，删改和忠实传达的百分比确实提供了一个重要参数，但并不是唯一参数。具体而言，尽管上述十个例子均有着同样主题（凸显扶桑的母亲意象），这并非表明，对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构建，这十个例子发挥了同等程度的作用，或是对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有着同等程度的抵触性。因此，在删改和忠实传递的比例相等的情况下，还需要分析译者所删改的例子和所忠实传递的例子之间是否有区别。

在分析这些例子本身对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重要性之前，我先简单提及西方女性主义有关母亲身份的看法。

对于母亲身份，西方女性主义内部存在如下分歧，一些认为该身份是导致女性压迫的根源，另一些认为该身份是女性权力的源泉。上述分歧与西方女性主义内部的等权派和差异派之争相对应。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以自由主义女性

主义为代表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正是贬低母亲身份的等权派。¹⁸⁸比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贬低跟母亲身份相关的怀孕行为，否认其特别性和重要性（Rothman 1994: 153）。这是因为，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系密切的个人主义认为，母亲特有的能力和行为并非等同于主体性特有的能力和行为，比如怀孕和生育是对理性存在的“偏离”（DiQuinzio 1999: 11; 245）。

可见，严歌苓将凸显扶桑的母亲意象当成一种女性赋权方式，而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并没有认可类似赋权方式。所以，严歌苓通过“母亲化”扶桑给女性赋权的理念，总体而言，有着抵制该话语的目的。但是，对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不同例子有着不同程度的抵触性，包括零抵触（也就是说，某些例子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质疑该话语）。

在凸显扶桑的母亲意象的十个例子中（表 7），真正对译者所认同话语有着抵触性的是例 1 和例 3。例 1 凸显扶桑基于母亲情怀旨在利他给予的性态度，例 3 通过强调扶桑对强奸她的克里斯具有母亲惩罚儿子的权力给受害女性赋权。相比较而言，剩下八例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母亲化扶桑，或婴孩化克里斯。

但是，上述最重要的两例恰恰被译者 Silber 删除。为此，尽管 Silber 分别删改和忠实传达了 50% 的例子，这并非表明她体现了立场上的分裂。考虑到 Silber 省略了这十个例子中最具有抵触性的例子，这个事实本身表明，她的翻译行为还是受到了所认同话语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表格中的另外八个例子（例 2、4、5 被删改，例 6、7、8、9、10 被忠实传递），本身并没有真正抵触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Silber 之所以删改了其中的例 2、例 4、例 5，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如逻辑不通，而非意识形态因素（不是因为这些例子抵触了主流话语而进行审查）。

以例 4 为例。译者把“当你这样一下一下为他把茶吹凉时，**他身心出现了一种战栗的感动**”翻译成“*And when you cooled his tea, breath by breath, he trembled with longing*”。在这个例子中，其中的“你”是二十岁的妓女扶桑，“他”是十二岁的小嫖客克里斯，两人首次见面。扶桑为克里斯泡了茶，并因为担心克里斯烫伤嘴，而小心翼翼为他把茶吹凉；克里斯因为扶桑“母亲”般

¹⁸⁸ 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母职的贬低，某种程度上跟北美（西方）文化对母职的贬低相关。正如 Klein（1995: 103）指出，母亲身份被认为缺乏“特意性”（*deliberateness*），而北美文化往往将“特意性”等同于能动性。

的温柔和体贴而感动。但是，译文把“出现了一种战栗的感动”重写成“trembled with longing”，使得原本“儿子”对“母亲”的关爱行为所产生的感动，在翻译中成为男性对女性带有性意味的“渴望”，从而没有很好地传达原文试图建构的“母子”关系。那么，如何解释其中的重写？这或许是因为 Silber 认为原文不合逻辑，认为嫖客对妓女产生的不应是亲情意义上的“感动”，而应是情欲意义上的“冲动”，从而在翻译中进行了“修正”。

再以例 5 为例。译者把“他竟躺在你怀里睡着了。天亮你为难地看着他，那么多吻也不能哄他放了你。他睡得很沉，**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翻译成“He had fallen asleep in your arms. In the morning you had a problem—all those kisses and you still couldn’t get him to let you go. He slept so soundly, *like all young men*”。在这个例子中，“他”是克里斯，已不止十七岁，“你”是扶桑。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99），“孩子”有两个意思，包括“儿童”和某人的“子女”。考虑到克里斯当时已不止十七岁，该例中的“孩子”应指代某人的“子女”，为此凸显了扶桑的“母亲”意象及身份。但是，译文把“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重写成“like all young men”，为此去除了原文试图建构的“母子”关系。这或许是因为译者觉得把当时十七岁的克里斯描述成孩子有点不合常理，同样不是因为她辨认出了其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并因为该例抵触了她所信奉的话语而进行删改。

事实上，对于严歌苓“母亲化”扶桑这个行为本身，译者 Silber 并没有表示出反感或抵制的态度。在翻译原本没有凸显扶桑的母亲意象的句子时，她有时甚至凸显了扶桑的母亲意象。比如，Silber 把“她撮起的嘴唇和垂下的睫毛使她脸上出现了母牛似的温厚”翻译成“Her pursed lips and lowered lashes lent her face all the gentleness of a mother”。¹⁸⁹这是扶桑首次遇见克里斯并帮他把茶吹凉时的情景。同样，这并非表明译者 Silber 认同严歌苓“母亲化”扶桑的女性主义意图，而是表明单纯“母亲化”扶桑的例子并没有抵触她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

为此，就“扶桑的母亲意象”而言，尽管译者 Silber 忠实传递了 50%的例子，这并非意味着她抵制了自身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而体现了对

¹⁸⁹ 原文和译文分别摘自严歌苓（1996b: 11）和 Yan（2001: 12）。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尊重，因为这些被忠实传递的例子本身并没有抵触相关话语。然而，一旦所涉及例子确实与所认同话语发生冲突(如被删改的例 1 和例 3)，译者 Silber 的立场便呈现出来。

为此，总体而言，就翻译“扶桑的母亲意象”而言，基于对翻译行为本身的分析，我们可以假设，译者 Silber 的立场没有体现分裂，因为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体现出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抵制。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假设，在翻译“扶桑的母亲意象”时，译者 Silber 尊重他者的“有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帮助她摆脱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奴役”。

当然，也许事实并非如此。也许 Silber 忠实传递了所有例子，但其中的一些在后来给编辑删除了，但这已无从得知。

(二) 翻译“扶桑的宽恕”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第二个观点，给雌性中心心理/精神层面的怜悯宽恕等品质赋权，并在此过程中逆转了常规意义上的强（压迫者）和弱（被压迫者）关系。为此，曾经受害的宽恕者比曾经施害的被宽恕者强大，因为“在宗教和伦理学的意义上，宽恕的主体相对于宽恕的对象是一种强势的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的强势”（乔以钢和刘堃 2007: 93）。

严歌苓笔下富有雌性的女性往往宽恕男性，包括对她们进行性侵犯的男性，用严歌苓自己的话说，她们“不跟男人一般见识”（2005: 48）。因为宽恕，这些女性没有把男性强加于自身的迫害行为当成对自己的伤害，相反以施舍的态度对他们进行救赎，从而在解构迫害概念的同时征服了后者。

这最明显体现于扶桑。在谈及扶桑时，严歌苓指出：“对于男性也好，对于强迫她的人也好，对于践踏她的人也好，她都有一种怜悯和宽容的态度来接受所有的这些所作所为，她允许这些恶的东西存在。我觉得这种宽容和接纳是一种佛性的表现”（严歌苓等 2006: 6）。具体而言，扶桑宽恕在她经期期间蹂躏她的嫖客，宽恕劫她卖她的原配丈夫大勇，宽恕跟其他白人一起轮奸她的克里斯，等等。比如，这是《扶桑》中的一段话及其翻译：

原文：他想，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

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怜悯；**弱势对于强势的慷慨的宽恕**。（1996b: 254）

译文: He thought, What made the image of Fusang kneeling so moving was the fact that it embodied the age-old compassion of women for men. (2001: 250)

这是七十岁的克里斯回忆起当年扶桑宽恕他时的情景。克里斯在黑暗中与其他白人一起轮奸了扶桑，却以为扶桑不知道；但其实扶桑一直知道，并宽恕了他。原文有以下两层信息：首先，在雌性与弱势以及雄性与强势之间划等号；其次，强调扶桑/雌性的宽恕。在此基础上，严歌苓试图借助宽恕的赋权意义，将雌雄原本的弱强关系转化成强弱关系，从而实现她的女性主义意图。

但在译文中，我们发现译者 Silber 进行了删改。她去除了原文在雌性与弱势以及雄性与强势之间的类比，并去除了原文对宽恕的强调（斜体部分）。我们可以认为，这和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有关。先看 Silber 为什么去除原文中的雌弱雄强观点。在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两性天生是平等的，而不是严歌苓所认为的雌弱雄强。Silber 或许没有意识到，严歌苓对雌雄关系的弱强定位，只是为了之后借助宽恕的赋权力量颠覆原本的弱强关系，而这也正是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狡猾”所在。

现在我们探讨译者 Silber 为何去除原文有关宽恕的强调。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所强调的女性赋权方式，是物质层面的社会、法律等体制的改革和完善，而非精神层面的赋权。具体而言，相对于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没有把女性（对男性）的宽恕倾向看成美德，¹⁹⁰而认为是缺点，因为这维持了女性主义者试图改变的各种不平等，包括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以及女性的无权地位和强烈自尊的缺乏（Haber 1998: 147）。为此，该主流话语往往把对女性的宽恕倾向的强调看成是父权观点，而非给女性赋权的方式。比如，严歌苓借助克里斯的视角赞美宽恕所象征的美德和力量，而在 McWilliams(2005: 153)看来，这与男性统治的“商品化凝视”相关。

上文只是分析了一个例子的翻译情况。在《扶桑》中，体现扶桑的宽恕的例子还有不少。为考察总体翻译情况，我先提供《扶桑》中所有代表性例子的原文和译文，并在此基础上做相关分析。

先看所有代表性例子的翻译情况，以下表格可供参考（其中的例子按照删改程度排序：删除-重写-忠实传达）：

¹⁹⁰ 认为女性更会宽恕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假设。

例	原文	译文	说明
1	在她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时,她温暖的笑是那样的安慰, 人在这笑中感到羞愧同时明白自己被宽恕了。 (1996b: 139) ¹⁹¹		①背景: 这是克里斯对扶桑的看法。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2	克里斯带点酸楚地承认,跪着的扶桑是个美丽的形象。美丽是这片和谐。跪着的姿势使得她美得惊人, 使她的宽容和柔顺被这姿势铸在那里。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的居高临下者。她跪着,用无尽的宽恕和柔顺梳理这黑色绞索般的长发。 (1996b: 197)	Chris didn't like to admit it, but it was a beautiful sight. The beauty came from harmony. Kneeling made her alarmingly beautiful. (2001: 194)	①背景: 在看到扶桑跪下来给劫她卖她的“主人”梳头时,克里斯生发了上述感想。 ②译文: 删除 了斜体部分。
3	许多年后,七十岁的克里斯在老年性失眠的一个夜晚,又一次看见扶桑跪着的形像。扶桑仍穿那件浅红衫子,身材比他年轻时印象中的要小。她那跪着的 宽恕 是他风烛残年时最感到动人的。(1996b: 253-254)	Many years later, Chris at seventy, up one night with insomnia, saw the image of Fusang kneeling again. She was wearing the same pink blouse, but she was smaller than in his earlier memories. The image moved him like nothing else could. (2001: 250)	①背景: 老年克里斯回忆扶桑宽恕年轻时的自己; 在宽恕他的时候, 她搂着他跪了下来。 ②译文: 删除 了斜体部分。
4	他看着十七岁的自己像条垂死的鱼, 在她宽容的网里挣扎。 原来 宽容 与下跪是不冲突的! 他在七十岁这个失眠之夜突然悟到这点。(1996b: 254)		①背景: 老年克里斯回忆扶桑宽恕年轻时的自己; 她跪着宽恕了他。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5	他想,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于雄性的 宽恕 与悲悯; 弱勢对于强势的慷慨的宽恕。 (1996b: 254)	He thought, What made the image of Fusang kneeling so moving was the fact that it embodied the age-old compassion of women for men. (2001: 250)	①背景: 老年克里斯回忆扶桑宽恕年轻时的自己。 ②译文: 删除 了斜体部分。
6	他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 她有圣一般的宽容? 还是她编织了天罗地网,让他连人带心一	Who was this woman? A saint who could forgive anything? Or a hunter who	①背景: 这是克里斯发现扶桑宽恕自己时的想法。

¹⁹¹ 这个例子也体现了“扶桑的以受为攻”。

	块栽进来,永生永世逃不出去? (1996b: 252)	set such good traps that he would never escape? (2001: 249)	②译文: 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7	她把她的厚谊变成宽容,她把宽容织成一张网,蓦然间,他已逃不出去,成了终生的良心的俘虏。 甚至她把他吐实情的机会也歼灭在这张 包容一切的宽容之网 里。(1996b: 252-253)	<i>She had turned her goodwill into forgiveness and her forgiveness into a net and, suddenly, escape was impossible.</i> He was a prisoner for life of his own conscience. In that <i>net of forgiveness</i> , she had even taken away his chance to tell her what he had done. (2001: 249)	①背景: 这是克里斯发现扶桑宽恕自己时的想法。 ②译文: 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8	她将他的头搂进怀里。一会,她搂着他跪了下来,多次想给他擦眼泪都被他掳开。他偶然从泪水中看见她跪着的形态。那样的曲扭形成的线条,竟会美丽。她跪着,再次 宽容了世界 。(1996b: 253)	She put her arms around him and pulled his head to her chest. After a time, she slipped to her knees, her arms still around him. She wanted to wipe his tears but he kept pushing her away. He saw her kneeling from through his tears. It was beautiful. She knelt there, <i>forgiving the whole world</i> once more. (2001: 250)	①背景: 扶桑安慰因获得自己宽恕而羞愧的克里斯。 ②译文: 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9	他一生没有宽恕太多人和事。他善于在别人和自己身上发现罪恶,到老,他悟到 他正直的一生是被一个妓女宽恕下来的 。 ¹⁹² (1996b: 254)	He hadn't forgiven very many people in his life. He had always been so good at finding fault in himself and others and now he realized that <i>his whole upright life had been ushered along by Fusang's forgiveness.</i> (2001: 250)	①背景: 克里斯为扶桑宽恕自己而感恩。 ②译文: 大抵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在所有例子中,删改约占 56%,忠实传递约占 44%。			

表 8: 翻译“扶桑的宽恕”

¹⁹² 扶桑以她的宽恕征服和救赎了克里斯。比如《扶桑》中有这样的段落:“克里斯还想到自己的一生,被扶桑改变了的一生。他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人,也反对华人间的相互残害。他成了个中国学者,他觉得扶桑在看他做这一切,不论她赞同还是反对,她总是在看着他的”(1996b: 275)。

从上表可知，在强调扶桑的宽恕的九个例子中，有五例被删除，而另四例得到忠实传递。这是否说明，在处理“扶桑的宽恕”时，译者 Silber “显得”体现了立场上的分裂，即在迎合所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同时，也进行了抵制？这需要分析被删改和忠实传递的例子是否确实抵制了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因为有些严歌苓用以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例子，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视角看，或许并没有真正地起到抵制作用。

我已在上文指出，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是物质/世俗女性主义，重视的是在物质层面给女性赋权，而不是在宗教精神层面给女性赋权。为此，就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把凸显扶桑的宽恕当成一种女性赋权方式而言，这并非译者所认同的主流话语所提倡，从而有着针对该话语的抵制目的。

在这九个例子中，在我看来，除例 1（删除）、例 2（删除）、例 8（忠实传递）外（这三个例子仅仅描述扶桑的宽恕，没有明确涉及宽恕对两性权力关系的（潜在）颠覆或逆转），剩下的六个例子（例 3、4、5 被删除，而例 6、7、9 被保留）对于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来说，确实都具有类似的抵触性。

以例 4 为例。Silber 在翻译中删除了“他看着十七岁的自己像条垂死的鱼，**在她宽容的网里挣扎**。原来**宽容**与下跪是不冲突的！他在七十岁这个失眠之夜突然悟到这点”。在这个例子中，严歌苓借助克里斯的视角，强调扶桑的宽恕如何“击败”了曾经强奸过她的克里斯，使得她在精神层面征服了曾经的迫害者，为此具有了女性主义意义。然而，推崇物质层面的反击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不可能认可这种斗争方式。为此，我们可以假设，就删除这个例子本身而言，译者 Silber “在效果上”构成了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迎合。

但与此相冲突的是，Silber 也忠实传递了同样具有抵触性的例子。以例 7 为例。Silber 忠实传递了“**她把她的厚谊变成宽容，她把宽容织成一张网，蓦然间，他已逃不出去，成了终生的良心的俘虏**。甚至她把吐实情的机会也歼灭在这张**包容一切的宽容之网**里”。在这个例子中，严歌苓强调扶桑宽恕强奸她的克里斯，使得后者成了良心俘虏，从而也使得强奸受害者扶桑在精

神层面“战胜”了强奸者克里斯。可见，尽管这个例子也以类似方式抵制了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她却选择在翻译中保留。同样，我们可以假设，就保留这个例子本身而言，译者 Silber “效果上”构成了对所认同主流话语的抵制。

可见，在翻译“扶桑的宽恕”方面，就翻译行为本身而言，译者 Silber 比较明显地体现了立场分裂，一方面删除了与她所认同的女性主义相抵触的例子，另一方面却忠实传递了同样具有抵触性的另一些例子。

尽管译者 Silber 忠实传递了凸显扶桑的宽恕并同时抵制所认同话语的一些例子，这可能并非因为她辨认出并尊重背后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借助女性的宽恕给女性赋权），而或许是其他原因。宽恕是很多宗教都推崇的一个概念，包括佛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尽管译者 Silber 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她对犹太人身份（她母亲是犹太人）有着强烈的认同感。¹⁹³考虑到对德国纳粹分子的宽恕构成犹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成分，译者 Silber 的犹太人身份或许导致了她对宽恕这个概念的欣赏，从而在某些情况下忠实传递了凸显扶桑的宽恕的例子。

为此，我们可以假设，译者 Silber 在翻译“扶桑的宽恕”方面所体现的分裂，或许并非因为她试图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让原文中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发出声音，而有可能是因为非女性主义因素，比如这里的文化因素。当然，考虑到 Silber 确实忠实传递了一些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例子，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在翻译“扶桑的宽恕”方面，译者尊重他者和差异的“有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她免受霸权话语的“奴役”。同样，我们还是需要承认事实的多种可能性，比如，表格中所罗列的删改事实上或许根本与 Silber 无关，而与编辑相关，但这同样无从得知。

(三) 翻译“扶桑的以受为攻”

强调女性在生理/物质层面的承受性，以及在两性关系中推崇“以受为攻”的哲学，是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第三个观点。严歌苓强调女性巨大的容量，认为“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烂打碎，她一直可以接受”（2005: 48），而“以受为攻”意味着“在接受中消融，在接受中享受”（引自李硕儒 2001: 79）。

¹⁹³ Silber 表示，犹太文化对犹太人非常包容，即使一个人只有母亲是犹太人，他/她也被看成是犹太人。

很明显，对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而言，“以受为攻”中的“攻”，并非指代常规意义上的主动出击，而指代以下两方面：第一，通过接受或享受某些迫害行为，消解其原本被赋予的迫害意义；¹⁹⁴第二，通过从道家角度颠覆施与者和承受者的强弱关系，给承受者赋权。为此，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中的“以受为攻”，用 Zhou (2003: 94) 的话说，质疑了“唯一两个被认可的社会抵制策略包括谴责和斗争”。

上述这种“以受为攻”的哲学，以解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有关某些现象的常规看法为基础。类似解构在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中较为普遍。比如，Rosenlee (2006) 曾试图修正西方女性主义有关中国缠脚和缠脚女性的单纯父权解读。具体而言，Rosenlee (2006: 11) 将缠脚与女性性别身份、汉族文明、族裔身份相联系，指出缠脚属于“真正的女性文化”，实践主体是女性，而体现美学价值和阶级身份的缠脚，尤其在明末清初汉族文化受到满族威胁时，也象征着汉族身份以及对野蛮满族的抵制，从而在此基础上肯定缠脚女性的能动性，改变有关第三世界女性为纯粹受害者的形象。正如 Rosenlee 赋予缠脚这个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几乎是纯粹的女性迫害行为以女性主义意义，并赋予往往被认为纯粹受害者的中国缠脚女性以能动性一样，严歌苓也借助“以受为攻”的逻辑，修正西方女性主义有关侵犯女性权利的超强度卖淫或强奸等的常规看法，同时给这些往往被认为纯粹受害者的女性赋权。

扶桑正是一个实施“以受为攻”哲学的典范，这体现于她对受难的态度，尤其是涉及卖淫和强奸的受难。对于卖淫受虐也好，被轮奸侵犯也好，扶桑一直实践着这种“反常识”的攻击哲学，却因此在那个暴虐的男性世界中得以存活，成为“飘洋而来的三千中国妓女中活得最长的一个”（严歌苓 1996b: 276）。

接下来，将集中考察译者 Silber 如何处理扶桑的“以受为攻”，分别涉及卖淫和强奸。

1 翻译“涉及卖淫的以受为攻”

扶桑是湖南一个种茶人家的女儿，在襁褓里时就跟一个八岁的广东少爷订

¹⁹⁴ “以受为攻”（在接受中消解），也意味着以“自我受难”（self-suffering）为攻。“自我受难”是非暴力控制的一个技巧，体现于 Gandhi 和 Martin Luther King 的非暴力主张，是使得对手感到羞愧的武器（Ruddick 1989: 169）。

了亲。但订亲才第二年，这个少爷就跟长辈去美国旧金山淘金，并一直未归。扶桑在十四岁时嫁到夫家，之后被拐到美国并卖到唐人街妓院，从此开始她的卖淫生涯。但扶桑并不讨厌卖淫，她曾经有一次稀里糊涂跟别的妓女逃脱，第二天却主动回来。因此，扶桑的卖淫刚开始是被迫的，但之后却是自愿的。扶桑在卖淫生涯中经受了許多磨难，但她却一直实践着“以受为攻”的哲学。

考虑到“以受为攻”有两层含义，包括通过接受或享受某些迫害行为消解原本被赋予的迫害意义，以及通过从道家角度颠覆施与者和承受者的强弱关系而给承受者赋权，接下去将从上述两方面分析涉及卖淫的“以受为攻”。

(1) 翻译“扶桑的在享受中消解”

扶桑经受过许多常人眼中的磨难，比如她曾在经期期间连续接十多个客人。但是，她对此体现了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在享受中消解”的态度。这是《扶桑》中的两段话及其翻译：

原文 (1): 你看着他，让他意识到你没有成一滩不可收拾的狼藉。**你让他明白你如此享受了受难**，你再次升起，完整丰硕，面颊一边一团红晕。你浴血，让他看你受难后的光辉。(1996b: 62)

译文 (1): As you watch him, you convince him that suffering is part of your beauty, that you can rise from it again and again, cheeks flushed, whole and full. (2001: 64-65)

原文 (2): 你怎样才能让他懂得你——流血，**受难，欢乐**，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他似乎懂了。他看见了你眼睛深处的生命力，似懂非懂地认识到你其实接受了苦难；不止接受，**你是享受了它，你从这照理是巨大的痛苦中偷欢获益**。(1996b: 65)。

译文 (2): 删除。

上述两段原文均强调扶桑不仅接受受难，更重要的是在其中得到享受。这里的受难指代扶桑在经期期间被迫持续接大量客人，享受指代扶桑将这个行为转换成获取高潮的途径，和某种程度的精神升华，使得受难对她而言不再是受

难。用 Feng (2000: 68) 的话说, 这意味着她将受迫害的身体, 转变成她可从中获得自由和快乐的“乌托邦式的她者领地”(utopian her-land)。

上述两段译文均省略了上述核心信息。根据译者 Silber 在 1999 年 12 月 22 日写给编辑 Schwalbe 的信, 可以明确, Silber 在译文稿中用括号标注了第一段原文, 建议编辑可完全删除。尽管编辑没有选择完全删除, 却还是去除了凸显“在享受中消解”的信息。

对于上述删除, 我们可以假设, 这跟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相关。

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对卖淫持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卖淫是某种父权机制, 而妓女是被压迫者; 第二种观点认为卖淫是很多女性自主选择的工作方式, 而妓女等性工作者应得到其他工作者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在工作期间免受恐惧、剥削、暴力等的困扰 (O'Neill 2001: 16)。第二种观点不仅合法化自主卖淫, 还认为卖淫等类似工作有可能成为女性的“解放领域”, 比如妓女可以在卖淫过程中超越被动客体的身份, 进行“协商、抵制、颠覆”, 而妓女身份也可充当妓女使用现成“性秩序”(sexual order) 的能动场所 (Chapkins 1997: 1; 20; 30)。

第二种观点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 为此也是译者 Silber 的立场。也就是说, 可以假设译者 Silber 并不反对自主卖淫, 同时也认同卖淫可以成为体现女性主体性的其中一种方式。上文所提及的两个段落表明,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也不反对卖淫, 并认同卖淫给女性提供一个“享受”的途径。但是, 在对待妓女权利方面, 严歌苓和译者 Silber 有不同态度: 严歌苓没有谴责对扶桑的妓女权利(比如有权拒绝在经期期间接客, 何况是持续接客)的践踏, 却反过来歌颂这个妓女化践踏为享受的能力; 译者 Silber 肯定会认为这是践踏妓女人权, 理应批判。

为此, 我们可以假设, 译者 Silber 与严歌苓的上述冲突是上述段落在翻译中被删除的动因(之一)。

(2) 翻译“有关嫖客与妓女之间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

上文探讨涉及“以受为攻”的第一层意义, 即在接受或享受中消解。在这

一部分，我将考察译者 Silber 如何处理“以受为攻”的第二层意义，即通过颠覆施与者（如嫖客）和承受者（如被过度剥削的妓女）的强弱关系给承受者赋权。以下是《扶桑》中的一个段落及其译文：

原文：她的肌肤是海洋上最细的流沙，那样随波逐流。某一时刻它是无形的，化在海潮里。他以为该有挣扎，该有痛苦的痕迹。而他看到的却是和谐。不管那男人拖一条发辫、蜡黄的、刺满青色兽样的脊梁如何令他憎恶，但那和谐是美丽的。她的肉身是这和谐的基础，她主宰支配着伸缩、进退。正是这美丽使两股眼泪顺克里斯的鼻腔上涌。**你以为海以它的汹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本体，它盛着无论多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淹没。**（1996b: 60）

译文：He thought there should be struggle, some sign of suffering. But what he saw instead was harmony. No matter that the man wore a queue, or that his sallow back was covered with grotesque tattoos—the harmony was beautiful. Her body was its basis; she controlled the advance and retreat. The beauty of it set tears coursing down Chris’s cheeks.（2001: 62）

这是扶桑在经期期间持续接客时的情景。考虑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其中一个目的，是通过运用某些道家哲学观点颠覆有关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的主流看法，上述例子的核心信息包括“她的肉身是这和谐的基础，她主宰着伸缩、进退”，以及严歌苓有关海与沙的比喻，即“你以为海以它的汹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本体，它盛着无论多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淹没”。其中，“海”指代过度剥削扶桑的嫖客，“沙”指代完全接受而没有半点抵制的妓女扶桑，但严歌苓却认为“沙”因为盛着“海”而超越了被主宰地位。

译者 Silber 忠实传递了第一个信息，却省略了第二个信息（斜体部分有关海与沙的类比）。那么，这可如何理解？我们依旧假设，这或许跟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相关。

有关扶桑用肉体主宰嫖客的信息被保留，或许是因为西方女性主义普遍认可类似的思维逆转，即不是男性在占有女性，而是女性在包容和主宰男性，从而赋予女性主体性。然而，涉及海与沙比喻的信息，就不是 Silber 所能够或选

择认同的了，可以假设，她无法从虐海和流沙的关系中看出后者有任何占上风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译者 Silber 不认为妓女与嫖客之间的关系可以等同于流沙与虐海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将妓女置于任人处置的境地。

事实上，上述例子有关海与沙之间的强弱辩证，体现了道家鼻祖老子的思想。老子推崇常规意义上被认为处于弱势并与雌性相连的概念，包括无、守、退、柔等，并推崇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这也是刘笑敢（2008: 116-117）所谓的“辩证式否定”，即“在否定基础上的新的肯定，是对更高目标的肯定，或者说是指向超越性目标的”）。为此，从道家的视角看，虐海尽管强大，流沙尽管无力，平静下来的海还是被沙所包围，更强大并最终占上风的还是沙。严歌苓试图用海与沙的这个比喻给任凭嫖客处置的妓女扶桑赋权，为此颠覆了常规意义上的嫖客与（被过度剥削的）妓女之间的强弱关系。

但是，刘笑敢也强调，这种辩证式否定所体现的逻辑不易被理解和接受。考虑到译者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背景，以及其中的自由主义根基，严歌苓从道家角度和形而上层面对妓女扶桑的赋权，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她所能理解的。为此，尽管 Silber 和严歌苓均重视如何给妓女赋权，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认为给妓女赋权意味着提高妓女控制自己身体和免受过度剥削的能力，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则对此进行道家式“辩证”，两者有质的区别。为此，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冲突是导致“海与沙”的辩证被删除的原因（之一）。

以上探讨的例子涉及卖淫的“以受为攻”。接下来，将探讨涉及强奸的“以受为攻”。

2 翻译“涉及强奸的以受为攻”

在唐人街的种族冲突暴动中，多名华裔妓女被拖到街上轮奸，扶桑是其中一个。这种源于种族仇恨的强奸，尽管在一国境内（19 世纪的美国）发生，其性质与民族战争中发生的强奸行为相类似。但是，严歌苓在此强调的并非是民族/种族冲突中女性身体的象征意义，而是借助扶桑对强奸的态度证实她所提倡的“以受为攻”的女性主义策略。

具体而言，严歌苓一方面强调扶桑在接受中解构强奸所被赋予的迫害意义（在接受中消解），另一方面则对强奸者与被强奸者之间的强弱关系进行道家式

颠覆。

(1) 翻译扶桑的“在接受中消解”

在《扶桑》中，严歌苓多次提到扶桑被白人男性轮奸时的情景，并强调扶桑在此过程中的接受而非反抗。以下是小说中的一个段落及其翻译：

原文：你当时不仅没有叫喊，**你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你只是迎合上去，迎合在狂野和疼痛上。**他们像是在拿你报复着什么。可报复什么呢？你那时在想与生俱来的所有疼痛都像雾一样裂了又聚，升起又退去。**你像雾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你的人。**（1996b: 226）

译文：Not only did you not scream, *you were as amenable as fog. You simply accommodated the pain.* At the time you were thinking that one's allotment of pain in life could tear and converge like fog. *Like fog, you enveloped each man stabbing into you.* (2001: 223)

在这个例子中，被白人男性轮奸的扶桑，并没有做任何被强奸者所被期望做的事如尖叫反抗，而是以顺从接受的态度对待强奸者。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视角看，如果一个女性接受而不是反抗男性的强奸，这意味着强奸中的“强迫”不再有意义，从而也消解了强奸这个行为本身。这正是在接受中消解强奸的含义。顺从强奸者的扶桑，为此抵制了强奸者旨在使她感到“污浊”和“堕落”的目的（McWilliams 2005: 145）。

尽管在接受中消解强奸这一理念，与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完全抵触，Silber 大体忠实地传达了其中的核心信息（斜体部分）。事实上，Silber（1995b: 188）曾表示，她认同 Dorinne Kondo 的观点，后者指出：“诸如‘抵制和容纳’的说法看起来真的不充分，因为表面上的抵制往往被意识各层面的共谋和妥协所削弱，而容纳会有意想不到的颠覆效果。”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Silber 在上述例子中选择了忠实传递，因为她认可容纳所具有的颠覆意义。为此，我们可以假设，就这个例子而言，译者 Silber 尊重他者的“有色”思想，“战胜”了自己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认同，从而实现了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所代表差异的尊重。

(2) 翻译“有关强奸者与被强奸者之间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

这一部分将探讨译者 Silber 如何处理“以受为攻”的第二层含义，即对施与者（如强奸者）与承受者（如被强奸者）之间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

在描述扶桑被多个白人男性轮奸时，严歌苓两次以雾与礁石的比喻，强调扶桑的弥合能力，借此凸显她的“强势”。常规意义上讲，柔软无形的雾是软弱象征，而坚硬无比的礁石是强硬象征，但无论礁石怎么撕裂，雾永远会自行弥合。严歌苓这里的辩证类似于老子的有关辩证，从哲学层面强调接受顺从的真正有力之处。¹⁹⁵以下是文本中的两段话及其译文：

原文（1）：那撮刺渐渐不再尖利，不再让你碎裂。**你一次又一次弥合、完整。**（1996b: 226-227）

译文（1）：And after a while the pain was no longer so sharp, no longer tore you completely apart. （2001: 223）

原文（2）：你知道血从你的嘴唇、胸脯和下体流出，但疼痛没了，**你知道你将弥合成先前的整体，像雾的弥合那样无痕迹。**（1996b: 228）

译文（2）：删除。

这两例描述的均是扶桑被轮奸时的情景，均强调扶桑雾一般的弥合和超越能力。译者 Silber 均省略了这个核心信息，包括第一个例子中的“你一次又一次弥合、完整”，以及第二个例子中的“你知道你将弥合成先前的整体，像雾的弥合那样无痕迹”。

在这两例中，严歌苓强调被轮奸的扶桑将像雾一样弥合成先前的整体，旨在强调女性在肉体层面的巨大承受力和超越力，赋予被强奸女性以某种强势和不可迫害性，从而颠覆了强奸者和被强奸者之间的强弱关系。在严歌苓看来，正如貌似柔弱的雾比将它戳破的礁石强大，貌似柔弱的被强奸者扶桑也因为承受力和恢复力而强于强奸者，在此基础上暗示女性同雾一样“不可战胜”。从严歌苓本人的视角看，扶桑所体现的这种雾一般的承受力和超越力才是真正的强

¹⁹⁵ 比如，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七十六章写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势，像扶桑这样的女性才是真正的强者和女性主义者。

然而，严歌苓以这样的方式给被强奸女性赋权，从西方女性主义视角看，不免有争议之处。强奸是西方女性主义特别关注的一个议题，因为强奸被认为是对女性身体/性自治和权利侵犯程度最高的性别迫害行为。¹⁹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和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尽管在很多方面有着分歧，对于强奸带给女性的巨大身心损害，却有着共识。

可以想象，严歌苓借助扶桑所进行的对强奸者和被强奸者强弱关系的颠覆，以及所建议的对被强奸者的赋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被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所容忍。相对于严歌苓通过强调女性肉体的坚韧和不可摧毁，以及通过强调雾一般的恢复力给被强奸女性赋权，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则借助肉体之外的文明法律制度给女性赋权，保护女体不受侵犯和摧毁。在我看来，译者 Silber 必然很难理解惨遭蹂躏的女体如何像雾一样弥合成先前的整体还了无痕迹，无法理解严歌苓至柔则至刚的老子辩证逻辑，和该逻辑的形而上意义。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上述例子中的斜体部分被删除的原因。

3 小结

有关“以受为攻”的翻译情况，我们只分析了若干例子。考虑到体现上述观点的例子不止这几个，为了解总体翻译情况，我先提供《扶桑》中所有代表性例子的原文译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先看所有代表性例子的翻译情况，以下表格可供参考（其中的例子按照删改程度排序：删除-重写-忠实传达）：

例	原文	译文	说明
1	在她 <i>对一切痛楚和罪孽全身心接受</i> 时，她温暖的笑是那样的安慰，人在这笑中感到羞愧同时明白自己被宽恕了。（1996b: 139）		①背景：强调扶桑对苦难的接受；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一层意义，即在接受中消解。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¹⁹⁶ Benedict (1992: 11) 认为，强奸和涉及性的谋杀是除战争之外对人身侵犯最为严重的行为。

2	你看着他，让他意识到你没有成一滩不可收拾的狼藉。 你让他明白你如此享受了受难 ，你再次升起，完整丰硕，面颊一边一团红晕。你浴血，让他看到你受难后的光辉。(1996b: 62)	As you watch him, you convince him that suffering is part of your beauty, that you can rise from it again and again, cheeks flushed, whole and full. (2001: 64-65)	①背景：这是扶桑在经期期间连续接客后的情景；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一层意义，即在享受中消解。 ②译文： 删除 了斜体部分。
3	你怎样才能让他懂得你——流血， 受难，欢乐 ，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他似乎懂了。他看见了你眼睛深处的生命力，似懂非懂地认识到你其实接受了苦难；不止接受， 你是享受了它，你从这照理是巨大的痛苦中偷欢获益 。(1996b: 65)		①背景：这是扶桑对自己在经期期间连续接客的看法；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一层意义，即在享受中消解。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4	她的肌肤是海洋上最细的流沙，那样随波逐流。某时刻它是无形的，化在海潮里。他以为该有挣扎，该有痛苦的痕迹。而他看到的却是和谐。不管那男人拖一条发辫、蜡黄的、刺满青色兽样的脊梁如何令他憎恶，但那和谐是美丽的。她的肉身是这和谐的基础，她主宰支配着伸缩、进退。正是这美丽使两股眼泪顺克里斯的鼻腔上涌。 你以为海以它的汹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本体，它盛着无论多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淹没 。(1996b: 60)	He thought there should be struggle, some sign of suffering. But what he saw instead was harmony. No matter that the man wore a queue, or that his sallow back was covered with grotesque tattoos—the harmony was beautiful. Her body was its basis; she controlled the advance and retreat. The beauty of it set tears coursing down Chris's cheeks. (2001: 62)	①背景：这是扶桑在经期期间连续接客的情景；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二层意义，即对施与者和承受者之间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 ②译文： 删除 了斜体部分。
5	那撮刺渐渐不再尖利，不再让你碎裂。 你一次又一次弥合、完整 。(1996b: 226)	And after a while the pain was no longer so sharp, no longer tore you completely apart. (2001: 223)	①背景：这是扶桑在被白人男性轮奸时的情景，强调她雾一般的恢复力；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二层意义，即对施与者和承受者之间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 ②译文： 删除 了斜体部分。
6	你知道血从你的嘴唇、胸脯		①背景：这是扶桑被白

	和下体流出，但疼痛没了，你知道你将弥合成先前的整体， 像雾的弥合那样无痕迹 。（1996b: 228）		人男性轮奸时的情景，强调她雾一般的恢复力；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二层意义，即对施与者和承受者之间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7	在这一笑之前，她说：我是贼。我跟你们走。我偷了首饰。她没料到自己会说这几句话。在她那样笑的时候，她明白了自己是什么。 她明白了自己那个在苦难中偷欢的天性 。（1996b: 138）	Before the smile, she had said, I'm a thief. I'll go with you. I took his jewelry. She hadn't expected to say this. But when she smiled that way, she realized what she was. <i>She understood then that it was her nature to steal pleasure from suffering.</i> (2001: 137)	①背景：扶桑被美国拯救会从唐人街的妓院中拯救出来，但她选择做回唐人街妓女；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一层意义，即在享受中消解。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8	你被拖了进去，他们轮流钻进帘帐。 你没有救命救命地喊，没有去抓去咬 。你的手向他的上衣摸去，在他狂躁的耸动中，你用牙咬掉他胸前的纽扣。 你没有骂他们畜生野兽。你仍向着一片虚无张开你的身体。你尽量地一次次开放 ，只是在两只拳头中握着满把的纽扣。（1996b: 212）	You have been dragged inside and men take turns coming through the curtain. <i>You don't call for help; you don't bite or scratch.</i> You reach for the jacket of each man, and during his wild heavings, you bite off a button. <i>You don't call them names, you just open your body toward an expanse of nothingness. You concentrate on opening yourself, time after time,</i> except for your fists, which are full of buttons. (2001: 209)	①背景：这是扶桑被白人男性轮奸时的情景；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一层意义，即在接受中消解。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9	你当时不仅没有叫喊， 你柔顺得如同无形无状的雾。你只是迎合上去，迎合在狂野和疼痛上 。他们像是在拿你报复着什么。可报复什么呢？你那时在想与生俱来的所有疼痛都像雾一样裂了又聚，升起又退去。 你像雾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你	Not only did you not scream, <i>you were as amenable as fog. You simply accommodated the pain.</i> At the time you were thinking that one's allotment of pain in life could tear and converge like fog. <i>Like fog, you enveloped each man</i>	①背景：这是扶桑被白人男性轮奸时的情景；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一层意义，即在接受中消解。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的人。(1996b: 226)	<i>stabbing into you.</i> (2001: 223)	
10	我和你一样记不清了：多少个躯体压下来。 你只是一次次包容，如同雾包容无论多嶙峋的礁石，无论多汹涌的海浪。 (1996b: 228)	I don't remember any better than you do how many bodies pressed down upon you. <i>You just enveloped them, one after the next, the way fog envelopes rocks no matter how jagged, seas no matter how savage.</i> (2001: 224)	①背景：这是扶桑被白人男性轮奸时的情景；凸显以受为攻的第一层意义，即在接受中消解。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在所有例子中，删改约占 60%，忠实传递约占 40%。			

表 9：翻译“扶桑的以受为攻”

从上表可知，在强调扶桑的“以受为攻”的十个例子中，有六例被删改，而四例被忠实传递。那么，这是否也说明，译者 Silber “显得”体现了立场上的分裂，即在迎合所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同时，也进行了抵制？

严歌苓强调的“以受为攻”，明显有着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上述表格所提供的十个例子，对于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也确实都有着抵触性。为此，考虑到译者 Silber 删改了 60%的例子，而忠实传递了 40%的例子，这表明她在翻译“扶桑的以受为攻”方面确实体现了分裂。

但是，不同例子所具有的抵触程度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具体例子所涉及的“分主题”，即“以受为攻”的不同含义，包括在接受中消解，在享受中消解，以及对施与者和承受者之间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具体而言，针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具有最高抵触程度的是对承受者和施为者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例 4、5、6），其次是在享受中消解（例 2、3、7），最后是在接受中消解（例 1、8、9、10）。之所以说有关施与者与承受者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有着最高的抵触程度，是考虑到这种中国式道家哲学，相对于主流西方文化（从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有着最大程度的“他性”。这种“他性”体现为对直线思维、物质赋权、人权话语等的抵制，从而抵制了很多常识性概念和观点。

从上表可知，对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话语有着最高程度抵触性的三个

例子（例 4、5、6）均在翻译中被删除；在对该话语有着次等程度抵触性的三个例子（例 2、3、7）中，前两例被删除；在对该话语有着最低程度抵触性的四个例子（例 1、8、9、10）中，只有例 1 被删除。这里需要看一下这四个有着最低抵触程度的例子。尽管例 1、8、9、10 均有着同样的分主题（在接受中消解），但被删除的例 1 与被保留的例 8、9、10 之间存在差异。例 1 强调扶桑对一切痛苦和罪孽的全身心接受，是一种宽泛陈述；例 8、9、10 强调扶桑在被轮奸时没有反抗，我们可以将此理解成一种现实策略。考虑到被强奸者的反抗往往会招来更大的践踏甚至杀身之祸，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者或许也能认同扶桑的这种行为。为此，当我们只强调例 8、9、10 的表层意义（顺从强奸者乃明智之举），而非背后的哲学理论意义（在接受中消解）时，这些例子便失去针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抵触性。可见，在针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方面，被删除的例 1，比起被保留的例 8、9、10，有着更大的抵触性。

可见，基于对翻译行为本身的分析，译者 Silber 在翻译“扶桑的以受为攻”方面体现了的分裂，因为她忠实传递了一些与其所认同话语相抵触的例子，从而“在效果上”体现了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的抵制，也从而意味着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思想的某种程度认可（尽管她可能不认为这是某种女性主义）。但是，考虑到她在处理“以受为攻”的不同分主题方面所体现的不同倾向，即删改力度随着抵触程度的增高而增高，这仍然表明她还是受到背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操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假设，她所认同的主流话语还是“严格”地执行过滤任务，即过滤某些在这个话语看来过于极端的观点。但是，在此过程中，Silber 尊重他者的“有色”思想，也帮助她避免完全受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奴役”。

同样，我们还是得承认事实的其他可能。比如，表格中所有的删改例子（除例 2 外，这是唯一一个我有证据证明是 Silber 建议删改的例子），或许均跟编辑相关。不过，这还是无从得知了。

（四）翻译“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

强调并赋权给雌性中的自然原始即拒绝理性和意识，通过否认和解构各种把女性定义为受害者的文明概念，而达到给女性赋权的目的，是严歌苓式女性

主义的第四个观点。可见，在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中，自然原始是褒义而非贬义。

具体而言，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者没有把当代文明所普遍认同的女性迫害行为，包括暴力袭击、性剥削、性侵犯等，当成是对女性的迫害，由此使得自己在经受类似体验时能超越受害者身份。正如严歌苓本人指出，她笔下的扶桑和王葡萄“都有些蒙昧，对好多的概念都不清楚，也就很少被概念一再伤害，她们内心都是快乐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是概念在伤害你。对男人们讲的扶桑是一个妓女，妓女是最下面的，她会问什么是那个？她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她生命力就旺盛了”（引自王红旗 2007）。

在此基础上，这些女性也获得了不受外界干涉和文明概念束缚的内心自由，或是 Klein（1995: 114）所谓的“心理自治”（psychological autonomy）。为此，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拥有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者，是得“道”之人。在道家思想中，“道”是最高境界。得“道”之人“不面对世界，也不分辨万物”，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或情感倾向（刘笑敢 2008: 30），从而获得原始混沌的状态以及绝对的自由。考虑到“道”是至高境界，严歌苓或许认为，她笔下的扶桑等女性，较之于与男性对抗的西方女性主义者，更胜一筹。

1 翻译“扶桑的自然原始”

在《扶桑》中，严歌苓多次强调扶桑的原始、古老、本真。正如老子一样，在严歌苓看来，原始比文明优越，而文明意味着倒退。严歌苓指出，扶桑“是一个原始的嚣张的自由体，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社会和世俗给予的概念和符号，她没洗过脑，只是一个最低的原初的生命形式，一个淳朴又纯粹的雌性体”，并指出自己是“带着一种讴歌式的兴奋来讴歌这种原始的生命力量的，无论带来的是正面还是反面的效果”（引自李硕儒 2001: 79）。比如，以下是《扶桑》中的一个段落及其翻译：

原文：在那艘远洋轮上，十七岁的克里斯突然懂了那一切。他看着阴暗早晨的海，几乎叹出声来：多么好的女人，诚心诚意得像脚下一抔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好在于她的低贱；任何自视高贵的女人身上的女性都干涸了。带着干涸死去的女

性，她们对男人有的就剩下了伎俩；所有的诱惑都是人为的，非自然的。

从这个时候起，女人便是陷阱，女人成了最功利的东西。克里斯在自己的社会中看到足够的女性早已干涸的女性。这个海洋上的清晨他想，扶桑是个真正的、最原本的女性。那泥土般真诚的女性。(1996b: 142)¹⁹⁷

译文：删除。

我在本章第二节谈论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时指出，严歌苓特别钟意自然的女性，而对被当代文明“异化”的女性感到失望。¹⁹⁸上述段落描述的是严歌苓理想中的原始女性：无论别人对她做什么（“踏”和“打滚”可喻指迫害女性的行为），她没有任何有关侵权、自尊、自卫、反抗等概念，完全是一个拒绝理性的存在。正如 Feng (2000: 67) 所言，扶桑就像能够扰乱暴力“阳界”(world of Yang) 的“阴之原则”(principle of Yin)，任何现存概念对她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明显与我们印象中咄咄逼人的西方女勇士形象背道而驰。从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视角看，上述段落或许完全就是男性对女性的父权想象。

可以预料的是，上述这段话没有出现在出版后的译文中，并且有证据证明译者 Silber 对此负直接责任。正如我在上文指出，声称自己知道编辑 Schwalbe 的品位和要求，认定他肯定不喜欢上述段落所体现的“多愁善感”、“直言”、“夸大”，Silber 自做主张略过不译，并对编辑说：“我知道你不会喜欢这一部分，与其浪费时间翻译这么长一段，我干脆就略过了。”

可见，上述这段话是译者 Silber 以编辑 Schwalbe 肯定不喜欢为理由，自行略过不译的。Silber 甚至没有像对待其他她认为有问题的段落那样，标上括号建议编辑删除，这也说明了她的反感程度。作为关心女性问题的女性主义学者，译者 Silber 肯定意识到这个段落对于塑造扶桑这个人物的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严歌苓有关女性问题看法的重要性。如果 Silber 认同其中的观点，她很可能会直译出来，结果可能仅仅是编辑在此基础上做一些简化，而不会导致整个段落译文中的完全消失。在我看来，译者 Silber 或许没有意识到，她因为如此反感其中的观点，以至于以尊重编辑的品位为名审查了上述段落。

¹⁹⁷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例子也体现“扶桑的以受为攻”。

¹⁹⁸ 在散文《弱者的宣言》中，严歌苓提到了这类女性：“而我满眼都是飞快翻动的红唇，告诉我‘非赢不可！’在工作中，在家庭里，在离婚法庭上，大方和厚颜是一回事。厚颜也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等，与同我从小学会的，与英雄气概有关的褒义词同义。绝不吃亏、绝不让步、绝不牺牲自己，据说是强者的要素”(1999b: 172)。

在上述例子中，严歌苓强调扶桑对普遍的女性迫害概念的无意识，凸显她泥土般的自然状态。接下来，我们看扶桑如何体现了对某些特定女性主义概念如卖淫和强奸的无意识和否认。比如，这是文本中的其中一个段落及其翻译：

原文：甚至，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因为你只是接受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了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的友善使你从来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它。肉体间的相互交流是生命的发言与切磋。这就再次使我质疑：扶桑你或许是从很远古的年代来的。（1996b: 227）

译文：省略。

在这段话中，严歌苓强调了扶桑对“卖淫”概念的否认。在谈及扶桑与嫖客的性行为时，严歌苓指出：“我在写这些的时候，没把他们仅仅写成形而下的性行为或曰妓女与嫖客的交易行为，我是从形而上的生命对生命、灵魂对灵魂的关系上书写扶桑这个人物的”（引自李硕儒 2001: 78）。为此，在严歌苓笔下，身为妓女的扶桑没有把自己的行为看成是卖淫。但是，译文删除了整段话。

在 Jin (2006: 594-595) 看来，上述段落中的扶桑通过实践一种“非个人的、一视同仁的性”(impesonal, indiscriminate sexuality) 溶解了构成主体的各种边界，为此体现了对“自治主体”(sovereign subject) 的漠视。Jin 认为，上述段落被删除或许是因为它对“自治主体”概念的挑战，因为这种挑战必然使得许多美国读者感到不安。可见，Jin 从美国（译文）读者的角度分析上述段落的翻译情况。

但是，我将从译者 Silber 的角度和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待上述删除。当然，考虑到译者也是其中一个美国（译文）读者，从译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与从译文读者的角度进行分析，是密不可分的。

考虑到译者 Silber 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认同，我们可以认为她认可自主卖淫并关心妓女的主体性和人权。但是，这并非意味着 Silber 认可对卖淫概念的否认和解构，因为对卖淫概念的解构意味着对妓女自我的解构，从而意味着对其应得权利的否认。与此相反，以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为首要出发点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正是有志于解构卖淫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以道家的“物

化”和佛教的“无我”思想为依托。

我们可以假设，上述段落的删除与译者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有关。因为这一立场，她难以欣赏使得扶桑否认卖淫概念的“物化”和“无我”思想。道家庄子的“物化”思想意味着主体对自我的舍弃，体现为忘掉他人、外物、自己，其中，忘掉他人意味着超越人我之分（李炳海 1992: 115-116）；佛教中的“无我”思想也意味着否认“自我”的存在，把有关“我”的信仰看成痛苦根源，为此致力于“自我的寂灭”（Conze, 引自阿部正雄 2003: 29-30; 42）。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对佛教中的“无我”有不同理解。有些西方女性主义佛学者区分了佛教中的“自我”和常规意义上的“自我”，强调佛教中的“无我”并非意味着对能动性的否认和完全顺从。¹⁹⁹但同样偏爱佛教的严歌苓，却似乎就是把“无我”等同于常规自我的舍弃。这大概是因为西方女性主义佛学者受自由主义文化遗产的影响，而严歌苓则受道家文化遗产的影响，正如美国女性主义佛学者 Gross（1993: 134）承认，她本人有关佛教的某些理解受她本人价值体系的影响，与西方的“精神传统”（spiritual heritage）相关。

考虑到译者 Silber 的立场，她更能认同的应该是西方女性主义佛学者。为此，较之于严歌苓女性主义将舍弃（常规）自我、解构卖淫概念当成是对妓女（女性）的赋权，Silber 更为认同的赋权方式应该用卖淫概念“命名”女性出卖身体的体验，并用各种手段巩固妓女（女性）主体边界。为此，我们可以假设，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导致上述段落在翻译中被删除的原因（之一）。

扶桑不仅否认了卖淫的概念，也否认了强奸的概念。这是文本中的另外一个段落及其翻译：

原文：让我告诉你实话：你不怕强奸。我刚刚明白这一点。你没有恐惧，对于强奸的恐惧主要来源于它的概念。（1996b: 228）

译文：省略。

上述这段话突出扶桑对强奸概念的无意识和否认，但译文再次选择了删除。所谓强奸，指的是未经当事人同意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从而意味着对当事人

¹⁹⁹ 比如，Klein（1995: 127; 131）指出，佛教中的“无我”并非意味着排斥个人能动性，并认为佛教和女性主义均认为舍弃常规自我是不可取的。致力于修正有关佛教的父权阐释，并强调佛教中非父权思想的美国女性主义佛学者 Gross（1993: 160）也认为，佛教中的“无我”并非表示任由他人摆布。

“身体完整”(bodily integrity)和“性自治”权利的侵犯。这个概念假设自我有着完整边界,并以对自我边界的侵犯为前提。

我在上文谈及扶桑对卖淫概念的否认时指出,这种否认以道家庄子的“物化”思想和佛教中的“无我”思想为依托,这使得“我的”概念比如“我的身体”、“我的权利”等不复存在,从而导致任何具有女性迫害意义的概念也失去存在依据。同样道理,扶桑对强奸概念的否认也有着类似依托。这导致扶桑与一切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呈接受态度,为此强奸中的“强迫”便不复存在,而基于“强迫”的侮辱也不复存在,而没有了“强迫”的奸也最终只是某种性关系。

那么,如何从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上述段落翻译中的删除?关于强奸,西方女性主义内部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强奸是暴力不是性,强奸者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控制和羞辱受害者,第二种观点认为强奸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具有“强迫”(compulsory)性质的“异性性”(heterosexual sex)(Cahill 2001: 2-3)。尽管西方女性主义内部对强奸的理解存在不同意见,她们均认同强奸这个概念和事实的存在,并认同其严重性。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认可第一个观点。

为此,我们可以假设,从 Silber 的角度看,扶桑在上述段落中所体现的对强奸概念的否认和缺乏惧怕,几乎支持了该话语所强烈反对的体现父权思维的“强奸迷思”(rape myths),包括本质上放荡的女性渴望被强奸、女性是自愿的受害者、强奸是不存在的等等。²⁰⁰扶桑对这个女性主义概念的否认,或许不可避免地驱动了译者 Silber 的抵制情绪,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她删除了上述内容。

2 翻译“扶桑的内心自由”

自然原始的扶桑获得了道家意义上的内心自由,即绝对的心灵和精神自由,不受任何道德、情感、荣辱等的束缚。崔大华等(2003: 66-67)指出,道家的这种自由观,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主流自由观,包括以卢梭、康德为代表的意志自由,和以斯宾诺莎、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自由,意志自由强调人的行为具

²⁰⁰ 有关强奸的迷思可参考 Sheffield (1995) 和 Benedict (2005)。

有独立自主的本质，而理性自由强调人的理性自觉。这是《扶桑》中的一段话及其译文：

原文： 克里斯此刻终于懂了几年前的那个场景：扶桑被一群男人用铁链拴走；脸上带血，披头散发使她成为贯穿几千年历史的奴隶形象，然而她低下头，对自己深深一笑，为她得逞的一切，为她的自由。事情多荒谬啊，克里斯在他三十岁、四十岁，在他以后的整段余生中不断想到扶桑那笑给自己的笑。**你解放她或奴役她，她那无边无际的自由只属于她的内心。**

(1996b: 144)

译文： Chirs finally understood what had happened that day. Dragged off in chains by a gang of men, her face bloody, her hair a mess, Fusang had become a typical slave girl. Yet she had bowed her head and smiled to herself. How absurd! At thirty, at forty,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Chris would keep thinking of the way Fusang smiled. ***Whether you set her free or enslaved her, her freedom came completely from within.*** (2001: 142)

这是被美国拯救会拯救出卖淫行业的扶桑，被华裔男性大勇（白人眼中的恶棍）劫走的情景。之前她已被大勇揍得满脸是血。在这个例子中，严歌苓试图强调已得“道”的扶桑的绝对自由，从而达到了庄子所谓的“逍遥”境界，即“基于顺从命运和际遇所获得的纯粹个人的和精神的自由”（刘笑敢 2008: 32）。

在这个例子中，译者 Silber 大体忠实传递了涉及内心自由的核心信息。这种道家式的绝对自由，很明显与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相抵触，因为后者强调的是物质意义上的自由。可见，就这个例子而言，译者 Silber 尊重他者的“有色”思想成功地发挥了作用，帮助她摆脱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奴役。事实上，Silber (1995b: 3) 曾指出她不喜欢美国把自己有关自由的理解强加于其他文化：在美国媒体报道 1989 中国天安门事件时，对抵制的“浪漫化”以及美国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标准，导致把示威者塑造成“美国式自由斗士”（American-style freedom fighters），为此抹煞了他们的历史文化特性。这表明，在“自由”这个问题上，译者 Silber 尊重他者的“有色”思想有着较大的控制力，使得她可以忠实地传递上述段落所体现的“扶桑式自由”。

3 小结

上文只是考察了若干例子的翻译情况。考虑到体现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的例子不止这么多，为考察总体翻译情况，我先提供《扶桑》中所有代表性例子的原文译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先看体现扶桑自然原始与内心自由的例子，按照删改程度排序（删除-重写-忠实传达）：

例	原文	译文	说明
1	亦或许，他跪下，让她的乳房托着他的脸，让他吮吸他早已在她那儿嗅到的那 古老、近乎蛮荒的母性 。（1996b: 141） ²⁰¹		①背景：克里斯向往扶桑的自然原始。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2	在那艘远洋轮上，十七岁的克里斯突然懂了那一切。他看着阴暗早晨的海，几乎叹出声来：多么好的女人， 诚心诚意得像脚下一抔土，任你踏，任你在上面打滚，任你耕耘它，犁翻它，在它上面播种收获 。好在于她的低贱，任何自视高贵的女人身上的女性都干涸了。带着干涸死去的女性，她们对男人有的就剩下了伎俩；所有的诱惑都是人为的，非自然的。从这个时候起，女人便是陷阱，女人成了最功利的东西。克里斯在自己的社会中看到足够的女性早已干涸的女性。这个海洋上的清晨他想，扶桑是个真正的、最原本的女性。那泥土般真诚的女性。（1996b: 142）		①背景：克里斯赞美扶桑的自然原始。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3	有时，虽然你就这样近的在我面前，我却疑惑你其实不是我了解的你；你那时代的服饰、发型、首饰只是个假象， 实质的你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不，比那还古老。实质的你属于人类的文明发育之前、概念形		①背景：叙述者强调扶桑的自然原始。 ②译文： 删除 了整个段落。

²⁰¹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例子也体现“扶桑的母亲意象”。

	<p>成之前的天真和自由的时代。我不说人人说的伊甸园。伊甸园已成了概念。这大概是你成名的真正原因。因为每个男人在脱下所有的衣服时，随你返回到了无概念的混沌和天真中去了。（1996b: 151）</p>		
4	<p>是那敏感。你感到肉体在他的接触下敏感得发疼。那片任你沉浮的混沌没了，那片阔大的无意识潮一样退去。痛苦升上来。[……]你成了一堆感觉，一堆灵性，一点点失去了你肉体的保护；你像自然和旷野本身的肉体正从那无际的自然中脱离，被这敏感离间了。（1996b: 190）</p>	<p>It was the sensitivity. His touch made you ache. Your usual <i>detachment</i> receded like a tide and pain washed in. [...] You became a morass of raw emotion from which your body could no longer shield you. (2001: 186-187)</p>	<p>①背景：叙述者强调扶桑对克里斯的感情影响了扶桑的自然原始，使她变得脆弱。 ②译文：删除了斜体部分；把原文中的“无意识”改成“detachment”。</p>
5	<p>甚至，你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出卖，因为你只是接受男人们，那样平等地在被糟蹋的同时享受，在给予的同时索取。你本能地把这个买卖过程变成了肉体自行沟通。你肉体的友善使你从来没有领悟到你需要兜售它。肉体间的相互交流是生命自身的发言与切磋。这就再次使我质疑：扶桑你或许是从很远古的年代来的。（1996b: 227）</p>		<p>①背景：叙述者强调扶桑的自然原始。 ②译文：删除了整个段落。</p>
6	<p>让我告诉你实话，你不怕强奸。我刚刚明白这一点。你没有恐惧，对于强奸的恐惧主要来源于它的概念。（1996b: 228）</p>		<p>①背景：叙述者强调扶桑的自然原始。 ②译文：删除了整个段落。</p>
7	<p>在跪作为一个纯生物姿态形成概念之前，在它有一切卑屈、恭顺的奴性意味之前，它有着与其他所有姿态的平等。它有着自由的属性。（1996b: 254）</p>		<p>①背景：扶桑跪下来宽恕了强奸她的克里斯。克里斯把她的“跪”理解成纯生物姿态，凸显扶桑的自然原始。 ②译文：删除了整个段落。</p>
8	<p>扶桑，她从原始走来，因此她健壮、自由、无懈可击。（1996b: 275）</p>		<p>①背景：叙述者强调扶桑的自然原始。 ②译文：删除整个段落。</p>
9	<p>他想，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p>	<p>He thought, What made the image of</p>	<p>①背景：克里斯强调扶桑的自然原始。</p>

	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勢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 (1996b: 254) ²⁰²	Fusang kneeling so moving was the fact that it embodied the <i>age-old</i> compassion of women for men. (1996: 250)	②译文：用“age-old”取代“最远古的”。
10	克里斯此刻终于懂了几年前的那个场景：扶桑被一群男人用铁链拴走；脸上带血，披头散发使她成为贯穿几千年历史的奴隶形象，然而她低下头，对自己深深一笑，为她得逞的一切，为她的自由。事情多荒谬啊，克里斯在他三十岁、四十岁，在他以后的整段余生中不断想到扶桑那笑给自己的笑。 你解放她或奴役她，她那无边无际的自由只属于她的内心。 （1996b: 144）	Chris finally understood what had happened that day. Dragged off in chains by a gang of men, her face bloody, her hair a mess, Fusang had become a typical slave girl. Yet she had bowed her head and smiled to herself. How absurd! At thirty, at forty,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Chris would keep thinking of the way Fusang smiled. <i>Whether you set her free or enslaved her, her freedom came completely from within.</i> (2001: 142)	①背景：克里斯强调扶桑的内心自由。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11	那个跪着的扶桑，穿柔软随身的绸衫，什么颜色他已不记得，有时他想象它就是肉体的本色。她实质上是裸露的。他只记得那是个美丽的形象。 因为她心里实际上有一片自由，绝不是解放和拯救所能给予的。绝不是任何人能收回或给予的。 （1996b: 201）	Fusang was kneeling, dressed in soft silk that traced the shape of her body. He couldn't remember what color it was, but sometimes he imagined it was the color of her skin. She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naked. He just remembered it was a beautiful image. <i>Because deep down she really was free; she had the kind of freedom that rescue</i>	①背景：克里斯强调扶桑的内心自由。 ②译文：大体 忠实 传递了关键信息。

²⁰² 在谈论翻译“扶桑的宽恕”时，我也引用了这个例子。

		<i>or salvation could never bring, the kind that nobody could ever give or take away.</i> (2001: 197-198)	
在所有例子中，删改约占 82%，忠实传递约占 18%。			

表 10：翻译“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

从上表可知，在强调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的十一个例子中，有九例被删改，而剩下两例被忠实传递。那么，这是否说明，在处理这个主题时，译者 Silber “显得”体现了立场分裂，即在迎合所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同时，体现了某种程度抵制？

强调女性的理性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根基，该话语正是通过强调女性具有同男性一样的理性能力为女性争取权利。另一方面，该话语也推崇物质意义上的自由。考虑到这十一个例子均（直接或间接）推崇去除女性的意识理性，或者推崇女性在去除意识理性后获得的内心自由，它们为此都有着针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抵触性。考虑到译者 Silber 删改了其中的 82%，而忠实传递了其中的 18%，这表明 Silber 在处理这个主题方面确实体现了立场上的分裂。

但是，正如我从一开始就指出，不同例子所具有的抵触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本部分所关注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来说，针对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话语，具有最高抵触程度的是自然原始（例 1、2、3、4、5、6、7、8、9），然后是内心自由（例 10、11）。之所以说自然原始有着最高的抵触性，是因为对女性理性的强调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根基。以自然原始所象征的对文明概念包括卖淫和强奸的否认和抵制为例。事实上，这种否认和抵制因为建立在完全解构自我的基础上，显得非常极端而让人难以接受，²⁰³不仅被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所不容，也被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所不容。另一方面，之所以说严歌苓所强调的内心自由有着更低程度的抵触性，是因为尽管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强调要在物质层面给女性赋权并使女性获得实质意义上的自由，但内心自由毕

²⁰³ 如果说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强调并捍卫女性自我边界的不可渗透性，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如文化女性主义，则强调并美化女性自我边界的可渗透性。但是，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所强调的自我边界可渗透性，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所凸显的自我解构，也还不是一回事。

竟也是某种自由，从而并非具有纯粹不可接受的他性。

从上表可知，译者 Silber 删改了凸显扶桑的自然原始的例子（共九例），而保留了凸显扶桑的内心自由的例子（共两例）。

可见，在翻译“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方面，基于对翻译行为本身的分析，译者 Silber 体现了立场上的分裂，因为她忠实传递了对所认同话语构成抵触性的两个例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的抵制。但是，考虑到 Silber 删改了抵触性更高的九个例子，这仍然表明她受到所认同主流话语的影响。

为此，正如翻译“扶桑的宽恕”和“扶桑的以受为攻”一样，在翻译“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方面，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只是在一定程度内。同样，我们还是得承认事实的其他可能性。比如，上述表格中所有的删改例子（除例 2 外，这是唯一一个我有证据证明是 Silber 建议删改的例子），或许均跟编辑相关。不过，这还是无从得知了。

（五）翻译“扶桑的女菩萨形象”

上文所考察的四个方面，包括扶桑的母亲意象，扶桑的宽恕，扶桑的以受为攻，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分别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四个观点相对应。我在本部分要考察的第五个方面即扶桑的女菩萨形象，并没有对应于上述四个观点，而是对这些观点的抽象延伸。

“菩萨”（Bodhisattva）跟佛教相关，指代“修持六度万行，追求大觉，救度众生，于未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刘贵杰 2006: 131）。菩萨修行的“六度”，包括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智慧度。其中，布施度表示菩萨将自己的一切给予众生，包括钱财、知识、体力等，并在此过程中做到对众生无所厚薄，无论亲疏爱恨，从而实践佛教以平等公正为根基的大慈大悲之道。

扶桑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女菩萨。但是，扶桑借助妓女身份实践无所厚薄的肉身布施，这使得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女菩萨形象。事实上，扶桑的肉身布施已被很多学者所认同。比如，王德威（1996: vi）在论及《扶桑》时指出“扶桑肉身布施，却始终带着一抹迷样微笑”。在散文《性与文学》中，严歌苓

(1999b: 158) 也用了“无歧视的布施”来形容扶桑。

考虑到 19 世纪唐人街华裔男性的压抑状态（当时美国移民法禁止中国移民携妻眷入内），女菩萨般的扶桑把自己的肉身布施给这些苦力，减少他们在异国的苦难。这是《扶桑》中的一个段落及其翻译：

原文：六十岁的一天，克里斯想起他十二岁的一个瞬间。唐人区一条窄巷中，他看见了一个中国妓女。幽黑的窗格内，她完美如一尊**女神**胸像。她红色衣裳临界她身后的黑暗，她若往后靠那么一丁点，似乎就会与黑暗融和。她微笑得那么无意义，却那么诚意和温暖，**母性和娼妓**就那样共存在她身上。(1996b: 104)。²⁰⁵

译文：删除。

该段落表明，扶桑这个形象超越了贞洁与放荡、母亲与妓女之间的简单对立（Feng 2000: 65）。这种超越非常完美地体现于肉身布施的女菩萨（或是“女神”）形象：一方面，女菩萨对众生有着母亲般的关爱，满足在她眼中如孩子般的众生的需要，如这里的肉体需要；另一方面，女菩萨如母亲般满足众生的肉体需要，得借助妓女身份实现。

但是，这一段落在翻译中被删除，并且有证据证明这是译者 Silber 标上括号建议编辑删除的。这或许是因为 Silber 无法理解母性与娼妓同存一体的可能性，从而无法意识到严歌苓借女菩萨形象给扶桑赋权的女性主义意义：如果一个被过度剥削的妓女与嫖客之间的关系是弱者与强者关系，那么，一个被过度剥削并以肉身布施的女菩萨，与布施对象/男性之间的关系，则是强者与弱者关系，因为菩萨总是“高”于凡俗众生。

考虑到《扶桑》不止一个凸显扶桑的女菩萨形象的例子，为了解译者 Silber 的总体翻译情况，我提供以下表格供参考：

例	原文	译文	说明
1	六十岁的一天，克里斯想起他十二岁的一个瞬间。唐人区一条窄巷中，他看见了一个中国		①背景：老年克里斯回忆他首次见到妓女扶桑时的情景。 ②译文： 删除 整个段落。

²⁰⁵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例子也体现“扶桑的母亲意象”。

	妓女。幽黑的窗格内，她完美如一尊 女神 胸像。她红色衣裳临界她身后的黑暗，她若往后靠那么一丁点，似乎就会与黑暗融和。她笑得那么无意义，却那么诚意和温暖， 母性和娼妓 就那样共存在她身上。（1996b: 104）		
2	她那著名的温柔不就是无耻？ 她一视同仁地接受每个男人 ，弄得贵贱文野都没了，这不是最原始的无耻？这不是让整个城市返祖的无耻？（1996b: 209） ²⁰⁶		①背景：这是白人对扶桑的评论，从侧面凸显了她无歧视的肉身布施。 ②译文： 删除 整个段落。
3	他又进一步想到，扶桑是存心不要记住任何人名字的。这样她对任何一个人笑起来，那人才感到一份格外的体己，一份仅为他而生的温柔。他想得不敢再想下去：扶桑原来是 每个人的老婆 。（1996b: 263）		①背景：扶桑的“主人”大勇，曾经想把她许配给她叫得出名字的任何嫖客，但她一个都叫不出来。借助阿丁的视角，严歌苓强调扶桑实践以平等公正为根基的慈悲原则。 ②译文： 删除 整个段落。
删改占 100%。			

表 11：翻译“扶桑的女菩萨形象”

跟我在上文所考察的四个方面（扶桑的母亲意象、扶桑的宽恕、扶桑的以受为攻、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相比，《扶桑》并没有太多体现“扶桑的女菩萨形象”的例子。我只找到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从上表可知，译者 Silber 删除了凸显扶桑的女菩萨形象的所有例子；尽管只有三个，却也能说明一定问题。我们可以假设，Silber 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辨认出这些例子背后的女性主义意图，认为这些段落逻辑不通而建议删除。她或许质疑：怎可以将母性与娼妓相联系（例 1）？扶桑怎可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嫖客，而没有任何亲疏厚薄（例 2）？扶桑怎可能是每个人的老婆（例 3）？

我们也可以假设，这跟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相关。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是世俗女性主义，而严歌苓在上述三例中建构的却是某种宗教意义上的女神女性主义。²⁰⁷相对于倾向认为所有宗教都具有压迫性质的世俗

²⁰⁶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例子也体现“扶桑的自然原始”。

²⁰⁷ Raphael (2000: 13) 指出，学界对“女神”（Goddess）有不同解释，有些将其理解为真正的神，有些

女性主义，女神女性主义推崇女性的精神/政治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的一种形式（Raphael 2000: 22; 30-31）。但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看来，女神所象征的母性是“倒胃口的”和“倒退的”（Raphael 2000: 68）。

（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代表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女神女性主义之间的冲突，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译者 Silber 理解和认可上述三例。如果 Silber 能认可女神女性主义，认可女神的女性主义意义，或许就能更能认可体现于扶桑的女菩萨形象的女性主义意义，而不会（建议）删除上述三例了。这表明，就翻译“扶桑的女菩萨形象”而言，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

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上述例子（除例 1 外）或许根本与 Silber 无关，而需编辑负责，但这还是无从得知了。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扶桑》中的扶桑是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典范。尽管集中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扶桑，用严歌苓自己的话说，“具有大量的、非常高的假设性，基本上已经超现实了”（引自雅非 2003），这并不妨碍集中体现于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针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的抵制意义。集中体现于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用王德威的话说，“避免了（简单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论证公式”（1996: vi-vii），这是因为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既非纯粹的西方女性主义，也非纯粹的后殖民主义，而是干涉两者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这涉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背后的民族主义。尽管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有着彼此冲突的社会政治目标，因为女性主义旨在超越地理文化边界给所有女性赋权，而民族主义则旨在强化这些边界以对抗霸权，民族主义可作为一种[用以抵制西方女性主义霸权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策略存在（Donaldson 1992: 9; 11）。从这个视角看，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也是某种后殖民女性主义策略。

美国白人女性 Silber 是《扶桑》的英译者。她体现了一种复杂状况：一方

将其理解成某个“解放原型”（liberating archetype）。

面，她有着高度“有色”思想，具有包括高度“有色”成分的“白人女性身份”，以各种方式声明自己对“话语殖民”的抵制，以及对他者和差异的尊重；另一方面，她却没有足够认识到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本土性”，而在很大程度上，在潜意识层面，以此为参考框架看待其他文化中的性别问题。

在此背景下，以及假设译者 Silber 需要对《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情况负很大责任，本章考察 Silber 的“有色”思想和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如何体现于她的翻译实践，考察她的“有色”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帮助她免受所认同主流话语的“奴役”，而尊重代表他者和差异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具体而言，本章考察了《扶桑》中五个方面的翻译情况，包括扶桑的母亲意象，扶桑的宽恕，扶桑的以受为攻，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以及扶桑的女菩萨形象。这是我根据第三节的分析所做的表格：

《扶桑》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译文的删改情况	
1	扶桑的母亲意象（共十例）		共删改了约 50%	
2	扶桑的宽恕（共九例）		共删改了约 56%	
3	扶桑的以受为攻（共十例）	在接受中消解	删改了约 25%	共删改了约 60%
		在享受中消解	删改了约 67%	
		对施与者与承受者之间强弱关系的道家式颠覆	删改了 100%	
4	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共十四例）	自然原始	删改了 100%	共删改了约 82%
		内心自由	没有删改	
5	扶桑的女菩萨形象（共三例）		删改了 100%	

表 12：翻译《扶桑》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

可见，在处理《扶桑》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时，译者 Silber 体现了明显

的分裂：在删除一部分质疑她所认同主流话语的例子的同时，也忠实传递了另外一些。这事实上反映了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与她的“有色”思想之间的张力。

接下来，我将分析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和“有色”思想如何影响她的翻译。

一 译者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在翻译中的体现

从第三节可知，Silber 明确表示她完全无法认同扶桑这个人物形象。考虑到她在编辑 Schwalbe 授权下有建议删除的权力，这势必影响她处理体现于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方式。

根据表 12 提供的统计，我们可以认为，在处理《扶桑》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时，Silber 不可避免地受到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影响，为此体现了一定的审查倾向。这最明显体现于以下事实：Silber 建议删除《扶桑》中（在我看来）最集中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整块内容：

六十岁的克里斯嘴上的烟斗一丝烟也不冒，眼睛却像在浓烟中那样虚起。他看着心目中这个女人，明白了他投入这女人的原因。竟是——母性。极端的异国情调诱使少年的他往深处勘探她，结果他在多年后发现这竟是母性。那种古老的母性，早一期文明中所含有的母性。他心目中的母性包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母性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她没有排斥，不加取舍的胸怀是淫荡最优美的体现。六十岁的克里斯叼着烟斗，一动不动。就像他十四岁一动不动看着窗内。看着她怎样敞开自己，给人去毁去践踏。十多个人。还有更多。在她被毁灭的一瞬间，她直瞪瞪朝向他的眼里有什么在怒放。她的本性怒放了，倏然从被毁灭的自己、被践踏成土的自己跃然腾空，整场的毁灭带来的竟是这刹那间脱缰奔放的奔放的自由。她竟借助那场毁灭在一瞬间释放了自己。被撕碎，被揉得如同垃圾的她在这一瞬的涅槃；当从床上浑身汗水，下体浴血站起来时她披着几乎褴褛的红绸衫站起时，她是一只扶摇而升的凤凰。这是个最自由的身体，因为灵魂没有统治它。灵魂和肉体的平等使许多概念，比如羞辱和受难，失去了恒古的定义。她缓步走出那床的罪恶氛围，黑发、红衣、眼神犹如长辞般宽恕和满足，遍体鳞伤和疼痛无不写在她的动作和体态上。她嘴角上翘，天生的两撇微笑，一切都使那巨大的苦难变成对于她的成全。受难不该是羞辱的，受难有它的高贵和圣洁。这些是克里斯在六十岁想到的，用了他几乎一生才想到的。他想到她长辞般的微笑，只有母性有这样深厚的宽恕和满足。（1996b: 104-106）

这一整块内容，提及了扶桑的母性、宽恕、对受难的接受与超越、对常规概念的解构等（为此涵盖了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诸多方面），在译文中被删除。

而这整块内容，恰恰是译者 Silber 用括号标注出来建议编辑 Schwalbe 删除的。在于 1999 年 11 月 15 日写给 Schwalbe 的一封信中，Silber 指出她用括号标注了《扶桑》中的上述内容，并表示她已在译文中加了一句可代替上述内容的句子。而 Silber 本人也明确指出，她认为上述内容是《扶桑》中最“弱”（weakest）的内容。考虑到上述内容对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意义，这也从侧面说明 Silber 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反感程度。

从表 12 可知，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对她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一定程度控制，这是因为《扶桑》中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五个方面，均被不同程度地删改，比如译文删改了 50%体现“扶桑的母亲意象”的例子，56%体现“扶桑的宽恕”的例子，60%体现“扶桑的以受为攻”的例子，82%体现“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的例子，以及 100%体现“扶桑的女菩萨形象”的例子。

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强调理性，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理性，并通过强调两性有着共同的理性能力而为女性争取权利。但是，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反话语”）假设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善良，²⁰⁸并通过抛弃常规理性、概念等建构女性权力。

很明显，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标准看，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不但不是女性主义，甚至还有父权和反女性主义之嫌。具体而言，在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以下观点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父权观点：女性生性被动，像容器一样等待被填充；能够对男性虐待不动声色的女性，较之于不满男性虐待的女性，存活的可能性更大；女性卵子在受孕时基本是“受虐狂的”（masochistic），女性渴望痛苦，请求“屠杀”（slaughter）和牺牲；女性没有太多自我。²⁰⁹

为此，我们可以假设，译者 Silber 很可能认为我所谓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就是父权观点，因为严歌苓也强调女性对苦难和虐待的被动接受甚至享受，强调女性的原始和无我等，而没有足够认识到严歌苓建构的是迥异于她本人所信奉的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严歌苓式所强调的女性在生理物质层面的接受性，不是父权视角下的懦弱象征，而是涉及道和佛的某种高层境界；所强调的女性在受难中享受，也不是父权视角下的受虐癖好，而是某种攻击策略，等等。另

²⁰⁸ 在散文《弱者的宣言》中，严歌苓指出“善良是标界在人和畜之间的第一个标识”（1999b: 177）。

²⁰⁹ 上述信息参考自 Griffin（1978: 5; 28; 38; 45; 84）。

外，正如 Zauberga (2000: 52) 指出，美国在出版作品时，除需要修改或去除凸显文化差异的“话语特征”外，还需要满足政治正确的要求，比如，安徒生童话的 1993 年美国译文“审查”了小美人鱼的白色臂膀，以避免种族歧视，并把原文中的王子睡在美人鱼胸上改成王子睡在美人鱼肩头，以避免“刻板化”(stereotyping) 和性别歧视。考虑到上述原因，我们可以认为，对于 Silber 而言，她或许只是在编辑 Schwalbe 授权下，以政治正确(提倡男女平等)的名义，(建议)删除《扶桑》中她认为政治不正确的信息，即某些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例子。

此外，需要承认的是，有时译者(建议)删除某个(些)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例子，或许是因为她觉得逻辑不通，而不是因为这些例子抵制了她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正如我在第三节指出)。但是，类似删改还是与该话语相关，因为对该话语的认同使得她无法辨认出逻辑不通背后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意义。

另一方面，从表 12 可知，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在压制《扶桑》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时，还体现了一定特点。这可参考译文对其中五个方面的不同程度删改。具体而言，在所涉及的五个方面中，被删改得最为厉害的首先是“扶桑的女菩萨形象”(100%)，其次是“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82%)，再次是“扶桑的以受为攻”(60%)，再次是“扶桑的宽恕”(56%)，最后是“扶桑的母亲意象”(50%)。

从第三节可知，在上述五个方面中，最大程度借助道家和佛教思想(往往被纳入东方宗教文化体系)的分别是“扶桑的女菩萨形象”(佛教)、“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道家中道的境界)、“扶桑的以受为攻”(佛教对受难的认可和道家式辩证)。另外两个方面(“扶桑的宽恕”和“扶桑的母亲意象”)尽管也可以跟道家和佛教相关，但具有更大程度的文化共通性，比如宽恕是很多宗教包括基督教认可的一个美德，而母亲也是一些非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流派借以给女性赋权的概念，等等。

可见，尽管上述五个方面从主题而言均与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相抵触，仅仅从表 12 的删改比例判断，我们可以假设，这五个方面因为“他性”程度的不同(即在不同程度上借助道家和佛教思想)，在翻译中的命运也不同。总体而言，“他性”程度越高(即在更高程度上借助道家和佛教思

想)的例子,在翻译中受到审查的力度也越大,因为“他性”程度越高,给女性赋权的方式也更容易受到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抵制。正如 Dingwaney (1995: 4-5)所言,不平等权力关系语境下的文化“翻译”,往往对外来概念进行“熟悉化”(familiarization),在此过程中去掉这些概念所代表的“陌生”或“极度晦涩”。

相对于译文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压制倾向(遗憾的是,这些压制所体现的形式,如第三节的五个表格所示,在很大程度上是“删除”,如省略整个段落或句子,而不是更能体现主体立场的“重写”,但这是我能找到的所有代表性例子),《扶桑》中涉及华裔女性悲惨状况等的内容,从西方女性主义立场看谴责父权的内容,则在翻译中被如实传递。

正如我本章开头指出,《扶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包含各种相互冲突的话语。除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外,《扶桑》中也有一些可被纳入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框架的描述或观点。比如,严歌苓也描述了华裔妓女的悲惨处境、中国的包办婚姻及其对女性的压迫等。但根据我的考察,这些内容在翻译中基本得到保留。除对女性压迫处境进行描述外,严歌苓也对卖淫与婚姻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认为婚姻事实上意味着女性的出卖,同卖淫没有本质区别。²¹⁰严歌苓的这个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有关类似话题的定位。²¹¹为此,我们可以假设,这是体现严歌苓上述观点的段落在翻译中得到保留的原因(之一)。

可见,在涉及《扶桑》中的女性问题方面,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确实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导致很多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例子没能进入英语读者的视野。尽管一些英语读者的评论表明她们已较为接近严歌苓塑造扶桑的意图,但《扶桑》译文对很多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的删除,势必阻止她们辨认或理解其中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比如,Shapiro(2001)

²¹⁰ 这是《扶桑》中有关卖淫与婚姻的段落:“出卖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人们认为你在出卖,而并不认为我周围这些女人在出卖。我的时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这么多的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好了,成交。这种出卖的概念被成功偷换了,变成婚嫁。这些女人每个晚上出卖给一个男人,她们的肉体像货物一样聋哑,无动于衷。这份出卖为她换来无忧无虑的三餐、几柜子衣服和首饰。不止这一种出卖,有人卖自己给权势,有人卖给名望。有人可以卖自己给一个城市户口或美国绿卡。有多少女人不在出卖?难道我没有出卖?多少次的甘愿中,我在男性的身体下躺得像一堆货(1996b: 227)。”

²¹¹ 有关婚姻与卖淫的关系是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已得到广泛探讨。比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 Wollstonecraft 在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中指出,为其他目的结婚的女性好比妓女,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者 Beauvoir 也在《第二性》中表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妓女与已婚女人有着同样地位。

指出,通过强调扶桑的超越能力,严歌苓似乎试图提出有关“女性”(femaleness)和中国文化本质等的看法,提出“顺从的好处”(virtues of yielding)。McWilliams (2005: 143)则表示,《扶桑》的叙述者为扶桑的长寿及她对父权势力的抵制感到骄傲,并希望为“中国女性能动性的复兴”(renaissance in Chinese female agency)创造一种可能性。这两位参考《扶桑》英文版的评论者明显承认任人处置的扶桑所象征的积极意义,但她们均没有明确提及或探讨扶桑的女性主义意义,这或许跟许多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在翻译中被删除有关。

Silber 曾强调,尽管她喜欢《扶桑》这部小说,但她认为《扶桑》中文版的确需要编辑,并指出严歌苓本人告诉她,她(严歌苓)因为赶着用《扶桑》参加某个台湾文学奖,在中文版出版前没来得及好好修改。我们可以假设, Silber 认为需要编辑修改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发生冲突的内容,即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例子。

Spivak 曾在“*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1993: 188)中指出,译者必须认识到英语文化中看起来“抵制”的观点在源语文化中或许是“反动”的。也就是说,对抵制和反动的界定因文化而异,译者不应该用目的语文化的标准来重写源文本。这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而 Silber 也在某些时候落入了类似境地。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这或许跟出版社的商业性质相关。出版《扶桑》英文版的美国商业出版社 Hyperion East,是 Walt Disney Company 旗下 Hyperion 出版社的一家分社。出版社的商业性质决定该出版社必须考虑主流读者,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编辑和译者的行为。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假设译者 Silber 能完全摆脱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奴役”(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而决定忠实翻译《扶桑》中所有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内容,Hyperion East 的编辑 Schwalbe 也不会“放过”有关内容,因为他必须考虑美国主流读者和市场,而美国主流读者却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认同者。事实上, Schwalbe 曾指出,他作为 Hyperion East 主编的责任是保证所出版作品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并让出版社盈利 (Stronach 2006)。

严歌苓指出:“我的《扶桑》的翻译当中,我参与比较多,我费的时间和精力都很多。我和我的翻译整天整天地在电话里讨论,一打就是七八个钟头,搞了一两个月”(引自王颖 2001: 198)。事实证明,严歌苓在决定《扶桑》译

文的最终面貌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该删的还是被删了，争取也无济于事。这也是为什么严歌苓指出，她认为非常感动的东西“很可能到美国文化中是太过分的多愁善感，外国人对中国作家普遍的反映就是多愁善感，遣词造句抒情太多”（2006: 266）。然而，很多时候，“多愁善感”只是有关主体借以审查的借口，事实上另有其他考虑。这个借口呈各种不同形式，正如译者 Silber 告诉对删除《扶桑》中某些段落表示抗议的严歌苓，某些删除是因为有关内容在西方读者看来是“老调重弹”（rehashing the obvious），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什么真知灼见。

严歌苓曾在散文《弱者的宣言》中指出“好莱坞不顾践踏文学遗产之嫌，把好好一个小人鱼改成了又打又闹的女战士”，这是因为这些好莱坞大师“把当今社会中女人的心理——绝不作输者——填进了小人鱼，粗暴地更换下安徒生寄托在小人鱼身上最后的理想和希望”（1999b: 172-173）。同样道理，严歌苓在《扶桑》中所建构的体现小人鱼精神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也在翻译中受到了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抵制。

二 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在翻译中的体现

尽管 Silber 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这不能否认她具有高度“有色”思想的事实，即对他者的尊重和支持。类似“有色”意识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白人身份的一个重要成分，同时也跟 Silber 的汉学家背景和犹太人身份相关（我已在第三节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方面，Silber 在其学术文本中明确表示了尊重他者的立场，以及对话语殖民（如把自己和所属文化有关特定问题的特定看法强加于他者）的抵制。比如，Silber 认为话语殖民很明显体现于西方学者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文本，而她之所以写有关中国女书的博士论文，正是为了尽可能勾勒中国女书的历史文化特性，避免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组织）等就女书进行的话语殖民。此外，Silber 也强调需要承认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之间的差异。除了在性别问题方面体现对他者的尊重之外，Silber 在其他方面也体现了类似立场，比如强调不要把自己（和所属文化）有关某些普通概念如“私”（privacy）的认识强加于他者。另一方面，Silber 在其政治实践中体现了服务他者的立场，这些他者包括被美国“欺凌”的

国家、有色人种、穷人等。

同样道理，尽管我们可以假设，译者 Silber 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这同样不能否认她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试图避免受所认同话语的“奴役”，而忠实传递一部分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内容。

从表 12 可知，在涉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五个方面，译文体现了不同程度的忠实传递：扶桑的母亲意象（50%），扶桑的宽恕（44%），扶桑的以受为攻（40%），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18%），扶桑的女菩萨形象（0%）。

除“扶桑的母亲意象”（我在第三节指出，Silber 所忠实传递的凸显该主题的例子，并没有在实际意义上构成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抵制），和“扶桑的女菩萨形象”（Silber 没有忠实传达仅有的凸显该主题的三个例子）外，在翻译“扶桑的宽恕”、“扶桑的以受为攻”、“扶桑的自然原始和内心自由”方面，Silber 忠实传递了某些与所认同话语相冲突的例子，明确体现了抵制自身所认同话语的立场，“在效果上”构成了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认可和尊重。

比如，Silber 忠实传递了所有涉及扶桑的“内心自由”的例子（尽管只有两个）。这种道家式自由很明显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相抵触。但是，Silber 做到了成功抵制。事实上，Silber（1995b: 3）曾表示不喜欢美国把自己有关自由的理解强加于其他文化。这表明，在“自由”这个问题上，译者 Silber 尊重他者的“有色”思想发挥了较大作用，使得她可以忠实地传递有关例子所体现的“扶桑式自由”。

三 小结

从上文可知，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及其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认同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明显体现于《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然而，在这场较量中，译者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占了上风。

考虑到 Silber 的高度“有色”思想，她强烈的尊重他者的意识，尤其是在性别问题方面对话语殖民的强烈抵制，比如西方女性对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殖民，我们不禁质疑：为什么《扶桑》中代表他者和差异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没有获得 Silber 的足够尊重，导致她的“有色”思想最终被所认同的主流西方

女性主义话语所“击败”？

在我看来，这有以下几个可能性。

第一，这或许涉及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霸权地位。考虑到正如 DiQuinzio (1999: 2) 所言，霸权的意义在于有关观点对个体而言成为常识或“事情的本象” (the way things are)，这说明很多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信条已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无意识，包括西方女性以及很多被该话语“洗脑”的第三世界女性，她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质疑。很遗憾，该话语也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译者 Silber 的无意识层面，她基本没有质疑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地方性”，而将其当作“普遍真理”，并以此为参考框架看待其他文化中的性别问题（我已在第三节对此进行了谈论）。

为此，尽管白人女性 Silber 深刻认识到西方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并强烈表示要尊重第三世界女性他者，她的“有色”思想，似乎只在认为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是最合理女性主义的前提下起作用。为此，就很多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在翻译中被删改而言，与其说这是译者 Silber 本人的偏见，还不如说是她所认同主流话语的霸权在起作用。也就是说，Silber 删改有关内容从而压制了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或许是因为受到“白色”的无意识习惯的影响。

212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假设，某些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之所以在翻译中被删改，从本质上而言，是因为目的语文化所推崇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与原文本所推崇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之间，存在本质冲突和权力差异。

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本质冲突，在于两者所依托的文化理据不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涉及道家/佛教，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自由主义。对于自我、解放、物质、精神等概念，道家/佛教和自由主义有着相互冲突的理解：道家/佛教强调无我并致力于消解自我的边界，自由主义强调自我并致力于巩固自我的边界；道家/佛教认为解放意味着达到无我的境界，而自由主义认为解放意味着自我边界不受干涉和侵犯，等等。²¹³

²¹² 正如 Sun (2006: 29) 指出，边缘化他者可能是某种“文化无意识行为”。

²¹³ Clifford Geertz 曾在“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中指出：“西方把人视为一个有边界的、独特的、大致完整的具有动机和认识能力的体系，一个把意识、感情、判断、行为组成一个独特整体，并将其与其他类似整体和社会自然背景相对的动态中心，这种观点尽管对我们来说根深蒂固，但也仅仅是世界文化语境中一个非常特殊的观点”（引自 Klein 1995: 25）。道家和佛教有关自我的观点质疑了这个主流西方观点。

道家/佛教与自由主义，作为两个彼此冲突的文化传统和话语，从全球层面看，权力关系不言而喻。而道家/佛教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权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之间的权力差异。这种权力差异或许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某些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内容的删除。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某些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看法。Schutte（2000: 58-59）表示，尽管西方女性主义者越来越注意女性内部差异，她不是特别确定西方女性主义者是否把自己看成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其中一个分支，而考虑到西方思想自认为不具有文化特性，西方女性主义还是继续认为自己有关女性解放的观点适用所有女性。Schutte 的这个观点也可以解释《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情况。

综上所述，译者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白色”立场），之所以“击败”她的“有色”思想，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某些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信条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Silber 的无意识，以至于超越她本人的控制范围。

第二，这或许涉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所代表的“极度他性”（radical alterity）。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是反直觉的，尤其是它对女性受难的歌颂和合理化，同时也似乎违反了有关性别政治的常识性看法。事实上，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极度他性”不仅是对西方女性主义者（尤其是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者）而言。考虑到很多中国女性主义者也信奉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对她们而言也具有很大的“他性”。

以道家 and 佛教思想为依托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不仅彻底解构了很多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信条，也颠覆了很多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关键概念（如第二性、压迫等），提倡了确实暧昧难懂并有争议的女性抵制方式。对于浸染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译者 Silber 来说，要辨认出“狡猾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确实是难为了她。Silber 或许无法想象对卖淫、强奸等概念的无意识会是某种女性主义，无法想象对所有嫖客的大慈大悲会是某种女性主义。

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没有上述“极度他性”，译者 Silber 的“有色”思想将会有着更大的发挥余地。事实上，Silber 大体忠实地翻译了其她女性文本，包括丁小琪的《马兰花，马兰花》、《黑猫》、《杀母》，和苏青的《涛》。丁小琪和苏青的这些文本也涉及女性问题，但绝对没有《扶桑》中集中体现于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他性，从而也没有挑战 Silber 的“有色”思

想的极限。

为此，我们可以假设，译者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之所以“击败”她的“有色”思想，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极度他性”。

第三，这或许涉及 Hyperion East 出版社的商业性质。我在第四章分析 Aunt Lute 和 Virago 的翻译选材时指出，“商业动机”强化了这两个出版社的“白色”，因为“商业动机”意味着把接受语境放在第一位，并迎合西方主流话语和主流读者。同样道理，Hyperion East 的商业性质，也迫使为它服务的主体（包括译者 Silber）关注主流读者的需要。Silber 曾指出，她认为译文需要“延伸”英语，引进新要素，但考虑到文学市场的现状、英语霸权、美国人的阅读习惯，译文最重要的还是具备可读性，这就迫使译者进行自我审查。

然而，就《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而言，Silber 应该不会很强烈地感到需要违背自己的痛苦，因为主流读者的立场，从而也是出版社的立场，正是她本人所认同的立场，即支持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有了主流读者和出版社的“撑腰”，Silber 本人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便具有了无限“威力”。或许，她在根据这个立场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进行压制时，也不会感到过于“愧疚”，因为她会觉得这是大家的共识，而不是她本人的偏见。这种自我感觉“正当”的压制，显然会“力度”更大。

为此，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之所以“击败”她的“有色”思想，其中一个原因也或许跟 Hyperion East 出版社的商业性质有关。

可见，在翻译《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方面，译者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最终“击败”她的“有色”思想，涉及多方面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有关 Silber 迎合或抵制有关主流话语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基于翻译行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现实过程；我所谓的迎合或抵制，指的是有关翻译行为所体现的某种“效果”（effect），而不是翻译主体的真实立场，以及翻译行为的真实原因（这往往无从得知）。此外，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可能性。在翻译《扶桑》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方面，译者 Silber 所采取的删改和忠实传达交替的翻译策略，或许也以某种悖性的方式，导致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这个“他者”话语在目的语文化中发出了一定声音（因为已有评论者确实辨认出了扶桑这个形象的积极意义）。我们可以假设，在翻译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内容方面，如果译者不做类似删改而全盘译出，这个“他者”话语会因“极度

他性”导致目的语读者的完全抵制，从而也使得严歌苓完全无法实现借助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挑战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目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假设，Silber之所以删除某些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或许是为了抵制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通过删除她认为凸显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例子（Silber眼中的受害者，却是严歌苓眼中的强者），试图改善中国女性形象。从这个方面看，我们或许不应一味指责 Silber 的删除，而要考虑可能的积极意义或是良好动机。

以上是我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对《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英译进行的解读。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立场的学者会对相同现象做出不同解释，这涉及研究者的主体性。

比如，对于《扶桑》中最集中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整块内容在翻译中被删除的原因，Jin（2006: 583-585）也进行了推测，更为关注的是译文的接受语境。Jin 指出，这整块内容意味着严歌苓借助克里斯的视角仿拟东方主义，而删除可能是因为译者和编辑担心西方评论家和读者对此感到反感，因为他们大都是主张自由主义的白人中产阶级，期望亚洲移民文学需坚守多元文化民族主义而谴责东方主义，但有关内容却似乎是在提倡东方主义。

Jin 从目的语读者的反东方主义立场解读删除原因，自有她的理由。但在我看来，Jin 仅仅从反东方主义角度解读不是特别合适。这或许是因为她没有了解到，严歌苓塑造扶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过强调雌性抵制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正如 Feng（2000: 65）指出，上述内容尽管“危险地接近”东方主义，但这事实上反映了作者对母亲形象的迷恋。在我看来，严歌苓在此不是为了仿拟东方主义，而是在出于民族主义目的建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时，不自觉进行了自我东方化，这也是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悖论。

无论如何，Jin 跟我对同样翻译现象有不同看法，这表明任何视角包括我采用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都只是解释某个翻译现象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并非代表着唯一的可能性。

第六章 结论

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体现了对种族维度和性别维度的忽视，为此略过了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从而也导致了某些观点或结论的不足。尽管已有少数学者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了有关翻译现象或问题，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这些尝试有单薄之嫌。此外，她们也没有考虑体系性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我反思立场的缺乏。

有鉴于此，本研究一方面以提出研究问题的方式，体系性地把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纳入翻译研究中的三大领域，另一方面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尝试如何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第一节 研究发现

我在第一章谈及了本研究的三个研究目标：第一是凸显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第二是尝试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第三是了解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大体特点和可能原因。对上述目标的追求也导致了本研究的发现。

一 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

本研究表明，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提出的翻译研究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主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翻译研究所忽略却不乏重要性的问题，而对这些研究问题的探讨，在有可能得出不同于主流观点的结论的同时，也把某些主流观点问题化。

首先，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理论为例。把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纳入翻译理论，在有可能得出不同于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的同时，也把一些观点问题化。比如，从非西方女性主义视角探讨翻译行为所得出的结论，

将有可能不同于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谓的“妇占”、“以阴性的名义重写”等观点；而用非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定义女性主义译者，比如，用强调母职和利他的非洲女性主义定义女性主义译者，有可能建构出类似于慈爱地母的女性主义译者形象，从而有别于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青睐的女勇士般的女性主义译者形象。再比如，后殖民女性主义对女性之间利益冲突和权力关系的强调，也把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关女性主义译者的界定问题化，因为该界定假设女性之间存在统一利益。此外，后殖民女性主义有关女性之间权力关系以及女性自我分裂的探讨，也将复杂化有关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的探讨，而这是仅用父权所象征的压迫性界定主体性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欠缺的。

另一方面，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探讨翻译理论问题，也能开拓一些被主流后殖民翻译理论所忽略的方向，比如揭示有关翻译的性别化殖民话语，探讨如何根据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提出抵制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翻译观和策略等。另外，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在翻译理论中的切入，还将导致后殖民女性主义译者作为一个分析类别的产生，她们的翻译行为，即对殖民主义霸权和殖民主义父权的抵制，也将成为理论探讨的对象。这些探讨势必意味着把主流后殖民翻译理论性别化，从而超越该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的中性/男性视角。

其次，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史为例。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翻译史，将使得对女译者的研究超越单一父权文化背景，而把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包括西方的帝国主义史、反殖民史等。比如，比较西方女译者和第三世界女译者如何借助翻译抵制有着自身特色的父权文化，考察历史上西方女译者如何在借助翻译摆脱父权压迫，并建立个人主义女性主义自我的同时，在客观上辅助了殖民压迫，审视第三世界女译者如何借助翻译抵制西方女性主义霸权，等等。这将使得有关女译者的形象勾勒更为丰满和真实，不会给人千篇一律的抵制父权的女勇士形象。同时，类似考察也将使得在主流后殖民翻译史中隐身的第三世界女译者浮出历史地表。

最后，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批评为例。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比如了解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殖民话语，以及西方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翻译批评，将使我们关注上述殖民话语如何影响第三世界女性文本在西方的译介，关注西方女性主义霸权如何影响了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文本的翻译，等等。事实上，把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

入翻译批评，意味着对父权话语的迎合或抵制与否，不再是涉及女性文本的翻译批评在很多时候依赖的唯一重要标准，也意味着对殖民主义话语的迎合或抵制，不再是涉及第三世界文本的翻译批评在很多时候依赖的唯一重要标准，从而使得批评者开始关注一些被忽视却不失重要性的关注点。

以上大体是把后殖民女性主义切入翻译研究的学术意义。

至于政治意义，主要在于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能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西方中心倾向，以及抵制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的中性/男性倾向。上述抵制也将使得一直被边缘化的第三世界女性、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显形。考虑到当代对性别霸权和种族文化霸权的抵制，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因为对主流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主流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沟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正确。

事实上，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政治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跟当代翻译学界抵制西方/主流话语霸权的语境相关。不少学者强调需关注非西方翻译学者的观点和理论，强调类似观点和理论对于翻译研究国际对话的意义。比如，Wang 和 Sun (2008: 3) 在 *Translation, Globalisation and Localiz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中指出，应该强调本土中国翻译学者所关注和探讨的对象，而这些探讨将有可能启发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翻译学者。

二 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通过采取自我反思的研究立场，尝试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考虑到自我反思事实上是任何学术研究的要求，我如此强调要在本研究中进行自我反思，在某种程度上有重复之嫌。

我之所以明确提出要尝试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这是考虑到我在本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所采取的研究取向即“效忠取向”，特别容易忽略自我反思，而被所“效忠”的理论及政治议程所“奴役”。正如我在第一章指出，很多“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往往没有质疑预设，而满足于证实简单化权力关系的假设。第二，这是考虑到当代翻译学界对翻译研究建构性和翻译研究者主体性的强调，以及对翻译研究者需进行自我反思的强调。第三，这是考虑到具有自我反思意识和如何在实际研究

中贯彻自我反思立场是两回事。

当代学界有关身份和学术之间关系的探讨，有两个极端或理想，一个认为知识与认知者的身份无关，另一个认为知识取决于身份和体验，而介于这两个极端的学者则试图在承认身份重要性的同时，也承认研究需提供有力证据并经得起检验，因为这依然是大部分学者认为是构成“合理学术”的必要条件（Cabezón & Davaney 2004: 7）。

作为一个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有关翻译现象的研究者，我本人认同上述折中态度。一方面，我认为我的中国/第三世界女性身份影响我所开展的研究项目，即考察西方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没）影响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西方女译者对中国女性文本的翻译出版。另一方面，我也承认研究需要经得起检验，这意味着我试图在研究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的立场，尽可能对现实中的复杂情况保持敏感，使得我的研究不被我所认同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奴役”，而试图做出 Brownlie 所谓的“本土的效忠的决定”。

我的自我反思立场主要体现于第四章和第五章，前者考察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美国的 Aunt Lute 和英国的 Virago）在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所体现的翻译选材政治，后者考察有着高度“有色”思想并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美国白人女译者 Cathy Silber，如何翻译《扶桑》中的“反话语”，即旨在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抗衡的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具体而言，我的自我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个案研究前，我事先了解学界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旨在避免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重蹈“历史覆辙”，力图避免被某些预设事先“奴役”。比如，我了解到有学者批评后殖民女性主义体现了本质主义和同质化倾向，即同质化所有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意图，并体现了“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有鉴于此，在着手进行研究之前，我试图抵制这样一个想法，即本研究所涉及的西方白人女性主体，往往对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进行话语殖民，包括刻板化第三世界女性、压制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等，而相信会有抵制这个立场的主体存在，或有关主体会有抵制类似立场的时刻，等等。

这种在研究行为进行之前的抵制和反思，有助于避免研究过程中的无意识忽略情况。所谓无意识忽略，表示研究者对某些理论信条的绝对“信奉”，在某

种程度上导致她们眼里“看不到”事实上抵触了有关信条的现象。

类似反思，从理论上讲，是所有研究者都应该具备的。但是，大多数“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往往忽略这一点。

第二，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我也试图一直保持反思意识，复杂化西方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之间的权力关系，注意白人女性主体所体现的分裂性，尽可能再现包括内部冲突和不一致的具体情况，在分析有关现象时，承认从后殖民女性主义框架之外考虑其他原因的可行性，等等。

首先，以我在第四章分析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的翻译选材为例。在分析过程中，我试图肯定这两个出版社包含“有色”思想/成分即抵制霸权，而不是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两个具有“白人女性身份”的出版社肯定是百分百的“白色”。

接着，在分析 Aunt Lute 在出版严歌苓小说方面所体现的翻译选材特点时，我也没有试图把所有被该出版社选中的文本，解读成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刻板化或妖魔化，从而证实后殖民女性主义假设，即西方女性主义者在话语层面“殖民”第三世界女性。相反，我试图找出与类似假设相冲突的例子，而事实上我也确实找到了反例，比如 Aunt Lute 没有试图建构一个纯粹凸显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话语。此外，尽管 Aunt Lute 确实从总体上，“在效果上”，体现了迎合有关主流话语的倾向，从而导致 Aunt Lute 的“白色”在绝对意义上“击败”了“有色”，我也试图承认这一倾向背后的各种可能性。比如，Aunt Lute 或许并没有迎合有关主流话语的出发点或意图，而是因为有关话语信条进入无意识层面，这就涉及“白色”的无意识习惯；或者，Aunt Lute 确实有迎合有关主流话语的出发点或意图，但这不是因为信奉主流话语本身，而是因为经济原因（财政不稳定，缺乏资金）把严歌苓文集定位为具有畅销潜力的文本，从而在翻译选材时选择迎合主流读者的文本。也就是说，我认为，Aunt Lute 之所以“显得”倾向选择刻板化中国女性和中国的文本，或许不是有关编辑信奉“殖民主义逻辑”，而取决于一些她们很难控制的因素，包括霸权话语对个体在无意识层面的影响、出版社的生存需要等等。

在分析 Virago 的翻译选材特点时，在抵制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假设的情况下，尽管我确实发现，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这个出版社更明显地体

现了话语殖民的倾向，导致该出版社基本没有体现出白人主体往往被期望具有的分裂性，即对有关主流话语的抵制，而体现了某种“整体性”，我也同样承认这一发现背后的各种可能性。比如，Virago 或许并没有迎合有关主流话语的出发点或意图，而是因为有关话语信条在很大程度上进入无意识层面；或者，Virago 确实有迎合有关主流话语的出发点或意图，但这不是因为信奉主流话语，而是因为出版社的商业性质和附属性质，比如，商业性质促使该出版社选择迎合主流读者的文本，而附属性质影响该出版社的自主决定（选材决定有时受到所附属大商业集团的控制）。

最后，我在分析过程中多次强调，我有关出版社迎合或抵制主流话语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基于选择行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现实过程；强调我所谓的迎合或抵制，指的是选择行为本身所体现的某种“效果”，而不是选择主体（出版社）的真实立场，以及选择行为的真实原因（这往往无从得知）；强调迎合或抵制可以是无意识的或被动（迫）的。同时，我也强调，尽管这两个出版社的选择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了对有关主流话语的不同程度迎合，我们需要承认这些出版行为的积极意义，毕竟不是所有的第三世界女作者都有被翻译出版的机会。

以上是我在分析 Aunt Lute 和 Virago 的翻译选材政治时，所实践的自我反思立场。

其次，以我在第五章分析美国白人女译者 Silber 的翻译为例。正如我肯定 Aunt Lute 和 Virago 具有“有色”思想一样，我也强调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认同的 Silber 具有高度“有色”思想，肯定她强烈的尊重他者和差异的意识。

接着，考虑到 Barker 曾指出文化研究中“方便样本”（convenient sample）的问题，即某些样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类似样本符合研究者的“既定”（pre-given）立场和目的（不是因为这些样本具有代表性），而他人也无法检测有效性（2008: 150），²¹⁴在考察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观点的例子如何被翻译，同时考察 Silber 的“有色”思想及其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认同之间的张力如何体现其中时，我也没有只找出所谓的“方便样本”或者仅仅提及被删改的例子，而是提供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包括被删改的以及被忠实传递的，从而给读者一个比较空间和判断平台。此外，尽管我的文本分析基于以下假设，

²¹⁴ 比如，Brownlie（2003: 46）指出，Niranjana（1992）在论证其观点时专门挑选符合她目的的例子。

即译者 Silber 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情况负责，我在分析过程中也多次强调这可能跟 Silber 无关，而是编辑的建议。

在指出译者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击败”她的“有色”思想后，我试图考虑各种可能性：某些主流西方女性主义信条，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 Silber 的无意识层面，以至于超越她意识和思想的控制范围；或者，这是因为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极度他性”挑战了 Silber “有色”思想的极限；亦或者，这涉及 Hyperion East 的商业性质。考虑到商业出版社及其所设想的读者（即主流读者）均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这使得 Silber、出版社、所设想的读者，在面对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时具有了统一立场，从而也或许使得 Silber 在根据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重写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内容时，不那么“心虚”，并或许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重写”力度。

此外，我在分析过程中同样多次强调，我有关 Silber 迎合或是抵制主流话语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基于翻译行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现实过程；强调我所谓的迎合或抵制，指的是翻译行为所体现的某种“效果”，而不是翻译主体的真实立场，以及翻译行为的真实原因（这往往无从得知）；强调所谓的迎合或抵制可以是无意识的或被动（迫）的。同时，我也强调，译者 Silber 在处理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时，所采取的删改和忠实传达交替的翻译策略，或许也以某种悖性的方式使得上述“反话语”在目的语文化中发出了一定声音：在翻译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内容方面，如果译者不做类似删改而全盘译出，有关内容会因过度的“他性”导致目的语读者的完全抵制，从而也将使得严歌苓完全无法实现她借助严歌苓式女性主义挑战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目的。此外，我甚至假设，Silber 之所以删除某些体现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例子，或许是为了抵制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通过删除她认为凸显中国女性“受害者”形象的例子，试图改善中国女性形象。类似假设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译者删改行为和动机的肯定，而不是一味强调负面性。

最后，考虑到研究取向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现实的变化(Saukko 2003: 9)，以及考虑到用不同理论和取向研究同一翻译现象，也会得出不同结论，²¹⁵我

²¹⁵ Hagemann (2005) 解读伪翻译作品 *Translated Accounts* 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合适例子。针对文本正文用不流利的英语写成，而前言用标准英语写成，Hagemann 从两个相反的角度进行了解读：翻译主体采用了强化东方他性的翻译策略，从而体现殖民动机；或者，翻译主体采用了抵制目的语霸权的翻译策略，具有后殖民意义。可见，同样的翻译，因为假设翻译主体具有不同文化立场，可以被赋予完全不同的解读。

为此也提及了对同一个删改现象持完全不同意见的学者。也就是说，我认可从非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解释相同现象的可行性，而不是认为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有关现象最合适。

以上是我在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进行个案研究时，所实践的自我反思立场。

可以这么说，在我（第四章和第五章）所“建构”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话语”（任何学术从本质上而言都是某种被建构的话语）中，我的自我反思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我作为研究者“犹疑”的声音，使得我的这个研究话语包括了内部冲突与断裂成分：在认可后殖民女性主义者对西方女性的谴责的同时，认可某些西方女性抵制殖民话语的立场，强调有关主体的有色“思想”和“白色”无意识习惯之间的张力；在强调某些行为（选择出版刻板化有关对象的文本，删改原文）负面意义的同时，承认这些行为所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使得被出版的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得原文更容易得到读者接受，从而更好地实现传达其中思想的目的）；在强调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待有关翻译现象之意义的同时，也承认从其他视角看待同一现象的可取之处；在强调某些假设具有较大说服力的同时，承认这些假设的不妥之处，等等。

与此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所建构的“话语”（正如第三章所提及的 Amireh 和 Kahf 的研究），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平整的、光洁的，研究者所体现的声音，用 Brownlie (2003: 54) 的话说，也是“自信武断的”，所提供的画面也比较单一，无非就是试图证明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话语“殖民”第三世界女性。考虑到现实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没有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建构的是一个理想却不现实的话语。

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正如我在本研究的“尝试”表明，颇有其暧昧之处。进行自我反思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不再致力于建构一个统一而无任何内部异质的话语，而试图敞开整个研究过程，凸显其中的不确定性和暧昧之处。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 Lowe 的有关观点。在谈到文化批评时，Lowe (1991: 28) 曾指出，批评者不应该寻求如何把“偏移”（slippage）、“不稳定性”（instability）、“多义性”（multivalence）等类似现象，嵌入某个话语和反话语，而应该意识到“多样性”（heterogeneities）和“暧昧”

(ambivalences) 是文化现实。

三 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特点

简述两个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 (Aunt Lute 和 Virago) 和一个西方女性主义译者 (Silber), 在翻译出版中国女性文本方面的特点之前, 我先承认, 我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以下几个假设: Aunt Lute 和 Virago 需要对翻译选材负责, 而 Silber 需要对翻译中的删改负责; 可以把文本选择行为和翻译行为本身, 当作一个“文本”进行“阅读”和分析, 在无法知道真实幕后信息的情况下, 可以根据这些行为本身所代表的“效果”, 判断行为主体的立场, 而类似立场可以是行为主体有意识或主动采取的, 也可以是行为主体无意识或被动(迫)采取的。

通过考察上述两个出版社的选择行为, 我发现, 无论是具有高度“有色”思想的“白人女性”主体 Aunt Lute, 还是具有低度“有色”思想的“白人女性”主体 Virago, 在涉及中国女性文本的翻译选材方面, 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者所具有的“白色”的限制, 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出版社的选择行为体现了这样一种效果, 即它们对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 以及西方有关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认同程度, 在绝对意义上超过了抵制程度。

通过考察译者 Silber 的翻译行为, 我发现,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有色”思想的白人女性, Silber 的“有色”思想和认同主流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 以颇为复杂的方式体现于她对《扶桑》中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翻译。具体而言, 根据 Silber 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的处理情况, 我们可认为, Silber 体现了分裂: 一方面, 她与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的认同, 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許多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的删改; 另一方面, 她的高度“有色”思想, 也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些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的保留。但是, 总体而言, Silber 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立场, 最终还是显得“击败”了她的“有色”思想。

上述个案表明, 某些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译者, 尽管有着抵制西方女性主义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主流话语, 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话语霸权的意图和努力(比如她们具有不同程度的“有色”意识), 也因为种种原因

(包括“白色”的无意识习惯、商业动机、原文本的高度“他性”和“抵制性”等),而成为有关霸权话语的受害者:其行为本身“在效果上”构成的对有关权力关系的复制,大于对有关权力关系的抵制。至于这个倾向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其他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译者,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

第二节 研究局限及后续研究的可能性

在本研究中,尽管我一直努力贯彻自我反思的立场,但努力终究是努力,至于能反思到什么程度,或是反思的有效性能发挥到什么程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进行自我反思的“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者,并非能够完全摆脱 Brownlie (2003)所谓的“阐释限制”(interpretative constraints),正如进行自我反思的描述翻译研究者如 Hermans,在 Brownlie 看来,也同样体现类似局限一样。

事实上,我的自我反思只是意味着我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没有进行自我反思的“效忠取向”的翻译研究在立场上的局限,并非意味着本研究超越了使用某个理论视角进行研究所带来的局限。这种涉及视角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反思或不反思能彻底避免的。比如,语言学、文化学、后殖民理论等学科框架提供了一个审视翻译的“镜头”和阐释视角,在为聚焦和描述创造条件从而使得考察和分析成为可能的同时,也意味着对特定现象所持看法的“过滤”(Tymoczko 2005: 1090-1091)。也就是说,某个理论能使我们更清楚地分析一些现象,但同时也使得我们忽略另外一些重要事实。

除了借用某个理论视角进行研究所带来的局限之外,考虑到后殖民女性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我本人的中国/第三世界女性身份以及我的中国民族主义等,也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的研究,但这种涉及族裔身份的主体性和政治立场也是研究者很难彻底超越的。也就是说,尽管我努力抵制,我所认同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立场,以及我本人的族裔身份等,都可能已在我无意识的情况下起了作用,正如那些声称要抵制白人女性特权,并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译者,在实践过程中仍强化白人女性特权并复制固有权力关系一样。

比如说,我本人的中国人身份可能已在我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影响了我对

Aunt Lute 选择翻译出版《天浴》、《少尉之死》、《卖红苹果的盲女子》的评论，或是对 Virago 选择翻译出版《马燕日记》的评论。因为，我对西方有关西藏问题、农村问题、社会法制问题等的看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跟我的中国人身份相关，而占主流的中国人身份则跟中国的新民族主义相关。比如，在当今语境下，很多中国人认为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是对中国的“妖魔化”，是美国想借机阻止中国崛起并希望中国重蹈苏联之路，并认为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抵制类似妖魔化行为（Mackerras 1999: 155）。

另一方面，我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看 Silber 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的处理，也或许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我本人的中国人身份的影响。比如，我的中国人身份或许使得我对严歌苓式女性主义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大共鸣，而对 Silber 及其所认同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则有着更大的距离感。这些或许都已影响了我在研究过程中的阐释。

此外，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某些内幕消息的缺乏，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的分析和归纳。比如，Aunt Lute 和 Virago 均只出版过一个中国作者，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得出结论的普适性。再比如，我假设 Aunt Lute 和 Virago 对涉及中国女性文本的翻译选材负根本责任（尽管这个假设很合理，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假设 Silber 对《扶桑》中所有严歌苓式女性主义例子的英译负根本责任（尽管这个假设也有一定证据，但同样不能确保对所有例子的处理方式均是 Silber 的意见），考虑到假设与现实的差异，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的有关分析。

最后，考虑到归类本身的局限，因为不同类别之间很多时候有重叠成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的有关分析。

以上是对研究局限的简述。

考虑到本研究只考察了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和译者与中国女性文本之间在翻译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考虑到本研究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所提出的一系列研究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比如，可以考虑建构翻译理论的各种非西方女性主义版本，探索来自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文本在西方翻译出版的异同以及背后的原因，比较西方女性主义出版社、西方非女性主义出版社，以及中国出版社翻译中国女性文本的情况，等等。

参考文献

英文部分

- Agorni, Mirella. 2002. *Translating Italy fo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omen, Translation and Travel Writing, 1739-1797*. Manchester, UK; Northampton, MA: St. Jerome Pub.
- Agorni, Mirella. 2005. "A Marginal(ized)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 History: Women and Transl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eta* 50(3): 817-830.
- Aitchison, Cara Carmichael. 2003. *Gender and Leisure: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Alexander, M. Jacqui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1997. "Introduction: Genealogies, Legacies, Movements." In M. Jacqui Alexander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xiii-xlii.
- Alvesson, Mats, and Kaj Sköldbberg. 2009. *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 Amireh, Amal and Lisa Suhair Majaj. 2000. "Introduction." In Amal Amireh and Lisa Suhair Majaj (eds.) *Going Global: The Transnational Reception of Third World Women Writers*. New York: Garland, 1-26.
- Amireh, Amal. 2000. "Framing Nawal EL Saadawi: Arab Feminism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Signs* 26(1): 215-249.
- Amos, Valerie and Pratibha Parmar. 1984. "Challenging Imperial Feminism." *Feminist Review: Many Voices, One Chant* 17: 3-19.
- Anderson, Kristine J. 2000.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In Olive Classe (ed.)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London;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435-436.
- Ang, Ien.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rrojo, Rosemary. 1994. "Fidelity and the Gendered Translation." *TTR* 8(2): 147-164.
- Arrojo, Rosemary. 1995. "Feminist, 'Orgasmic'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d Their Contradictions." *TradTerm* 2: 67-75.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2007.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2nd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ahri, Deepika. 2004. "Feminism in/and Postcolonialism." In Neil Lazaru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Literary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9.
- Baker, Mona. 1996. "Linguis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plementary or Competing Paradig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ngelika Lauer, Heidrun Gerzymisch-Arbogast, Johann Haller, and Erich Steiner (eds.)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m Imbruch: 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Wilss zum 70 Geburtstag*. Tübingen: Gunter Narr, 9-19.
- Baker, Mona.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London and

- New York: Routledge.
- Balakaeva, Delia. 2007. "Central Asia." In Manfred Beller and Joep Leerssen (ed.) *Imagolog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s: A Critical Survey*. Amsterdam; New York, NY: Rodopi, 123-125.
- Bandia, Paul. 2003. "Postcolonialism and Translation: The Dialectic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S2: 129-142.
- Bao, Zhifen. 1999. "Getting Through the Summer," "Out on a Boat, Facing the Moon, Thinking of My Brother and Sister-in-Law in the Capital," "On Hearing a Flute."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In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ed.)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25-526.
- Bao, Zhihui. 1999. "Sleepless," "Sitting Up at Night," "Thoughts on a Rainy Day," "Going by the Old House."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In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ed.)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24-525.
- Bao, Zhilan. 1999. "Sunset," "Pear Blossoms in the Next Yard," "Spring Sacrifice."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In Kang-I Sun Chang and Haun Saussy (ed.) *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523.
- Barker, Martin. 2008. "Analyzing Discourse." In Michael Pickering (ed.) *Research Methods for Cultural Studi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50-174.
- Bassnett, Susan. 1992. "Writing in No Man's Land: Questions of Gender and Translation." *Ilho do Desterro* 28(2): 63-73.
- Bassnett, Susan and Harish Trivedi. 1999. "Of Colonies, 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 In 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18.
- Batt, Herbert J. (ed. and trans.) 2001. *Tales of Tibet: 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and Wind Horses*.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Beasley, Chris. 1999. *What is Feminism? An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Theory*.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Beasley, Chris. 2005. *Gender and Sexuality: Critical Theories, Critical Thinkers*. London: SAGE.
- Benedict, Helen. 1992. *Virgin or Vamp: How the Press Covers Sex Crime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nedict, Helen. 2005. "The Language of Rape." In Emilie Buchwald, Pamela R. Fletcher, and Martha Roth (eds.) *Transforming a Rape Culture*. Minneapolis: Milkweed Editions, 122-127.
- Bertacco, Simona. 2003. "The Canadian Feminists' Translation Project: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S2: 233-245.
- Bitel, Anton. 2006. "Review of *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 Available from: http://www.musicomh.com/films/cave-of-the-yellow-dog_0606.htm
- Blackwelder, Rob. 1999. "Chen Bends the Rules: Actress-turned-director Defies Chinese Government to Make Political and Personal 'Xiu Xiu'." Available from:

- <http://www.contactmusic.com/new/home.nsf/interviewee/joanchen>
- Bouagada, Habib. 2005. "Orientalism in Translation: The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in 18th Century France and 19th Century England" (MA thesis).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 Bourdieu, Pierre. 2008. "A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Publishing." Translated by Ryan Fraser. *Translation Studies* 1(2): 123-153.
- Brownlie, Siobhan. 2003. "Distinguishing Some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Research: The Issue of Interpretive Constraints." *The Translator* 9(1): 39-64.
- Brownlie, Siobhan. 2007. "Situating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Social Semiotics* 17(2): 135-150.
- Brownlie, Siobhan. 2008. "Resistance and Non-resistance to Boundary Crossing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Target* 20(2): 333-347.
- Cabezón, Joséand Ignacio and Sheila Greeve Davaney. 2004. "Introduction." In Joséand Ignacio Cabezón and Sheila Greeve Davaney (eds.)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Scholarship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New York: Routledge, 1-23.
- Cahill, Ann J. 2001.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of Rape." In *Rethinking Rape*.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14.
- Calderón, Sara Levi. 1995. *The Two Mujeres*. Translated by Gina Kaufer.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Cao, Qing. 2007a.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In Shi Xu (ed.) *Discourse as Cultural Struggl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05-122.
- Cao, Qing. 2007b. "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 A Case Study of a BBC Television Documentary Series *Roads to Xanadu*."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7(2): 275-297.
- Carver, Ann C. and Sung-sheng Yvonne Chang (eds.) 1990. *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Contemporary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of Taiwan*.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at CUNY.
- Chamberlain, Lori. 1988. "Gender and the Metaphorics of Translation." *Signs* 13(3): 454-472.
- Chan, Leo Tak-hung. 2003. "Translation, Transmission, and Travel." In Leo Tak-hung Chan (ed.) *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321-346.
- Chan, Leo Tak-hung. 2004. "Theories from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Modes, Issues and Debates*. Amsterdam: Benjamins, 30-42.
- Chan, Leo Tak-hung. 2006. "Translated Fiction."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4(1): 66-72.
- Chance, Jane. 1998. "Gender Subversion and Linguistic Castration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ristine de Pizan." In A. Roberts (ed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Medieval Texts*. Gainesville, Florida: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61-194.
- Chang, Nam-fung. 2009. "Repertoire Transfer and Resistance: The Westerniz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e Translator* 15(2): 305-325.

- Chapkis, Wendy. 1997. *Live Sex Acts: Women Performing Erotic Labor*. New York: Routledge.
- Chaudhuri, Nupur and Margaret Strobel (eds.) 1992. *Western Women and Imperialism: Complicity and Resista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hen, Ellen Mary. 1969. "Nothingness and the Mother Principle in Early Chinese Taoism."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9(3): 391-405.
- Cheung, Martha P. Y. 2002. "Power and Ideology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 Analysis of Three Seminal Works." In Theo Hermans (ed.)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44-164.
- Choudhuri, Nath Indra. 1997. "The Plurality of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Meta* 42(2): 439-433.
- Chow, Rey. 1991a.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how, Rey. 1991b. "Violence in the Other Country." In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81-100.
- Chow, Rey. 1995.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ow, Rey. 2002. *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 Clarke, John James. 2000. *The Tao of the West: Western Transformations of Taoist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Cornelius, David. 2007. "Review of *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 Available from: <http://www.dvdtalk.com/reviews/26899/cave-of-the-yellow-dog/>
- Crust, Kevin. 2006. "Review of *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 Available from: <http://www.calendarlive.com/movies/reviews/cl-et-cave17nov17,0,5461362.story>
- Dardenne, Sabine. 2006. *I Choose to Live*. Translated by Penelope Dening. London: Virago Press.
- Davaa, Byambasuren and Lisa Reisch. 2007. *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 Translated by Sally-Ann Spencer. London: Virago Press.
- Devy, Ganesh. 1999.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History." In 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82-188.
- Díaz-Diocaretz, Myriam. 1985. *Translating Poetic Discourse: Questions on Feminist Strategies in Adrienne Rich*.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Ding, Ling and Lu Hsun. 2007. *The Power of Weakness*.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at CUNY.
- Dingwaney, Anuradha. 1995. "Introduction: Translating 'Third World' Cultures." In Anuradha Dingwaney and Carol Maier (ed.)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Texts*. Pittsburgh;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3-15.

- Ding, Xiaoqi. 1990. "Indica, Indica."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Mother Jones* 15(7): 52-58.
- Ding, Xiaoqi. 1993. *Maidenhome*. Translated by Chris Berry and Cathy Silber. Melbourne: Hyland House Publishing.
- Ding, Xiaoqi. 1994. *Maidenhome*. Translated by Chris Berry and Cathy Silber.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DiQuinzio, Patrice. 1999. *The Impossibility of Motherhood: Feminism, Individu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Mothering*.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 Dirlik, Arif. 1996.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96-118.
- Dirlik, Arif. 1997. "The Global in the Local." In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84-102.
- Donaldson, Laura E. 1992. *Decolonizing Feminisms: Race, Gender and Empire Building*. London: Routledge.
- Donovan, Josephine. 2000. *Feminist Theory: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3rd Ed.)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 Eagleton, Mary. 1996. *Working with Feminist Critici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Emberley, Julia V. 1993. *Thresholds of Difference: Feminist Critique, Native Women's Writings, Postcolonial The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Evans, Jamie Lee. 1995. "Aunt Lute Book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ction." In Loraine Edwals and Midge Stocker Chicago (eds.) *The Woman-centered Economy: Ideals, Reality, and the Space in Between*. Chicago: Third Side Press, 299-303.
- Evans, Judith. 1995. *Feminist Theory Today: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wave Feminism*.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Fehr, Wendy. 2006. "Paradigms in Tension: Islamic Feminism as an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Dialectic in Turkey" (MA thesis). Saint Mary's University.
- Felski, Rita. 2000. *Doing Time: Feminist Theory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Feng, Jicai. 1991. "They Who Have Suffered Greatly."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In *Voices From the Whirlwind: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3-27.
- Feng, Pin-Chia. 2000. "Remapp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Case of *Fu Sang*."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38(1): 61-71.
- Flotow, Luise von. 1991. "Feminist Translation: Contexts, Practices, Theories." *TTR* 4(2): 69-84.
- Flotow, Luise von. 1997a. "Mutual Pun-ishment? Feminist Wordplay in Translation: Mary Daly in German." In Dirk Delabastita (ed.) *Traductio: Essays on Punning and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45-66.
- Flotow, Luise von. 1997b. *Translation and Gender*.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Flotow, Luise von. 1999. "Genders and the Translated Text: Developments in 'Transformance'." *Textus, English Studies in Italy* 12(2): 275-287.

- Flotow, Luise von. 2007. "Gender and Translation." In Piotr Kuhiwczak and Karin Littau (ed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92-105.
- Gambier, Yves. 2007. "Y a-t-il place pour une socio-traductologie?" In Michael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5-218.
- Garayta, Isabel. 1998. "'Womanhandling' the Text: Feminism, Rewriting, and Translation"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Gentzler, Edwin. 2003. "Translation,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Americas." *EnterText* 2(2): 12-38.
- Ghandi, Leela. 1998. *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Ghosh, Bishnupriya. 2001. "Feminisms." In John Hawley (ed.) *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70-177.
- Gioseffi, Daniela (ed.) 2003. *Women on War: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Women's Writing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at CUNY.
- Gisbert, Gora and José Santaemilia. 2003. "Gender and Translation: Virginia Woolf's *To the Lighthouse* in French." In José Santaemilia (ed.) *Genero, lenguaje y traducción*. Valencia: Universitat de Valencia, 474-484.
- Godard, Barbara. 1984. "Translation and Sexual Difference." *Resources for Feminist Research* 13(3): 13-16.
- Godard, Barbara. 1989. "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 *Tessera* 6: 42-53.
- Godard, Barbara. 2000. "Gender and Gender Politics in Translation." In Olive Classe (ed.)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London;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501-511.
- Gold, Jerome. 1996. "Ruth Gundle. The Eighth Mountain Press." In *Publishing Lives: Interviews with Independent Book Publisher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and British Columbia*. Mill creek, WA: Black Heron Press, 107-119.
- Goldberg, Elizabeth Swanson. 2007. "Torture II: Citizenship." *Beyond Terror: Gender, Narrative, Human Right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57-86.
- Goldblatt, Howard. 2000. "Border Crossings: Chinese Writing in Their World and Ours." In Timothy B. Weston and Lionel M. Jensen (eds.) *China Beyond the Headlin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327-346.
- Goodings, Lennie. 1993. "Cleaning the Office and Changing the World." In Peter Owen (ed.) *Publishing Now*. London: Peter Owen, 64-70.
- Goozé, Marjanne E. 1995. "A Language of Her Own: Bettina Brentano-von Arnim's Translation Theory and Her English Translation Project." In Elke Frederiksen and Katherine R. Goodman (eds.) *Bettina Brentano-von Arnim: Gender and Politic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349-401.
- Gouanvic, Jean-Marc. 2007. "Objectivation, réflexivité et traduction. Pour une re-lecture bourdieusienne de la traduction." In Michael Wolf and Alexandra

-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ersta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79-107.
- Griffin, Susan. 1978.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Gross, Rita M. 1993. *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 A Feminist History,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Buddh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upta, Prasenjit. 1998. "Post- or Neo-Colonial Translation? Linguistic Inequity and Translator's Resistance."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2: 170-193.
- H, M. "PFS Film Review: Xiu Xiu." Available from: <http://www.geocities.com/~polfilms/xiuxiu.html>
- Haber, Joram G. 1998. "Forgiveness and Feminism." In Joram G. Haber and Mark S. Halfon (eds.) *Norms and Values: Essays on the Work of Virginia Hel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41-152.
- Hagemann, Susanne. 2005.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James Kelman's Translated Accounts." *Scottish Studies Review* 6(1): 74-83.
- Hannay, Margaret Patterson (ed.) 1985. *Silent But for the Word: Tudor Women as Patrons, Translators, and Writers of Religious Works*. Kent, Ohio: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ngton, Imani and Chryell Bellamy (ed.) 2002. *Positive/Negative: Women of Color and HIV/AIDS*.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Hatim, Basil and Jeremy Munday. 2004. *Transla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Hauptmann, Gaby. 2001. *In Search of an Impotent Man*. Translated by Shaun Whiteside. London: Virago Press.
- Hauptmann, Gaby. 2002. *Grabbing the Family Jewels*. Translated by Helen Atkins. London: Virago Press.
- Healy, Michelle. 2004. "The Cachet of the 'Invisible' Translator: Englishwomen Translating Scienc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Ottawa.
- Henitiuk, Valerie. 1999. "Translating Woman: Reading the Female through the Male." *Meta* 44(3): 469-484.
- Hermans, Theo. 1998a. "Translation and Normativity."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5(1-2): 51-72.
- Hermans, Theo. 1988b. "Some Concluding Comments on Debates and the Responses."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and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and Society* 5(1-2): 135-142.
- Hermans, Theo. 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Descriptive and Systematic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Hermans, Theo. 2002. "Paradoxes and Aporias i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lessandra Riccardi (ed.)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23.
- Hermans, Theo. 2009. "Translation, Ethics, Politics." In Jeremy Munday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93-105.
- Jacquemond, Richard. 1992.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Case of

- French-Arabic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39-158.
- Jaggar, Alison M. 2005. “Global Responsibility and Western Feminism.” In Barbara S. Andrew, Jean Keller, and Lisa H. Schwartzman (eds.)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Ethics and Politics: Feminist Ethics and Social Theor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85-200.
- James, Stanlie M. 1989. “Black Femin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men in Ghana and the U.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Denver.
- Jin, Wen. 2006. “Transnational Criticism and Asian Immigrant Literature in the U.S.: Reading Yan Geling’s *Fusa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7(4): 570-600.
- Johnson, Barbara. 1985. “Taking Fidelity Philosophically.” In Joseph F.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42-148.
- Johnson-Odim, Cheryl. 1991. “Common Themes, Different Contexts: Third World Women and Feminism.” In Chandra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314-327.
- Jung, C. G. 1986. “The Mother Archetype.” *Aspects of the Feminine*. Translated by R. F. C. Hull. London: ARK, 109-112.
- Kadish, Doris. 1994. “Translatin in Context.” In Doris Y. Kadish and Françoise Massardier-Kenney (eds.) *Translating Slavery: Gender and Race in French Women’s Writing, 1783-1823*.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6-64.
- Kahf, Mohja. 2000. “Packaging ‘Huda’: Sha’rawi’s Memoir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ption Environment.” In Amal Amireh and Lisa Suhair Majaj (eds.) *Going Global: The Transnational Reception of Third World Women Writers*. New York: Garland.
- Keough, Peter. 1999. “China Syndrome: Xiu Xiu Must Go on.” Available from: http://www.bostonphoenix.com/archive/movies/99/05/27/XIU_XIU_THE_SENT_DOWN_GIRL.html
- Kim, Christine. 2004. “The Politics of Print: Feminist Publishing and Canadian Literary Production” (PhD thesis). York University.
- Kinkley, Jeffrey C. 2002. “Review of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6(2): 136-137.
- Klein, Anne Carolyn. 1995. *Meeting the Great Bliss Queen: Buddhists, Feminists, and the Art of the Self*. Boston: Beacon Press.
- Koskinen, Kaisa. 2004. “Shared Culture? Reflections on Rec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arget* 16(1): 143-156.
- Krontiris, Tina. 1992. *Oppositional Voices: Women as Writers and Translators of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 Kuegler, Sabine. 2005. *Jungle Child*. Translated by Christian Kuegler. London: Virago Press.
- Lai, Amy Tak-yee. 2007. *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Diaspora*. Newcastle, UK: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 Lamb, Mary Ellen. 1985. “Cooke Sisters: Attitudes toward Learned Women.” In

- Margaret Patterson Hannay (ed.) *Silent But for the Word: Tudor Women as Patrons, Translators, and Writers of Religious Works*. Kent, Ohio: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07-125.
- Laughlin, Karen and Eva Wong. 1999. "Feminism and/in Taoism." In Arvind Sharma and Katherine K. Young (eds.) *Feminism and World Religion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48-178.
- Lee, Pauline C. 2000. "Li Zhi and John Stuart Mill: A Confucian Feminist Critique of Liberal Feminism." In Li Chenyang (ed.)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Confucianism, Ethics, and Gender*. Chicago, Ill.: Open Court, 113-132.
- LeGates, Marlene. 2001. *In Their Time: A History of Feminism in Western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Lewis, Reina and Sara Mills. 2003. "Introduction." In Reina Lewis and Sara Mills (eds.) *Feminist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24.
- Littau, Karin. 2000. "Pandora's Tongues." *TTR* 13(1): 21-35.
- Lotbinière-Harwood, Suzanne de. 1991. *The Body Bilingual: 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 Toronto: The Women's Press.
- Lowe, Lisa. 1991. *Critical Terrains: 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ung, Rachel. 2003. "Translating Sensitive Texts."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11(4): 255-268.
- Ma, Sheng-mei. 1998. *Immigrant Subjectivities in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Diaspora Literatur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a, Yan. 2002. *Le journal de Ma Yan: Vie quotidienne d'une écolière chinoise*. Pré sentation by Pierre Haski. Paris: Éditions Ramsay.
- Ma, Yan. 2004. *The Diary of Ma Ya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ierre Haski. Translated by Lisa Appignanesi. London: Virago Press.
- Ma, Yan. 2005. *The Diary of Ma Ya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ierre Haski. Translated by Lisa Appignanesi. London: Virago Press.
- Ma, Yan. 2005. *The Diary of Ma Ya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ierre Haski. Translated by Lisa Appignanesi.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Ma, Yan. 2009. *The Diary of Ma Ya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Pierre Haski. Translated by Lisa Appignanesi.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Mackerras, Colin. 199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i, Mukhtai, with Marie Thérèse Cuny. 2007. *In the Name of Honor*. Translated by Linda Coverdale. London: Virago Press.
- Maier, Carol. 1998. "Issues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Women's Fiction." *Bulletin of Hispanic Studies* 75: 95-108.
- Malina, Danusia and Sian Maslin-Prothero. 1998. "Coming Clean: On Being Feminist Editors." In Danusia Malina and Sian Maslin-Prothero (ed.) *Surviving the Academy: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Philadelphia: Falmer Press, 146-155.
- Massardier-Kenney, Françoise. 1994. "Trans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oris Y.

- Kadish and Françoise Massardier-Kenney (eds.) *Translating Slavery: Gender and Race in French Women's Writing, 1783-1823*.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1-25.
- McWilliams, Sally E. 2005. "From a Distance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Theorizing Diasporic Chinese Female Subjectivities in Geling Yan's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Meridians* 1: 133-160.
- Mehta, Brinda J. 2000. "Postcolonial Feminism." In Lorraine Code (ed.) *Encyclopedia of Feminist Theori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395-397.
- Mezei, Kathy. 1986. "The Question of Gender in Translation: Examples from Denise Boucher and Anne Hébert: A Corollary to Evelyne Voldeng's 'Trans/lata/latus'." *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 57: 136-141.
- Nieh, Hualing. 1998. *Mulberry and Peach: Two Women of China*. Translated by Jane Parish Yang with Linda Lappin.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at the CUNY.
- Mikell, Gwendolyn. 1995. "African Feminism: Toward a New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Feminist Studies* 21(2): 405-424.
- Mohanty, Chandra. 1991a. "Introduction.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In Chandra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47.
- Mohanty, Chandra. 1991b.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Chandra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51-80.
- Moi, Toril. 2002. "While We Wai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Sex*." *Signs* 27(4): 1005-1035.
- Montero, Rosa. 2010. *Beautiful and Dark*. Translated by Adrienne Mitchell.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Mow, Shirley, Tao Jie, and Zheng Bijun (eds.) 2004. *Holding up Half the Sky: Chinese Wome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at CUNY.
- Murray, Simone. 2004. *Mixed Media: Feminist Presses and Publishing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 Narayan, Uma. 1997. *Dislocating Cultures: Identities, Traditions, and Third World Femi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Narayan, Uma. 1998. "Essence of Culture and a Sense of History."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13(2): 86-106.
- Niranjana, Tejaswini. 1992. *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naemeka, Obioma. 1997. "Urban Spaces, Women's Places. Polygamy as a Sign in Mariama Bâ's Novels." In Obioma Nnaemeka (ed.) *The Politics of (M)othering: Womanhood, Identity, and Resistance in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62-191.
- Nnaemeka, Obioma. 2005. "Mapping African Feminisms." In Andrea Cornwall (ed.) *Readings in Gender in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James Currey, 31-41.
- O'Neill, Maggie. 2001. "Feminism(s) and Prostitution." *Prostitution and Feminism: Towards a Politics of Feeling*.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5-41.
- Ong, Aihwa. 1988. "Colonialism and Modernity: Feminis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Inscriptions* 3-4: 79-93.
- Pettersson, Bo. 1999. "The Postcolonial Turn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Reviewed." Available from: http://www.uqtr.ca/AE/vol_4/petter.htm
- Pym, Anthony. 1998.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Qian, Gang. 1989. *The Great China Earthquake*. Translated by Nicola Ellis and Cathy Silb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Rajan, Rajeswari Sunder and You-me Park. 2000. "Postcolonial Feminism/Postcolonialism and Feminism." In Henry Schwarz and Sangeeta Ray (eds.) *A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Studie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53-71.
- Ramakrishna, Shantha. 2000.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rough Translation: An Indian Perspective." In Sherry Simon and Paul St-Pierre (eds.)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87-100.
- Ramanathan, Geetha, and Stacey Schlau. 1995. "Third World Women's Texts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Criticisms." *College Literature* 22(1): 1-9.
- Raphael, Melissa. 2000. *Introducing Theology: Discourse on the Goddess*. Cleveland, Ohio: Pilgrim Press.
- Reed, Kate. 2008. "Racing the Feminist Agenda." In Diane Richardson and Victoria Robinson (eds.) *Introducing Gender and Women's Studies*. Basingstok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91-103.
- Robinson, Douglas. 1995. "Theorizing Translation in a Woman's Voice: Subverting the Rhetoric of Patronage, Courtly Love and Morality." *The Translator* 1(2): 153-175.
- Robinson, Douglas. 1997.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Rosenlee, Li-Hsiang Lisa. 2006. *Confucianism and Wome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othman, Barbara Katz. 1994. "Beyond Mothers and Fathers: Ideology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In Evelyn Nakano Glenn, Grace Chang, and Linda Rennie Forcey (eds.) *Mothering: Ideology, Experience and Agency*. New York: Routledge, 139-160.
- Ruddick, Sara. 1989.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 Boston: Beacon Press.
- Saliba, Therese. 2000. "Arab Feminism at the Millennium." *Signs* 25(4): 1087-1092.
- Sánchez, Dolores. 2007. "The Truth about Sexual Difference: Scientific Discourse and Cultural Transfer." *The Translator* 13(2): 171-194.
- Saukko, Paula. 2003. *Doing Research in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nd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Sautman, Barry. 1999. "Year of the Yak: The Tibet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U.S.-China Relations." In Peter Koehn and Joseph Y. S. Cheng (eds.) *The Outlook for U.S.-China Relations Following the 1997-1998 Summits: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81-202.
- Scanlon, John and Julia Swindells. 1996. "Bad Apple." In Mary Eagleton (ed.)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31-136.
- Schager, Nick. 2006. "Review of *The Cave of the Yellow Dog*." Available from: http://www.slantmagazine.com/film/film_review.asp?ID=2634
- Schoenfelder, Lisa and Barb Wieser (ed.) 1995. *Shadow on a Tightrope: Writings by Women on Fat Oppression*.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Schutte, Ofelia. 2000. "Cultural Alteri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Feminist Theory in North-South Contexts." In Naomi Zack (ed.) *Women of Color and Philosophy: A Critical Reader*. Malde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44-68.
- Seierstad, Asne. 2004. *A Hundred and One Days*. Translated by Ingrid Christophersen. London: Virago Press.
- Seierstad, Asne. 2005. *With Their Backs to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Sindre Kartvedt. London: Virago Press.
- Seierstad, Asne. 2009. *The Angel of Grozny: Life Inside Chechnya*. Translated by Nadia Christensen. London: Virago Press.
- Sengupta, Mahasweta. 1995. "Translation, Colonialism and Poetics: Rebindranath Tagore in Two Worlds." In Susan Bassnett and Andra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Cassell, 56-63.
- Shakya, Tsering. 2001. "Foreword: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presentation in Tibet." In Herbert J. Batt (ed. and trans.) *Tales of Tibet: 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and Wind Horses*.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xi-xxiii.
- Shapiro, Anna. 2001. "Fate, Dope, and Clarity." *The Observer*. July 22nd.
- Sheffield, Carole J. 1995. "Sexual Terrorism." In Jo Freeman (ed.) *Wome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5th Ed.) Mountain View, California: Mayfield Pub. Co., 1-21.
- Shen, Shiao-Ying. 2001. "Locating Feminine Writing in Taiwan Cinema: A Study of Yang Hui-Shan's Body and Sylvia Chang's *Siao Yu*." *Postscript* 20(2-3): 115-123.
- Shih, Shu-Mei. 2002. "Towards an Ethics of Transnational Encounter, or 'When' Does a 'Chinese' Woman Become a 'Feminist'?"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3(2): 90-126.
- Short, Kayann. 1994. "Publishing Feminism in the Feminist Press Movement, 1969-1994"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 Shread, Carolyn. 2007. "Metamorphosis or Metramorphosis? Towards a Feminist Ethics of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TTR* 20(2): 213-242.
- Silber, Cathy. 1992. "A 1000-year-old Secret." *Ms.* 3(2): 58-60.
- Silber, Cathy. 1994a. "Foreword." In Ding Xiaoqi *Maidenhome*. San Francisco: Aunt

- Lute Books, xi-xiv.
- Silber, Cathy. 1994b. "From Daughter to Daughter-in-Law in the Women's Script of Southern Hunan." In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47-68.
- Silber, Cathy. 1995a. "Women's Writing from Hunan." In *China for Women: Travel and Culture*.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at the CUNY, 13-20.
- Silber, Cathy. 1995b. "Nüshu (Chinese Women's Script) Literacy and Literature"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Silber, Cathy. 2000. "Literature: China." In Cheris Kramarae and Dale Spender (eds.)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Women: Global Women's Issues and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1259-1261.
- Silber, Cathy. 2002. "Privac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Bonnie McDougall and Anders Hansson (eds.) *Chinese Concepts of Privacy*. Leiden: Brill, 55-78.
- Simon, 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Simon, Sherry. 1997. "Translation, Postcolonial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Meta* 42(2): 462-477.
- Simon, Sherry. 2000. "Introduction." In Sherry Simon and Paul St-Pierre (eds.)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9-29.
- Simon, Sherry and Paul St-Pierre (eds.) 2000.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 Simons, Judy. 1998. "Women, Publishing, and Power." In Judy Simons and Kate fullbrook (eds.) *Writing, a Woman's Business: Women, Writing and the Marketplace*.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83-192.
- Simons, Margaret. 1983. "The Silencing of Simone de Beauvoir: Guess What's Missing from *The Second Sex*."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6(5): 559-164.
- Siwak, Ewa. 1998, "Rewriting Women's Discourse across Cultures: Rece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Ingeborg Bachmann's Prose in Poland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Snell-Hornby, Mary. 2001. "The Space 'in between': What is a Hybrid text?"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2(2): 207-216.
- Snell-Hornby, Mary. 2003. "Re-creating the Hybrid Text: Postcolonial Indian Writings and the European Scene." *Linguistica Antverpiensia* NS2: 173-189.
- Spivak, Gayatri. 1985.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Critical Inquiry* 12(1): 235-61.
- Spivak, Gayatri. 1988a. "Subaltern Studies: 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 In R. Guha and G. Spivak (eds.) *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2.
- Spivak, Gayatri. 1988b.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71-313.

- Spivak, Gayatri. 1990. "Criticism, Feminism, and the Institution." In Sarah Harasym (ed.)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16.
- Spivak, Gayatri. 1993. "In a Word: Interview." In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24.
- Spivak, Gayatri. 1993.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79-200.
- Spivak, Gayatri. 1995. "Translator's Preface," "Translator's Note," "Afterword." In Mahasweta Devi *Imaginary Maps: Three Stories*.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Gayatri Spivak.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xxiii-xxix, xxxi, 197-205.
- Sragow, Michael. 1999. "Joan Chen: Guerilla Director." Available from: <http://www.salon.com/ent/col/srag/1999/05/27/chen/>
- Stasiulis, Daiva. 1993. "Authentic Voice: Anti-racist Politics in Canadian Feminist Publishing and Literary Publication." In Sneja Gunew and Anna Yeatman (ed.)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35-60.
- Steady, Filomena Chioma. 1987. "African Feminism: A Worldwide Perspective." In Rosalyn Terborg-Penn, Sharon Harley, and Andrea Benton Rushing (eds.) *Women in Africa and the African Diaspora*.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3-24.
- Steier, Frederick. 1991. "Research as Self-Reflexivity, Self-Reflexivity as Social Process." In Frederick Steier (ed.)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11.
- Stronach, Jeannine. 1999. "Conversation with Will Schwalbe." Available from: http://www.waterbridgereview.org/122006/cnv_sc_hwalbe.php
- Su, Qing. 2005. "Waves."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In Amy Dooling (ed.) *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 The Revolutionary Years, 1936-19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78-206.
- Suleri, Sara. 1992. "Woman Skin Deep: Femin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In *Critical Inquiry* 18(4): 756-769.
- Sullivan, Shannon. 2006. *Revealing Whiteness: The Unconscious Habits of Racial Privile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umillera, Rocío G. 2008. "Postcolonialism and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Wide Sargasso Sea* into Spanish." Available from: http://www.iatis.org/newvoices/issues/2008/sumillera_paper_2008.pdf
- Sun, Jianxi. 1991. "Jia Pingwa and His Fiction." Translated by Denis C. Mair and Cathy Silber. In Ying Bian (ed.) *The Time is Not Yet Rip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99-111.
- Sun, Yifeng. 2006. "Translating Foreign Otherness."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7(1): 23-36.
- Sun, Yifeng. 2007. "(Multi)-Cultural Context: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Adrift."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53(3): 241-259.
- Sun, Yifeng. 2009. "Cultural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calization."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40(2-3): 89-110.
- Susam-Sarajeva, Şebnem. 2005. "A Course on Gender and Translation." In José

- Santaemilia (ed.) *Gender, Sex, and Translation: The Manipulation of Identit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61-176.
- Teng, Jinhua Emma. 1996.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 in the Western Academy: A Critical Review." *Signs* 22(1): 115-151.
- The Feminist Press. 1995. *China for Women: Travel and Culture*.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at CUNY.
- Tolliver, Joyce. 2002. "Rosalía between Two Shores: Gender, Rewriting and Translation." *Hispania* 85(1): 33-43.
- Trivedi, Harish. 1997. "India, England, France: A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al Triangle." *Meta* 42(2): 407-415.
- Tymoczko, Maria. 1999a.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Tymoczko, Maria. 1999b. "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40.
- Tymoczko, Maria. 2000a. "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tivism, Soci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eopolitical Shifts." *The Translator* (6)1: 23-47.
- Tymoczko, Maria. 2000b. "Translations of Themselves: The Contours of Postcolonial Fiction." In Sherry Simon and Paul St-Pierre (eds.) *Changing the Terms: 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47-166.
- Tymoczko, Maria. 2002. "Connecting the Two Infinite Orders: Research Metho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o Hermans (ed.)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9-25.
- Tymoczko, Maria. 2005. "Trajectories of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eta* 50(4): 1082-1097.
- Venuti, Lawrence.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Vélez, Diana (ed. and trans.) 1997. *Reclaiming Medusa: Short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Puerto Rican Women*.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Vieira, Else Ribeiro Pires. 1999. "Liberating Calibans: Reading of Antropofagia and Harold de Campos' Poetics of Transcreation." In Susan Bassnett and Harish Trivedi (eds.)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95-113.
- Wang, Hui. 2009. "Postcolonial Approaches." In Mona Baker and Gabriela Saldanha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ilton Park, Abingdon: Routledge, 200-203.
- Wang, Meng. 1989. *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 (Vol. 2).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and Deirdre Hu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Wang, Ning, and Sun Yifeng. 2008. "Introduction." In Wang Ning and Sun Yifeng (eds.) *Translation, Globalisation and Localiz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14.

- Wasserstrom, Jeffrey N. 2000. "Big Bad China and the Good Chinese: An American Fairy Tale." In Timothy B. Weston and Lionel M. Jensen (eds.) *China Beyond the Headlin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3-36.
- Webb, J. Anne. 1995. "Feminist Publishing in Practice: Hurdles, Constraints and Debate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 Wigman, Robyn. 1999. "Whiteness Studies and the Paradox of Particularity." *Boundary 2* 26(3): 115-150.
- Wolf, Michaela. 2005. "The Creation of a 'Room of One's Own': Feminist Translators as Mediators between Cultures and Genders." In José Santaemilia (ed.) *Gender, Sex, and Translation: The Manipulation of Identitie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5-27.
- Wollstonecraft, Mary. 1775.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New York: Norton.
- Wu, Zao. 1989. "Song in Sixteen Words," "To the Tune of 'Tung Hsien Ko'," "On a Picture of Self with Hoe, Cultivating Plum Blossoms in Moonlight."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The Literary Review* 32(3): 396-397.
- Yan, Geling. 1999. *White Snakes and Other Stories*. Translated by Lawrence A. Walker.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 Yan, Geling. 2001.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Translated by Cathy Silber. New York: Hyperion East.
- Yeğenoğlu, Meyda. 2003. "Veiled Fantasies: Cultural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the Discourse of Orientalism." In Reina Lewis and Sara Mills (eds.) *Feminist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42-566.
- Young, Stacey. 1997. *Changing the Wor(l)d: Discourse, Politics, and the Feminist Mov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Yves, Gambier. 2007. "Y a-t-il place pour une socio-traductologie?" In Michael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eds.)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5-218.
- Zauberga, Ieva. 2000. "Rethinking Power Relations in Translation."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1(1): 49-56.
- Zhou, Yupei. 2003. "The Conceptions of Freedo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 Fiction. Gish Jen. Yan Geling. Ha Jin. Maureen F. McHugh" (PhD thesis). Kent State University.
- Zhu, Aijun. 2007. *Feminism and Global Chineseness: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Controversial Women Authors*. Youngstown, N.Y.: Cambria Press.
- Zonana, Joyce. 1993. "The Sultan and the Slave: Feminist Oriental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Jane Eyre'." *Signs* 3: 592-617.

中文部分

- 阿部正雄. 2003. 佛教. 张志强译. 台北: 麦田出版.
- 柏邦尼. 2008. "严歌苓: 写作是一种生理运动." 载自: <http://bulaoge.net/topic.blg?dmn=bonnie&tid=916782#Content>
- 陈瑞林. 2003a. "风景这边独好——我看当代北美华文文坛." 华文文学 1: 8-14.

- 陈瑞林. 2003b. “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 华文文学 5: 34-61.
- 陈思和. 2006a. “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 庄园编.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1-29.
- 陈思和. 2006b. “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 庄园编.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30-36.
- 陈燕妮. 1997. 陈燕妮采访录: 50 个中国人的美国经验.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 程绮瑾. 2006. “严歌苓专访: 一个女人的哲学和历史观.” 载自: <http://book.sina.com.cn/news/a/2006-05-12/1726200590.shtml>
- 崔大华等. 2003. 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 丁宁. 2007. “女性主义从启蒙到运动.” 荒林等. 微笑的话语行动——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文集. 北京: 九州出版社, 4-7.
- 丁小琪. 1989. “黑猫.” 另外的女人.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84-121.
- 丁小琪. 1989. “杀母.” 另外的女人.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88-202.
- 胡亚非. 1997. “中国文学: 本土”与海外——作家严歌苓访谈录.” 载自: http://wenxinshe.zhongwenlink.com/home/blog_read.asp?id=3584&blogid=39790
- 老子. 1995. 道德经. 陈国庆和张爱东注译. 西安: 三秦.
- 李炳海. 1992. 道家与道家文学.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硕儒. 2001. “严歌苓李硕儒对话录.” 出版广角 8: 82-84.
- 李激. 2008. “文化视野中的严歌苓小说主题论”(硕士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 李文杰. 2007. “论严歌苓的女性写作”(硕士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 林婉蓉. 2006. “严歌苓第一人称小说叙事研究”(硕士论文). 国立中山大学.
- 刘贵杰. 2006. 佛教哲学.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刘笑敢. 2008. 道教. 陈静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楼乘震. 2006. “五年的采访酝酿造就《第九个寡妇》——严歌苓说, ‘这是一个非写不可的故事.’” 载自: <http://paper.sznews.com/szsb/20060404/ca2252637.htm>
- 麻蕊. 2009. “文革对女性的双重迫害: 对《白蛇》中徐群珊形象的分析.” 学理论 24: 195-196.
- 马燕、韩石. 2003. 马燕日记: 一个感动世界的现代童话.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马燕、韩石. 2004. 马燕日记. 何岩萍、梁若瑜译. 台北: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 Mianhuatang. 2006. “严歌苓: 低调而骄傲.” 庄园(编).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62-264.
- 缪丽芳. 2006. “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节分析.” 华文文学 6: 88-91.
- 乔以钢. 2007. “女性和‘主义’.” 荒林等. 微笑的话语行动——中国女性主义学术文化沙龙文集. 北京: 九州出版社, 8-12.
- 乔以钢, 刘堃. 2007. “论北美华文女作家创作中‘离散’内涵的演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1: 90-95.
- 邵毅. 2007. “重写与制约: 从女性主义角度论《傲慢与偏见》的中译本”(博士论文). 香港浸会大学.
- 苏青. 1952. “涛.” 涛. 香港: 励力, 25-56.
- 王德威. 1996. “短评《扶桑》.” 严歌苓. 扶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vi-vii.

- 王红旗. 2007. “严歌苓: 探索人性原根大爱的女性传奇.” 载自: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54155/57487/5613312.html>
- 王颖. 2001. “著名旅美女作家严歌苓访谈录.” 严歌苓. 波西米亚楼.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2-215.
- 波伏娃, 西蒙娜. 1998. 第二性. 陶铁柱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 奚志英. 2006. “论严歌苓小说对迁移生活的写照” (硕士学位论文). 扬州大学.
- 雅非. 2003. “在海外写作: 作家严歌苓访谈.” 载自: <http://www.diouban.com/grouptopic/3157380/>
- 严歌苓. 1993. 少女小渔 (小说集). 台北: 尔雅出版社.
- 严歌苓. 1995. 海那边 (小说集). 台北: 九歌出版社.
- 严歌苓. 1996a. 倒淌河 (小说和散文集). 台北: 三民出版社.
- 严歌苓. 1996b. 扶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严歌苓. 1999a. 风筝歌 (小说集).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社.
- 严歌苓. 1999b. “一天的断想.” 波西米亚楼. 台北: 三民, 1-13.
- 严歌苓. 1999b. “FBI 监视下的婚姻.” 波西米亚楼. 台北: 三民, 79-94.
- 严歌苓. 1999b. “性与文学.” 波西米亚楼. 台北: 三民, 153-161.
- 严歌苓. 1999b. “弱者的宣言——写在影片《少女小渔》获奖之际.” 波西米亚楼. 台北: 三民, 171-177.
- 严歌苓. 1999b. “雌性之地.” 波西米亚楼. 台北: 三民, 179-184.
- 严歌苓. 1999c. 白蛇 (小说集). 台北: 九歌出版社.
- 严歌苓. 2005. “十年一觉美国梦.” 华文文学 3: 47-48.
- 严歌苓. 2006. “性感没了是彻底失败.” 庄园编.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65-267.
- 严歌苓等. 2006. “王葡萄: 女人是第二性吗? 严歌苓与复旦大学学生对话.” 上海文学 5: 4-7.
- 俞小时. 2002. “严歌苓: ‘摒弃’猎奇写作.” 文学报. 8月15日.
- 张爱玲. 1993. “谈女人.” 流言.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张琼. 2004. “此身·彼岸.” 华文文学 6: 66-68.
- 赵爱华. 2007. “论严歌苓多元、开放、平等的文化身份观的展示”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 庄园. 2006. “严歌苓访谈.” 华文文学 1: 100-102.